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中国与世界

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

2019年7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MGI) 自 1990 年创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深入了解快速发展变化的全球经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作为麦肯锡公司的商业和经济研究部门，旨在为企业、政府和社会事业领导人提供各种事实和洞见，作为其制定管理决策和政策决策的依据。

我们的研究融合了经济学与管理学两门学科，结合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商业领袖的深入见解。通过“从微观到宏观”的方法，从分析微观经济的产业趋势入手，以求更好地了解影响商业战略和公共政策的宏观经济因素。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表的深度研究报告目前涵盖了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 多个产业，现阶段的研究重心围绕 6 大主题：生产力与经济增长、自然资源、劳动力市场、全球金融市场演变、科技和创新的经济效应以及城市化。最新报告主要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研究与评估，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收入不均、生产率难题、解决性别歧视问题带来的经济利益、全球竞争新纪元、中国的创新、数字和金融全球化等。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工作由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负责领导，包括 Jacques Bughin、华强森和 James Manyika（兼任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主席）。研究院成员也包括了 Michael Chui、Susan Lund、Anu Madgavkar、Jan Mischke、Sree Ramaswamy 和 Jaana Remes等全球董事合伙人，以及 Mekala Krishnan、成政珉等资深研究员。

我们的项目团队由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资深董事和资深研究员领衔，成员包括来自全球麦肯锡分公司的咨询顾问。这些团队充分利用了麦肯锡的全球董事和行业以及管理专家网络资源。MGI 委员会由全球麦肯锡分公司领导者以及业务部门领导者组成，包括 Michael Birshan、Andrés Cadena、Sandrine Devillard、André Dua、Kweilin Ellingrud、Tarek Elmasry、Katy George、Rajat Gupta、Eric Hazan、Acha Leke、Scott Nyquist、Gary Pinkus、Sven Smit、Oliver Tonby 和 Eckart Windhagen。我们的顾问团队中不乏顶尖经济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项目由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提供资金；不受任何企业、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的委托。如欲了解更多信息或下载报告，请访问： mckinsey.com/mgi。

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

2019年7月

作者

华强森，上海
成政珉，上海
梁敦临，香港
倪以理，香港
James Manyika，旧金山
Anu Madgavkar，孟买
Susan Lund，华盛顿特区
Andrey Mironenko，悉尼

前言

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正迈入全新阶段。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奇迹主要源自产业增长和投资，但主要动力目前已转为内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逐渐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增长，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贸易大国的现状。与此同时，全球贸易局势日渐紧张，各国保护主义日渐抬头，这些转变都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是否已经达到了顶峰。

本报告着眼于中国的全球化规模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最新编制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我们还研究了各个行业和国家对这种经济联系的依存度。此外，我们还深入研究了技术与消费两个领域的现状及发展机会。最后，我们通过模拟研究，估算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发生变化后可能涉及到的经济价值，并简要探寻了企业如何适应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本报告隶属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开展的“MGI 全球贸易”系列研究，相关报告包括《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的新时代》（2016年3月）和《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2019年1月）。

本研究的领导人包括：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联席院长华强森（常驻上海）、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副院长成珉（常驻上海）；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兼麦肯锡中国区主席梁敦临、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兼麦肯锡中国区总裁倪以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主席兼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 James Manyika（常驻旧金山）；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 Anu Madgavkar（常驻孟买）；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全球董事合伙人 Susan Lund（常驻华盛顿特区）。研究团队由 Andrey Mironeko 和 James Bien 领导，团队成员包括：Mo Chen、Carmen Liu、Meng Meng、Raye Qin、Erik Rong、Ben Wang 和 Minyu Xiao。在此我们也要向负责麦肯锡全球出版业务的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 Rik Kirkland（常驻伦敦）、麦肯锡中国区对外关系团队负责人 Glenn Leibowitz，以及麦肯锡亚洲地区风险业务负责人 Ziad Haider 的贡献和指导表示感谢。

我们的学术顾问和外部顾问也为这项研究建言献策，提供了新的洞见。我们要衷心感谢：布鲁金斯学会经济政策发展主席 Martin Baily 以及商业和公共政策部主任兼资深研究员Bernard L. Schwartz；麦肯锡名誉董事兼资深顾问欧高敦；亚洲环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 Andrew Sheng 博士；以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Anthony M. Solomon”资深研究员Nicholas R. Lardy。我们也要感谢与我们私下分享洞见的诸多商业领袖、政策制定者以及公共和私营机构的研究员。

本研究的完成也有赖于许多麦肯锡同仁贡献的专业知识。我们要感谢 Stefan Burghardt、Albert Chang、Wonsik Choi、Michael Chui、Karel Eloot、Paul Gao、管明宇、Patrick Hertzke、Sheng Hong、Forest Hou、Richard Huang、Daniel Hui、Mekala Krishnan、Gang Liang、Lan Luan、Katrina Lv、Felix Poh、John Qu、Dennis Schwedhelm、Sha Sha、Yezhou Shi、Antonio Sun、Florian Then、唐睿思、Jin Wang、Ting Wu、Alex You、Cherie Zhang、Derek Zhang、Haimeng Zhang、Susan Zhang、Gaobo Zhou、Tiankai Zhu 和 Daniel Zipser。

本报告的制作由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资深编辑 Janet Bush、出版经理 Julie Philpot 以及高级图形设计师 Marisa Carder 和 Patrick White共同完成，并得到了麦肯锡亚太地区对外关系负责人 Cathy Gui、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数字编辑 Lauren Meling 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内容专员 Timothy Beacom 的大力支持。

本报告秉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使命，旨在帮助企业和政策领导人理解改变全球经济的力量，并为下一轮增长做好准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所有研究均系独立作品，只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不接受任何企业、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委托。欢迎您与我们分享对本报告的看法与评论，电子邮件地址：MGI@mckinsey.com。

Jacques Bughin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联席院长
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
常驻布鲁塞尔分公司

James Manyika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主席
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
常驻旧金山分公司

华强森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联席院长
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
常驻上海分公司

2019 年 7 月

目录

概述 viii

摘要 1

1. 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融合度有多高? 21

2.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 41

3. 中国已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 59

4. 中国的消费市场为全球经济提供了进一步的发展机遇 83

5. 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变化后可能引发巨大的价值变动 105

6 不确定环境下的企业战略制定 131

技术附录 141

参考文献 149

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

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的历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贸易大国，然而，在金融等领域的发展仍有待提高。目前，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这种联系的增强或减弱，都可能引起巨大的经济价值变动。企业需要考虑调整发展战略以适应未来的不确定性。

—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虽然中国作为全球大国，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但其经济尚未全方位与世界融合。中国在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商品贸易国。然而，尽管中国有111家企业跻身《财富》世界500强，但它们的营收仍有80%以上来自国内。中国的银行、证券和债券市场规模都位居全球前三，但外资企业的参与程度却很有限。

—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编制的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显示，在贸易、科技和资本三个重点维度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降低。相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有所上升。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重点正转向内需。在2015年以来的16个季度中，有11个季度中国国内消费占GDP增长总额的比例超过60%。根据我们对20个行业和73个经济体的分析，不同行业和地区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存在较大差异。

— 中国已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我们从11个领域择取了81项技术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对其中超过90%的技术均采用了全球标准。我们分析了中国在电动汽车、机器人和半导体这三大全球技术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发现中国企业虽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仍需要引进关键元件，例如减速齿轮（机器人）、动力电子元件（电动汽车）和设备（半导体）等。

— 随着收入的增长，中国的消费市场可能将继续繁荣。在很多消费领域，中国已经与世界高度融合，并且未来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跨国企业在中国消费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远高于在美国市场的渗透率，不过，未来也将面临来自本土企业的竞争。在我们研究的 30个消费品类当中，外国品牌在其中 11个品类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值得关注的是，有两大趋势将可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商机。首先，中国消费者期待拥有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选择。第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走出国门，增加境外消费。2010年以来，出境游保持每年 13%的增长，2018年达到1.5 亿人次。

— 我们着重择取了5项可能导致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发生变化的发展趋势，并模拟了这些趋势可能引发的价值创造或流失。研究显示，到2040年，受影响的经济价值或将达到22万亿美元到3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 15%至26%）。这5项发展趋势是：(1) 成为进口目的地；(2) 服务业的开放；(3) 金融市场全球化；(4) 协作解决全球议题；(5) 技术和创新的流动。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若减弱，则可能导致关税增加、贸易和技术流动或将面临更多限制，而世界各国对如何解决全球议题的分歧也将继续存在。如果加强联系，中国就会从世界其他地方加大进口力度，双向技术流动也会加强，中国服务领域的竞争力也将提升，解决全球议题的可能性也更大。在这两种情况下，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将可能从中受益或蒙受损失，并权衡利弊。

— 企业需要进行调整才能应对不确定性较高、甚至风险较高的环境。我们建议企业需要从以下 4 个方面考虑如何调整战略：(1) 评估其自身在短期和长期受中国与世界之间经济联系变化的影响程度；(2) 明确投资方向及价值链布局；(3) 培养自身的卓越运营能力，以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4) 培养并保持幸存者心态，既要保持乐观，也要面对现实，改善资产负债表，并保持融资渠道通畅，还要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寻找收购和重组机会。

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

从经济体量上看，中国已跻身全球大国之列，但仍有进一步与世界融合的空间

贸易
商品贸易占全球 **11%**
然而……
服务贸易仅占全球 **6%**

企业
财富世界500强企业 **111 家**
然而……
海外营收占比 **<20%**

资本
金融系统规模居全球 **前三**
然而……
外资企业参与程度 **<6%**

人员
出境游人次 **1.5 亿**
然而……
移民至中国的人数占全球移民 **0.2%**

技术
全球研发支出排名 **第二**
然而……
知识产权进口比出口多 **6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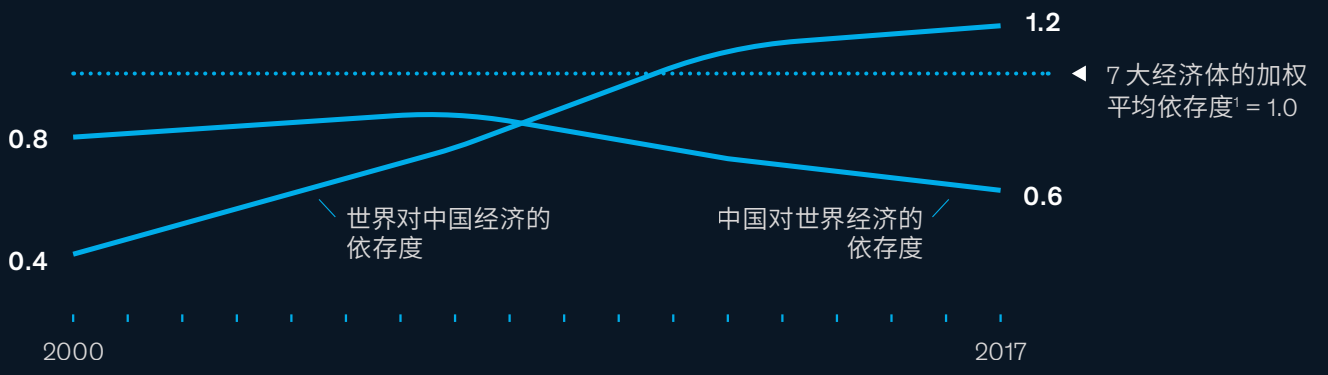
数据
网民人数 **8.02 亿**
然而……
仅为美国跨境数据流动的 **20%**

环境
可再生能源投资占全球 **45%**
然而……
碳排放占全球 **28%**

文化
电影票房全球排名 **第二**
然而……
电视剧出口额仅为韩国的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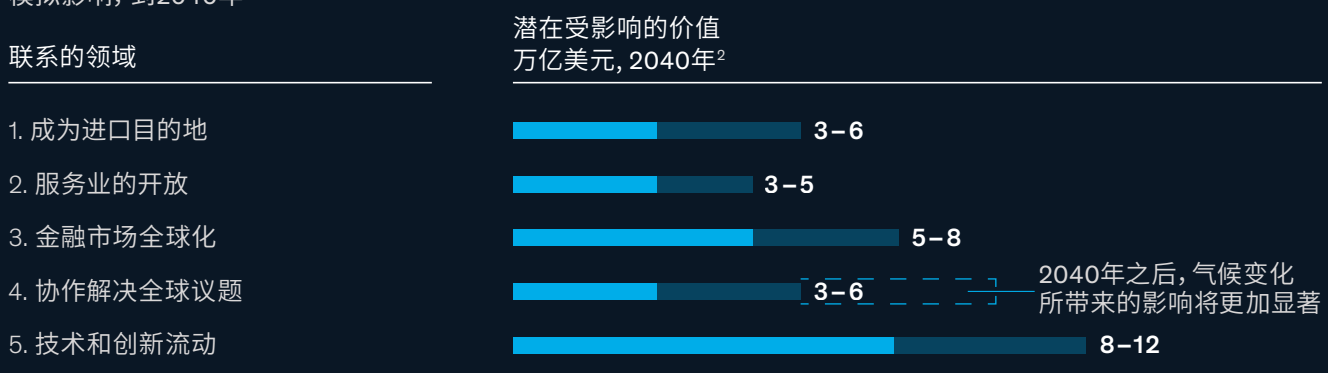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下降，而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

中国-世界依存度指数（贸易、技术和资本）



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将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变动

模拟影响，到2040年



22万亿美元到37万亿美元之间的经济价值（到2040年，相当于15%-26%的全球GDP）可能会受到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变化的影响

[1] 中国、日本、德国、法国、印度、英国和美国。
[2] 对于可能引起的经济价值变动的估算是基于在特定条件及假设下的模拟研究；并非是对未来的预测值。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摘要

自从中国开始建立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拥抱市场机制，并积极接纳全球最佳实践以后，中国经济便迈入了腾飞阶段。如今，中国已凭借其庞大的经济体量跻身全球大国之列。中国在2013年跃居全球第一大商品贸易国，拥有111家《财富》世界500强上榜企业（与美国的数量相当），而且无论作为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目的国还是对外投资来源国，中国都已跻身全球前两位。

然而，中国经济尚未实现与世界的全方位融合。中国企业的绝大部分营收仍然来自本国市场。国际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时，依然要面对运营与监管方面冗杂的掣肘因素。尽管中国蓬勃的数字经济产生了海量数据，但跨境数据流的规模仍然较为有限。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全球其他经济体受益良多——消费者得以享受中国出口的低价商品，跨国企业也从迅猛扩张、活力四射的中国市场中捕获了新的增长来源。但在此过程中也难免要付出某些代价，首先便是中等收入就业岗位的流失，这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发布的"MGI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显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相对降低。世界各国也随之开始重新审视这种关系。于是，贸易争端时常见诸媒体头条，技术流动面临新规审查，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地缘政治局势越发紧张。经过了若干年的深化合作之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是否将逐步走向弱化？我们是否会见证中国与世界的融合程度已达到顶峰？反之，如果双方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将催生哪些机会？将对双方带来多少经济价值？在这种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环境中，企业又该如何自处？

本报告分为6章，首先我们将从8个维度审视中国经济与世界融合的现状（第一章），探讨中国与世界经济依存度的变化，并根据具体行业和国家展开详细分析（第二章）。随后将针对技术领域（第三章）以及消费市场（第四章）展开详细分析——技术创新是所有经济体的发展关键，中国也不例外；而消费市场更是中国乃至全球目前主要的经济增长来源。在第五章中，我们将探讨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价值的变动。最后，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探索企业高管面对这种变化应如何调整经营方式。本研究的基础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早先对于全球价值链变动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其中"新中国效应"正驱动全球需求增长及提升行业成熟度的研究[1]。

虽然中国作为全球大国，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但中国经济尚未全方位实现与世界融合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按名义GDP总量来计算，中国在2018年已达到美国的66%，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MGI连接指数"根据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流动情况对各个经济体的参与度进行了排名，结果显示，中国2017年的连接程度位居全球第9[2]。2018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总量的16%。

然而，中国经济存在进一步与世界融合的空间。为了衡量中国与世界的融合程度，我们从8个维度分析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与世界融合的程度（见图E1）。

[1]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global value chains*（《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年1月。

[2]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的新时代》），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6年3月。

图 E1

从经济体量上看，中国已跻身全球大国之列，但仍有进一步与世界融合的空间

	中国的经济规模	进一步与世界融合的空间
贸易	中国自 2013 年以来一直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17 年占全球商品贸易的 11.4%	…… 但中国 2017 年的服务贸易额仅占全球总量的 6.4%左右
企业	中国拥有 111 家《财富》世界 500 强上榜企业，数量与美国相当	……但这些企业的收入仍然主要来自国内市场（海外营收仅占 18%，而标普 500 企业的平均比例为 44%）
资本	中国拥有庞大的金融系统（全球第一大银行系统、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三大债券市场）	……但跨境流动（美国的流动规模是中国的3-4倍）和外资参与度相对有限（银行、股票和债券市场外资占比尚不足6%）
人员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留学生（在 2017 年高等教育阶段国际学生中占比 17%）和出境游客（出境游2018年达到1.5亿人次，居全球之首）来源地	…… 但人员流动的地理区域仍然较为集中（约 60% 的留学生前往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移民中国的外国人仅占全球移民总数的 0.2%
技术	中国投入巨资开展研发（2018年以 2930亿美元的研发支出位居全球第二）	…… 但仍然需要进口技术（仅 3 个国家就为中国贡献了一半以上的技术进口）和进口知识产权（中国的知识产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 6 倍）
数据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规模超过 8 亿人），产生了海量数据	……但跨境数据流动的规模很有限（位居全球第 8，但仅为美国数据流动的 20%）
环境影响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占到全球的 45%	……但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源（占全球年总排放量的 28%）
文化	中国正在大举投资提升全球文化影响力（2017年，全球票房排名前 50 的电影有 12% 在中国拍摄了内容，而2010 年仅为 2%）	……但文化影响力仍然有限（电视剧出口额仅为韩国的 三分之一）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 **贸易。**在全球贸易舞台上，中国既是重要的供应方，也是重要的消费市场。中国在2009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2013年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1.9%增长到2017年的11.4%。我们分析了18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33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是中国，65个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是中国。但不同地区和行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差异较大。中国对某些地区（尤其是邻国）和行业的影响偏高，尤其是那些技术产业链实现了全球整合的地区，以及将中国视作关键市场的资源出口行业。2017年，中国以2270亿美元的出口额成为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相当于2005年的三倍；同年，中国的服务进口额高达4680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二大服务进口国。不过，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全球份额尚不及商品贸易——2017年，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总量中的占比为6.4%，约为商品贸易占比的一半。从全球来看，服务贸易比商品贸易的增速快60%[3]。

— **企业。**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自201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企业总数从10167家增长到37164家，大约保持着16%的年增速。其中一些已成长为全球性企业。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上榜企业中有111家来自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接近美国的126家。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014-2016年间，经济利润排名全球前1%的企业当中有 10% 是中国企业，而1995-1997年间这一比例尚不足 1%[4]。虽然这些企业在中国境外的营收有所增长，但即使是其中的一些全球性企业，其海外营收的比例仍不足 20%[5]。相比之下，标普500企业的平均海外营收比例则高达44%。另外，2018年度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中仅有一家中国企业[6]。

[3]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年1月。

[4] *Superstars: The dynamics of firms, sectors, and cities leading the global economy*，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8年10月。

[5] 中国企业在“《财富》世界 500 强”中的营收占比从 2007年的 10% 增加到 2017年的 19%。根据标准普尔的数据，2017年，上榜美国企业在美国之外的营收占比为44%。请参见：Howard Silverblatt，《S&P 500 2017: Global sales，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2018年8月。 us.spindices.com/indexology/djia-and-sp-500/sp-500-global-sales。

[6]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brands，福布斯，forbes.com/powerful-brands/list/；“2018年全球最佳品牌榜”，Interbrand，interbrand.com/best-brands/best-global-brands/2018/ranking/。

— **资本。**2015-2017年间，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也是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然而中国距离金融体系全球化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2018年，外资在中国银行系统中的占比仅为2%左右，在债券市场中为2%，在股票市场中约为6%。另外，中国2017年的资本流动输入和输出总额（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贷款、债券、股权和准备金）仅相当于美国的30%左右。

2018年中国出境游人次是2000年

14倍

— **人员。**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人员流动（也即留学生和游客的流动）正在快速增长。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留学生和游客来源地（留学生总计60.84万人，为2000年的16倍；2018年中国出境游达到近1.5亿人次，为2000年的14倍）。相比之下，2017年来华留学和旅游的人数分别仅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3%和全球出境游人次的4%。中国学生海外留学目的地一直高度集中，仅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三国就吸引了约60%的中国留学生。2017年，约一半的中国人的出游目的地在大中华范围内，另有29%的游客会前往亚洲其他地方。移民流动的规模一直很小。1990-2017年间，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约占全球移民总数的2.8%，移民到中国的外国人约占全球移民总数的0.2%。

— **技术。**近年来，中国的研发开支大幅增长。国内研发开支从2000年的90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93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7]。但在一些核心技术上中国仍需要进口，例如半导体和光学设备。此外中国也需要海外知识产权的引进。2017年中国的知识产权进口额为290亿美元，而知识产权出口额仅为50亿美元左右（为进口额的17%）[8]。与中国签订技术进口合同的国家的地域集中度非常高，逾一半的海外研发采购金额集中流向三个国家——美国（31%）、日本（21%）、德国（10%）。

— **数据。**中国拥有超过8亿名网民，规模全球居首，虽然近年来跨境数据流有所增长，但总体规模依然有限。中国的宽带数据流动总量位居全球第八，仅为美国的20%，考虑到中国庞大的数字经济体量，这个流动规模可谓小之又小[9]。

— **环境影响。**自200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如今已占到全球年排放总量的28%（虽然温室气体排放的比例已下降很多）。中国一直在大力投资开发可再生能源，2017年在这一领域共计投入了约1270亿美元，占全球投资总额的45%，相当于美国或欧洲（均为410亿美元）的3倍。中国之所以努力降低碳排放强度，不仅仅是为了履行签署《巴黎协定》时的承诺，即在2005-2020年间将碳排放强度减少40%~45%（该目标已于2017年底达成），也是为了解决国内的各项问题（包括空气质量问题）[10]。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6年中国的PM2.5浓度中值（一项空气污染指标）是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3.7倍。

2017年，全球

12%

的影片在中国拍摄了内容，2010年仅为

2%

— **文化。**中国为了向世界发扬本国文化而投入了大笔资金，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全球孔子学院数量已从2010年的298所增加到了2017年的548所。近年来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文化娱乐产业提供融资，辅之以有竞争力的制作设施，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影片来华拍摄：2017年全球票房前50强的电影中，有12%的影片至少在中国拍摄了一部分内容，而2010年仅有2%。不过，尽管投资甚巨，但中国尚未对全球范围内的主流文化产生显著影响。仅举一例：中国电视剧的出口额仅为韩国的1/3，而中国十大顶尖音乐人在全球领先的一个流媒体平台上的订阅总量仅为韩国十大顶尖艺人的3%。

---

[7] *The China effect on global innovation*（《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年10月；*Digital China: Powering the economy 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12月；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3/03/c_137865068.htm。

[8] “进口”知识产权费用是中国为了使用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而支付的费用。“出口”知识产权费用是中国因为提供本国知识产权而向其他国家收取的费用。

[9]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的新时代》），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6年3月。

[10] *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report 2018*，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彭博新能源财经，2018年。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

我们从贸易、资本和技术方面审视了中国与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之后发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在相对上升。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在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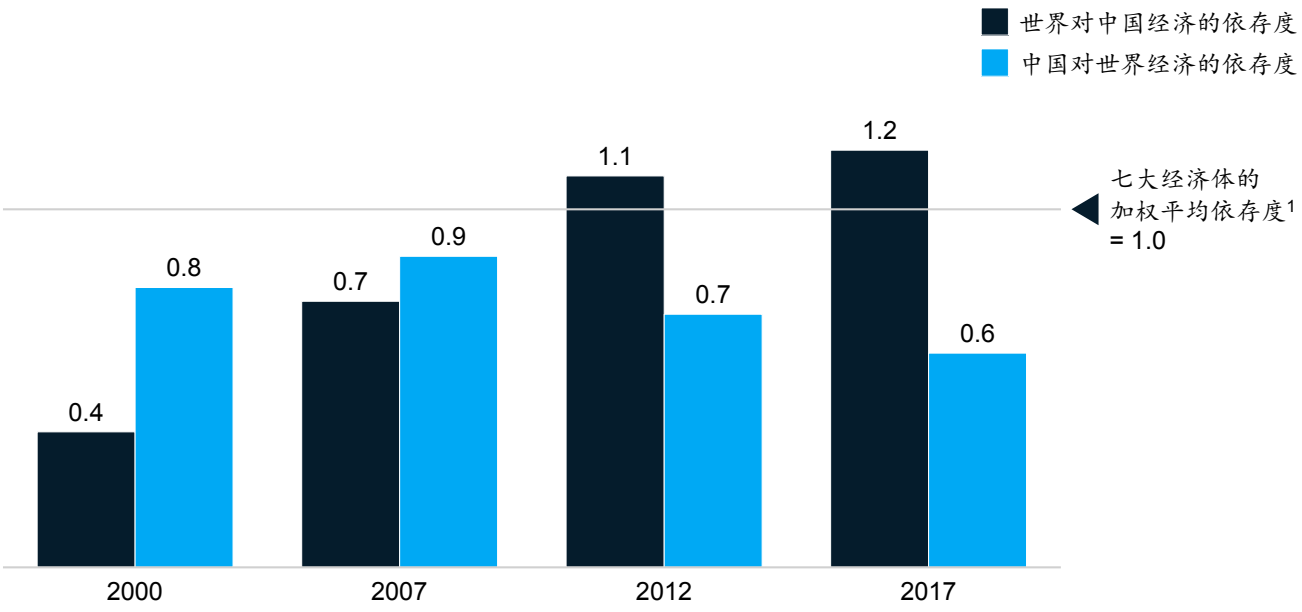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上述8大维度中选取了贸易、技术和资本三个重点维度，对中国与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进行了分析[11]。2000-2017年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这三方面均有所提升，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却有所降低（见图E2）。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编制了“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旨在通过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的横向比较来衡量这些经济流动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体的相对重要性。研究显示，2000-2017年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依存度指数从0.4逐步增长到1.2，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指数则在2007年达到0.9的最高点，到2017年则下降到0.6。

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重点已逐步转回国内消费市场。2015年以来的16个季度中，有11个季度中国国内消费占GDP增长总额的比例超过60%。2017-2018年间，中国约有76%的GDP增长来自国内消费，而净贸易额对GDP增长的贡献实际为负。在2008年，中国的净贸易顺差还占到GDP的8%，但到2018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3%左右，低于德国或韩国（这两个国家的净贸易顺差占GDP的5%~8%）[12]。中国内需的增长以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期全球范围内贸易强度的下降。中国正在消费更多其生产的产品。这些显著变化不但左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重点，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彼此依存的态势。

图 E2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而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上升

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贸易、技术和资本）



[1] 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英国和美国。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11] 该指数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依存度：贸易（以某个国家的出口额除以世界其余地方的消费额计算得出）和需求（以某个国家的进口额除以世界其余地方的产值得出）；技术（以某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技术服务和设备出口额除以世界其余地方的研发开支得出），以及资本（以某个国家输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除以世界其他地方输入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计算得出）和投资机会（以某个国家输入的外商直接投资额除以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计算得出）。我们首先衡量了过去20年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依存度。我们把世界与七大经济体（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平均依存度指数设为1.0：高于1.0表明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高于对七大经济体的平均依存度，低于1.0表明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低于对七大经济体的平均依存度。

[12]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年1月。

中国对世界经济依存度的下降也反映了一个现实：相比发达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开放度仍有提高的空间。在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数据，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已从2000年的16%降至2009年的约9%。但2017年的平均税率却上升到了10.6%（需要注意的是，税率水平在2018年宣布新一轮关税下调后或将再一次降至7.5%）[13]。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2017年的平均关税仅为3%~4%左右。此外，资本方面的壁垒始终存在。虽然经合组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指数"为中国评定的指数已经从0.74下降到了0.39，但仍然远高于0.08的经合组织平均水平[14]。在此需要指出：该指数可能并未考虑到中国最近为减少监管限制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例如推行"负面清单"制度[15]。

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上升，则表明中国作为消费市场、供应方和资本提供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贡献了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35%。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尽管目前中国在全球家庭消费中的占比仅为10%，但在2010-2017年间，中国贡献了31%的全球家庭消费增长额。另外，在汽车、酒类、奢侈品、手机等许多品类中，中国都是全球第一大市场，约占全球消费总额的30%（甚至更高）。我们注意到，中国在2015-2017年间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和目的地。但我们对73个经济体和20个行业的分析显示，不同地区和行业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存在较大差异。

地理位置邻近中国、资源贸易占比较高，并且参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最高

我们从国家层面研究了各个经济体对中国的进口（国内产值出口到中国的比例）、出口（来自中国的进口额占国内消费总额的比例）和资本（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例）的依存度。自2007年以来，在我们研究的73个经济体中，有69个经济体的国内产值相对于中国的进口的依存度上升；有72个经济体的国内消费相对于中国出口的依存度上升；还有58个经济体的国内投资相对于中国资本的依存度上升（见图E3）。

— **亚洲经济体与中国的联系因区域供应链而愈加紧密。**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一直在上升，尤其是那些对华出口比重较大的国家。它们往往通过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对华贸易在国内产值中占比很高。例如新加坡的对华贸易额（包括进口和出口）几乎占到了国内产值的30%。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现，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化属性加强、全球化属性减弱的态势。2013-2017年间，区域间贸易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增加了2.7个百分点[16]。这种情况在亚洲尤为显著，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这三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其中一些经济体对中国资本的依存度也同样明显。举例而言，2013-2017年间，马来西亚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6%；在新加坡则为5%。

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澳大利亚总产值的

16%

2003-2007年这一比率仅为

4%

— **资源丰富的国家更依赖中国的需求。**对外出口自然资源的国家显著依赖中国的需求。以南非为例，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其国内总产值的15%，而2003-2007年间这一比率仅为2%。与之相似，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澳大利亚总产值的16%，先前这一比率仅为4%。仅铁矿石出口一项就占到了澳大利亚对华总出口的48%（矿产和金属共计占到出口总额的84%），澳大利亚采掘业21%的产出都流向了中国。

— **一些新兴经济体和体量较小的成熟经济体也高度依赖中国的投资。**举例而言，2013-2017年间，埃及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13%，巴基斯坦则为8%。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不只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其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来源和第三大国外援助来源[17]。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非洲的房地产、能源以及交通基础设施领域。

[13] China to cut tariffs on imports including machinery, textiles, 彭博新闻，2018年9月26日。关税数字是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收集的数据计算得到的简单平均数。需要指出的是，若按加权平均数计算，实际征收的关税将整体有所降低，尽管与发达市场相比仍处于相同的数量级。

[14] 经合组织指数最后一次更新是在2017年，此后也许没有再继续追踪中国监管政策的变化。

[15] 负面清单规定，在获准进入"受限"市场时需要满足各种流程、标准和审批规定。没有出现在该清单上的行业都是"允许进入"的，因此对投资者没有特别要求。详细信息请参见：Dorcas Wong, China's new negative list targets unified market access, *China Briefing*, 2019年1月。

[16]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年1月。

[17] 很多情况下，对中国资本的依存度都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关，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非洲经济体的投资是在该倡议宣布之前进行的。了解更多关于中非联系的信息，请参见：*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 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中非经济合作现状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发展？》），麦肯锡公司，2017年6月。

图 E3

地理位置邻近中国、资源贸易占比较高，并且参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最高

依存度 最低 最高

类型	国家/地区	对华出口占国内产值比例，%		对华进口占国内消费比例，%		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总投资额比例，%	
		2003–07	2013–17	2003–07	2013–17	2003–07	2013–17
地理位置依存度	韩国	8	11	4	6	<1	<1
	马来西亚	8	11	5	11	<1	6
	菲律宾	12	8	6	14	6	<1
	新加坡	10	11	12	18	2	5
	越南	3	11	6	13	3	1
资源依存度	澳大利亚	4	16	3	7	<1	3
	智利	5	13	3	10	<1	<1
	哥斯达黎加	9	9	2	5	3	<1
	加纳	<1	8	5	18	<1	4
	南非	2	15	2	6	<1	3
资本依存度	埃及	<1	<1	3	5	1	13
	巴基斯坦	<1	1	3	7	2	8
	秘鲁	4	7	1	5	2	6
	葡萄牙	<1	2	<1	3	<1	3
发达经济体	美国	<1	2	3	6	<1	<1
	德国	2	4	2	3	<1	<1
	日本	4	5	3	5	<1	<1
	英国	<1	2	2	5	<1	2

资料来源：IHS Markit；国家统计局；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 **相比之下，大型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较低。**从国内经济体量的角度考虑，发达经济体（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各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中国的依存度相对较低。对华出口额通常在其总产出中占比不足5%，对华进口额在其国内消费中的占比也不足5%。另外，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其国内投资的比例更低于1%。

不同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各不相同

我们择取了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综合分析了全球各国对中国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依存度（见图E4）。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研究主要涵盖的是基础产业和制造业，而非服务业，这是因为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的贸易属性更强，可用数据更多。

我们发现，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极为庞大，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在20个行业当中，中国有17个行业的消费份额在全球总消费中占比超过20%。此外，中国在全球服务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上升[18]。这说明对于寻找增长来源的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的机会不容忽视。

我们根据贸易依存度的不同，将行业归纳为5个类别：

— **中国在电子、机械和设备领域已经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在这些深度整合的贸易领域当中，中国的角色既是供应方，也是市场。总体上，这些领域的贸易属性通常很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高占比反映出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贸易——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7%~28%，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16%。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产出占比也很可观，全球份额高达38%~42%。

— **对于贸易属性极高的轻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全球各国高度依赖中国的产出。**某些行业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生动地表明了全球各国对中国生产的依存度。中国在全球轻工制造领域（例如纺织和服装）的份额甚至高达52%。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各国也高度依赖于中国的出口：中国占据了全球纺织和服装出口的40%，家具出口的26%。

2013-2017年，中国贡献了全球采掘业进口额的

21%

2003-2007年这一比例为

7%

—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不断取得进展，全球上游产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均有所提高。**那些为进一步加工提供原材料的行业都要依赖中国的进口。中国制造业的增长大幅提升了对原材料和中间品（用于加工成最终商品）的需求，人均收入的增长也推升了中国的整体商品需求。2003-2007年间，中国贡献了全球采掘业进口额的7%，在2013-2017年间这一比例更升高到21%。

— **在另一些全球贸易属性较强的行业中，中国并不是主要参与者。**在一些着重于服务快速增长的本地需求、且有本地成分要求的行业，因此尽管这些行业的贸易强度很高，但并不太依赖中国。以制药行业为例，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药品出口的4%、全球进口的3%。同样，虽然汽车领域的贸易强度较高，但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出口的3%、全球进口的7%。不过，这些行业在中国都有相当庞大的需求，因此对于想要涉足这些行业的企业来说，中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市场。

— **没有加入全球贸易的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往往较低。**我们把5个贸易强度占总产出的比例较低的行业归为“本地自产自销”的一类。尽管贸易强度相对较低，但中国仍在其中一些行业占据了很大份额。举例而言，中国的金属制造行业占据了全球出口的23%，农产品行业则占据了全球进口的18%。

[18]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global value chains*（《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年1月。

图 E4

技术、劳动密集型商品和资源价值链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

类型	行业名称	贸易强度	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		中国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例，%	
			2003–07	2013–17	2003–07	2013–17
高度整合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		15	28	12	16
	电气设备		16	27	7	9
	其他机械和设备		7	17	8	9
高度依存于中国的出口	纺织、服装和皮革		26	40	5	5
	家具、安全、消防等		17	26	2	4
	其他非金属矿产		11	22	5	8
	橡胶和塑料		10	19	5	7
	基础金属		8	13	8	8
高度依存于中国的进口	采掘业		1	1	7	21
	化工		4	9	9	12
	纸和纸制品		3	9	6	12
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很小的全球价值链	其他运输设备		3	6	3	5
	制药		2	4	1	3
	机动车及拖车		1	3	2	7
	焦炭和成品油		2	4	4	6
自产自销	食品、饮料和烟草		3	4	3	6
	金属制品		14	23	3	5
	木材及木制品		11	22	2	3
	印刷和媒体		8	18	2	4
	农业、林业和渔业		5	5	7	19

资料来源：IHS Markit；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美国信息技术行业有

14%

的营收来自中国
（MSCI指数）

中国已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

中国近年来的技术创新势头迅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全球大国，并在很多技术领域跃居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19]。根据2017年的统计，中国的手机销量占到全球销量的40%，电动车销量占到64%，半导体消费占到46%。中国市场已经为很多高科技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增长机遇。根据“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MSCI）的统计，美国信息技术领域有14%的营收来自中国。

在数字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普及的时代，持续创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链是最复杂的价值链之一，尤其需要各方通力协作，而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其中，并占据了相当大的全球进出口份额。以集成电路和光学设备领域为例，中国的进口额高达国内产值的5倍。

在审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如何演变时，技术可谓是一个核心关注点。由于中国目前仍然需要国外的技术流动，所以为了促进本土创新并提高生产率，中国需要保持甚至加强获取技术的力度。全球各国也对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越发关注，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一些国家出台了新的法规，对获取外国技术的中国投资展开更密切的审查。人们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技术链是否会脱离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国政府针对技术领域本土化所提出的目标[20]。根据《中国制造2025》计划设定的目标，在政府重点发展的23个子领域中的11个领域，国家提出，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的期望值为40%~90%[21]。

中国在各个行业都在发展本土价值链。中国内需的增长以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期全球范围内贸易强度的下降。中国正在消费更多其生产的产品[22]。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技术市场似乎都呈现出本地化的趋势，只是不同行业程度各异。在光伏面板、高铁、数字支付系统和电动汽车这些行业，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占据的份额超过90%。而在半导体和飞机制造等行业中，中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占据的份额都很小，而且高度依赖外国技术。对此次研究的大多数价值链而言，中国仍有很大的全球化潜力。若论全球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国在海外光伏面板市场占据了高达50%的份额；若论全球化程度不足的行业，中国在飞机制造行业的市场份额尚不及1%（见图E5）。

在所研究的技术中，中国厂商有能力生产其中的

60~80%

为了衡量中国与世界在技术链上的融合程度，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11个领域择取了81项技术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对其中超过90%的技术均采用了全球标准（见图E6）。至于中国标准与全球标准相左的少数几项技术领域，都可以用经济动因加以解释。以聚氯乙烯（PVC）制造业为例，中国采用的煤基工艺在成本上低于国际上更普遍的乙烯基工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我们在分析中发现，中国的本土厂商有能力生产60%~80%的技术，这意味着仍然有至少20%~40%的技术需要跨国企业输入。此外，我们对同类标准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供应商可以在40%~60%的技术研究中实现与国际供应商同等或更好的效果。在一些尚未确立全球标准的新兴技术领域（例如5G、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即便在这些领域，中国也从设备进口、人才引进和国外投资中获益良多，而且今后还将继续使用这些资源。

[19] *Digital China: Powering the economy 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12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lications for China*（《人工智能：对中国的启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4月；*Notes from the AI frontier: Modeling the impact of AI on the world economy*，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8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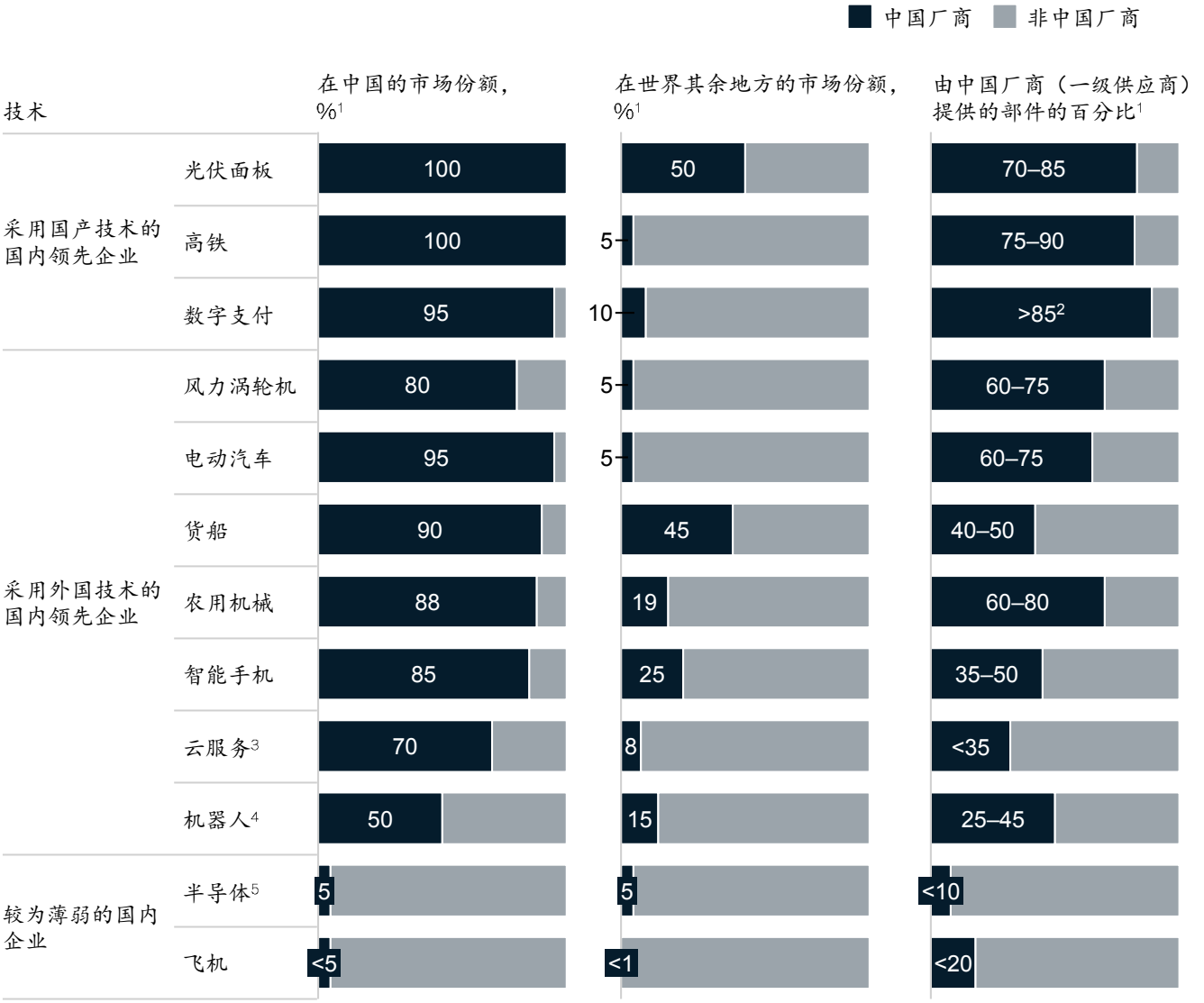
[20] *Made in China 2025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industry*，促进劳动力市场强大和国家发展项目部（Project for Strong Labor Markets and National Dvelopment），美国参议院小企业和创业委员会（U.S. Senate 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2019年2月。

[21] 《<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创新绿皮书——技术路线图》，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2015年10月。

[22]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global value chains*（《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年1月。

图 E5

中国的科技厂商已经在关键子领域获得了可观的市场份额，但仍然依赖全球价值链提供输入品



[1] 基于 2018 年或最新可用数据。
[2] 通过对比国内和进口软件的开发成本而计算。
[3] 用于云存储的服务器。
[4] 仅包含工业机器人。
[5] 受可用数据的限制，在此假设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相等。

资料来源：年报；文献检索；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图 E6

中国几乎大部分技术行业均与全球标准整合，但各个价值链的本地化程度存在差异

	行业/领域	评估的技术	采用全球标准的比例[1]	拥有国内供应商的比例[1]	中国供应商可以在技术上提供优于全球领导者或可以与之媲美的比例[1]
基础材料	• 采矿 • 钢铁	7			
化工	• 油气 • 日用化工及特殊化工 • 纺织	12			
电子元件	• 显示屏 • 集成电路	8			
电动汽车	• 纯电动汽车 •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7			
交通运输	• 高铁 • 航运	10			
消费电子产品和互联网	• 消费电子产品 • 数字支付 • 无人机	11			
设备	• 手术机器人 • 工业机器人	4			
制药和生物科技	• 小分子药物 • 生物分子药物	6			
人工智能	• 语音识别 • 人脸识别 • 无人驾驶	5			
下一代技术	• 量子技术 • 5G • 太空	8			
基因组学	• 基因分型 • 基因测序 • 基因编辑	3			
总计		81	>90%	60–80%	40–60%

[1] 我们所估算的“采用全球标准比例”是通过择取不同行业中的关键技术，并评估中国是否使用了相同的、海外所普遍采用的技术标准及流程；我们所估算的“拥有国内提供商的比例”是分析了各个关键技术中，中国企业是否在全球供应商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所估算的“优于全球领导者或可以与之媲美的比例”是指中国供应商是否能提供比国际供应商更出色或相当的技术。

资料来源：文献检索；专家访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全球各国的经验均表明，一个国家若想向技术链的上游挺进，必须具备四大要素：(1) 大规模投入资金；(2) 拥有获取技术和知识的渠道；(3) 进入庞大的市场；(4) 推行鼓励竞争和创新的有效制度。日本（汽车）、韩国（半导体）和中国（高铁和液晶显示器）曾经的技术飞跃无不表明上述四大要素对于科技发展和创新不可或缺。举例而言，中国的高铁行业便得益于国家层面的支持，中国政府从2004年以来持续投入巨资完成了2万公里铁路建设。中国也与全球4家领先的老牌高铁企业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此外，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高铁市场，总里程数占全球65%。由于高铁被中国列为国家重点产业，企业高管和工程师都明白任务的紧迫性，因此能够高效调动资源，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并且针对中国的运行环境开发解决方案，最终实现了大规模部署[23]。

我们从以上四大要素入手，对中国的技术行业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第一个（投资规模）和第三个（市场）要素上拥有极大优势。中国不但有能力提供充沛的科研资金，也拥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推动技术的商业化[24]。因此，中国向技术链上游挺进的关键点就落在了第二和第四个要素上，也即积极开发和收购核心知识技术，以及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以确保其生态系统具有足够的竞争活力来促进创新。对这两个要素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以及加强资本、知识、人才流动都可以加快中国向价值链上游挺进的速度。

我们分析了中国在3个全球技术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并且评估了全球技术链继续整合将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何种影响：

2011-2017年间，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年增长超过

90%

— **电动汽车：这个行业在中国发展得十分繁荣，并且显现出全球整合的趋势。**2011-2017 年间，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实现了超过90%的年增速，主要动力来自大举投资和政府支持。但只有国内生产的汽车才能享受政府补贴[25]。2017年，中国本土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 厂商）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国际市场中占比却不足5%。虽然本土 OEM 厂商更依赖于国内市场，但中国也从全球价值链整合中获益良多。中国的多数电子器件和电路元件都是从欧洲、日本和美国进口的。从产品质量上看，中国制造商在某些领域相对落后，例如中国顶尖电池制造商生产的电池产品在能量密度上要比日本顶尖企业低30%~40%[26]。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国内电动汽车行业竞争力的计划，对企业的补贴预计持续到 2020 年；对合资企业的限制也在放松，为跨国企业打开了新的机会。

— **机器人：虽然国内生产商在该行业的某些子领域中崭露头角，但中国一直在通过全球价值链整合的优势来获取核心零部件和高端产品解决方案。**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占全球工业机器人总销量的36%。从整体上看，外企在中国市场中占据了逾50%的份额，但中国本土企业也在逐步取得进展，尤其是在规模较小、复杂度较低的应用领域。中国的OEM 厂商目前在点胶、堆垛塑料成型和金属铸造机器人领域获得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焊接及物料处理机器人领域仅占据约10%的份额。具体到伺服马达、减速齿轮、控制系统等需要顶尖技术才能生产的核心组件，中国仍然要依靠在国内设厂的外企或者从国外直接进口。

— **半导体：中国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技术链的整合。**半导体已成为中国的战略性产业，获得了政府的巨大关注和投资，但目前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中国2018年的集成电路进口额甚至超过了原油。中国的集成设备制造和装备行业的全球化程度极低，但在无芯片制造设计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全球市场份额从2013年的11%增加到2017年的15%。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计划，希望国内80%的半导体需求到2030年可以由国内企业来供应（包括在华外企），相比2016年的33%实现大幅提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整合有助于中国加速这一进程。遵守全球标准有助于中国获取更多的全球知识和技术，便于相关资本、知识和人才的流入。全球价值链整合还能为中国本土企业创造更健康的竞争环境，尤其对国有企业而言。这一过程也将惠及全球其他国家——首先便是获得了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同时，全球整合也会催生全新的创新合作机会。举例而言：随着硅基半导体芯片逐步逼近“摩尔定律”预测的性能极限，石墨烯和氮化镓等新材料的涌现以及3D和光电子等设计方式的创新都会为全球合作打开新的天地。

[23] *The China effect on global innovation*（《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年10月。
[24] *Digital China: Powering the economy 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12月。
[25] *Supercharging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 vehicles in China*，麦肯锡公司，2015年4月，本土生产的产品通常包括由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
[26] 《宁德时代或将被LG化学超越？全球前几大电池寡头瓜分80%市场》，电池中国网，2018 年 12 月 11 日，http://www.cheyun.com/content/25122。

2017年，食品支出在中国家庭总消费中的占比为

25%

2000年为

50%

中国智能手机在非洲的市场份额

>30%

中国快速扩张的消费市场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重要机会

中国消费市场已经在扩张中变得更加自信、富裕、更加乐于尝试新鲜事物，从而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纽带。消费市场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也为国际企业创造了巨大机会。到2030年，58%的中国家庭有望跻身"大众富裕"或以上阶层，这一比例将超过韩国目前的55%[27]。中国城镇消费者的支出水平正在向世界其他国家靠拢。中国城镇消费者用于可支配性支出的收入也在增多。食品支出在中国家庭总消费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50%降低到了2017年的25%，已经与发达国家如今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相差无几——日本为26%，韩国为29%，美国为17%。

在华外企将可能面临竞争格局的变化

中国消费市场已经与全球高度整合。自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逐步降低了外企在华运营的门槛，并从2004年开始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国内所有市场经营零售业务。中国还开放了分销领域，允许外资分销企业申请全国性牌照[28]。因此，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渗透率相当可观。我们分析了十大消费领域的30种顶尖品牌，发现2017年在华外企的平均市场渗透率为40%，在美国这一比例仅为26%。某些行业的渗透率甚至更高，例如在美妆和个人护理领域中跨国企业的渗透率高达73%（见图E7）。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企业和品牌的发展也被带动起来。在我们研究的30个消费品类当中，外国品牌在其中 11 个品类中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在这些品类当中，中国本土企业的产品质量和营收业绩已经可与外企相媲美，其中有些企业已经开始走向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尤其是高端领域）曾经由美韩两国的生产商所主导，但现在中国手机品牌已经逐步出口东南亚、非洲和欧洲。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统计，中国智能手机在非洲大陆、印度和马来西亚的市场份额超过30%。中国的移动游戏产业在2016-2018年间增长了250%，《王者荣耀》和《终结者2：审判日》等不少国产游戏已经出口海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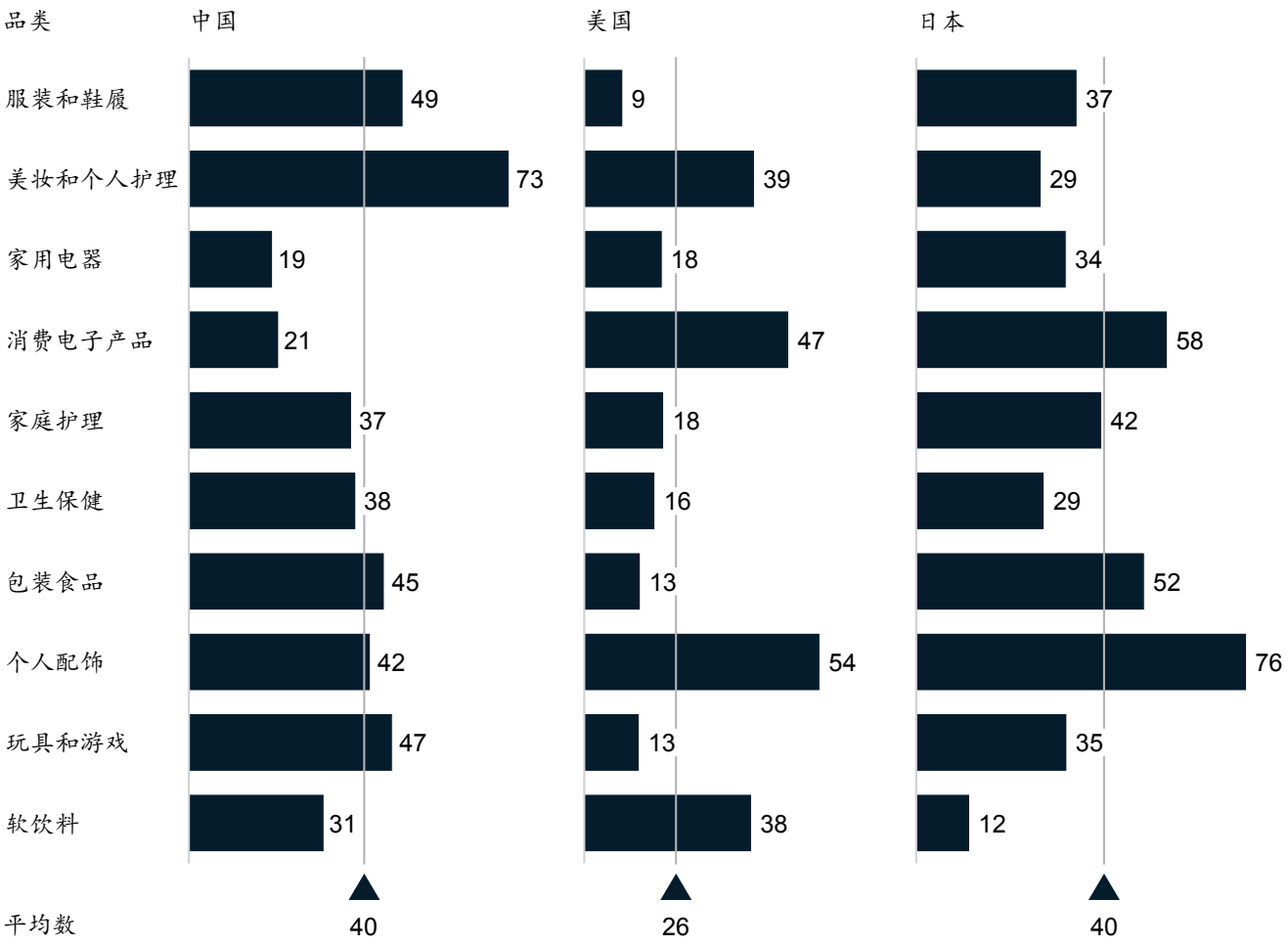
[27] 指家庭可支配收入达到或超过每月1.8万元人民币的家庭。
[28] Christina Nelson, Developing China sales and distribution capabilities, *China Business Review*（《中国经济评论》），2010年7月1日。

图 E7

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渗透率高于在美国市场的渗透率

按品类和市场划分，跨国企业在全球前30大商品品类中占据的市场份额（2017年）

%



注释：由于四舍五入，数字总和可能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欧睿国际；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两大趋势可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巨大商机

我们要着重指出以下两个可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巨大商机的趋势：

— **中国消费者期待拥有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选择。**随着收入的增长，中国消费者渴望拥有更多选择。虽然消费降级的说法很流行，但我们发现，有证据显示中国正在经历广泛的消费升级。麦肯锡2018年全球消费者信心调查显示，中国有26%的受访者整体处于消费升级状态，而全球另外10个顶尖经济体的平均比例为17%。某些情况下，中国消费者对国内品牌有所不满，部分原因在于产品质量不佳，而且选择较少——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均如此。不过，跨境电商作为一种便于中国消费者获取海外商品的渠道，近年来正在快速增长。根据艾瑞咨询的统计，2015-2017年间，中国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110亿元人民币（约合170亿美元）。我们预计，服务将成为下一个在竞争中精益求精的领域。中国的服务行业仍然落后于其他国家，生产率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20%~50%。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一些高收入居民因为对国内服务的品质怀有担忧，已经开始尝试使用国外的服务。虽然政府已经实施了一些针对向外资开放服务行业的举措，但外资的参与程度仍然有限。

—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增加境外消费。**中国的人员流动逐渐加大（尤其是学生和游客），让目的地国家的企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商机。中国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地，中国人在新加坡和泰国的出游消费分别相对于两国国内个人消费的7%~9%。中国留学生也对其他经济体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澳大利亚2017年对华教育出口额高达100亿澳元（这还不包括中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开支）。各国企业不妨积极适应中国人的习惯和偏好，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以充分把握上述趋势带来的商机。

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将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变动

中国与世界似乎都在重新审视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全球化的意外后果以及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成为全球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高度关注的话题，在美国，还有人担心“中国冲击”（china shock）导致了制造业岗位的流失[29]。一些主要经济体正在酝酿出台法规来加强对外商投资交易的审核——当所涉技术具备重要的战略意义时尤为如此。这些情况都预示着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正在减弱，但彼此脱离并非不可避免。

我们着重择取了5项可能导致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发生变化的发展趋势，并模拟了这些趋势可能引发的价值创造或流失。这5项发展趋势是：(1) 成为进口目的地；(2) 服务业的开放；(3) 金融市场全球化；(4) 协作解决全球议题；(5) 技术和创新的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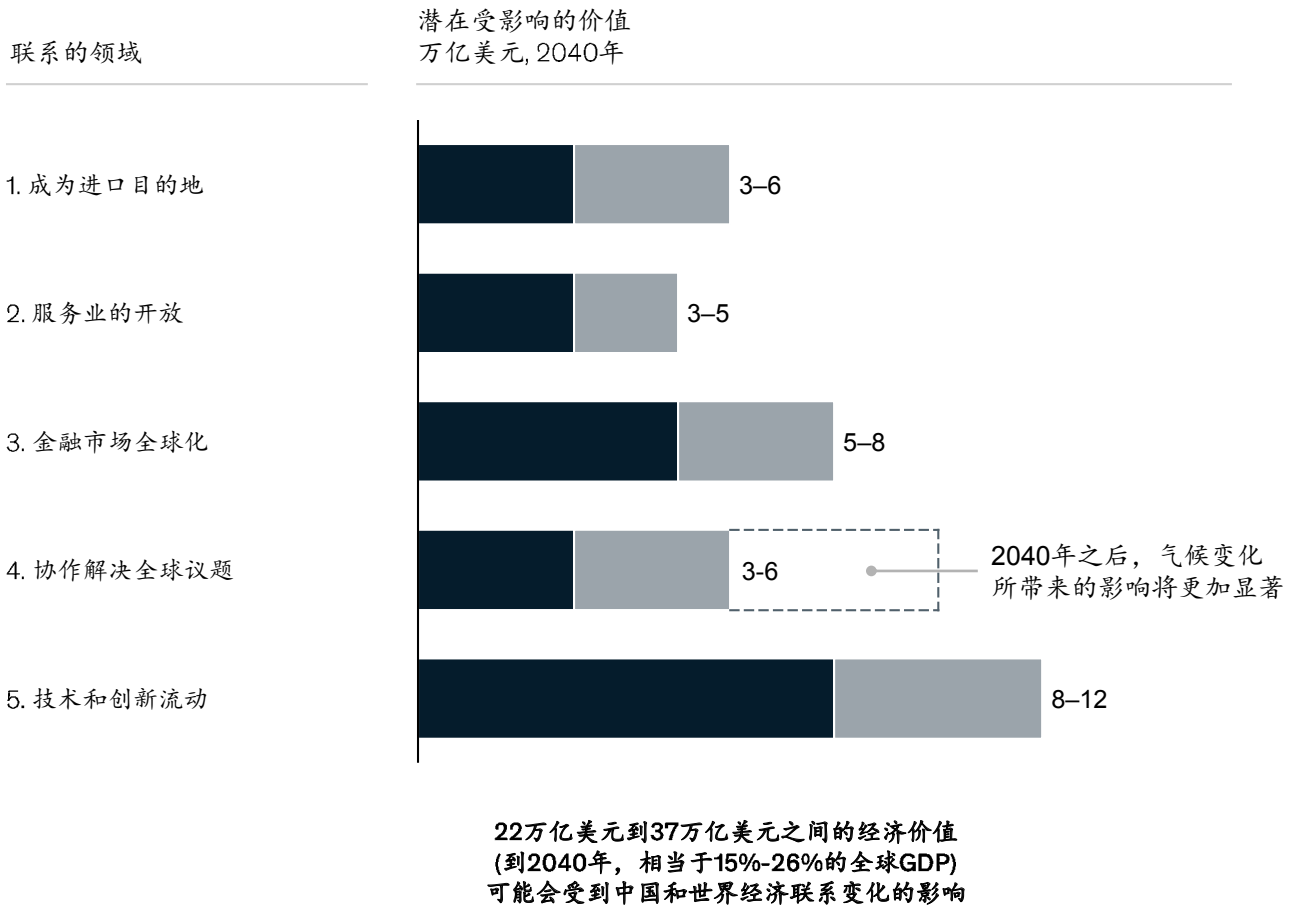
我们使用麦肯锡全球增长模型进行模拟计算，并利用外部研究对结果进行了调整，最终发现：如果上述5项趋势均向加强联系发展，则中国和世界到2040年有望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而减弱联系则可能令巨大的经济价值面临风险。这种价值绝大部分都表现为对GDP的影响，其余则表现为其他价值形式，例如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时选择不同，将导致社会成本出现或升或降的分化。到2040年，可能受到影响的总价值或将达到22~37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GDP的15%~26%（见图E8）。

[29] 可参见 Daron Acemoglu 和 Pascual Restrepo,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2018年7月16日; Daron Acemoglu 等, 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6年, 第34卷, 第1号; David H. Autor, David Dorn 和 Gordon H. Hanson, The China shock:Learning from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6年, 第8卷。

图 E8

中国和世界之间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将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变动

模拟研究



22万亿美元到37万亿美元之间的经济价值
(到2040年，相当于15%-26%的全球GDP)
可能会受到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变化的影响

注释: 我们对于可能引起的经济价值变动的估算是基于在特定条件及假设下的模拟研究; 并非是对未来的预测值。我们使用麦肯锡全球增长模型作为基础进行模拟计算, 研究了对经济价值的正面及负面的影响, 具体取决于经济联系减弱或增强的情境下对主要经济驱动要素的影响程度。我们的研究关注的是对经济的长期影响, 而不是试图预测当前关于贸易和关税的辩论的结果。

资料来源: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只要这种经济联系发生变化，无论是加强还是减弱，总会有一些利益相关方得益或受损。例如，东南亚国家也许会因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减弱而受益，因为其他国家对它们的出口需求将会增加；而假如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加强，那么中国某些行业的劳动者和企业必将经历阵痛，因为政府将加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力度。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估算相关价值，我们在模拟时设定了一组具体的条件和假设，所以这些估算结果不应被视作对未来的预测[30]。例如，在所设定情景下，我们假定了各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会受到以下因素影响：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以及技术交流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程度。我们在模拟研究中排除了几个因素，包括与政治议程和军事干预相关的风险。本模拟研究侧重于长期影响。我们并不是在试图预测当前关于贸易和关税辩论的结果。

到2030年，中国的消费增长可能将高达约

6万亿

美元，相当于美国与西欧的总和

— **中国可能成为新兴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出口目的地；但如果联系减弱，全球贸易流动将会收缩。**根据各方的一致预测，中国从当下到2030年这段时间的消费增长可能将高达约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与西欧的总和，是印度与整个东盟国家的约两倍。中国可以通过进口更多优质商品来满足中产阶级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期望，同时刺激国内消费。世界其他国家也将从中获益。在将发展重心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以后，中国会从新兴经济体进口更多劳动密集型商品、从发达经济体进口更多优质商品，从而帮助其他经济体创造更多就业。然而，假如全球联系减弱，持续的贸易争端可能导致长期关税升高、全球贸易额收缩、生产率降低；发达市场的消费品价格可能上涨。在中国，贸易收缩或将导致制造业岗位供给过剩。模拟结果显示，与贸易相关的经济价值可能高达3~6万亿美元。

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

20~50%

— **中外企业都有望从服务业的开放中获益；但如果始终不放开服务行业的限制，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将继续存在。**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逐年增大，2018年占国内GDP的比例达到52%，而2010年只有44%。但服务品质、服务能力和准入问题却影响了很多服务业子领域的发展；而外企面临的种种限制也会阻碍竞争和现代化进程，进而抑制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20%~50%。虽然中国政府最近出台的一系列举措显示出扩大开放的信号但外企的某些经营障碍或仍将存在。模拟结果显示，中国与全球的经济联系发生变化后，服务领域受影响的经济价值将在3~5万亿美元之间[31]。

— **如果中国能够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的全球化和现代化，便可拓宽资本分配的选择范围、提高分配效率；反之则会导致中国金融市场面临更多波动，并且阻碍生产率增长。**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封闭，消费者在分配资产时的选择很有限，由此便导致了房地产价格上涨、回报率承压等一系列问题。国企债务在中国企业债务中的占比高达70%，但只贡献了略高于20%的工业产出[32]。倘若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全球市场进一步对接，中国的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或可拥有更多选择，资源配置效率也将有所提升。反之，倘若中国与全球市场的联系减弱，则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例如不良贷款风险）将会升高，导致商业利率和无风险利率之间的利差扩大，从而推高融资成本[33]。模拟显示，这一选择涉及到的经济价值共计约5~8万亿美元。

[30] 我们在模拟中集合了超过30篇学术论文的洞见，并且纳入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全球增长模型和外部模型中有关核心经济指标的建模效果。详细方法参见技术附件。

[31] 了解更多关于服务业自由化的影响，请参见 Denise Eby Konan 和 Keith E. Maskus, *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政策研究工作论文 WPS3193, 世界银行, 2004年; Aaditya Mattoo, Randeep Rathindran 和 Arvind Subramanian, *Measuring service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n illustration* (English), 政策研究工作论文 WPS2655, 世界银行, 2001年; Oleksandr Shepotylo 和 Volodymyr Vakhitov, Impact of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on productivity of manufacturing firms: , 讨论论文第45号, 基辅经济学院, 2011年。

[32] 魏玲玲, As China faces slowdown. Stimulus will have smaller global reach,《华尔街日报》, 2019年3月16日;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估计，如果消灭中国的僵尸企业，减少产能过剩，并且通过国企改革提升效率，则可将总产出增加 0.7~1.2个百分点。参见 W. Raphael Lam等, *Resolving China's zombies: Tackling debt and raising productivity*,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7年11月27日。

[33] Christopher Balding, *Rising interest rates challenge China's growth*, 彭博观点, 2018年8月15日。

— **中国能够为解决全球议题做出更多贡献；但如果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减弱，则中国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合作深度都将削弱。**全球经济体系的基础规则尚无定法，而中国可以为解决全球化问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中国已经加大对国际机构的承诺（以及融资力度），并且对代表新兴经济体的新机构给予大力支持。例如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的持股比例分别为30%和20%。中国也在积极组建区域贸易集团，逐渐成为制定全球化问题解决方案的关键参与者。例如在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中国正在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清洁煤炭解决方案。不过，中国仍有潜力开发更多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并向世界输出，例如共同定义全球化数字治理，以及填补每年预计约3500亿美元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34]。根据我们的估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或发生变化，这方面涉及的经济价值可能在3~6万亿美元之间，并且将在环境保护、网络安全等一系列与全球公共产品相关的话题上拓宽国际合作。

—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全球技术流动可能会增加，从而催生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解决方案，有助于提升生产率；反之则会逐渐削弱全球生产率。**创新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既包括自主创新，也包括进口创新），并逐渐促使中国经济整体向价值链上游挺进。若要加强技术流动，中国与世界需要携手构建一套彼此接受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如果能够动员全球共同参与，通过透明、可信的流程解决知识产权问题，就可以提高外企向中国出售技术所获得的收入，同时减少知识产权侵权的可能。 一项研究显示，知识产权侵权使得美国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35]。对中国来说，进一步推进全球化整合，有助于扩大获取国外技术的种类，促进与国外投资者、机构和人才之间的合作，共同开发全球领先的解决方案。但如果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下去，那么长期关税将会上升，技术流动也将受到实质性的限制，于是创新便会受阻，生产率增长也会大幅降低。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与中国的联系减弱意味着逐渐失去全球技术领域的关键供应商和市场，而且中国愈发活跃的技术创新也无法再向国外出口。2019年初，中国成为第一个实现了探测器登陆月球背面的国家；中国目前还在联合埃及等新兴经济体共同研发卫星。如果联系减弱，中国也将失去促进经济发展所需的关键技术。模拟数据显示，这方面涉及的价值在8~12万亿美元之间，具体取决于技术流动的方式，以及对生产率增长的后续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选择和情景（以及后果）不只意味着中国需要采取行动来积极应对，也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各国可以共同思考并改革全球贸易体系。提升争端解决效率和扩大包容性，并让全球进一步分享中国经济开放创造的利益，惠泽更广大的群体[36]。如果中国的金融行业实现了全球化，届时全球各国都应当对中国投资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各国需要明确拟定目标和里程碑，避免一些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全球福祉。此外，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技术与知识产权流动程度主要取决于各个国家对技术投资和国家安全问题所持的态度。

[34] *Bridging global infrastructure gaps*，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以及麦肯锡资本项目和基础设施实践，2016年6月。
[35] 估算美国知识产权在中国泄露所产生的成本时，依据的是美国知识产权盗窃问题委员会2017年的一份报告（/ipcommission.org/report/IP_Commission_Report_Update_2017.pdf）。
[36] Wendy Cutler, *Global trade is broken. Here are five ways to rebuild it*, 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9月12日；*Current trad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经合组织. https://www.oecd.org/trade/understanding-the-global-trading-system/trade-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

鉴于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将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企业需要调整经营方法，才能在新环境下繁荣发展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甚至还会潜藏风险。因此，企业需要从以下 4 个方面考虑如何调整发展战略：

- **评估自身在短期和长期受中国与世界之间经济联系变化的影响程度。**为了理解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的变化将对企业产生哪些影响，企业应当首先评估自身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依存度可以体现为很多形式。我们在衡量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时，已经为 8 个维度设定了可供企业检验和追踪的具体指标。企业可根据各自的依存度来评估联系发生变化后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利益。即便在应对短期波动和不确定性之时，企业也应该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基本面，积极思考哪些长期趋势可能对自身产生影响——例如收入增长、技术流动和本地竞争加剧。
- **明确投资方向和价值链布局。**由于上述情景和所涉及到的经济价值与每一家企业息息相关，企业高管可通过把中国的投资承诺等指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以确定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战略，并确定中国在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上扮演何种角色。企业应当明确自身在中国市场的期望——希望把中国市场作为关键的增长引擎，还是只想参与小众行业？举例而言，假如中国未来仍然是全球重要的增长和创新来源，那么企业不妨把优化投资纳入长期战略，甚至加大投资，并且加倍关注核心价值的创造（比如大力投资于研发创新）。如果中国不再是重要的增长和创新来源，企业就应该考虑把商业活动和投资转向其他地区。
- **培养自身的卓越运营能力，以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鉴于监管及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企业需要更加灵活以实现其价值定位。各国政府在跨境投资、并购以及技术和人员流动方面的作用越发凸显。企业应该重视业务市场的当地情况，因为情况可能发生骤变，敏感性可能会升高，在运营上犯下的错误将迅速升级，吸引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企业也不妨考虑调整运营足迹，但这需要企业本身具备足够的敏捷性，也意味着要向风险管理投入更多资源。
- **培养并保持幸存者心态。**有一些企业经历了经济衰退和危机时刻，却依然能够繁荣发展。它们往往都保持着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和通畅的融资渠道，并且拥有广泛的业务领域，不至于在某一行业衰退后就一蹶不振。然而，危机和不确定性也会创造某些机会，由此产生的压力会推动企业重组，从长期来看有助于提升经营健康，并催生一些业务开发以及外延式增长的机会，使其得以拓展业务范围或提升市场地位。

• • •

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贸易的动力源泉，但其与世界融合的进程仍不乏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变化。由于中国经济正逐步转向以内需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同时世界各国也在重新评估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未来这两方会不会相互脱离？如果联系减弱，那么双方都会损失巨大的经济价值。相反，加深彼此间的整合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无论这种联系未来将如何变化，依赖中国经济的企业都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才能在未来不确定的环境下繁荣发展。

1 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融合度有多高？

2018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为

~16%

1990年为

2%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凭借庞大的经济体量跻身全球大国之列，自 2013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商品贸易国。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 2014 年便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今，中国更进一步跻身成为全球前两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来源地。中国拥有 111 家《财富》世界 500 强上榜企业，与美国的数量相当。然而，尽管中国的经济体量非常可观，但其经济尚未全方位与世界融合。中国企业的绝大部分营收仍然来自国内市场。国际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时，在运营和监管方面依然面对冗杂的掣肘因素。虽然中国蓬勃的数字经济产生了海量数据，但跨境数据流的规模仍然有限。

本章将从 8 个维度来审视中国经济与世界融合的现状，并将中国与全球其他经济体进行对比。

作为经济体量庞大的全球大国，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融合度在 8 个维度上各不相同

自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占全球 GDP 的份额有了大幅增长。几十年来，中国积极拥抱市场机制，发扬创业精神、鼓励私营企业发展；大力推动工业和科技产业的现代化；并且积极鼓励外商前来投资和开展贸易。随着经济改革在 1990 年前后渐收成效，中国占全球 GDP 的份额也在十年年之间翻了一番，从 2% 增长到 4%；2000-2010 年间又再度翻了一番，达到 8%。到 2018年，中国已占据全球 GDP 份额的 16%。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统计数据，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在 2014 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是 1870 年以来的第一次[37]。若按名义GDP总量计算，中国的经济体量在 2018 年已达到美国的 66%，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历时多年的 GDP 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未来仍有可观的增长空间（参见附文 1：中国经济拥有强劲的增长动能）。

[37] 《世界经济展望》，2016 年 10 月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 年；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经合组织发展中心，2004 年。

附文1

中国经济拥有强劲的增长动能

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得益于强劲的内生动力（例如城镇化），人均 GDP 和生产率的提升潜力十分可观。

我们不妨将现在的中国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做一个比较。当时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规模仅次于美国（见图 1），人均 GDP 大约比美国高出 50%（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大约比美国低 20%）；而中国如今的名义人均 GDP 仅为美国的 15% 左右（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美国的 28%）。当年日本的城镇化比率已达到 78%；中国如今的比率仅为 58%，比高收入经济体低 20~30 个百分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始终难以获得强劲的增长动能。但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日本有所不同。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庞大，居民收入相比日本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仍然较低。城镇化和持续的经济改革将提高中国的经济生产率，从而推动居民收入和 GDP 进一步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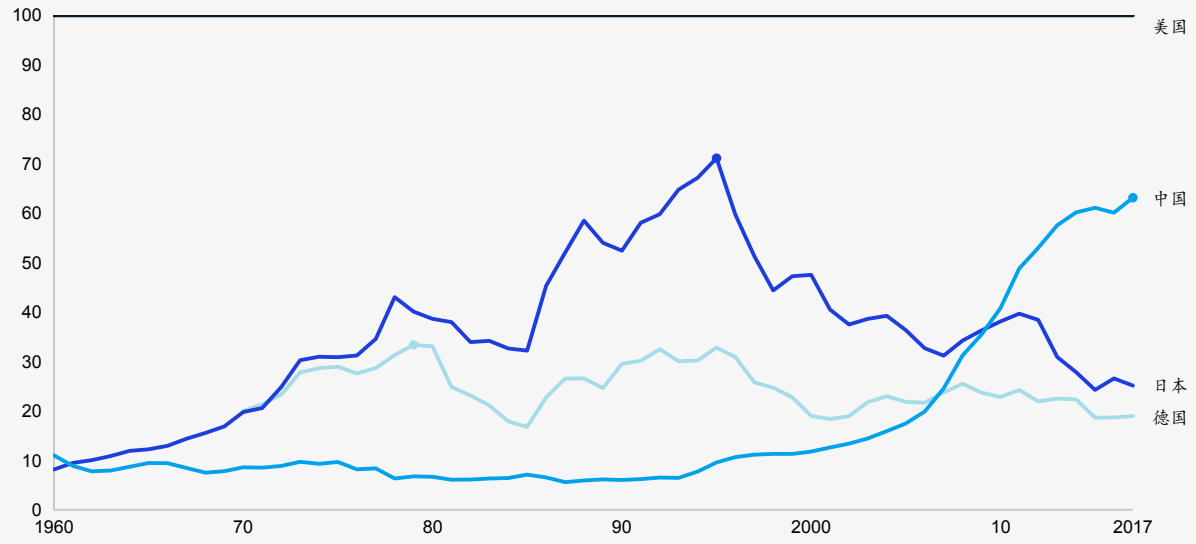
为了实现这些发展，中国必须妥善应对诸多挑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16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曾帮助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或已日渐失效，资本生产率和企业回报都在降低。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从 2007 年的 140% 左右增长到 2018 年的 250%。鉴于国内的劳动年龄人口已在 2013 年达到最大值，中国必须提高生产率，才能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上述研究也发现，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若从投资驱动转向生产率拉动，则可显著提升 GDP 总量和家庭收入水平[38]。

[38] China's choice: Capturing the $5 trillion productivity opportunity（《中国的选择：抓住 5 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机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6 年 6 月。

图1

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和城镇化率均相对较低，这表明中国的GDP未来仍有可观的增长空间

国家 GDP 变化，1960-2017年，
指数：100 = 美国，1960年（按当前美元价值计算）



	德国 1979年	日本 1995年	中国 2017年
人均 GDP，占美国百分比	96	151	15
城镇化率，%	73	78	5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高速增长多年以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参与者。我们从 8 个维度分析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融合程度后发现，虽然中国经济在所有维度上都具备庞大体量，但尚未全方位实现与世界的融合（见图 2）。

图2

从经济体量上看，中国已跻身全球大国之列，但仍有进一步与世界融合的空间

	中国的经济规模	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的空间
贸易	中国自 2013 年以来一直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17 年占全球商品贸易的 11.4%	…… 但中国 2017 年的服务贸易额仅占全球总量的 6.4%左右
企业	中国拥有 111 家《财富》世界 500 强上榜企业，数量与美国相当	……但它们的收入仍然主要基于国内市场（海外营收仅占 18%，而标普 500 企业的平均比例为 44%）
资本	中国拥有庞大的金融系统（全球第一大银行体系、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三大债券市场）	……但跨境流动（美国的流动规模是中国的3-4倍）和外资参与度相对有限（银行、股票和债券市场中的外资占比尚不足 6%）
人员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留学生（在 2017 年高等教育阶段国际学生中占比 17%）和游客（中国游客 2018 年出行 1.5 亿次，全球居首）输出来源国	…… 但人员流动的地理区域仍然较为集中（约 60% 的留学生前往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移民中国的外国人仅占全球移民总数的 0.2%
技术	中国投入巨资开展研发（2018 年凭借 2930 亿美元的研发支出位居全球第二）	…… 但仍然高度依赖进口技术（仅 3 个国家就为中国贡献了一半以上的技术进口合同）和知识产权（中国的知识产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 6 倍）
数据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规模超过 8 亿人），产生了海量数据	……但跨境数据流动的规模很有限（位居全球第 8，但仅为美国数据流动的 20%）
环境影响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占全球的 45%	……但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源（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28%）
文化	中国正在大举投资在全球范围内提升文化影响力（2017年全球票房排名前 50 的电影有 12% 在中国拍摄，而2010 年仅为 2%）	……但文化影响力仍然有限（电视剧出口额仅为韩国的 1/3）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贸易国，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

11.4%

维度 1. 贸易：中国已成为全球贸易大国

在全球贸易舞台上，中国既是重要的供应方，也是重要的消费市场。中国贡献了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 35%，并在全球家庭消费中占据 10% 的份额，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全球商品和服务流动规模很可观，已于 2009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于2013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中国 2017 年的商品出口总额高达 2.2 万亿美元，规模全球居首。2017 年中国在全球进出口商品贸易总额中占比约为 11.4%（见图 3）。我们对全球 186 个国家和地区展开分析，发现其中33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是中国，65 个国家的最大进口来源地是中国。

中国的对外出口规模也实现了指数级增长。2000 年中国的出口额仅为 1110 亿美元，是全球第十大出口国。2017 年中国的商品进口总额高达 1.7 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相比 2000 年的 1250 亿美元有了大幅增长。在全球约 20 个国家/地区中，出口额的 1/5 以上均来自对华出口。据联合国 2016 年的统计，对华出口占刚果民主共和国出口总额的 45%，澳大利亚为 33%，智利为 28%，韩国为 24%。自 1995 年以来，中国的商品贸易始终保持顺差。其年度贸易顺差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约 300 亿美元增至 2000-2010 年间的 3000 亿美元；2015-2017 年间更从 4000 亿美元增至 6000 亿美元。得益于此，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从 2000 年的 1590 亿美元增长到 2017 年的超过 3 万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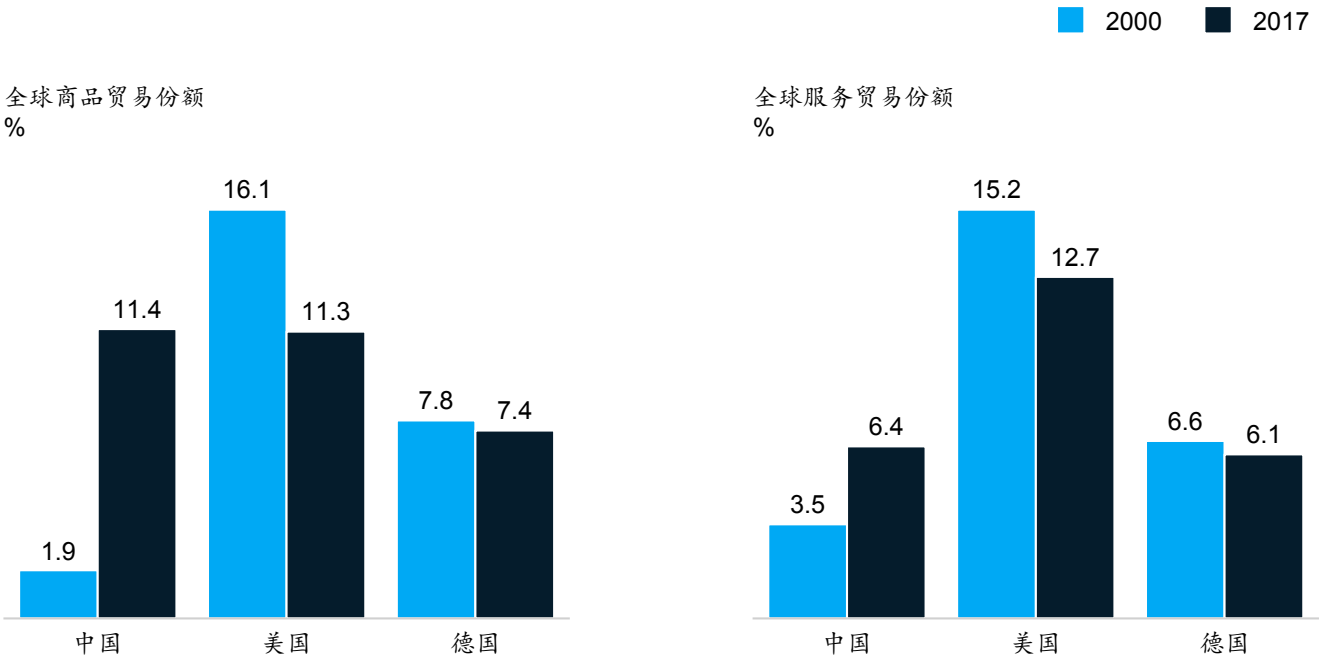
虽然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但中国仍在不断提升制造业的能力和品质。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占比从 1990 年的 1% 飙升到 2018 年的 28%。近年来，中国一直在重点提升化学、机械和汽车等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实力。

中国也在不断扩大服务贸易规模。2017年，中国以 2270 亿美元出口额跃居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这一数字达到 2005 年的 3 倍。2017 年中国的服务进口额高达 4680 亿美元，规模全球第二。服务贸易逆差也在逐年扩大，从 2009 年的约 150 亿美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2650 亿美元。这一增长主要反映在中国游客出境旅游观光等方面，约占总贸易额的 54%。建筑和商业是中国服务出口规模最大的两个领域，合计占比达 52%。然而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全球份额尚不及商品贸易。2017年，中国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6.4%，约为商品贸易占比的一半。但从全球来看，服务贸易的增速比商品贸易快 60%[39]。

[39]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 年 1 月。

图3

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贸易国，但占据的全球服务贸易市场份额仍然相对较低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维度 2. 企业：外资企业在中国拓展市场布局之际，中国企业也在走向全球

许多中国企业现已成长为全球性企业。全球《财富》 500 强上榜企业当中，总部位于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企业数量已从 2007 年的 22 家增长至 2018 年的 111 家（若计入中国台湾的企业，总数将变为 120 家），相比之下，美国在 2018 年拥有126 家上榜企业（见图 4）。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近日一项关于“超级明星”企业的研究显示，1995-1997 年间，中国尚无一家超级明星企业跻身全球表现前 10% 或 1% 之列。然而到了 2014-2016 年，中国企业在全球前 10% 企业中的占比已经达到 8%，在前 1% 的企业中占比达到 1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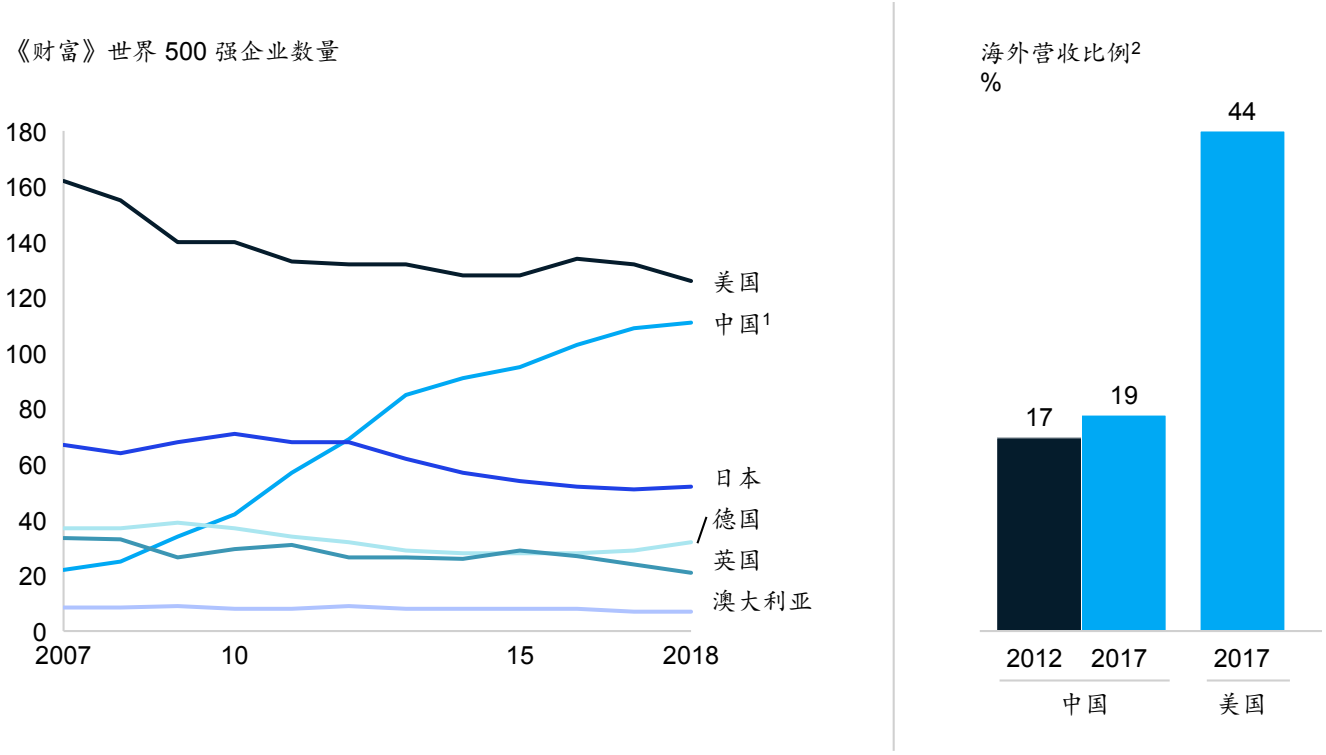
也不仅只有中国的大型企业才在寻求全球扩张。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0-2016 年间，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企业总数从 10167 家增长到了 37164 家，年增速大约保持在 16%。这些企业的业务遍及全球各地，其中北美增长最快，年增速高达 20%，拉丁美洲以 17% 的增速紧随其后，亚洲其余地区则为 16%。但官方统计数据很可能低估了中国企业的扩张范围。自下而上的分析表明，活跃于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总数可能远高于这一数字。根据麦肯锡的估算，非洲目前约有 1 万家中国企业正在开展业务，相当于官方统计数据的 3 倍，我们还发现其中 90% 是私营企业[41]。

[40] 超级明星企业在过去 20 年间变得更加多样化。在计算这种多样化时，我们使用了“辛普森多样性指数”，该指数相当于经济学里的“赫芬达尔指数”，可有效衡量每个国家在排名前 10% 或 1% 的公司中的“市场份额”。参见*Superstars: The dynamics of firms, sectors, and cities leading the global economy*，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8 年 10 月。

[41]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 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龙狮共舞：中非经济合作现状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发展？》），麦肯锡公司，2017 年 6 月。

图4

中国的《财富》世界 500 强上榜企业总数几乎与美国相当，但中国企业的大部分营收仍来自国内市场



1 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企业。
2 中国的营收分析对象是上榜《财富》世界 500 强的中国企业；美国的营收分析对象是标准普尔 500 列出的所有企业。
资料来源：彭博社；《财富》杂志；标准普尔；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中国也逐渐涌现出一批全球领军企业。中国的数字巨头正以投资、并购、合资、技术合作、业务扩张等方式走向全球。2016 年，阿里巴巴的国际电商零售额约占公司总营收的 2%，而2018 年的年报显示，该比例已经增长至 6%。腾讯通过一系列收购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42]。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有 80% 以上的销售额来自海外[43]。传音和小米已在非洲、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市场中成为了领军者。抖音在中国境外拥有大约 2 亿月活用户[44]。滴滴斥资 10 亿美元收购巴西本土共享出行企业 99（该企业是优步在巴西的头号竞争对手），借此成功打入拉美市场[45]。中国的风投基金也纷纷在美国和新兴市场设立办事处。Westlake Venture、创新工场和 Hax 这些或多或少具有中国“血统”的风投基金以及孵化器都在硅谷设立了办事处[46]。

42 Chris Morris, China's Tencent folds yet another video game company into its empire, 《财富》, 2018 年 8 月 30 日.
43 Yang Yang, DJI seeks new round of financing with company value of $15b, 《中国日报》, 2018 年 3月 21 日.
44 Todd Spangler, TikTok app nears 80 million U.S. downloads after phasing out Musical.ly, lands Jimmy Fallon as fan, *Variety*, 2018 年 11 月 20 日; Nicole Jao, *Douyin claims to have 400 million monthly active users in China*, TechNode, 2018 年 11 月 8 日。
45 Ingrid Lunden, Didi confirms it has acquired 99 in Brazil to expand in Latin America, TechCrunch, 2018 年 2 月 8 日.
46 Yunan Zhang, Chinese government's path into Silicon Valley, Tech News, 2017 年 2 月 10 日; Matt Sheehan, *Does Chinese venture capital in Silicon Valley threaten US tech advantage?*, MacroPolo, 2018 年 4 月 26 日。

2017年上榜《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的境外收入占总收入之比为

19%

2007年为

10%

中国也是外国跨国企业的重要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1-2018 年间，由外商投资的中国工业企业的收入增长了 12 倍。2017 年，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制造业总营收的 22%。到 2018 年，约有 80% 的《财富》 500 强上榜企业（不包含中国上榜企业）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其中 40% 的企业已经在华设立了研发中心。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外资企业目前占中国就业岗位总数的 7%。这一趋势对整个供应链上就业岗位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一项研究显示，1998-2004 年间，外资企业在华扩张的风潮对国内私营企业的就业产生了积极影响[47]。另一项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发展高新技术、接触国际市场提供了帮助[48]。

虽然一些中国企业已具备全球体量，但得到世界公认的全球领导企业仍然较少。在《福布斯》和 Interbrand 分别评选出的两份“全球品牌 100 强”榜单中，仅有一家中国企业上榜，也就是华为（在榜单中分别排在第 79 和第 68 位）[49]。中国企业的绝大多数营收仍来自国内市场。不过，在 2007-2017 年间，跻身全球《财富》 500 强的中国企业的境外市场营收占比已从 10% 稳步增长到 19%。根据标准普尔的统计，美国企业的境外市场营收占比高达 44%[50]。在中国，不同行业的海外营收占比相差很大。科技类企业在境外市场的营收占比最高，为 42%，工业企业为 22%，化工企业为 12%，金融服务企业为 9%，汽车企业为 8%。

维度 3. 资本：中国资本市场规模虽然庞大，但远未实现全球化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扩张，中国金融体系的规模也在持续增长。如今，中国的银行体系已凭借 40 万亿美元的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规模也分别位列全球第二和第三。然而，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远未实现全球化。外资在中国银行体系中仅占 2% 左右，而英国约为 45%，美国约为 13%，欧元区约为 12%，日本约为 7%。外资持股在中国股票市场中占比不足 2%，而英国约为 54%，美国约为 22%，日本约为 32%，韩国约为 31%（见图 5）。虽然中国已为外资的流入和流出开辟了新渠道，例如沪港通、深港通合作计划，但收效不及预期。外资持股在中国债券市场占比不足 2%，美国约为 41%，德国约为 12%，日本和韩国均为 10% 左右。最后，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和支付总额中占比仅为 1% 和 2%。与此相比，美元在这两项指标中占比为 64% 和 42%，欧元为 20% 和 30%。

在资本流动方面，情况也并不均衡。2015-2017 年间，中国既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也是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2000-2017 年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输入额从 410 亿美元大幅增长到 1360 亿美元，但即便如此，仍然只占到国内总投资额的 2% 左右；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输出额在中国总投资额中的占比则从 2000 年的只有 0.1% 增长到了 2017 年的 8%。中国已成为全球各国的主要直接投资者，但中国与世界各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在某些地区相对较为集中。例如，60%~80% 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包括流入和流出）都发生在亚洲其他地区之间。需要指出是，如此之高的比例或许会产生误导，因为亚洲其他地区也包括中国香港，这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出中国的门户。我们自下而上评估了各种交易后发现，2016 年中国有 33% 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北美，另有 33% 流向欧洲。到了 2018 年，流向北美的比例降至 14%，流向欧洲的比例则增至 40%。

[47] Sune Karlsson等，*FDI and job creation in China*，东亚发展研究国际中心，工作论文系列第 2007-24 卷，2007 年 11 月。

[48] Peter J. Buckley、Jeremy Cleff 和 Chengqi Wang, The impact of inward FDI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 年，第 33 卷，第 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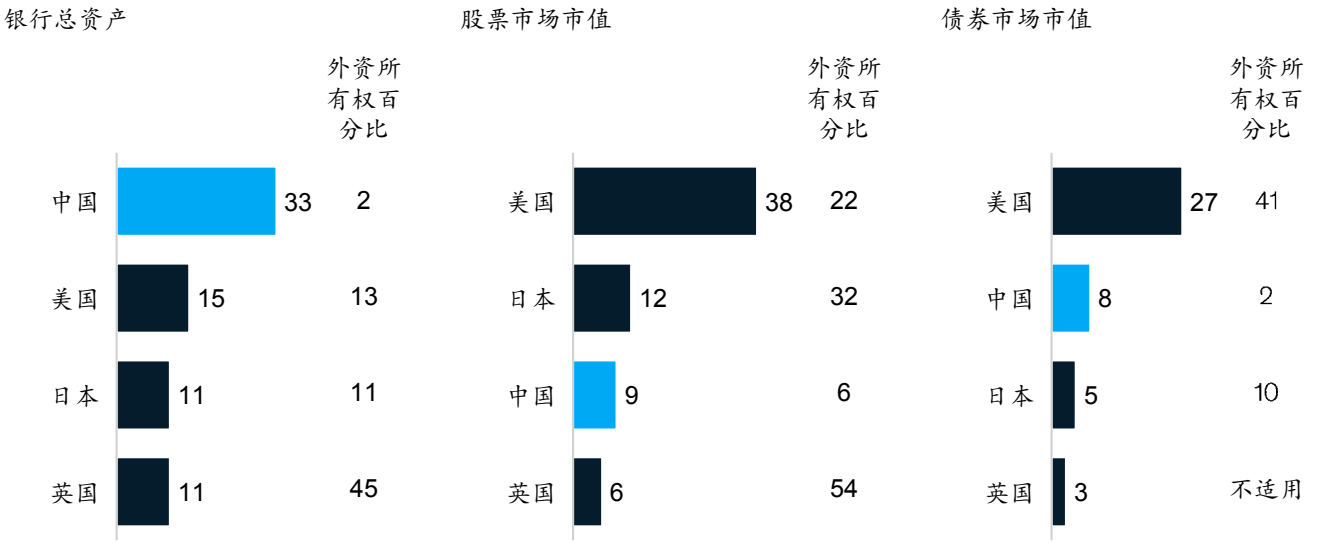
[49] “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榜”，《福布斯》，forbes.com/powerful-brands/list/；“2018 年全球最佳品牌榜”，*Interbrand*，interbrand.com/best-brands/best-global-brands/2018/ranking/。

[50] Howard Silverblatt, *S&P 500 2017: Global sales*，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2018 年 8 月，us.spindices.com/indexology/djia-and-sp-500/sp-500-global-sa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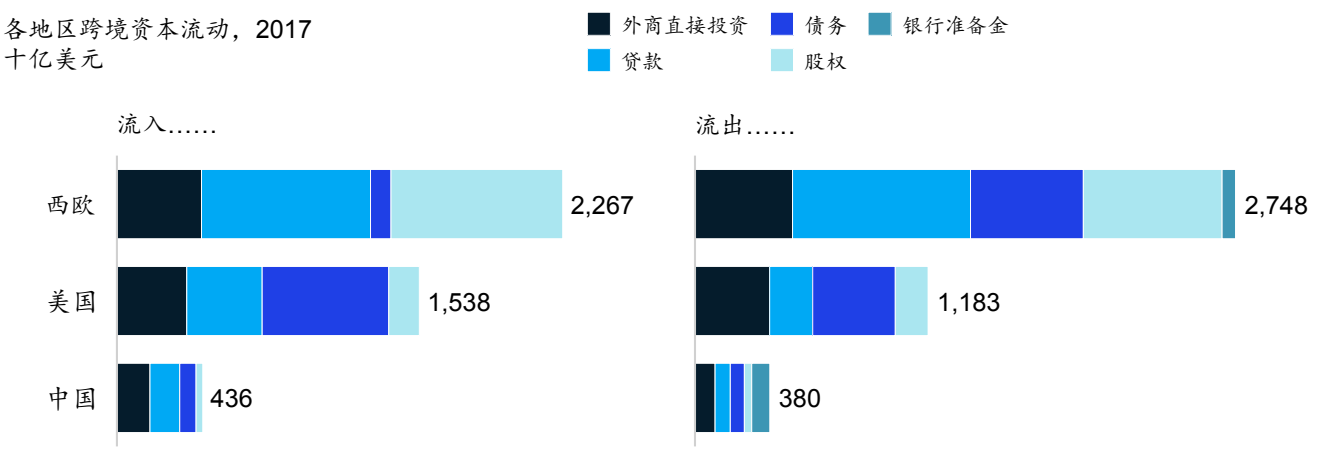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金融体系的规模位居全球前三，但外资占比很低，跨境流动的规模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有限

全球前四大金融经济体的金融体系规模[1]
万亿美元



各地区跨境资本流动，2017
十亿美元



[1] 最近可用年份。

资料来源：联合国；BIS；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除了外商直接投资以外，跨境资本流动还包括贷款、债务、股权和准备金。从这些更为宏观的数字来看，中国的跨境流动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仍然很有限。2017 年流入中国的资本总额为 4360 亿美元，仅为美国的 28%；流出中国的资本总额为 3800 亿美元，仅为美国的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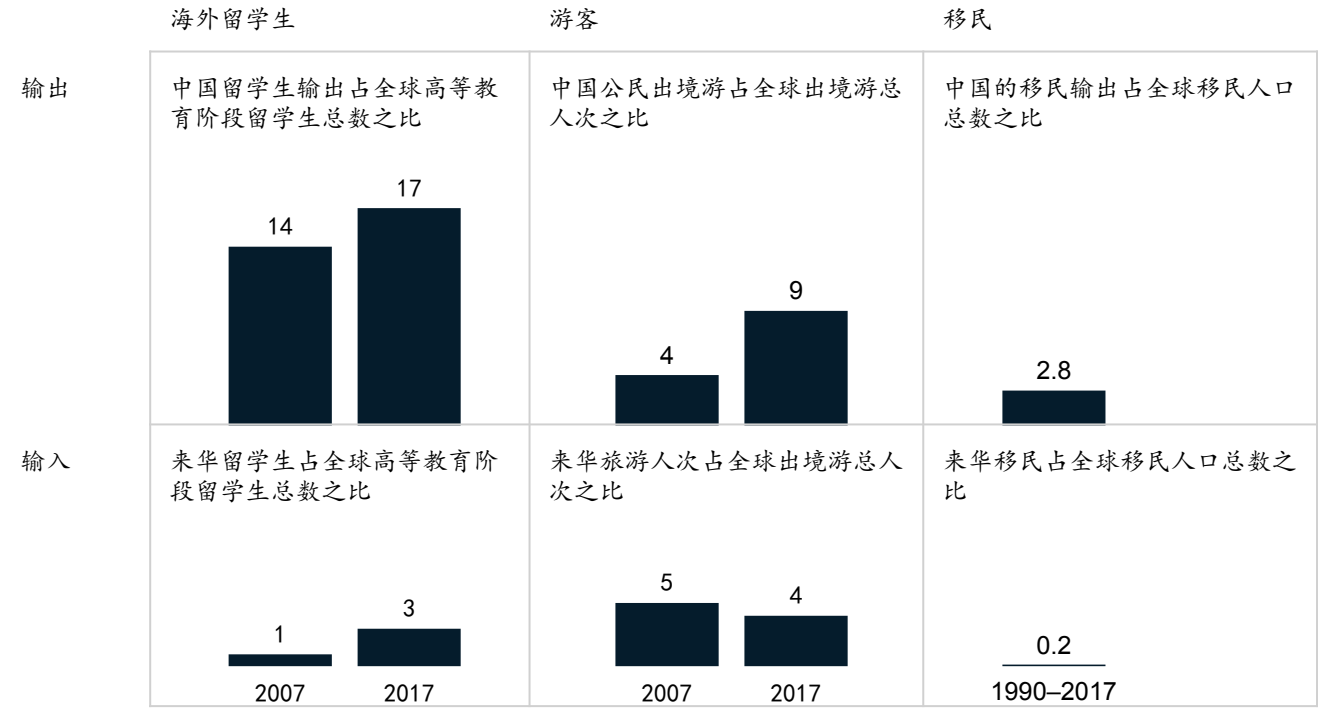
维度 4. 人员：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人员流动迅速增长，但仍主要集中于特定地区

中国以 14 亿人口稳居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与世界各国间的人员流动也在快速增长，尤其是留学生和游客（见图 6）。然而，中国的移民流动仅占全球人员流动总量的一小部分，留学生和游客的流动也集中于某些特定地区。

图6

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及出境游人次很多，但移民规模和来华人员规模仍然相对有限

中国占全球人员流动之比
%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2017年中国的海外留学生总人数为

608,400

是2000年的

16倍

2017 年（目前的可用数据截止到这一年），中国有 60.84 万学生赴海外留学，这一数字是 2000 年的 16 倍，远高于其他国家。2016 年，韩国和日本分别有 11.6 万和 20 万学生赴海外留学。中国学生的留学目的地主要集中于美国，赴美读书的学生占 2015 年中国留学生总人数的 36%，赴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比例分别为 12% 和 11%。目前，中国留学生在全球高等教育阶段的国际学生中占比达 17%。值得注意的是，48.9 万海外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归国留学生比例从 2000-2010 年间的不足 20% 增长到 2013-2017 年间的 80% 左右[51]。这些留学生带回的知识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创新做出了宝贵贡献。中国也是重要的国际留学目的地。2016 年，中国接收了 48.9 万名外国留学生，成为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地；这些留学生 60% 来自亚洲。韩国、泰国和巴基斯坦留学生是来华国际学生的主体，分别占总人数的 16%、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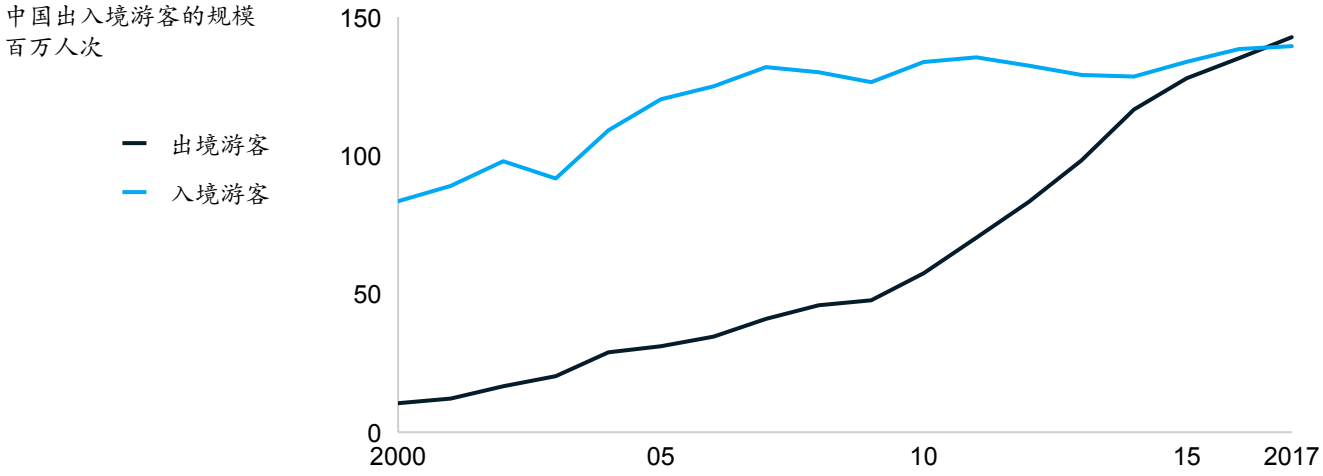
中国游客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2017 年的出境游人次达 1.43 亿，但其中半数以上的游客前往大中华地区（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另有 29% 前往亚洲其他地区。同年，来华旅游人次达 1.39 亿，其中 78% 的游客来自亚洲经济体，包括大中华地区（见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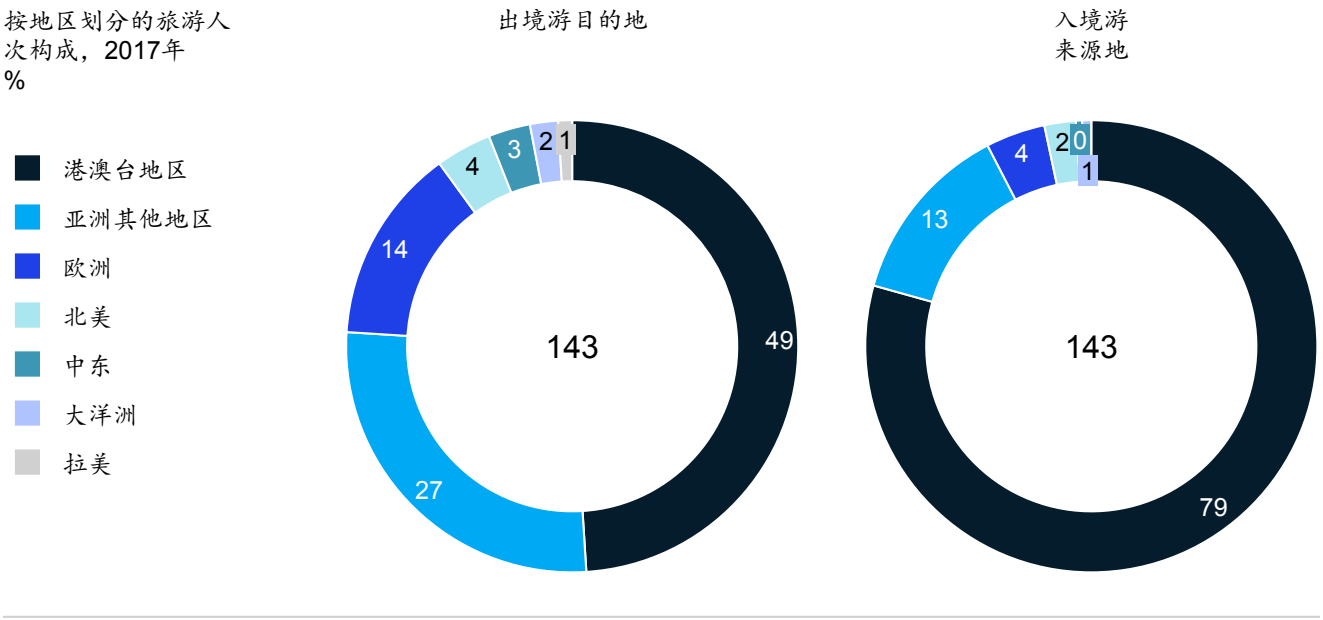
而中国移民的流动规模则小得多。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1990-2017 年间共有 430 万中国人移民到世界各地，约占全球移民总数的 3%。但其移民目的地高度集中，67% 前往亚洲其他地区定居，其中又有一半以上移民中国香港。中国游客目前占国际游客总人数的 9%，高于 2007 年的 4%。目前外籍人士移民中国仍然受限。同期入华移民人数仅为 37.6 万，不足全球移民总人数的 1%。

[5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图7

中国出境游增速快于入境游，但人员流动的地理区域仍然较为集中





注释：由于四舍五入，数字总和可能不等于 100%。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旅游业理事会；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维度 5. 技术：中国不断加强国内科技能力，但在某些核心技术领域仍然需要进口

过去 20 年间，中国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大幅增长，国内研发开支总额从 2000 年的约 100 亿美元迅速增至2017 年的2600 亿美元，几乎达到美国研发投入绝对值的一半（见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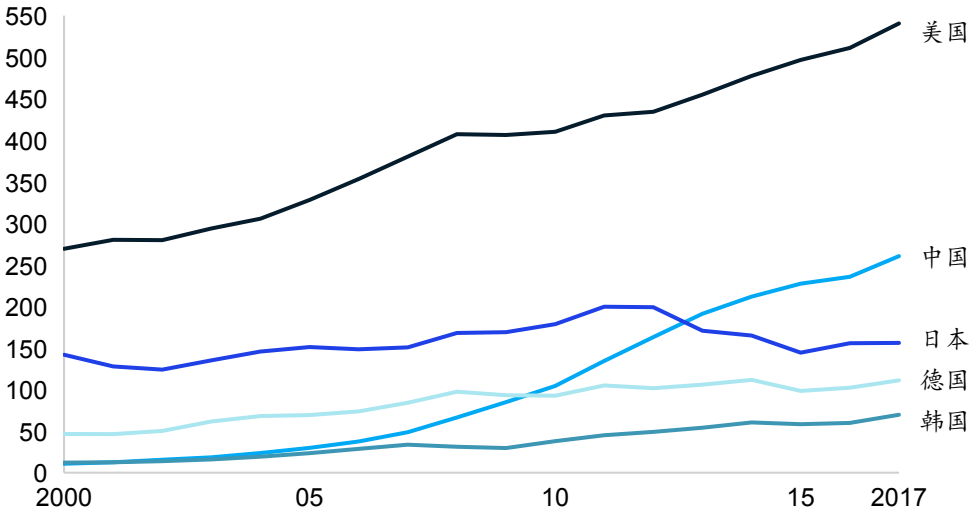
中国本土研发能力的提升和研发开支的增长，使得中国对国外研发能力的依赖相对有所下降，也促使中国成长为一个全球化创新平台[52]。若按绝对值计算，中国的技术进口额自 2000 年以来每年增长 3%，但技术进口占国内总研发开支的相对比例却在下降，从 2000 年的 14% 降至 2016 年的 3%。本土研发能力的提升也反映在中国技术进口的结构变化当中。1996 年，设备进口约占中国技术进口总额的 82%。到 2016 年，约有 63% 的技术进口为知识产权引进，另有 29% 为技术服务引进。

[52] *The China effect on global innovation*（《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 年 10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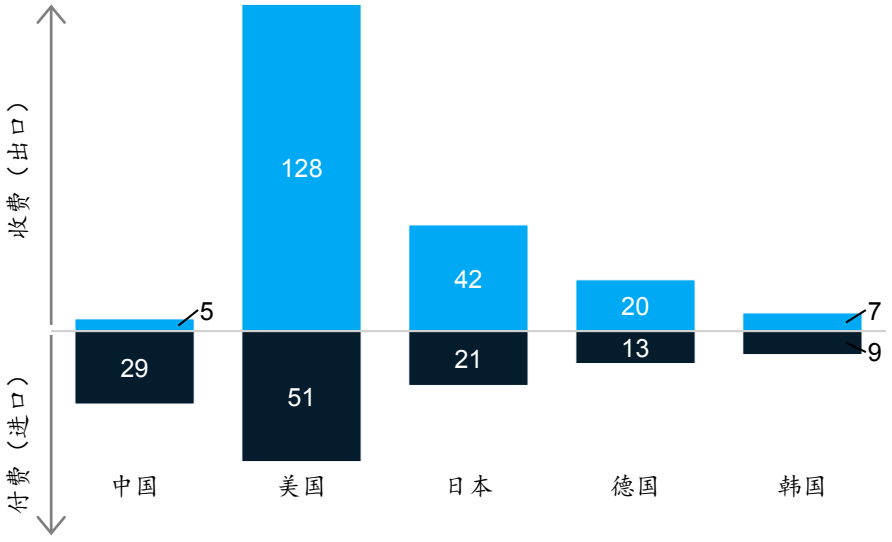
图8

中国已增加研发支出，但仍然是全球重要的技术进口国

各国研发开支



各国知识产权贸易额，2017年



知识产权出口/进口比率	0.2	2.5	2.0	1.6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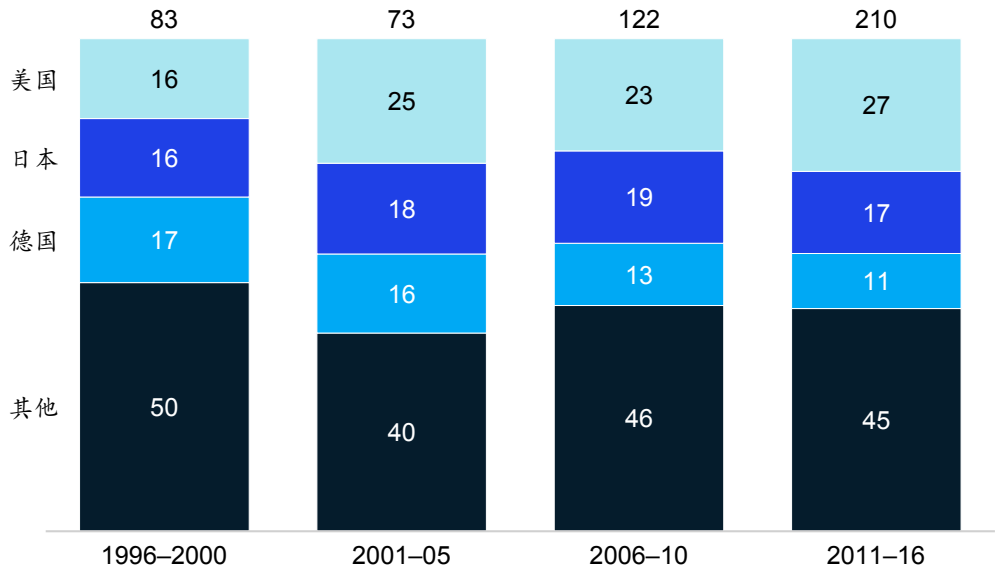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统计；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然而，中国在一些核心技术上仍需要进口，而且进口来源国的地域集中度非常高。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海外研发采购金额集中流向三个国家——美国（31%）、日本（21%）、德国（10%）。这种集中的状态在过去 20 年间一直相对稳定（见图 9）。中国如今也在出口知识产权——2017 年的知识产权出口额约为 50 亿美元，而2000 年仅为 8000 万美元。但中国的知识产权出口额仅为进口额的 17% 左右，而且出口额远低于其他国家。举例而言，美国 2017 年的知识产权出口额高达 1280 亿美元，日本为 420 亿美元，德国为 200 亿美元。中国的知识产权进口额仅为美国知识产权出口额的 23%。虽然中国的技术进出口总额在绝对值上有所增加，但增长率却远低于国内研发投资总额的增长。

图9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有超过一半的技术进口来自美国、日本、德国这三个国家

按照采购来源划分的中国技术进口合同[1]
%；十亿美元



[1] 技术进口合同包括设备采购、知识产权、技术服务以及其他采购。
注释：由于四舍五入，数字总和可能不等于 100%。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2010-2017年间，中国的跨境数据流动增长了

17倍

维度 6. 数据：虽然数据流动规模增长迅猛，但存在国内监管法规的限制

全球范围内的跨境数据流动一直在飞速增长。2005-2017 年间，全球数据流动总规模增长了 148 倍，成为整体跨境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境流动包括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53]。中国持续发展的数字化进程催生了海量数据，也促使跨境流动快速扩张，从 2010 年的 2441 G/秒增加到 2017 年的 41310 G/秒，大约增长了 17 倍。中国的宽带数据流动规模现已跻身全球前 8，而在 2005 年仅排在全球第 13 位（见图 10）。

相对于中国庞大的数字经济体量，其跨境数据流动规模仍然较小。中国拥有约 8 亿网民，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其中超过 90% 的网民在使用移动平台。中国在全球电商零售交易额中占比超过 40%[54]。但由于中国与世界各国及地区的数据流动存在某些限制，产生于中国的数据往往只留在境内，而中国人访问某些海外服务时也会受到限制。从规模上看，来自中国的跨境数据流动仅占美国数据流动的 20%，若与荷兰、新加坡和瑞典等小型经济体相比，中国跨进数据流的占比甚至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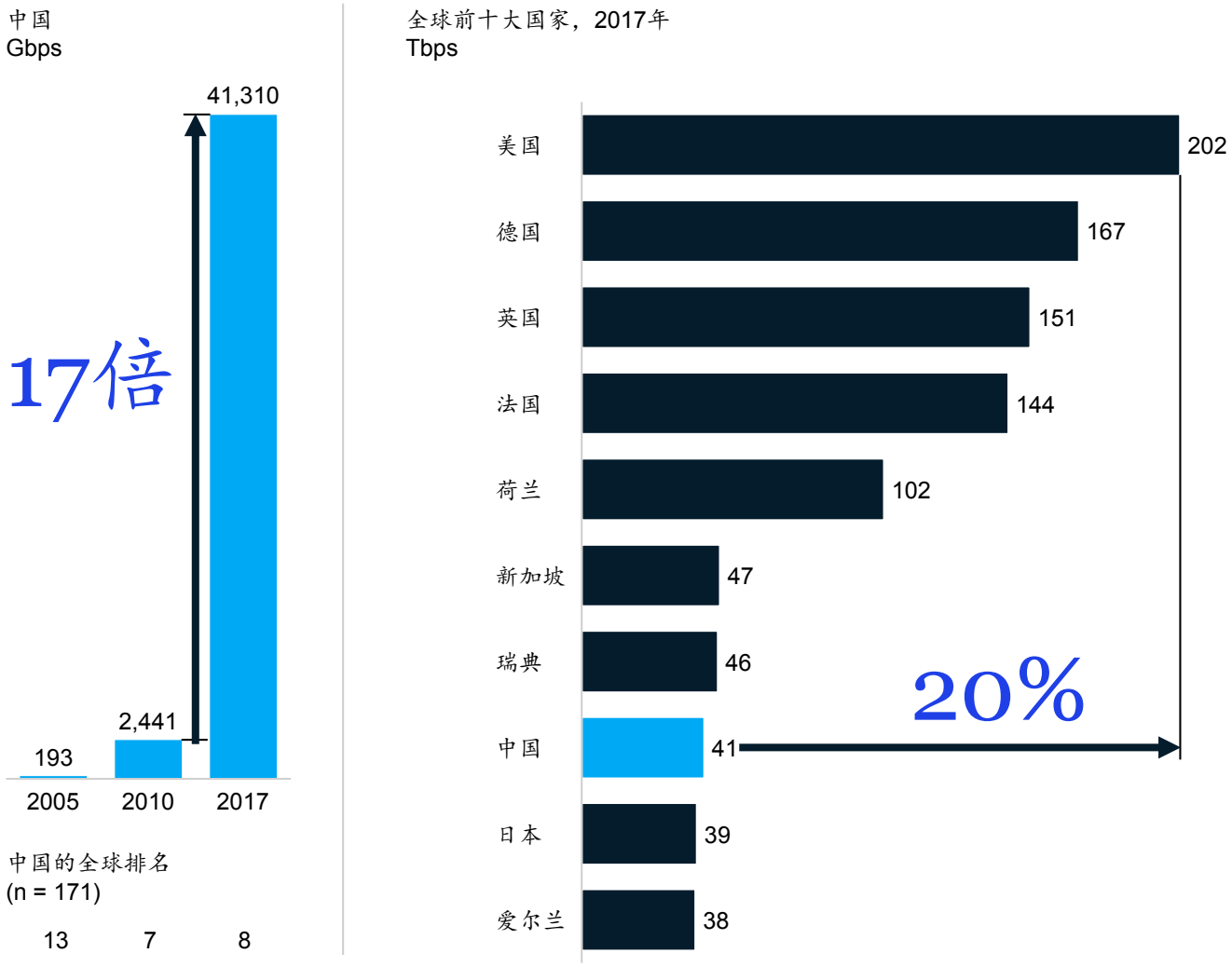
[53]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 年 1 月；和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的新时代》），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16 年 2 月。

[54] *Digital China: Powering the economy 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 年 12 月。

图10

2010-2017 年中国的跨境数据流增长了 17 倍，但仍然只有美国的 20%

跨境数据流动总量（带宽）



资料来源：TeleGeography；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2017年中国贡献了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额的

45%

维度 7. 环境影响：中国已大幅降低其碳排放强度，但仍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源

自 2006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如今占到全球年排放总量的 28%（虽然温室气体排放的比例已下降很多）。2017 年中国的碳排放量超过其后三个国家的总和（美国、印度和俄罗斯）。虽然中国已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也即单位 GDP 的碳排放量），但仍高于很多其他国家，如美国（单位 GDP 排放 0.31 千克二氧化碳）、印度（0.29 千克）、日本（0.26 千克）和英国（0.15 千克）。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节能技术的限制，低收入国家的碳排放强度往往更高。但中国目前的碳排放强度（0.47 千克）仍然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0.36 千克）。

中国已经通过艰苦的努力大幅减少了碳排放量。2009 年中国签署了《巴黎协定》，宣布到2020 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将在 2005 年的基础上减少 40%~45%（该目标已于2017年底达成），到 2030 年将减少 60%~65%。中国通过设定煤炭消耗上限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煤炭消耗总量已在 2013 年达到最大值[55]。2011 年，中国出台了碳排放交易机制，为企业分配排放配额，允许超额排放的企业向低排放企业购买未使用的配额[56]。这些措施似乎成功降低了中国对高排放行业的依赖。《全球碳地图》显示，截至 2017 年末，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已降为0.47 千克，比 2005 年的 0.80 千克减少 40%，提前 3 年实现了目标。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领导者。2017 年，中国在这一领域共计投入了约 1270 亿美元，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额（2800 亿美元）的 45%，相当于美国或欧洲（均为410亿美元）投资额的 3 倍（见图 11）。

其中，太阳能为其主要投资领域，投资总额达 850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长 58%；风电投资 361 亿美元，下降 6%；小水电投资 24 亿美元，下降 7%；生物质能发电和垃圾焚化发电投资 15 亿美元，也下降了 7%。随着中国的太阳能发电成本持续下降，屋顶和工业园部署的光伏项目也越来越多。而太阳能发电不受政府配额限制，因此能耗大的消费主体都在纷纷安装光伏面板，在满足电力需求之余，也享受着最低限度的附加补贴。对中国 2017 年大幅飙升的太阳能投资进行细分便可发现，其中有 196 亿美元都投入到了功率不足 1 兆瓦的光伏系统中[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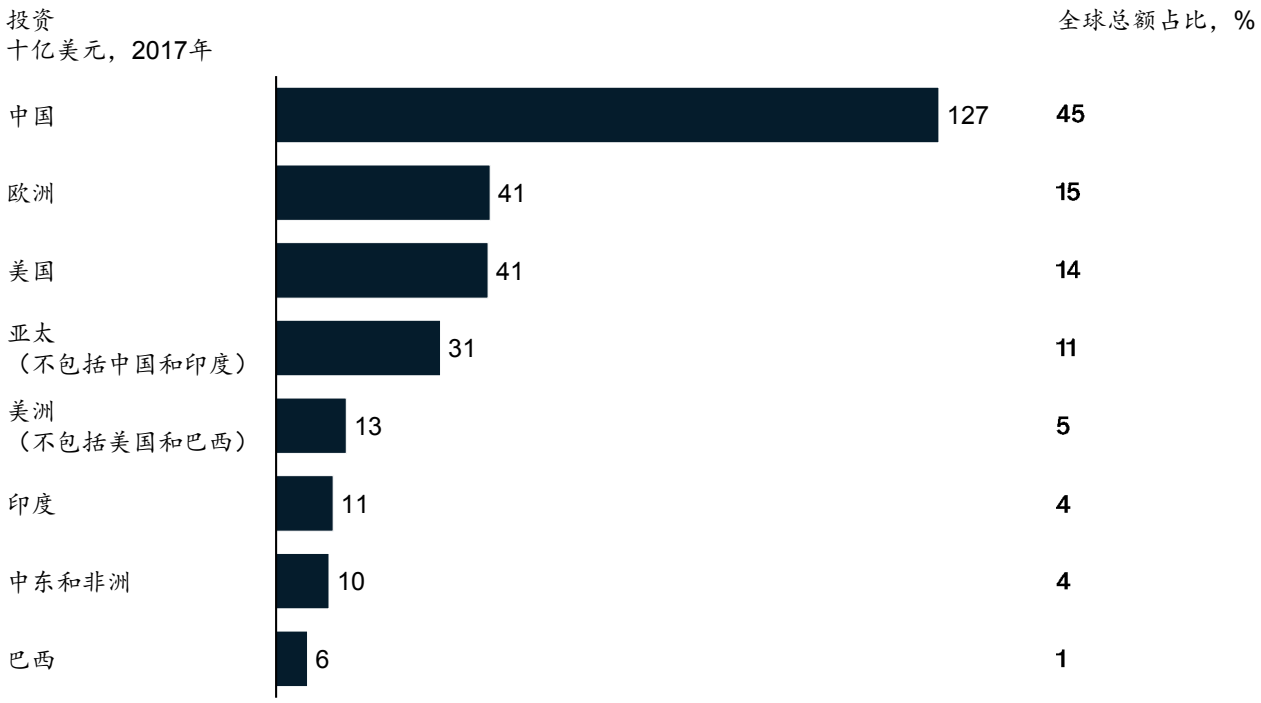
中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内面临的诸多挑战，尤其是污染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6 年中国的 PM 2.5 浓度中值（一项空气污染指标）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 3.7 倍。

[55] *PlanetPolicy*, China's peaking emissions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climate policy, 引自 Qi Ye 的博客，2018 年 9 月 12 日，brookings.edu/blog/planetpolicy/2018/09/12/chinas-peaking-emissions-and-the-future-of-global-climate-policy/。
[56] *China meets 2020 carbon target three years ahead of schedule*, 联合国气候变化新闻，2018 年 3 月 28 日
[57] *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report 2018*,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彭博新能源财经，201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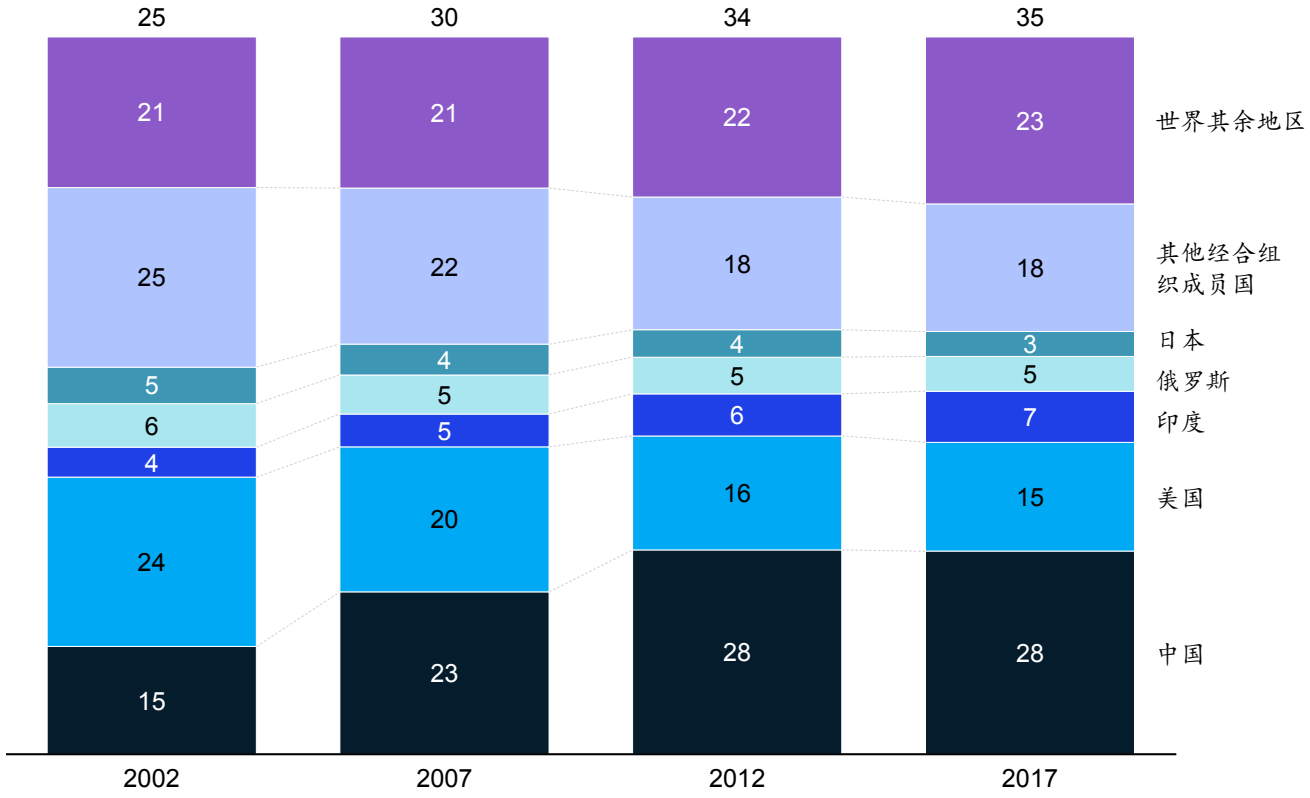
图11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也是最大的碳排放国

可再生能源投资额，十亿美元，2017年



各国家/地区的碳排放量，$GtCO_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碳图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维度 8. 文化：中国为了向世界发扬本国文化而投入了大笔资金，但尚未对全球主流文化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正在不断加大投资，力求提升本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例如积极投资电影行业，以及大力支持教育机构和课程的开设（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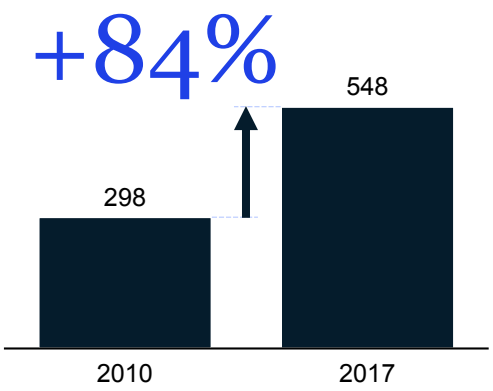
图12

中国正在加大投资发扬本国文化，但尚未具有全球影响力

中国加大投资力度，发展全球文化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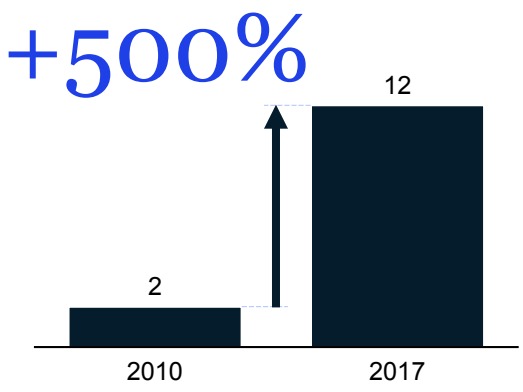
教育

孔子学院数量



电影

全球票房排名前 50 的电影在中国拍摄的百分比（至少有部分内容在中国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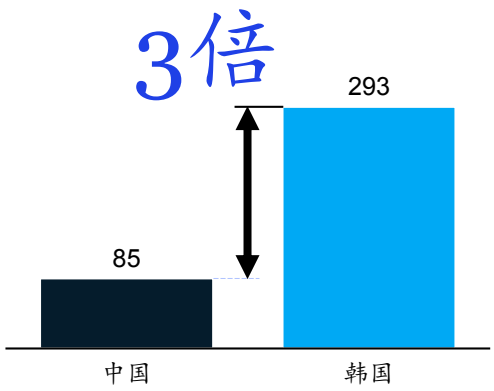


……但文化影响力仍然有限……

电视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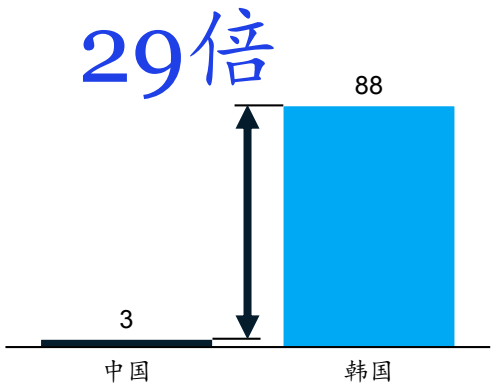
电视剧出口（2017年或最近可用年份的数据）

百万美元



流行音乐

中国与韩国前十大顶尖歌手的作品在某全球流媒体平台的订阅次数，百万次



资料来源：文献检索；公司网站；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2010-2017 年间，全球年度票房前 50 强的影片中有中国演员参演的比例已从 4% 增加到了22%，在中国取景的电影在全球影片中的占比从 2% 增长到了 12%。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在电影融资领域的投入逐年渐增。中国庞大的票房规模也对全球院线产生了影响，2018 年的总票房达到 90 亿美元，此前的 5 年间一直保持着 21% 的年增速。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电影票仓，仅次于美国的 120 亿美元。

2018年中国电影总票房为

90亿美元

此外，中国也在积极扩大汉语的文化影响力。2004 年，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在世界各地投资建设孔子学院，希望以这种方式传播汉语教育。如今，中国已在全球 154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548 家孔子学院。2010-2017 年间，选择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人数增长了 6 倍。不过，一些机构正在重新评估这些学院的作用，并有可能对其减少支持[58]。

除了由政府提供的学位之外，也有很多中国企业携手多边机构，向新兴市场传播技术知识，并为其提供一流的数字基础设施。例如阿里巴巴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合作开展的“互联网创业者计划”——每年招收 1000 名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创业者，让其亲身体验中国的电子商务和科技领域的革命性变化[59]。

然而，中国文化尚未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仅举两例便可说明：在某个全球流媒体平台上，中国十大顶尖音乐人的订阅总量仅为韩国十大顶尖艺人的 3%。中国电视剧的出口额也只有韩国的 1/3。中国的文娱产业仍然相对较为封闭。经合组织的“外商直接投资限制指数”综合考量了外资股权限制、歧视性筛选、人员限制、运营限制等因素，将中国媒体领域的限制指数评定为 1.0，也即“完全封闭”。此外，中国也为国内上映的外国电影设定了配额；2012 年以来的配额为每年 34 部影片，高于 2002 年时设定的 20 部。

• • •

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的推动下实现了高速增长，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其经济尚未全方位与世界融合。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相对依存度已然下降，而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在不断上升。

[58] 有人认为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国扩大影响力乃至开展间谍活动的渠道。参见：U.S. universities shut down Confucius Institutes，中国数字时代，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9/01/u-s-universities-shut-down-confucius-institutes/；Alex Lo，Confucius Institutes:China's benign outreach or something more sinister?，《南华早报》，2018 年 7 月 16 日。但也有一些反对部分美国政治家指控孔子学院与中国政府间谍活动有关的观点，参见：David Dodwell，US politicians link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with espionage is taking paranoia to the extreme，《南华早报》，2018 年 9 月 29 日。

[59] 《互联网创业者计划》，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org/en/Pages/eFounders-Initiative.aspx。

南浦大橋

2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渐减少对投资和贸易的依赖，逐步转向以内需驱动的发展模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正在相对降低。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庞大，又是全球重要的贸易国家，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反而在相对上升。我们择取了全球 73 个经济体的 20 个行业展开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行业和地区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在上升

为了审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如何变化，我们将从第一章探讨的 8 个维度中选取 3 个重点维度，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在贸易、资本和科技方面的依存度——在这3个维度中，我们能够获取可靠的双边和多边全球流动数据[60]。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通过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的横向比较来衡量这些经济流动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相对重要性，据此编制了最新一期的“MGI 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研究方法参见附文 2：编制“MGI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的考虑因素）。

按照绝对值计算，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资本和科技流动都有大幅增长。2000-2017 年间，中国的贸易额（包括进口和出口）从 4700 亿美元增长到了 4.3 万亿美元；同期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从 9.15 亿美元增至 1200 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输入额从 410 亿美元增至 1360 亿美元；技术进口额从 18 亿美元增至 480 亿美元。但相对来说，2000-2017 年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这 3 个维度都有所提升，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却有所降低。研究显示，世界对中国经济依存指数从 2000 年的 0.4 增至 2017 年的 1.2，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 2007 年便达到最大值 0.9，到 2017 年则下滑到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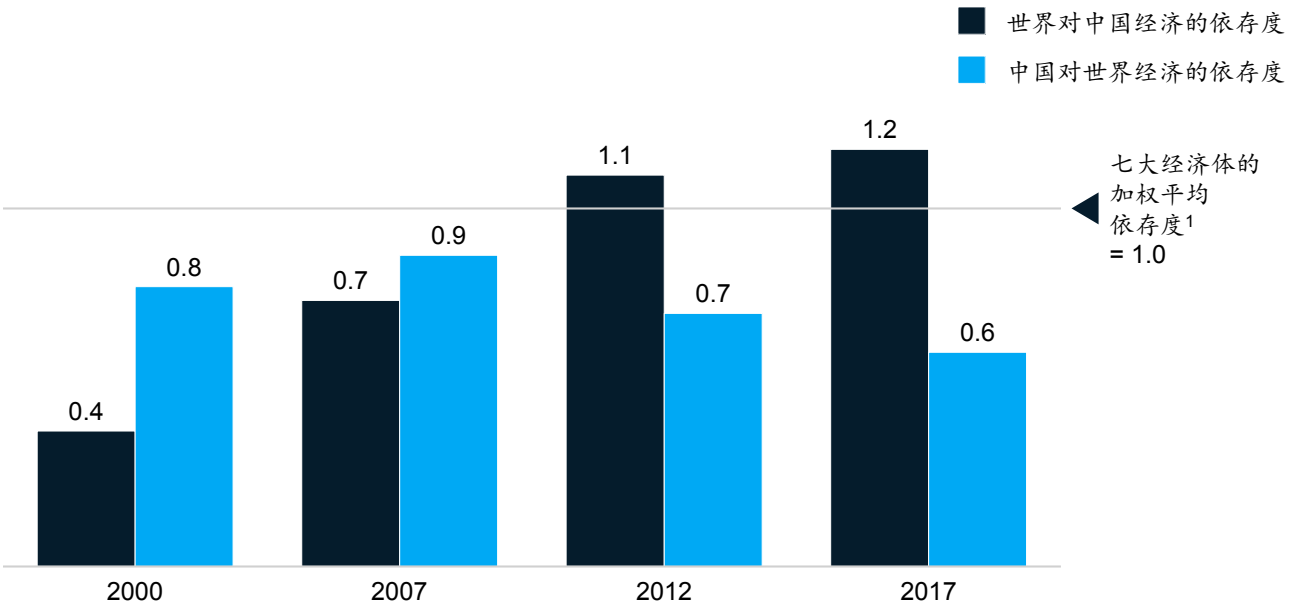
[60] 在贸易领域，我们衡量了中国作为消费市场以及商品与服务提供方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在资本领域，我们衡量了中国作为融资提供方和投资目的地的重要性。在技术领域，我们衡量了中国的技术出口对全球研发开支的重要性。

中国对世界经济依存度的下降（尽管绝对值有所增长）表明中国经济体量在不断扩张，但这是经济流动规模所无法反映的趋势。而世界对中国经济依存度的上升，则说明中国作为下列角色的重要性有所提高：（1）其他经济体的供应方和消费市场；（2）资本输出来源国和投资目的地；（3）技术出口与进口来源（见图 13）。

图13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相对依存度持续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则在不断上升

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贸易、技术和资本）



[1] 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英国和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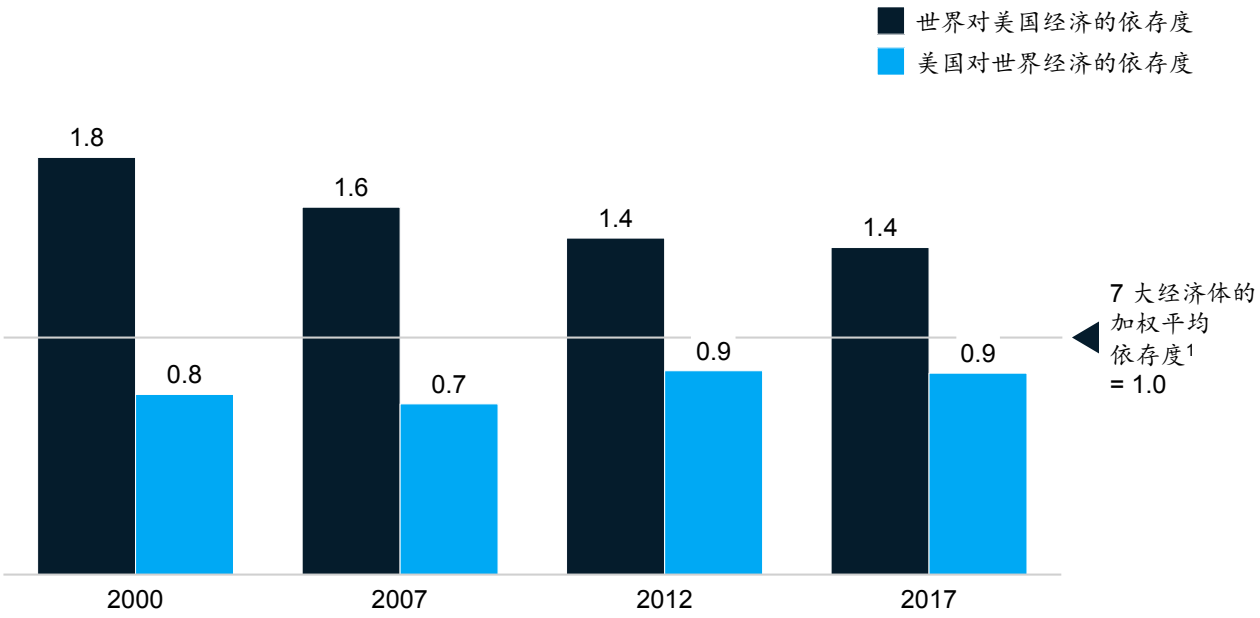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相比之下，世界对美国经济的相对依存度在此期间已从 1.8 降至 1.4。这可能意味着世界各国都在与更多经济体加强联系，努力提升贸易、资本和技术流动的多元化。但世界对美国经济的依存指数却高于 1（这是 7 个国家的平均值），这表明世界对美国的依存度高于对所有大型经济体的平均依存度。相反，美国对世界经济的相对依存度始终保持在 0.7~0.9 之间，这表明美国与全世界的贸易、资本和技术流动的增长保持同步（见图 14）。

图14

世界对美国经济的依存度正在相对下降

美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贸易、技术和资本）



[1] 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英国和美国。

资料来源：IHS Markit；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附文 2

编制“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的考虑因素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编制的“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包含 5 个元素，涵盖了贸易、资本和技术 3 个领域。在贸易方面，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考虑了供给（以某国出口额除以世界其余地方的消费额计算得出）和需求（以某国进口额除以世界其余地方的产值计算得出）两方面的依存度。在资本方面，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考虑了资本（以某国输出对外直接投资额除以世界其余地方输入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计算得出）和投资机会（以某个输入的直接投资额除以世界其余地方输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计算得出）两方面的依存度。在科技方面，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考虑了技术出口（以某国的知识产权、技术服务和设备出口额除以世界其余地方的总研发开支计算得出）的依存度。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流动（包括流入和流出）总规模的绝对值（包括出口和进口、外商直接投资输入和输出，以及技术流动）都有所增长。“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的详细编制方法参见《技术附录》。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下降

中国对世界的相对依存度相对有所下降，原因在于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已经不再是贸易和投资，而是内需。从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间的 16 个季度中，中国有 11 个季度的国内消费占 GDP 增长的比例超过 60%（见图 15）。2018 年，中国约有 76% 的 GDP 增长来自国内消费，而净贸易额对 GDP 增长的贡献实际为负。早在 2008 年，中国的净贸易顺差便达到 GDP 的 8%；但到了 2018 年，这一比例据估算已降至 1.3%左右，低于德国或韩国（这两个国家的净贸易顺差占 GDP 的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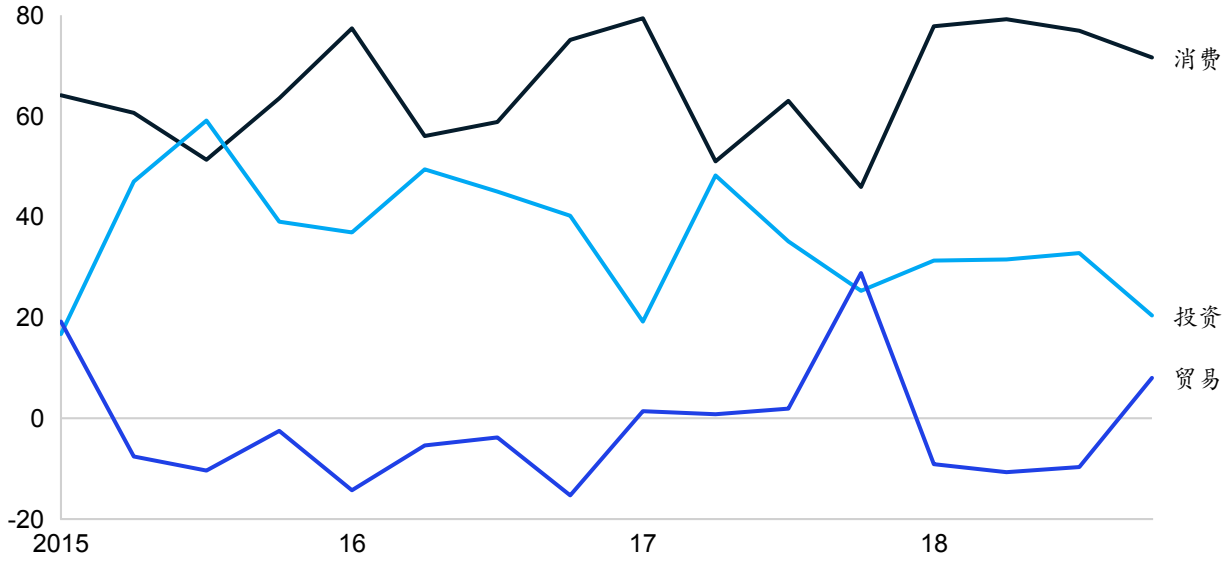
中国目前在诸多消费领域中都是全球第一大市场，例如，中国占据全球纺织和服装消费的 40%，汽车消费的 28%，计算机和电子产品消费的 38%。得益于庞大的内需，越来越多中国制造的商品都会在本土销售。在本次研究涉及到的行业价值链当中，2007 年中国的总产出有 17% 用于对外出口，而 2017 年的比例仅有 9%，大约与美国相当，但远低于德国（34%）、韩国（28%）或者日本（14%）的比例[61]。这些显著变化不但左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重点，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彼此依存的态势。

[61]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 年 1 月。

图15

在 2015-2018 年的 16 个季度中，中国有 11 个季度的国内消费占 GDP 增长总额的比例超过 60%

各开支组成部分对 GDP 增长的贡献
%



资料来源：CEIC；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在贸易、资本和技术流动方面仍然相对比较封闭。在贸易方面，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已从 2000 年的约 16% 降至 2009 年的约 9%。但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这一税率到 2017 年却上升到了 10.6%，又在 2018 年的新一轮关税下调之后降至 7.5%[62]。但仍高于美国和欧盟约 3%~4% 的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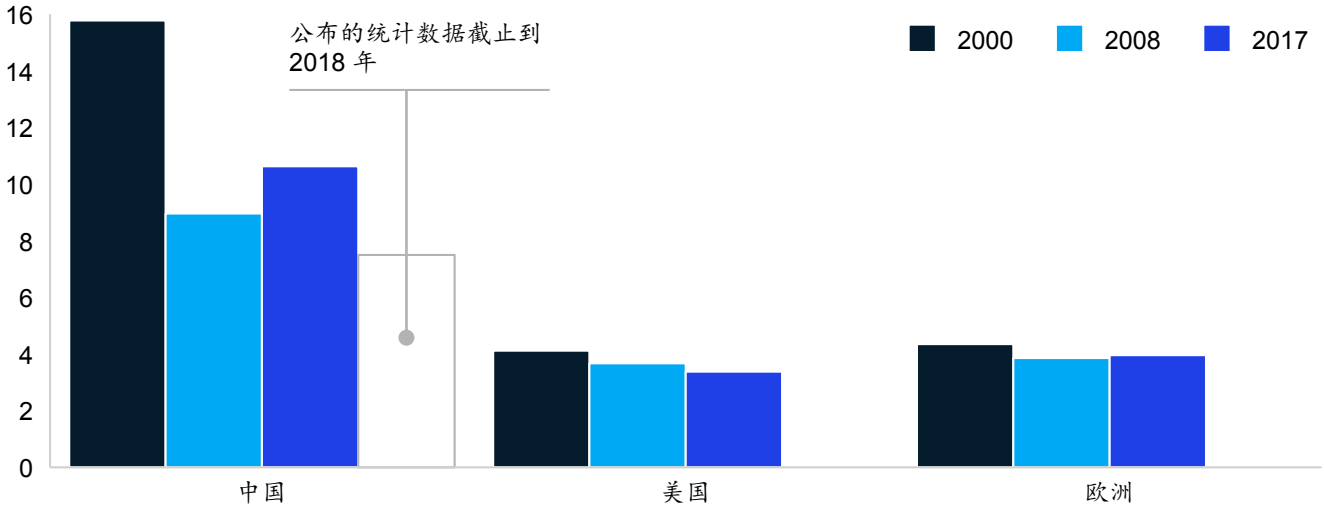
在资本方面，中国已经开始向外资敞开大门，但壁垒仍然存在。经合组织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指数”为中国评定的指数在 2003-2017 年间已从 0.38 下降至 0.1，但其服务业监管限制指数至今依然高达 0.39，虽然低于 2003 年的 0.74，但远高于目前经合组织 0.08 的平均水平（见图 16）。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指数可能并未考虑到中国自 2017 年以来为减少监管限制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调整（2017 年是目前这些指数涵盖的最后一年），例如减少“负面清单”的行业数量。在服务业的方面，在华外资企业面临诸多监管，其监管限制指数高达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 4~5 倍[63]。在餐饮、酒店、零售以及批发贸易领域，中国的开放程度相对较高。但在媒体、电信、金融服务、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封闭程度却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这种情况导致中国消费者对服务的潜在需求很高，因为目前国内的高品质服务仍然有限，与中国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并不匹配（详见第 5 章）。

[62] 关税数据是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公告中提取的简单平均数。但我们也发现，若按加权平均数计算，实际征收的关税将整体有所降低，但与发达市场相比仍然非常显著。
[63] 经合组织监管限制指数最近一次更新是在 2017 年，因此上述数字或许无法反映此后中国监管政策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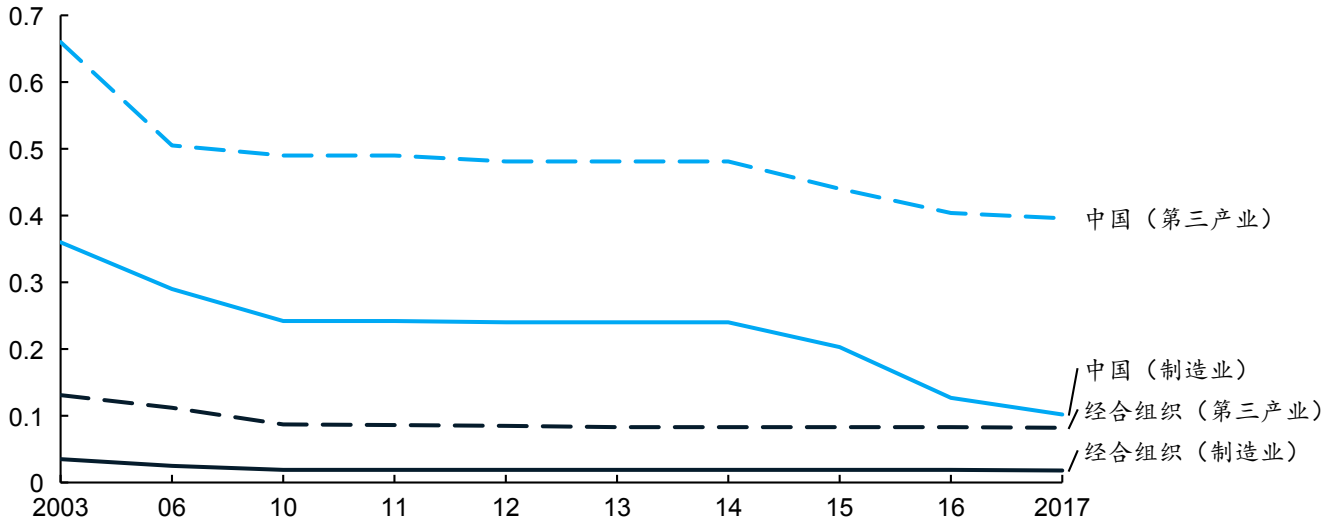
图16

在关税及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中国经济仍相对受限，还有进一步开放的空间

贸易开放程度：平均关税税率
%



外商直接投资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限制指数[1]



[1] 我们采用了经合组织的外商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指数：0 表示开放，1 表示封闭。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数据；经合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外资监管环境正在逐步改善。自 2013 年以来，中国启用了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监管方式——除了清单中列出的行业，外资注册后均可进入中国市场。2014-2018 年间，清单明确限制的行业已经从 139 个减少到了 48 个（见图 17）。而且“负面清单”还详细列出了在某些方面开放特定行业的具体规划，例如金融服务领域的合资要求将在 2021 年取消。此外，中国政府在过去 5 年中设立了 12 个自由贸易区，关于减少这些区域的外资限制的呼声始终未歇。例如中国欧盟商会便表示生产商往往接触不到客户，他们还表示，对于某些新的行业，如果针对外商投资的改革试点能在中国内地的范围内开展，而不只是在“隔离开来”的贸易区之内，那么对外资的吸引力会更强[64]。

在技术方面，中国已出台了很多有针对性的政策，以支持本土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实力。根据“中国制造 2025”计划所设目标，在政府重点发展的 23 个领域中的11个领域，国家提出，中国本土企业市场份额的期望值为 40%~90%[65]。该计划发布于 2015 年，明确了中国在全球高科技制造行业的目标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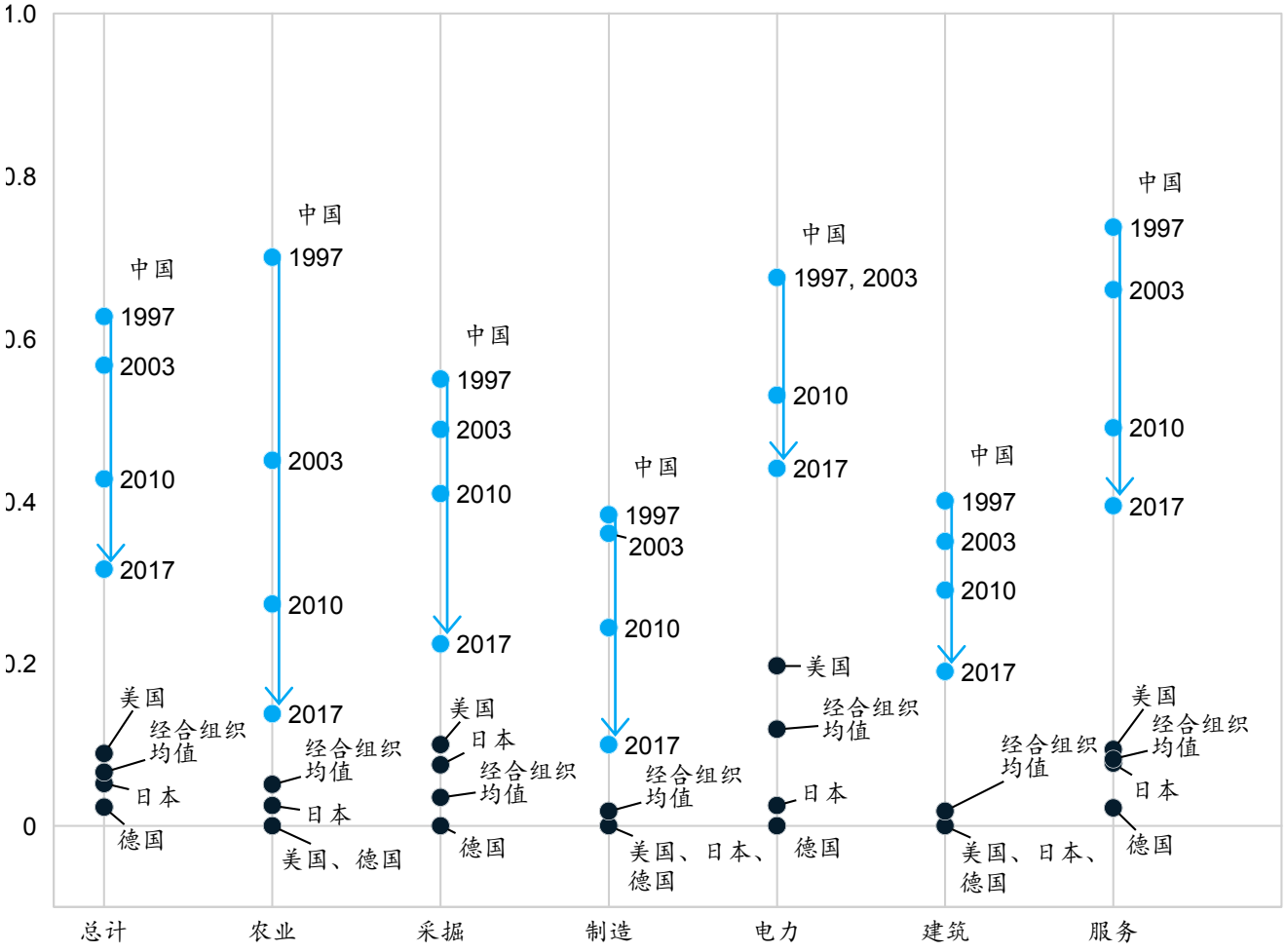
[64] Amanda Lee, China pushes reforms in free trade zones as skepticism grows among foreign investors, 《南华早报》, 2018 年 11 月 23 日。

[65] 《<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创新绿皮书——技术路线图》,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 2015 年 10 月。

图17

虽然中国已在各个领域积极开放外商直接投资渠道，但开放程度仍不及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经合组织外商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指数[1]



[1] 经合组织评估了某个国家或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输入施加的限制措施，并通过一个指数值来反映某个行业的限制程度：0 表示开放，1 表示封闭。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

全球很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较高，而且这种依存度还在不断上升。我们从国家层面研究了各个经济体对中国的市场（向中国出口）、供给（从中国进口）和资本（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依存度。自 2007 年以来，在我们研究的 73 个经济体中，有 69 个经济体的国内产值相对于中国进口的依存度有所上升；有72 个经济体的国内消费相对于中国出口的依存度有所上升；还有 58 个经济体的国内投资相对于中国资本的依存度有所上升。

另外，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鉴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这个发现并不意外。在 20 个制造业类别中，中国有 17 个行业的消费份额在全球总消费中占比超过 20%（详见第 3 章）。对于为制造业生产输入品的行业而言，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而对于消费制造业输出品的行业而言，中国又是重要的供应方。中国的制造业规模以及与世界各国的贸易规模都有大幅增长。2003-2007 年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出中只占 12%；而 2013-2017 年间该比例则跃升至 33%。同样，2003-2007 年间中国的贸易额（包括进口和出口）占全球总产出的 5%，在 2013-2017 年间则上升到 8%。由于高科技领域的全球价值链非常复杂，所以该领域对中国的依存度尤其高。

2013-2017年间，中国贡献了全球制造业产出的

33%

2003-2007年间为

12%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分析的重点是基础产业和制造业，而非服务业，这是因为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的贸易属性更强，可用数据更多。中国对服务的需求显然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而大幅增加，这相应推升了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主要表现为向中国出口的服务越来越多。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进口国。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中国 2017 年的服务进口额达4680 亿美元（服务出口额为 2270 亿美元）[66]。但由于种种限制，世界对中国服务业的依存度极不均匀。中国的服务进口高度集中于几个行业，例如其中 54% 的进口（约 2550 亿美元）来自观光旅游业。中国在海运和空运行业的进口额也很高，2017 年的总额分别为 590 亿和 270 亿美元。而其他的服务领域都很封闭，导致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很低。举例而言，中国 2017 年的金融服务进口额仅为 16 亿美元，不足进口总额的 1%，相较 2014 年近 50 亿美元的最大值有显著下跌。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外资也受到很大限制（详见第 4 章）。

4 组国家中有 3 组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较高

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都有所增加，其中 3 组尤为明显（见图 18）。亚洲经济体由于在地理位置上邻近中国，得以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和投资环境。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例如南非和澳大利亚）和中间产品生产国（例如韩国）在高度依赖于中国的进口需求。世界其他地区的新兴市场（例如埃及和巴基斯坦）也高度依存于中国的对外投资。

[66] 《中国服务进口报告 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8 年 11 月，images.mofcom.gov.cn/english/201811/20181114155703850.pdf。

图18

地理位置邻近中国、资源贸易占比较高，并且积极参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国家对中国的相对依存度最高

依存度 最低 最高

类型	国家	对华出口占国内产值比例，%		对华进口占国内消费比例，%		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总投资额比例，%	
		2003-2007	2013-2017	2003-2007	2013-2017	2003-2007	2013-2017
地理位置依存度	韩国	8	11	4	6	<1	<1
	马来西亚	8	11	5	11	<1	6
	菲律宾	12	8	6	14	6	<1
	新加坡	10	11	12	18	2	5
	越南	3	11	6	13	3	1
资源依存度	澳大利亚	4	16	3	7	<1	3
	智利	5	13	3	10	<1	<1
	哥斯达黎加	9	9	2	5	3	<1
	加纳	<1	8	5	18	<1	4
	南非	2	15	2	6	<1	3
资本依存度	埃及	<1	<1	3	5	1	13
	巴基斯坦	<1	1	3	7	2	8
	秘鲁	4	7	1	5	2	6
	葡萄牙	<1	2	<1	3	<1	3
发达经济体	美国	<1	2	3	6	<1	<1
	德国	2	4	2	3	<1	<1
	日本	4	5	3	5	<1	<1
	英国	<1	2	2	5	<1	2

资料来源：IHS Markit；国家统计局；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亚洲经济体与中国的联系因区域供应链而愈加紧密

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历来很高，最近几年有增无减，对向中国出口的依存度尤其如此。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国家往往通过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建立了紧密联系，对华贸易在国内产值中占比很高。中国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某些亚洲经济体对中国资本的依存度也同样明显。举例而言，2013-2017 年间，马来西亚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 6%，在新加坡则为 5%。

新加坡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度很高，因此尤其值得关注。与中国的贸易占新加坡国内总产值的11%，占总消费的 18%。即使在 10 年之前，新加坡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就已经很高（对华贸易相当于其国内总产值的 10%，总消费的 12%，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 2%）。随着时间推移，新加坡与中国的联系变得愈发紧密，部分原因在于两国在 2009 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从此双边贸易额便逐年增加。2017 年，仅新加坡对华出口集成电路这一项的规模就达到了 200 亿美元。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新加坡也是中国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有 20% 以上流入了新加坡。2017 年，盛裕集团（新加坡国企）与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组建了合资公司，在基础设施项目上展开合作[67]。除了“一带一路”相关合作以外，新加坡政府还与中国合作投资了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重庆互联互通项目等诸多项目。

韩国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也很高。目前，韩国总出口的 1/4 都流向了中国，国内很多行业在中间产品和制成品方面都高度依赖于中国的供给和需求。我们也根据行业层面的贸易流动评估了韩国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参见附文 3：从行业-地理视角审视韩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

[67] Ann Williams, Surbana Jurong sets up joint venture with China Highway in design, consultancy services,《海峡时报》，2017 年 3 月 22 日。

附文 3

从行业-地理视角分析韩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

评估某个国家对中国经济依存度的方法之一，就是从行业层面分析贸易联系。为了分析韩国对中国的依存度，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择取了 4 个行业层面的指标：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占韩国本土中间产品总消费的比例；从中国进口的制成品占韩国本土制成品总消费的比例；韩国本土中间产品出口中国的比例；韩国本土制成品出口中国的比例（见图 19）。

这项分析表明，2014 年（可用数据截止到这一年），韩国的计算机行业以及电子和电气设备行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最高——由于这些行业在世界各国的全球化整合程度都相当高，所以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在中间产品和制成品领域，韩国都要依存于中国的进出口，这凸显了中国在技术价值链中的多重角色。

其他对中国依存度较高的行业包括纺织和服装业，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和服装产品占韩国最终消费总额的 25%，反映出中国在轻工制造领域的地位。相反，韩国的橡胶和塑料制造业又高度依存于中国市场的消费需求；在这些行业中，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对华出口为韩国贡献了 9% 的中间产品产值和 16% 的制成品产值。最后，韩国的媒体行业也依存于中国的需求，这反映了韩国电视和音乐领域的流行文化热度不断上升。

图19

韩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受到计算机和电子产品、服装进口以及媒体出口的推动

依存度最低 → 依存度最高

类型	领域	韩国对中国供应的依存度		韩国对中国需求的依存度	
		中国的中间商品进口占中间商品总消费之比，%	中国的制成品进口占制成品总消费之比，%	出口到中国的中间商品占中间商品总产出之比，%	出口到中国的制成品占制成品总产出之比，%
整体高度依存于中国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	10	17	21	32
	电气设备	5	21	8	20
	家具、安全、消防及其他	5	14	9	8
高度依存于中国的需求	印刷和媒体	2	5	1	16
	橡胶和塑料	4	10	9	16
	化工	3	3	12	11
	其他机械和设备	5	3	6	14
	焦炭和成品油	1	2	6	9
高度依存于中国的供应	纺织、服装和皮革	4	25	6	7
	木材及木制品	3	29	1	4
	其他非金属矿产	5	14	5	5
	采掘业	1	12	<1	<1
对中国依存度相对较低	金属制品	5	4	2	4
	其他运输设备	5	5	5	2
	基础金属	4	6	3	3
	机动车及拖车	4	<1	5	3
	纸和纸制品	2	7	1	<1
	食品、饮料和烟草	1	5	<1	2
	农业、林业和渔业	2	2	<1	<1
	制药	3	1	1	5

资料来源：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资源丰富的国家对中国的需求的依存度较高

由于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大幅增加，资源出口国对中国的依存度便迅速提升。举例而言，对华出口目前占到南非总产值的 15%，而在 2003-2007 年间这一比率仅为 2%。与之相似，对华出口目前占到澳大利亚总产值的 16%，在 2003-2007 年间这一比率仅为 4%。这种依存度迅速提升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中国逐渐成为了“世界工厂”，对原材料和中间品（用于加工成最终商品）产生了更多需求。

澳大利亚高度依赖中国的进口需求。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自然资源进口来源之一，而中国则是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仅铁矿石出口一项就占到澳大利亚对华总出口的 48%（矿产和金属共计占到出口总额的 84%）。澳大利亚采掘业 21% 的产出都流向了中国。上述统计均表明澳大利亚对中国进口需求的依存度很高，而中国的制造业也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意义重大。正如前文所述，高度依赖中国的进口需求，将会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我们目前已在澳大利亚观察到了这种情况。据澳大利亚政府预计，随着中国的钢铁制造行业增长放缓，铁矿石价格将从 2017 年的 69 美元/吨下跌到 2019 年的 53 美元/吨[68]。

作为中国学生留学的第二热门选择，澳大利亚也对中国的教育需求高度敏感。如今澳大利亚的对华教育出口额已高达 100 亿澳元，在短短 10 年间增长了 260%[69]。如果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有所减弱，澳大利亚将可能承受次级效应的冲击。企业信心减弱会限制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从而对澳大利亚的出口产生冲击。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也可能削弱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从而限制出国留学的学生总数。

一些新兴经济体和体量较小的发达经济体也越来越依存于中国的投资

虽然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兴经济体的对华贸易依存度仍然相对较低，但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些国家的国内投资中占比逐年增长，非洲尤其如此。目前埃及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 13%，巴基斯坦则为 8%。对某些国家而言，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它们对中国资本的依存度，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非洲经济体的投资在该倡议宣布之前便已进行多年[70]。

到2018年中期，中国向埃及输出的外商直接投资总计高达

2430万亿美元

其中，埃及对中国资本的依存度有相当明显的上升。到 2018 年中，埃及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高达 243 亿美元（包括一笔已公布但尚未最终敲定的投资，预计耗资 200亿美元，该项目将在开罗以东建设一个新的行政中心）[71]。这些投资已经流入很多大型基建项目，包括铁路、炼油和能源合资项目。中国还与埃及政府合作开发了一个经济特区，希望推动贸易、投资、就业和工业化的发展。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此前一项研究发现，在非中国企业有 89% 的员工和 44% 的管理者是当地人[72]。中国目前是非洲电信基础设施领域最大的外国投资伙伴。中国已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成为拉丁美洲第一大债权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对某些拉美国家而言，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其国内投资总额的占比或许高达 6%。流入拉美地区的中国资本大多用于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融资。中国也在向规模较小的发达经济体投资。举例而言，2018 年 11 月，葡萄牙从中国获得一笔高达 120 亿欧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笔资金流向了能源、交通、保险、医疗、金融服务、房地产和媒体等多个领域[73]。

---

68 《资源和能源季报》，澳大利亚联邦产业、创新和科学部以及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2018 年 12 月。

69 *Chinese education exports reach $10 billion,* 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委员会，2018 年 6 月 7 日。

70 欲了解中非经济联系的更多信息，请参见：*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 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龙狮共舞：中非经济合作现状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发展？》），麦肯锡公司，2017 年 6 月。

71 Heba Saleh, Egypt sees Chinese investment and tourists as a ‘win-win boost,《金融时报》，2018 年 10 月 30 日。

72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 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龙狮共舞：中非经济合作现状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发展？》），麦肯锡公司，2017 年 6 月。

73 Philippe Le Corre, China’s golden era in Portugal,《外交官》，2018 年 11 月 24 日。

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依存度往往相对较低

自 2003 年以来，大多数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流动都有所增长，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国内增长动力相对较为充足，所以对中国的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依存度较小。虽然这些流动规模的绝对值很高（例如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但若论份额，仅占各国国内经济总量的 1%~5%。不过，我们必须指出，西方发达经济体在某些特定领域中，也许高度依存于来自中国的流动。例如，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留学目的地，根据美国旅游协会的数据，2017 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投入的教育相关支出高达 1390亿美元[74]。

技术与装备行业、资源行业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中国的依存度最高

为了从行业层面衡量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我们择取了 73 个经济体和 20 个基础产业及制造业，综合分析了每个行业的贸易强度（按全球总出口占全球总产出之比来计算）、对中国出口的依存度（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以及对中国进口的依存度（中国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例）。分析显示，这 20 个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都有一定提升，我们根据依存度的高低，将这些行业归纳为 5 个类别。其中有 3 类高度依赖中国这一重要市场，如果世界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减弱，这些行业将面临显著冲击（见图 20）。

2013-2017年间，中国贡献了全球计算机和电子产品总产值的

44%

2003-2007年间为

21%

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技术和设备制造价值链

有些行业从研发、原材料采购到最终组装需要用到大量关键零部件，涉及多种加工流程，这些行业的价值链往往高度全球化，有许多国家和企业参与其中。中国制造商在这些价值链中往往扮演最终组装者的角色。不过，近年来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开始进入很多行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由此让中国得以在这些行业中占据了可观的生产份额——占全球总产出的 35% 以上，在电气设备等行业中的占比甚至高达 48%。更重要的是，对华贸易额也在全球总产出中占据了很高的比例。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现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是很多制造行业相当重要的生产者，而且地位仍在提高。以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业为例，中国在全球总产值中的占比从 2003-2007 年的 21% 增长到 2013-2017 年的 44%。而作为计算机和电子产品消费大国，中国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2017 年，中国市场消化了全球手机销量的 40%，全球个人电脑销量的 19%。这些商品的对华出口额占全球行业总产值的 19%（高于 10 年前的 14%）。从这些统计数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已成为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价值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既是稀土等原材料的供应者，也是电路元件和电子器件的组装者，还是这些产品的最终消费者。

[74] *International visitations to the U.S. from China 2017, International Inbound Travel Market Profile,* 美国旅游协会，ustravel.org/system/files/media_root/document/Research_Country-Profile_2017_China.pdf。

图20

全球技术、劳动密集型贸易品和资源价值链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对华贸易

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 低 高

类型	行业名称	贸易强度	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之比，%		中国占全球进口总额之比，%	
			2003-2007	2013-2017	2003-2007	2013-2017
高度整合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		15	28	12	16
	电气设备		16	27	7	9
	其他机械和设备		7	17	8	9
高度依存于中国的出口	纺织、服装和皮革		26	40	5	5
	家具、安全、消防、其他		17	26	2	4
	其他非金属矿产		11	22	5	8
	橡胶和塑料		10	19	5	7
	基础金属		8	13	8	8
高度依存于中国的进口	采掘业		1	1	7	21
	化工		4	9	9	12
	纸和纸制品		3	9	6	12
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很低的全球价值链	其他运输设备		3	6	3	5
	制药		2	4	1	3
	机动车及拖车		1	3	2	7
	焦炭和成品油		2	4	4	6
本地自产自销	食品、饮料和烟草		3	4	3	6
	金属制品		14	23	3	5
	木材及木制品		11	22	2	3
	印刷和媒体		8	18	2	4
	农业、林业和渔业		5	5	7	19

资料来源：IHS Markit；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中国占巴基斯坦纺织业进口总额的

71%

对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全球各国均高度依赖中国的产出

中国之所以被誉为“世界工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在轻工制造业的重要地位。这个行业的加工步骤相对简单，企业得以充分利用中国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某些重工制造行业中，中国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早在 15 年前，中国便已确立了在轻工制造业的竞争优势（2003-2007 年间，中国的纺织和服装生产占全球总产出的 28%），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进一步扩大。在这些行业中，中国占全球总产出的份额最高可达53%（即纺织服装制造业；参见下文）。此外，很多行业也高度依赖对华出口。例如全球纺织和服装贸易总额的 40% 以及家具贸易总额的 26% 均出口到了中国。但也并非所有产出都能够用于出口——其中有一部分还要作为中间产品进一步在国内加工。例如全球有 49% 的非金属矿物在中国生产，但中国却占到全球出口总额的 22%。

中国“世界工厂”的属性在纺织和服装行业体现得最为明显。中国如今贡献了该行业 53% 的全球产出。这一行业对整个中国制造业也很重要。纺织和服装占中国总出口的 14%，该行业 32% 的产出用于出口。中国在该行业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本身的经济规模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从而使生产成本远低于其他市场。过去 20 年间，中国的纺织和服装制造行业产值显著增长，而发达经济体在该行业的岗位却大幅减少。1998-2014 年，美国纺织制造业的岗位每年减少 7.6%，服装制造业的岗位每年减少 11.2%。不过，进口对就业的冲击在子行业中表现得各不相同。在纺织制造领域的 7.6% 年度就业降幅当中，仅有 0.4% 是进口冲击所致；而在服装制造领域的 11.2% 年度就业降幅中，与进口相关的岗位损失比例高达 10.8%[75]。

有迹象显示，世界对中国服装生产的依存度正在下降，而中国在全球服装供应链中的角色也在改变。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中国服装行业的比较优势已逐渐被其他新兴经济体夺走；例如产能和就业已经开始向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越南转移。2013 年，中国的服装出口总额相当于全球其余地区服装总产值的 60%，但随后数年间，该比例逐渐降至 51%。美国时装产业协会的一项调查发现，2018 年中国占据全球服装企业总采购额的 11%~30%，2016-2017 年间则为 30%~50%[76]。近年来中国已逐渐打入价值链上游，开始为新兴经济体供应纺织品，目前占巴基斯坦纺织业总进口额的 71%，越南的 50%，孟加拉国的 47%。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不断取得进展，全球上游产业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均有提升

中国制造业的增长大幅提高了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用于加工成最终制成品）的需求，人均收入的增长也推升了中国的整体商品需求。这种需求增长对基础行业的影响最大。2003-2007 年间，中国贡献了全球采掘业进口额的 7%，在 2013-2017 年间这一比例更升高到 21%。在同类行业中，虽然中国的产出已占到全球产出的 20%~35%，但仍然占据了 12% 的全球进口。

[75] *Economic impact of trade agreements implemented under trade authorities procedures*, 2016 年报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出版号第 4614 号，调查号第 332-555 号，2016 年 6 月。

[76] Sheng Lu, *2018 fashion industry benchmarking study*, 美国时尚业协会，2018 年 7 月。

采掘业是一个高度依赖对华出口的典型行业。这个行业的依存度在地理位置上高度集中。澳大利亚、智利、南非等自然资源储量较高的国家在资源出口方面更依赖中国。反之亦然：由于中国的制造业高度依赖采掘行业的产出，所以中国也高度依存于全球采掘业的供给。虽然中国的铁矿石产量在过去 20 年间始终在增长，但仍无法满足国内钢铁需求的增速，需要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进口。目前，仅采掘业进口一项就占了中国进口总额的 28%。

由于全球上游产业高度依赖对华出口，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对中国进口需求的变化非常敏感。一项研究发现，2003-2012 年间，中国的 GDP 增速是影响全球铁矿石价格的第一大因素[77]。全球依赖对华出口的现象也对交通运输业产生了次级效应，因为向中国运输资源需要动员全球各地的货船。

本土化要求较高的行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较低

某些行业的本土化要求较高（由于监管限制，或由于企业专注于国内市场），因而限制了跨境流动的规模。尽管这些行业在全球其他地区的贸易强度或许比较高，但不太依赖对华贸易。

2010-2015年间，中国的药品支出年增速为

17%

制药行业就是对中国与世界之间贸易依存度相对较低的领域。对华贸易仅占全球出口总额的 4%，全球进口总额的 3%。然而，很多间接联系使中国成为外国制药企业的重要市场和研发中心。中国的药品生产规模十分庞大，约占 2013-2017 年全球总产出的 25%，但主要用于本土消费。中国国内的消费规模足以维持本土制药业的发展。中国居民的药品支出总规模仅次于美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两国在 2017 年的药品支出分别为 1170 亿美元和 4620 亿美元），在全球所有大型市场中增速最快，2010-2015 年间的年增速达到 17%。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制药行业还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不过，虽然中国居民的药品支出总额全球第二，但人均支出远低于发达市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15 年，中国的人均药品支出为 426 美元，美国为 9536 美元，澳大利亚为 4934 美元。

贸易强度较低的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各不相同

有些行业可归为“本地自产自销”的一类，贸易属性往往较低。其原因或者在于产品特性的限制（例如农业和渔业、餐饮业），或者是生产基地本地化所致（例如金属加工、木材及木制品生产行业），或者是文化特点使然（例如印刷和媒体行业）。这些行业在中国的增长主要由内需所拉动，但中国仍然将在全球贸易中占据很大比例，因为中国的金属加工等行业的规模相当可观。

[77] Linda Wårell, An analysis of iron ore prices during the latest commodity boom,《矿产经济学》，2018 年 5 月，第 31 卷，第1-2 期。

• • •

虽然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仍在提升，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有所下降，这表明中国经济正逐步转向以内需驱动的增长模式。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依存态势悄然改变，所有依存于中国的行业和国家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贸易、资本和技术流动的变化不但会改变全球供需的动态，也会影响那些依存度较高的行业和国家的经济增长。下一章，我们将关注从“麦肯锡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涵盖的另一个领域——技术，以继续剖析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

3 中国已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

审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如何演变时，技术可谓其中的核心关注点。鉴于高科技行业的复杂度极高，技术价值链天然便具备全球化特征。时至今日，中国已在全球技术价值链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为全球供应了 90% 的个人电脑、90% 的手机和 70% 的电视机[78]。这种深度融合的现状决定了双方经济的依存态势一旦改变，中国受到的影响将尤为显著。持续获取外国技术有利于支持本国创新，但据我们的观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技术流动障碍日渐显著。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已开始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技术投资展开更严格的评估。人们正在密切关注中国是否会脱离全球技术价值链，以及中国政府针对技术领域本土化提出了哪些目标[79]。 根据《中国制造 2025》计划所设定的目标，在政府重点发展的 23 个子领域中的 11 个领域，国家提出，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期望值为 40%~90%[80]。

本章将审视中国科技行业的整体格局，以衡量中国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的深度、观察中国本土供应链的发展情况，以及提供核心零部件、制成品和知识技术的外国企业在中国本土技术价值链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中国深度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之余，也在大力发展本土创新能力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技术消费群体，在很多技术行业中也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举例而言，2017 年统计显示，中国占全球手机销量的 40%，市场份额全球居首）。中国市场为很多高科技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增长机遇。根据“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MSCI）的统计，美国信息技术领域 14% 的营收来自中国。

[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79] *Made in China 2025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industry*，促进劳动力市场强大和国家发展项目部（Project for Strong Labor Market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美国参议院小企业和创业委员会（U.S. Senate 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2019 年 2 月。

[80] 《中国制造 2025 重点领域技术创新绿皮书》，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2015 年 10 月。

中国还是全球最卓越的科技创新国之一。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15 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中国的 4 类创新，发现中国在客户中心和效率驱动型创新领域表现出色，但在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型创新领域则落后于全球领先国家[81]。中国是数字经济大国，正在积极打造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生态系统（参见附文 4：中国数字经济的竞争力）[82]。在某些技术领域中，中国与全球领导者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美国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领域第一大国，紧随其后的便是中国。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在其“十三五”规划、2016-2018年实施的《“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以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当中，人工智能技术都是发展重点。中国政府已宣布，到 2020 年将在国内打造一个价值 1 万亿元人民币的人工智能市场，并在 2030 年之前成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中心。 中国互联网三巨头 BAT（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和语音识别技术企业科大讯飞也加入了“国家队”，携手开发可用于无人驾驶汽车、智慧城市和医学影像等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83]。

[81] *The China effect on global innovation*（《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 年 10 月。
[82] *Digital China: Powering the economy 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 年 12 月。
[8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lications for China*（《人工智能：对中国的启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 年 4 月；Notes from the AI frontier: Modeling the impact of AI on the world economy（《模拟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8 年 9 月。

附文 4

中国数字经济的竞争力

中国的数字经济丰富多彩、充满生机[84]，主要源自以下三大优势：

— 中国拥有庞大而年轻的技术消费市场，为数字商业模式的快速商业化创造了条件。2018 年，中国的网民规模超过 8 亿人，超过美国和欧洲的总和，其中 95% 以上的网民通过移动端上网。接近 1/5 的中国网民只使用移动设备上网，这一数字在美国仅为 5%。移动端销售额约占中国电商销售总额的 70%，在美国仅为 30%。中国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约为 68%，在美国仅为 15%。

— 中国以互联网三巨头 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为核心，建立了丰富的数字化生态圈。这三家企业不断淘汰低效、零散、劣质的线下市场，从而奠定了在国内数字产业的优势地位。它们凭借各自的核心业务崛起，随后逐步走向多元化发展。支付宝、微信等“超级 APP”在教育、健康、信息服务、娱乐、电子商务、社交互动等多个领域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站式购物体验。这三家企业也是中国数字生态圈的重要塑造者，在 2016 年为中国风投市场贡献了42% 的资金。中国最顶尖的初创企业当中，有1/5由 BAT 或前 BAT 员工创立，另外还有 30% 的企业获得过 BAT 的资金支持。如今，中国的数字生态圈早已不仅限于 BAT 三巨头；拼多多、字节跳动等市场新秀正在挑战它们的霸主地位。平安、华为等一些传统大型企业也纷纷在传统业务之外积极打造自己的技术生态圈。

— 中国政府在数字领域实行“先试水、后监管”的原则，使数字企业获得了充分的探索空间。支付宝早在 2005 年便推出了线上转账功能，但监管机构在 11 年之后才开始设置转账额度上限。如今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打造世界一流的配套基础设施，以支持数字生态系统的发展。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17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三大数字化推动力（去中介化、分散化和非物质化）将重塑行业价值链并提高生产率，到 2030 年或可转变和创造 10%~45% 的行业总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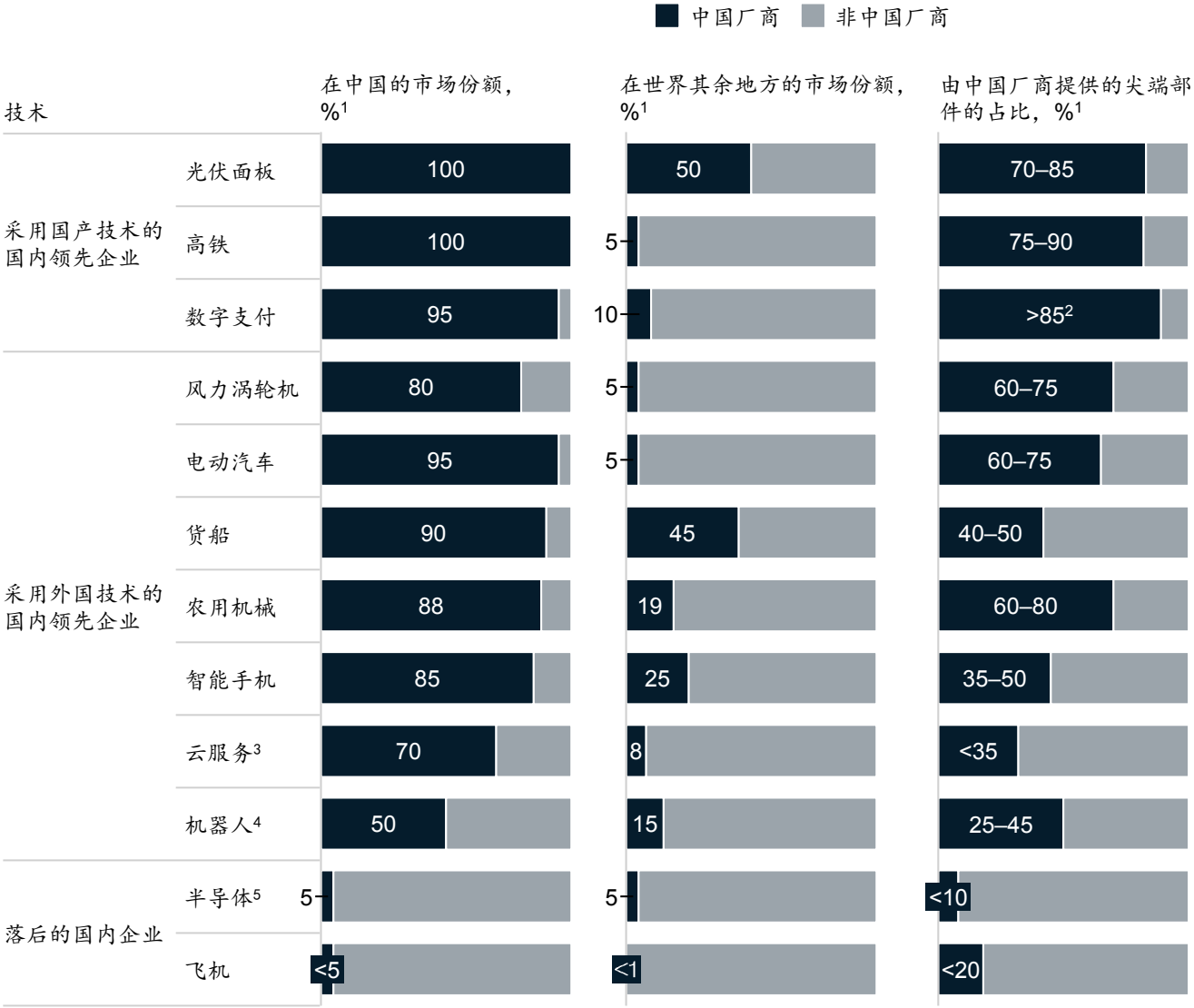
[84] *Digital China: Powering the economy 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 年 12 月。

不同技术领域的本地化程度相差很大。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择取了 12 个领域进行分析，旨在审视中国厂商在国内以及国外市场所占的份额，以及中国供应商在本土价值链上的一线零部件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见图 21）。

在光伏面板、高铁、数字支付这三个技术领域中，中国供应商在国内市场及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了很高份额，国内供应商为本土价值链贡献了逾 70% 的价值。在其中的 7 个领域，虽然中国供应商在国内市场占据的份额很可观，但仍有很大比例的零部件需要进口。举例而言，虽然中国的智能手机厂商占据国内市场 85% 以上的份额，但 50% 以上的零部件均采购自国外跨国企业。最后，在其中两个领域中（半导体和飞机），中国供应商在本土市场的份额很小，而且高度依赖外国产品。

图21

中国的科技厂商已在关键子领域获得了可观的市场份额，但仍然依赖全球价值链提供输入品



1 基于 2018 年或最新可用数据。
2 通过对比国内和进口软件的开发成本而计算得出。
3 用于云存储的服务器。
4 仅包含工业机器人。
5 受可用数据的限制，在此假设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相等。

资料来源：年报；文献检索；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在我们研究的几乎所有技术领域当中，中国的本土价值链在海外市场的份额都相对有限。在光伏面板和货船两个领域中，中国制造几乎占据了境外市场的半壁江山。但对其余领域而言，中国企业占境外市场的份额均不足 25%。

为了衡量中国与世界在技术价值链上的融合程度，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 11 个领域中择取了 81 项技术进行研究，并将中国与国际上的主流技术进行对比（见图 22）。研究发现，在超过 90% 的技术领域中，中国的主流技术均遵循了全球标准（详见《技术附录》）。但在某些行业中，中国却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有两个例子尤为显著：其一是数字支付，中国选择了二维码支付技术，与国际上广泛应用的近场支付（NFC）技术相比操作更简便，成本也更低。其二是聚氯乙烯（PVC）制造业，中国以煤基工艺代替了国际上应用更普遍的乙烯基工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两个例子中，中国也在采用全球标准方案（NFC 扫描仪和乙烯基 PVC 制造工艺），只是并未形成主流应用规模。

我们还发现，中国的本土厂商有能力生产 60%~80% 的技术，这意味着仍然有至少 20%~40% 的技术需要由国外跨国企业输入。

最后，我们在分析中发现，中国供应商只能在大概 40%~60% 的技术研究中实现与全球行业领导者同等或更好的水平，这表明中国顶尖厂商距离全球顶尖水平仍有一定差距。不过，后来居上也是可能的——其他行业不乏成功的先例。举例而言，在一些上游产业（如采掘业）和低复杂度的技术行业（如智能手机组装）当中，中国与掌握顶尖技术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已有所缩小。这是因为采掘业的发展历史很漫长，中国拥有充裕的追赶时间；而智能手机组装的技术门槛相对较低。中外企业技术差距最大的领域在于新兴以及高复杂度行业，比如集成电路。

中国主流技术中采用全球标准的比例超过

90%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也研究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基因组学、通信和太空探索等领域的新兴技术。这些行业的价值链处于发展初期，全球标准尚未确立，而中国正在做出重要贡献。举例而言，中国已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人脸识别；2019 年初，“嫦娥号”成为全球首个登陆月球背面的空间探测器。不过，在以上所有领域中，外国的零部件、投资和人才都让中国获益良多。

中国有望成为全球首个大规模启用 5G 通信网络的国家，并且将在制定全球标准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全球 10% 的 5G 技术专利，该比例远高于 3G 和 4G 技术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的水平。预计中国最终将拥有全球 30% 的 5G 相关专利[85]。此外，中国也一直在积极参与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以及其他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的相关工作。

[85] *The geopolitics of 5G*，欧亚集团，2018 年 11 月 5 日。

图 22

中国几乎大部分技术行业均与全球标准整合，但各个价值链的本地化程度存在差异

	行业/领域	评估的技术总数	采用全球标准的比例	拥有本土提供商的比例	技术水平超越全球领导者或与之相当比例
基础材料	• 采矿 • 钢铁	7			
化工	• 油气 • 日用化工及特殊化工 • 纺织	12			
电子元件	• 显示屏 • 集成电路	8			
电动汽车	• 纯电动汽车 •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7			
交通运输	• 高铁 • 航运	10			
消费电子产品和互联网	• 消费电子产品 • 数字支付 • 无人机	11			
设备	• 手术机器人 • 工业机器人	4			
制药和生物科技	• 小分子药物 • 生物分子药物	6			
人工智能	• 语音识别 • 人脸识别 • 无人驾驶	5			
下一代技术	• 量子技术 • 5G • 太空	8			
基因组学	• 基因分型 • 基因测序 • 基因编辑	3			
总计		81	>90%	60–80%	40–60%

[1] 我们所估算的“采用全球标准比例”是通过择取不同行业中的关键技术，并评估中国是否使用了相同的、海外所普遍采用的技术标准及流程；我们所估算的“拥有国内提供商的比例”是分析了各个关键技术中，中国企业是否在全球供应商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所估算的“优于全球领导者或可以与之媲美的比例”是指中国供应商是否能提供比国际供应商更出色或相当的技术。

资料来源：文献检索；专家访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中国若想向技术价值链上游挺进，需要具备 4 大要素，加深与世界的融合将有所助益

对于某些技术行业而言，若想达到全球化规模，也许需要 10~20 年的发展时间（见图 23）。这也正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成功挺进技术价值链上游、跃居全球行业领导者耗费的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汽车厂商凭借低端基础性技术于 1953 年恢复了乘用车生产，很快便在全球市场赶超了西方企业。随后，日本又开始推动汽车行业向技术价值链上游挺进，于 1967 年跃居全球第二大汽车生产国。1975 年起，台湾开始在中国政府的资助下研究集成电路设计，到 1999 年，台湾三大个人电脑芯片组厂商合计斩获了全球逾 50% 的市场份额[86]。韩国的企业集团最初只为本土市场生产存储芯片，却在短短 15 年间跃居全球第一大存储芯片生产国，占据全球 40% 的市场份额。以色列在 20 世纪 90 年代确定了生命科学技术的战略发展方向，到 2012 年，该国在医疗设备领域的人均专利数量已达到全球第一。

中国内地也有两个成功案例：2016 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液晶面板制造国，那时距离中国开始生产这种产品刚刚过去 13 年，距离中国将液晶面板列为国家战略行业也仅过去 5 年；至于高铁行业，中国在 2004 年宣布了一项战略计划，并与跨国企业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以获取必要的技术。到 2017 年，中国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生产高铁，并且大幅改良了相关技术。中国的“复兴号”动车组也已投入运营[87]。

全球各国的经验均表明，一个国家若想提高其在技术价值链的地位并获取更多价值，必须具备 4 大要素：(1) 大规模投入资金；(2) 拥有获取技术和知识的渠道；(3) 进入庞大的市场；(4) 推行鼓励竞争和创新的有效制度。几乎在所有的技术价值链中，中国在第一个（投资规模）和第三个（市场）要素上都拥有极大优势。中国不但有能力提供充沛的科研资金，也拥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推动技术的商业化[88]。例如，中国拥有庞大的网民群体，有利于数字企业反复试水，并迅速实现规模效应。此外，中国消费者也渴望拥抱新技术，这一点早已体现在移动支付、共享出行以及共享单车等领域的爆发式增长当中。

因此，中国向价值链上游挺进的关键点就落在了另外两个要素上：积极开发和收购核心知识技术（第二个要素）；以及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以确保其生态系统具备足够的竞争活力来促进创新（第四个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助于中国在这两个要素上取得持续进步。

[86] Pao-Long Chang 和 Xhien-Tzu Tsai, Finding the niche position — competition strategy of Taiwan's IC design industry, *Technovation*, 第 22 卷, 200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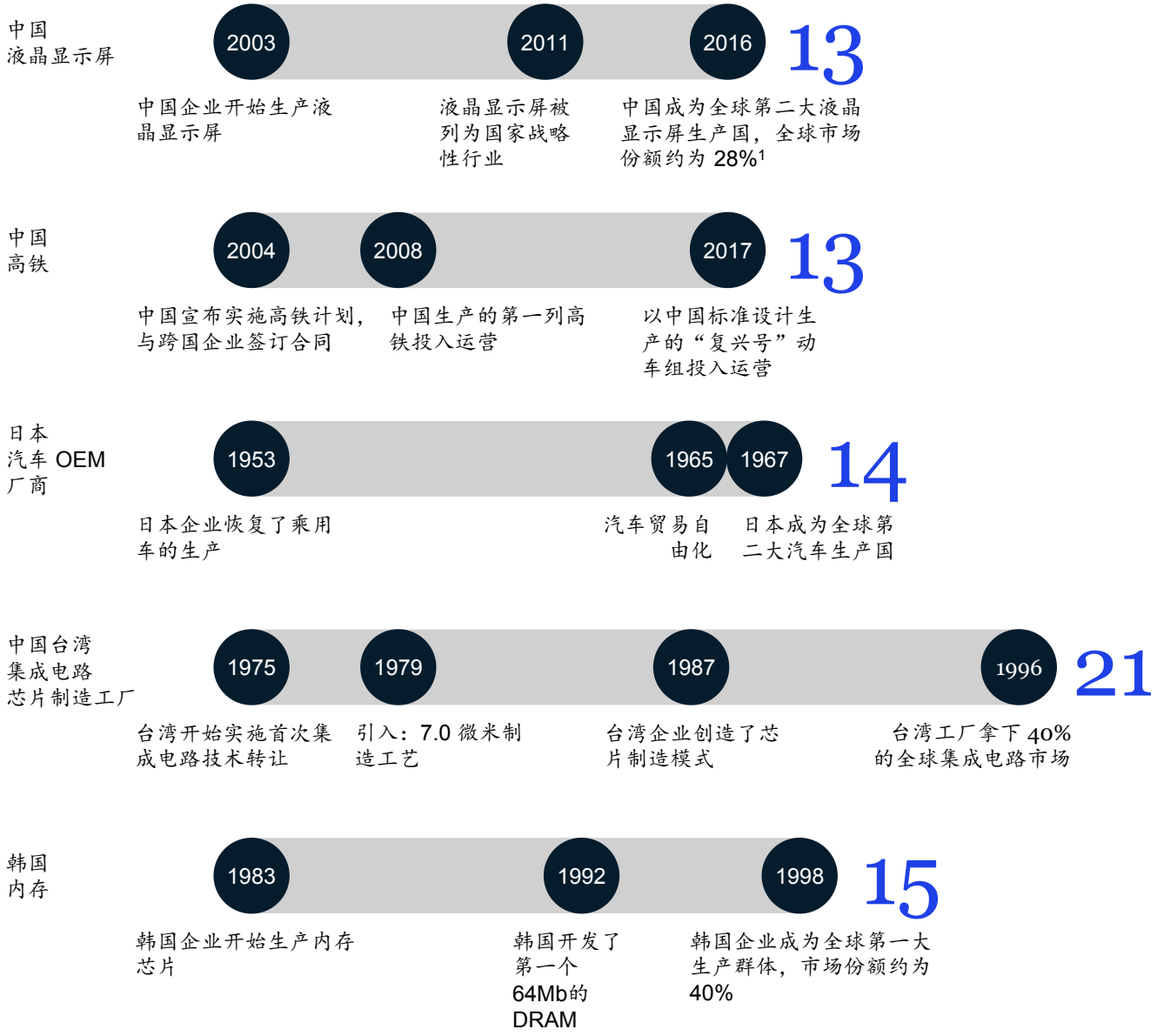
[87] Fuxing" bullet train to be put into operation in N China, 《中国日报》, 2018 年 8 月 17 日。

[88] 中国不断壮大的风险投资行业对数字化领域日益关注，而中国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风投规模也已位居全球前三，这些领域包括虚拟现实、无人驾驶、3D 打印、机器人和无人机，以及人工智能。请参见：*Digital China: Powering the economy 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 年 12 月。

图23

用10-20年时间逐步实现了某一领域技术超越的部分案例

成为某一行业全球领导者所用年限（按企业总部衡量）



[1] 基于两家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加总得出：京东方和华星光电。

资料来源：文献检索；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大规模投资是实现技术开发和创新的前提，并且需要持续投资

投资可用于开发和获取技术、构建能力、创造新市场。1980-2000 年间，日本是全球汽车行业的第一大投资者，投资规模高达 5700 亿美元（美国为 4140 亿美元），占全球汽车行业投资总额的 31%[89]。韩国的半导体企业很早就展开了大胆的投资，而且企业集团内部的交叉融资能力使其得以支持新业务发展，并承受住了进军内存行业之后前 3~5 年的财务亏损。中国台湾在 1979-1983 年间斥资 6.7 亿美元把半导体工艺从 7 微米级升级到 3 微米级；又在 1983-1988 年间斥资 2.45 亿美元，从 3 微米级升级到 1 微米级；1990-1995 年间再次投资 70 亿美元发展亚微米级技术，以跟随产业升级的步伐[90]。在此过程中，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功不可没。它不仅负责审查技术转移，而且率先组建了一个企业联盟，以合力开展早期技术的攻关。

2012-2014年间，中国在全球薄膜晶体管液晶面板新增产能中占比超过

50%

自从中国将液晶面板列为国家战略行业以后，政府便向该行业展开投资，并设定了一个目标：2011 年国内液晶面板价值链的总营收要达到 5000 亿元人民币。根据全球信息提供商 IHS Markit 的统计，2012-2014 年间，全球薄膜晶体管液晶面板（TFT-LCD）行业逾 50% 的新增产能来自中国。到2016年，中国累计向高铁行业投入约 8800 亿美元[91]。这不但刺激了国内市场的发展，维持了产能，也便利了整个行业的研发融资。

由于生产零部件、软件和硬件的技术工艺高度复杂，所以获取先进技术至关重要

全球各国的经验表明，与从零开始自行研发核心技术能力相比，如果能够顺利获取先进技术，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就能踏上更快捷的发展路径（参见附文 5：技术本土化的尝试往往以失败告终）。开展并购、获得国外跨国企业的技术转移、招募人才、寻求技术授权——这些都是其他经济体经常采用并屡屡获得成功的方法。举例而言，韩国的内存企业便通过技术授权和代工生产（OEM）而获得了最基础的设计和加工技术[92]。韩国在 1983-1988 年间签订的技术授权多达 101 项[93]。这些内存企业既受益于知识流动，也受益于人才流动。三星将其位于加州圣何塞的研发中心作为一个“过渡据点”，籍此吸引经验丰富的韩国资深工程师，并从韩国本土派遣年轻人才去硅谷与他们共同工作[94]。

在中国的液晶面板和高铁行业的发展历程中，获取外国的先进技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2003-2011 年间，中国前三大液晶面板生产商均通过与日韩跨国企业的合作或收购而获得了领先技术。举例而言，京东方于 2003 年收购了韩国现代的薄膜晶体管液晶面板（TFT-LCD）业务[95]。TCL（麾下的华星光电负责整个集团的显示面板业务）在 2007 年通过外包协议获得了韩国三星的技术支持，随即建立了自己的液晶显示屏工厂[96]。中国开发第一代高铁时，曾与全球四大高铁企业签署了为期 4 年（2004-2007 年）的技术转让协议，以获得工艺规范、生产技术以及工程师培训[97]。

89 IHS Markit。
90 Pao-Long Chang 和 Chiung-Wen Hsu,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aiwan'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1998 年 11 月，第 45 卷，第 4 期。
91 《2016 年中国高铁行业发展趋势及车辆需求预算》，中国产业信息网，2016 年 9 月 21 日， chyxx.com/industry/201609/450585.html。
92 S. Ran Kim, The Korean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 governance perspective,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998 年 6 月，第 7 卷，第 2 期。
93 Jaeyong Song, *Technological catching-up of Korea and Taiwan I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 study of modes of technology sourcing*, 讨论论文第 15 号，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商学院，2000 年 12 月。
94 David Mushkudiani, *The Kore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istorical overview and prospect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2000 年。
95 Mark O'Neill, China imports hi-tech through Hydis purchase,《南华早报》，2003 年 2 月 20 日。
96 Samsung to outsource some work to China's TCL，路透社，2008 年 4 月 29日。
97 Jue Wang 和 Qing Wang, *China's high-speed rail: From technological catching-up to innovation*, 中国人民大学，2017 年 11 月。

附文 5

技术本土化的尝试往往以失败告终

曾有若干经济体试图脱离全球化发展模式，用国内产品替代进口产品，以优先发展本土产业。但在多数情况下，本土厂商无法与拥有低价优势的进口商相竞争，从而使政府只能出手干预：或者调高进口关税，或者在补贴本土厂商的同时调高下游消费者支付的价格。

其中一例，就是拉丁美洲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推行的以进口替代为基础的工业化战略[98]。由于担心过分依赖国外进口可能引发经济波动，拉美国家曾努力以本土化生产来实现经济现代化，并因此对进口商品施加关税，并为国内企业提供补贴。虽然这些政策提升了国内的轻工产值，但维持这些行业持续增长的进口资本总量也因此增加。另外，当重工制造逐渐迈入工业化的阶段，想以进口替代模式来满足对某些高复杂度先进技术的需求，就显得捉襟见肘。

另一种进口替代模式是实现技术价值链上所有环节的本土化。但经验表明，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很难完全实现尖端技术的自给自足。以美国国防部的超高速集成电路 (VHSIC) 项目为例，该项目于 1979 年启动，目标是提高军用集成电路的产值。对于其中涉及到的半导体加工设备，美国政府希望每一个部件都至少能找到一家本土供应方。但该项目最终半途而废，因为实践后发现生产流程过于复杂[99]。虽然该项目成功交付了性能更高的半导体，但其成本却从预估的 2 亿美元飙升到逾 10 亿美元[100]。

还有一个例子：苏联曾试图开发一套可与美国的因特网分庭抗礼的互联网系统。尽管苏联在初期创造出了一个能够内部通信的计算机网络，但若想打造一个功能完善的互联网生态系统，还需要进一步投资和有效的竞争环境。最终，由于自动化研发过程缺乏规范竞争，加之机构之间为争夺财务资源而内斗，导致该项目最终铩羽[101]。

---

98 Guillermo Rozenwurcel, *Why have al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ailed in Latin America?,* 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世界研究院，研究论文第 2006/012 号，2006 年。

99 *Without technology, China's 'MIC 2025' to fall short of its goals,* Evertiq，2017 年 2 月 13 日。

100 Anna Slomovic, *Anteing up: The government's changing role in the microelectronics industry*，兰德公司，1988 年 12 月，apps.dtic.mil/dtic/tr/fulltext/u2/a228267.pdf。

101 Benjamin Peters , *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 The Uneasy History of the Soviet Internet*，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6 年。

经验表明，只有为国内生产提供巨大市场，本土产业才会形成规模

开辟市场需求是推动发展的关键——无论是当地还是全球市场。但对于大多数采用全球技术标准的经济体而言，国内市场的规模不足以支持本土厂商的发展，因此必须寻求出口市场。韩国和台湾的内存企业便通过全球化在本土市场之外开拓了巨大的国际市场。一项研究显示，1994年韩国的半导体产值为 850 万美元，其中 90% 出口到了其他国家[102]。而且即便是余下那 10% 用于满足国内需求的产值，最终仍然可能以高科技制成品的形式出口，例如电视机、电脑和手机。同样，台湾地区的企业也在积极挖掘全球化需求。其半导体在海外市场的年销售总额超过 800 亿美元，占台湾地区出口总额的 40%[103]。为了服务全球市场，台湾企业也开始在海外设厂。例如，台积电的 13 家前端工厂中有 4 家设在岛外，其中有 2 家位于中国内地。归根结底，拥有庞大的市场（无论是当地还是全球市场），才是上述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驱动力。

中国占全球高铁总运营里程的

65%

与那些依靠出口来拉动高科技产业的小型经济体不同，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增长迅猛，具备先天优势。中国是全球消费电子产品（电视机、智能手机等）第一大生产国，其制造的液晶面板有 90% 左右由本土市场消化。中国占全球电视机和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分别约为 27% 和 28%[104]。虽然国内市场足以支持自身发展，但某些行业的本土厂商正在开辟出口市场。中国的消费电子以及计算机制造行业（也即生产液晶面板相关产品的行业）分别有 28% 和 39% 的产出用于出口。对其他高科技行业而言，中国仅靠国内市场便足以支持本土厂商。中国在 2004-2016 年间修建了两万公里高铁，占全球高铁总运营里程的 65%[105]。虽然技术出口规模仍然很有限，但中国正在积极与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展开技术出口谈判[106]。

促进科技发展的关键在于鼓励良性竞争，并且需要不断提升创新标准

世界各国或多或少会依赖私营企业的力量来推动竞争，有时这些企业为了持续获得政府的支持，还会设定具体的绩效目标。1965 年之前，日本曾大力鼓励本土车企对外出口（例如减免税收、提供低息贷款和补贴），同时对汽车进口施加限制，目的在于促使至少 6 家本土大型车企（主要是日产、丰田等私营企业）充分展开竞争，以激发高水平创新。此举为这些车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帮助其应对汽车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国际竞争；日本 1955 年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时，便设定了 10 年的过渡期[107]。

[102] S. Ran Kim, The Korean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 governance perspective,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998 年 6 月，第 7 卷，第 2 期。

[103] *Taiwan—semiconductor equipment,* Taiwan Country Commercial Guide，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商务部，2018 年 10 月 10 日，export.gov/article?id=Taiwan-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Equipment。

[104] Ammar Arshad 和 Rashad Yazdanifard, Investigative synopsis of Sony Inc.'s strategic management issues / failures and how to overcome th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7 年 9 月，第 4 卷，第 9 号。

[105] 《2016 年中国高铁行业发展趋势及车辆需求预算》，中国产业信息网，2016 年 9 月 21 日，chyxx.com/industry/201609/450585.html。

[106] Robin Spiess, Work starts on Chinese-funded Indonesian high-speed railway, *Southeast Asia Globe*, 2018 年 7 月 10 日；Construction of Thai-Chinese high-speed rail to start fully next year: Thai official,《中国日报》，2018 年 6 月 3 日。

[107] David Flath, *A perspective on Japanese trade policy and Japan-US trade friction*，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日本经济和商业中心，工作论文第 151 号，1998 年 10 月。

液晶面板行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也得益于这种竞争，包括国内民企之间以及国内民企与国外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其下游产品——电视机和智能手机，早已成为成本敏感型大众商品，无论在性能还是成本效率方面，市场竞争都非常激烈。至于高铁行业，中国当年有 33 家本土企业（它们是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的前身）散布于 25 座城市当中，政府从中选拔出 4 家企业，与 4 家国外跨国企业合作展开制造技术的本地化研究，相当于发起了一场内部竞争[108]。

引入外企以及开展市场化竞争都有可能提高国内企业面临的良性压力。具体而言，国有企业的效率提升空间相对更大，更有望通过创新来提升长期竞争力。在中国的某些高科技行业中，国企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其财务回报率比私营企业低 45%，研发投资低 40%，创新效果低 30%[109]。若能采用以绩效为基础的管理体系，并推动民企之间以及民企与国企之间的良性竞争，将有助于促进行业创新。

从三大技术领域分析中国在全球技术价值链中的三种定位

接下来，我们将针对电动汽车、机器人、半导体这三大技术领域展开分析，借此审视中国本土的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全球价值链的融合程度。

中国前九大电动汽车OEM厂商在国内市场占据的份额超过

75%

电动汽车：该行业在中国发展得相当繁荣，并显示出全球整合的趋势

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已经得到显著开发，2018 年国内电动汽车总产量超过 100 万辆，而 2013 年时仅为 22978 辆——年均增速高达 116%。根据 IHS Markit 的统计，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在纯电动汽车领域，排名前 9 的中国 OEM 厂商占据了本土市场逾 75% 的份额（见图 24）。国产电动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包括电池和动力总成）也主要由本土厂商供应，合计约占总成本的 60%。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电动汽车价值链全然实现了本土化。中国仍然需要外国企业提供的关键零部件，包括微控制器和基于绝缘栅双极晶体管的电源模块（见图 25）。另外，中国生产的电池性能与全球顶尖产品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中国顶尖厂商生产的电池在能量密度上要比日本和韩国顶尖企业的产品低 30%~40%，由此将影响电动汽车的性能[110]。中国顶尖电动汽车品牌的续航里程比美国顶尖品牌短 40% 左右[111]。但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目前的规模依然令人瞩目。

[108] Jue Wang 和 Qing Wang, *China's high-speed rail: From technological catching-up to innovation*, 中国人民大学, ebha.org/public/C7:paper_file:79。

[109] John Wu, *Despite China favor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ts private companies are more innovative and productive*,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2016 年 11 月 29 日。

[110] Trefor Moss, China's road to electric-car domination is driven in part by batteries,《华尔街日报》, 2017 年 10 月 2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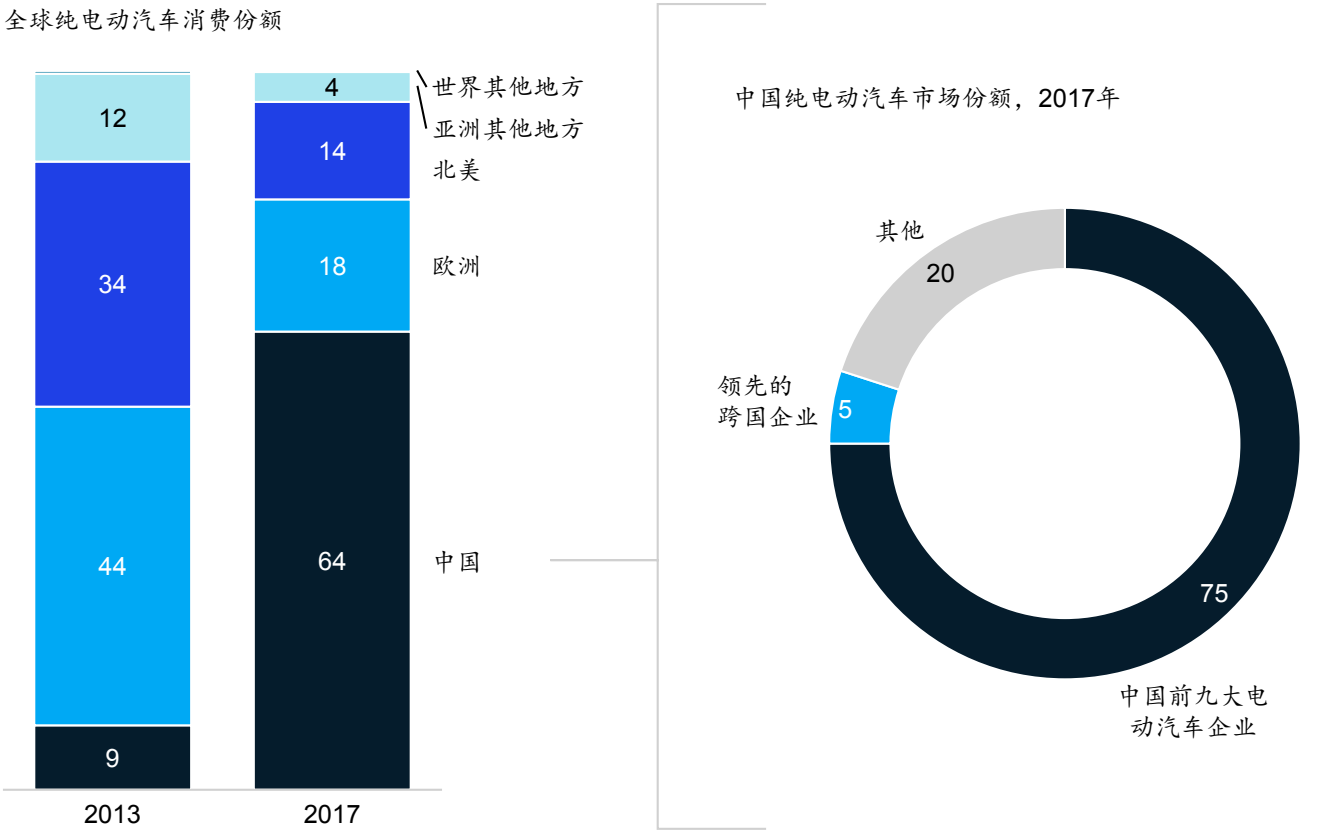
[111] Heejung Jung、Rebecca Silva 和 Michael Han, Scaling trends of electric vehicle performance: Driving range, fuel economy, peak power output, and temperature effect, *World Electric Vehicle Journal*, 2018 年 11 月, 第 9 卷, 第 4 期。

中国电动汽车行业迅猛增长的背后是惊人的资金投入（也即前文述及的四大要素中的第一个），而政府的支持也有助于创造巨大的市场（也即第三个要素）。2017 年，中国政府在电动汽车和混动汽车领域投入了 10 亿美元资金[112]。中国对中型车的货币补贴达到总售价的 23%（低于丹麦的 49% 和挪威的 45%，但高于美国的 18%、德国的 13% 和日本的 10%）[113]。为了支持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中国还增加了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境内的私人充电桩从 2010 年的 76 个增加到 2017 年的 6900 个——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190%。2010-2017 年，中国境内的公共充电桩从 1122 个飙升到 23 万个，复合年增长率超过 200%[114]。

[112] Kyle Hyatt, *China may slash EV purchase subsidies, but why?*, CNET, 2018 年 7 月 9 日。
[113] Patrick Hertzke、Nicolai Müller 和 Stephanie Schenk, China's electric-vehicle market plugs in, *McKinsey Quarterly*, 2017 年 7 月。
[114] *China's EV charging station and charging pile market report, 2018–2025*, Research in China, 2018 年 8 月, researchandmarkets.com/research/xvn269/china_ev_charging?w=5。

图24
中国本土厂商在国内的纯电动汽车市场中占据优势份额

%



注释：由于四舍五入，数字总和可能不等于 100%。
资料来源：IHS Markit；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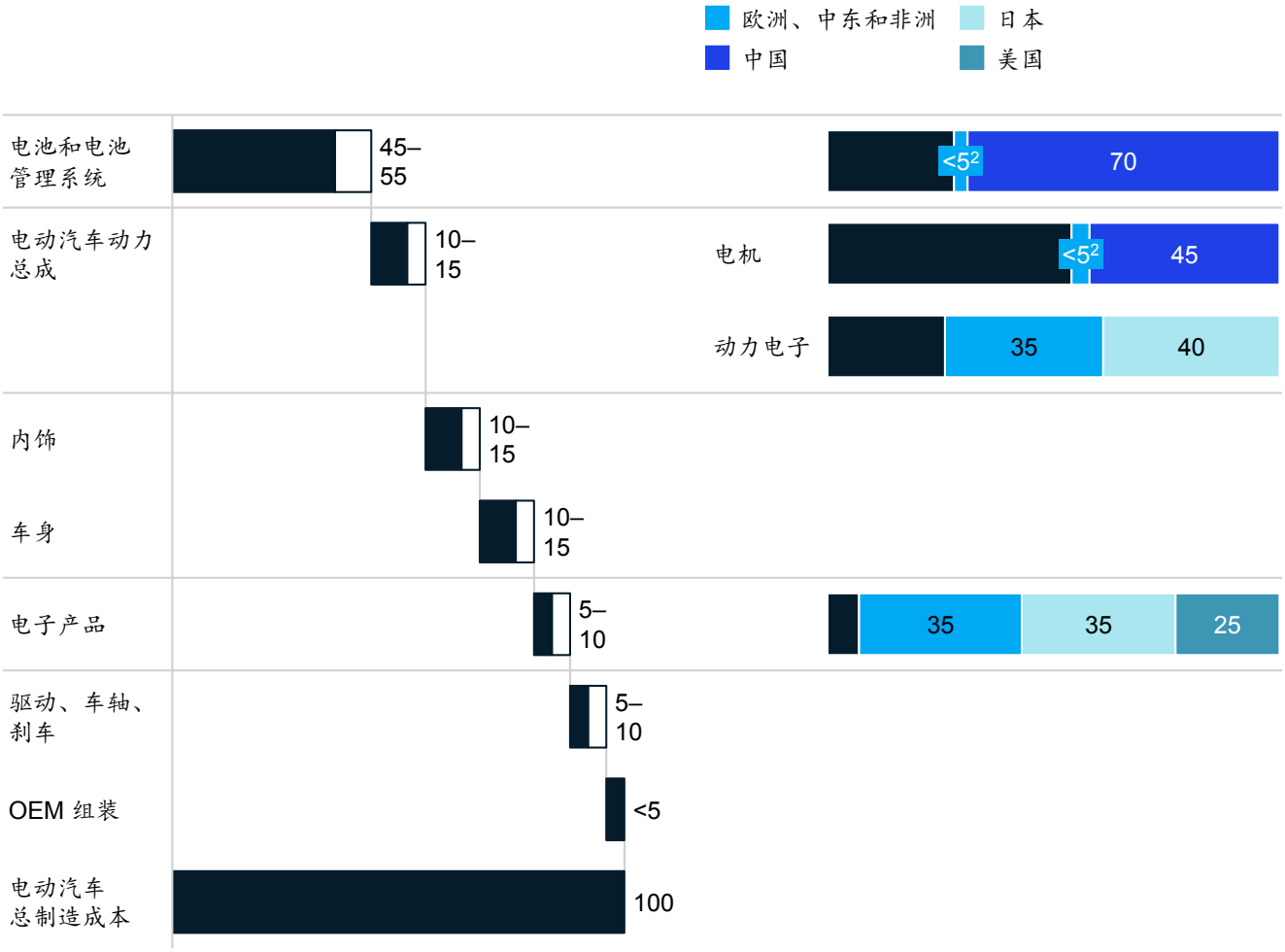
图25

中国仍然需要从外国进口电动汽车的某些关键零部件

%

一辆典型的纯电动汽车的成本结构[1]

部分零部件生产商的市场份额，近似值



1 基于三款热门纯电动车型。
2 与中国合作伙伴建立的合资企业
注：由于四舍五入，数字总和可能不等于 100%。

资料来源：深圳高工产业研究所；文献检索；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中国政府也成了电动汽车的大客户。2011-2016 年间，中国的电动公交车销量从 1000 辆飞速增长到 11.6 万辆[115]。中国政府将深圳作为纯电动公交的试点城市，这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座完全采用电动公交车的城市。从 2013 年起，中国政府每年为深圳的每辆电动公交车提供 7.2 万美元补贴。自此以后，该市的 1.6 万辆电动公交车一年花费政府逾 10 亿美元[116]。

115 Tim Dixon, *China 100% electric bus sales "just" 89,546 in 2017*, Clean Technica, 2018 年 2 月 4 日。
116 Daniel Ren, Shenzhen's all-electric bus fleet is a world's first that comes with massive government funding, 《南华早报》, 2018 年 10 月 23 日。

中国政府也在通过监管手段促进行业发展。举例而言，2017 年，政府在全国面向新能源汽车推出绿色牌照，车主可享受优惠政策。到 2025 年，中国政府希望插电混动或纯电动汽车的年销量可达到 700 万辆[117]。此外，中国显然正在实施一项以最终停产燃油汽车为目标的长期规划。一项于 2019 年生效的电动汽车新政为汽车厂商设立了强制性的电动汽车生产配额。在这些政策的激励下，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有望延续目前的高增长势头。

有证据显示，并非所有的干预措施都能取得预期成效。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充电桩数量大幅增长，但据估算其使用率却只有 15%[118]。技术品质较低（导致充电时间较长）和行业协调不足等因素都妨碍了公共充电桩的使用率。当然，国内市场标准化不足的现状也对电动汽车的安全性和成本效率造成了负面影响。一项研究估计，仅在 2018 年当年，中国便不得不因此报废了 17 万吨失效的电动汽车电池[119]。

2013-2017年间，中国为全球电动汽车销售增长的贡献超过

75%

中国目前逐步开始向外企开放庞大的电动汽车行业，并宣布了多项规划，旨在提升国内电动汽车行业的竞争力。这将为企业带来可观的机遇。2013-2017 年间，中国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增长的 75%。由此观之，中国有望成为跨国车企的全球增长引擎。中国目前不仅是全球第一大电动汽车市场，其预期增速也在全球首屈一指。

只有在中国生产的汽车（包括中外合资企业在华生产的汽车）才能享受政府补贴[120]。但这种补贴可能将在 2019 年削减 30%，并在 2020 年彻底取消，这就意味着本土厂商必须依靠零部件和整车性能展开竞争。同时，中国政府也计划逐步放松合资要求，可能会允许外资企业在华建立全资子公司。该举措已经促使某些国际 OEM 厂商宣布与中国本土品牌组建新的合资企业，并通过扩大现有合资企业的规模来合作生产电动汽车[121]。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已于 2019 年初启动建设。自 2017 年以来，福特已经与中国本土车企众泰联合组建了两家合资企业，计划共同开发“平价”电动汽车，并为中国各大城市提供网约车解决方案。

虽然这一系列为外资“松绑”的措施颇受好评，但外国车企在华经营的障碍仍然有待进一步消除。虽然一些外国 OEM 厂商已宣布，将在监管要求调整之后增持现有合资企业的股份，但合资企业的解散流程仍有待在运营层面上与国内合作方及监管机构展开细致协调。此外，还有一些要求和规定，也让有计划在华大规模投建电动汽车工厂的外国企业有所顾虑，例如国内的碳信用体系[122]。

机器人：中国仍然需要外国 OEM 厂商提供核心零部件和高端产品解决方案，但本土厂商已在某些子领域崭露头角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的统计，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机器人市场，占据 2017 年全球工业机器人总销量的 36%。但中国 OEM 厂商的表现参差不齐。整体来看，虽然中国本土企业已逐步取得进展，但全球机器人及零部件制造业的大部分市场份额仍由外国企业掌控。不过，由于中国本土制造业规模庞大，工业机器人领域尚有可观需求亟待满足，而且中国消费者对服务型机器人的需求也在增长，因此中国企业已经开始从中受益。

[117] China is leading the world to an electric car future，彭博新闻，2018 年 11 月 14 日。
[118] 肖莹，《能源局：中国已建成充电桩 45 万个，利用率不足 15%》，财新网，2018 年 1 月 22 日。
[119] China draws up plans to promote standardization in electric vehicles，路透社，2018 年 3 月 27 日。
[120] *Supercharging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 vehicles in China,* 麦肯锡公司，2015 年 4 月。
[121] Jack Perkowski, What the BMW deal means for the future of auto joint ventures in China，《福布斯》，2018 年 11 月 2 日；Kevin Buckland, Chinese carmakers under pressure as joint-venture caps eased，彭博新闻，2018 年 4 月 18 日。
[122] Yang Jian, Don’t bet on widespread breakups of JVs in China, *Automotive News,* 2018 年 4 月 23 日。

2017年中国贡献了全球工业机器人订单总量的36%

36%

2013年为

21%

中国也是全球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第一大采购国，2017 年占到全球订单总量的 36%，高于 2013 年的 21%。中国 OEM 厂商占国内总销量的比例已经从 2013 年的 25% 增加到 2017 年的 45% 左右（如果除去库卡机器人公司的份额，该比例则为 31%）。在规模较小、复杂度较低的应用领域，中国企业的进步最为显著（见图 26）。在国内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中，本土 OEM 厂商是焊接和测量机器人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在点胶、堆垛、塑料成型以及金属铸造机器人领域更拥有 50% 以上的份额。但这些机器人应用市场的规模通常很小（年销量不足两万台），出口需求很有限；而且复杂度较低，最多只能取代一个工业化全职人力工时岗位。中国供应商在材料处理（市场份额 8%）、焊接（10%）和装配机器人（11%）这三个本土市场中规模尚小，但无论在全球还是中国本土市场，这都是三个最大的应用领域。这些市场需要的也是最复杂的机器人，可以取代多达三个工业化全职人力工时岗位。

在服务机器人领域，中国与其他各国一样，也面临着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中国的电商包裹总量比美国多 50%，餐厅数量是美国的 13 倍，老年人口是美国的 3 倍——而电商、餐饮和老年居民都是服务机器人的重要目标市场。自动导引车（AGV）是服务机器人最大的应用领域之一，中国本土企业主宰了国内的自动导引车市场，占据约 90% 的市场份额。新松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机器人制造企业，目前正在为许多行业提供端对端自动化支持（包括工业机器人、仓储和物流自动化、系统集成）。该企业高度重视研发工作，麾下1600 多名员工中有 3/4 为研发人员。

若要整体实现价值链本土化，必将面临重重障碍。虽然中国更擅长制造外壳等商品部件，但在典型的工业机器人生产领域中，约有 70% 的成本来自三个复杂的高价值部件：伺服电机、减速齿轮和控制系统，这些部件仍然主要由外国企业供应。以伺服电机为例，中国目前只能制造上一代产品，无法生产顶尖部件。不过，汇川技术等领先的本土企业依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如今已斩获了约 8% 的全球市场份额。中国企业通过收购（例如德国库卡）在机器人控制器制造领域获得了一席之地，但全球最顶尖的企业仍然来自德国和日本。减速齿轮市场目前仍由日本企业掌控，市场份额约为 85%；该领域还没有一家大型中国企业（见图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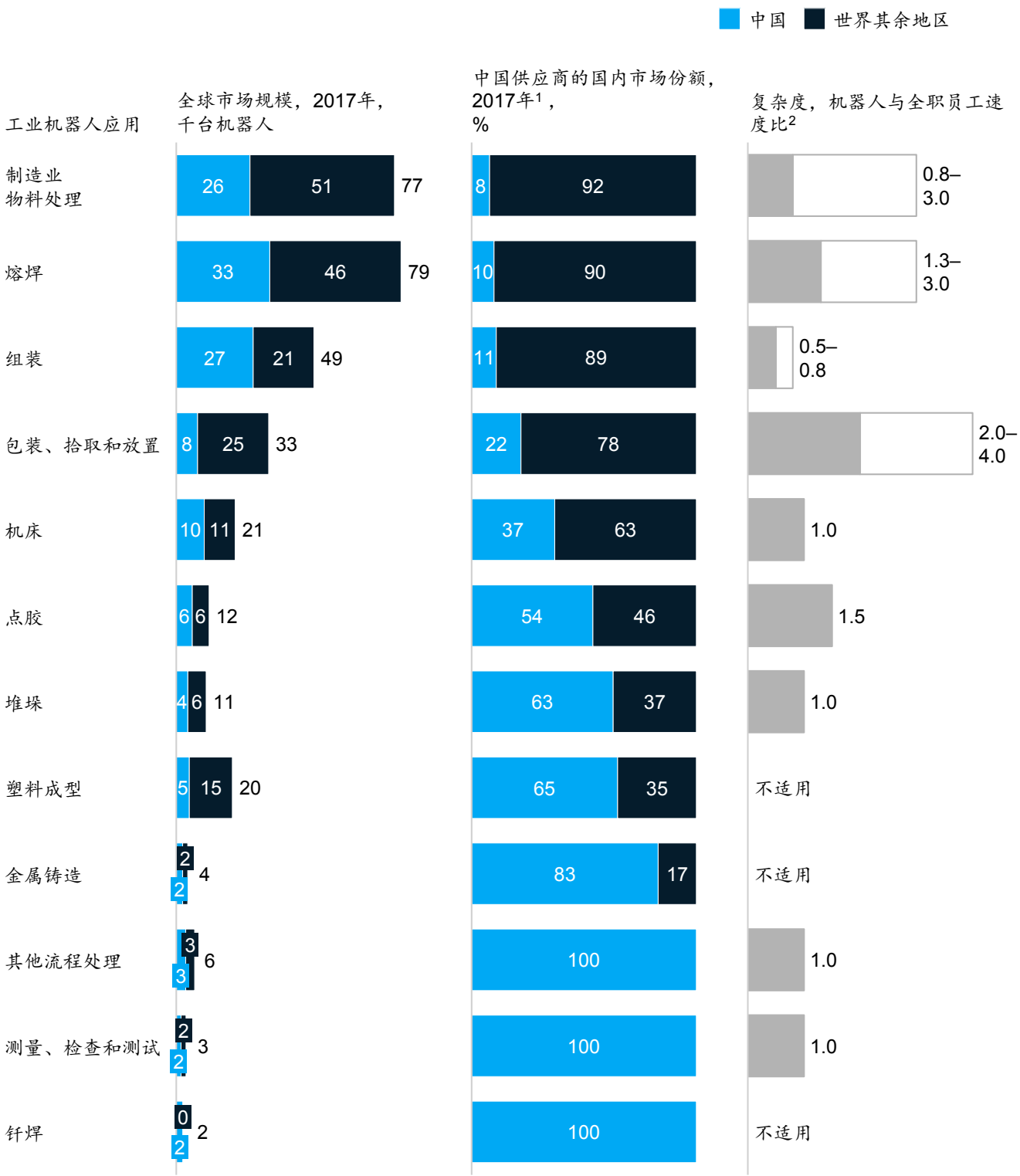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可归功于两个因素：自动化领域获得了大量投资（第一个要素）；中国政府为创造并拓展机器人市场提供了支持（第三个要素）。2014-2017 年间，机器人相关项目获得的融资从 6.98 亿元人民币快速增长到了 200 亿元人民币[123]。2015-2018 年，广东省提供 1500 亿美元补贴以提高本地制造商的自动化程度[124]。若要发展自动化，大力投资势在必行。中国目前的自动化水平很低，劳动力成本却在迅速上涨。2010-2017 年间，中国的城镇平均工资水平年均增长 11%。中国政府已经把数字化和自动化列为一项战略重点，其中一项目标是将中国的机器人使用密度从 2017 年的 97 台/万名员工提升至 2020 年的 150 台/万名员工（相比之下，美国的密度为 200 台，日本为 308 台，韩国为 710 台）。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毕竟两年前的工业自动化程度仅为 51 台机器人/万名员工。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有望维持强劲增长。

[123] 《卖一台机器人亏一万八，工业机器人行业狂飙后危机四伏》，投资界，2018 年 9 月 27 日，m.pedaily.cn/news/436171。

[124] He Huifeng 和 Celia Chen，“Made in China 2025”: A peek at the robot revolution under way in the hub of the “world’s factory”，《南华早报》，2018 年 9 月 18 日。

图26

在复杂度较低的小型工业机器人行业中，中国本土供应商正在逐渐夺取国内的市场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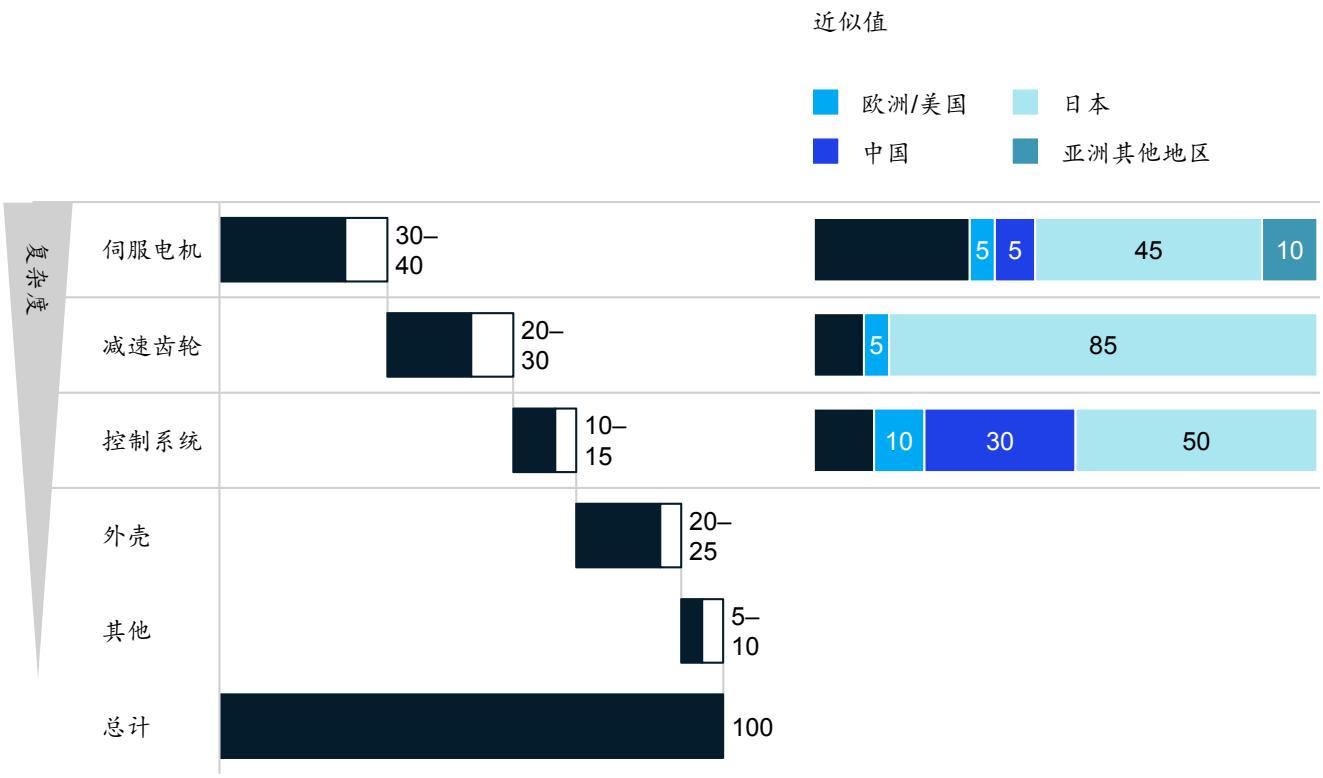


[1] 不包含 2016 年被美的收购的库卡机器人公司。
[2] 比率大于 1，则表示机器人速度超过人类操作员。
注释：由于四舍五入，数字总和可能不等于 100%。

资料来源：国际机器人联盟，2018；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图27

中国仍然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人行业的关键零部件



资料来源：分析师报告；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中国拥有的诸多优势表明其有望成为国内外机器人行业的可观力量，它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及服务型机器人市场，并向这一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中国政府有意进一步推动该行业的本土化。中国已经制定了到 2025 年的发展目标，包括届时让本土 OEM 厂商斩获70% 的市场份额，并实现占机器人成本 70% 的零部件均由本土生产。

不过，中国也不妨超越机器人制造这一领域，根据性能表现灵活选择国内外企业的设备，专注发展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以获得更可观的回报。举例而言，中国制造业的总营收在 2017 年再创新高，达到 17 万亿美元，如果以最顶尖的技术全面推动该行业的数字化，那么潜在收益理应高于工业机器人市场（总营收为 45 亿美元）的本地化潜力。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现，智能制造领域的高端机器人可将劳动效率提升 20%~50%。麦肯锡的其他研究也显示，随着机器人制造业的全球竞争日益激烈，价值焦点正从机械产品转向软件和服务[125]。与国际伙伴合作获取尖端技术和技能，有助于中国获取这种潜在收益。

[125] *Leveraging industrial software stack advancement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ow to capture impact at scale with IIoT platforms in th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space*, 麦肯锡数字咨询业务, 2018 年 9 月。

如果中国能够进一步融入全球机器人价值链，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大有裨益。这首先是因为这些企业将获得（或更深入地获得）全世界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2012-2017 年间，全球工业机器人 52% 的需求增量来自中国市场。此外，中国惊人的市场规模也为机器人产业提供了独特的实验和创新环境。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庞大规模，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都是自动化程度必然提高的原因，由此也将创造出一个成熟的实验环境。亚洲等地区的新兴市场迈向自动化之际，也将受益于中国的技术创新。中国本土企业已经在中国广阔的市场中放手尝试。阿里巴巴和京东等受众巨大的电商平台都已纷纷成立实验室，以开发和测试物流及智能仓储领域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工资水平较高的发达经济体通常会选择价格高昂的全自动工业化解决方案，而新兴经济体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对协作机器人的需求可能会越来越高，这一类机器人需要与人类进行互动，可以提供更高的灵活性。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协作机器人市场，仅 2016-2017 年的销量就增长了一倍有余。

半导体：虽然中国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技术价值链，但新的机遇已经来临

早在 20 年前，中国政府就将半导体列为了战略性产业[126]。该产业随即获得了巨额投资（第一个要素），中国也逐渐发展成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第三个要素），这些都有赖于个人电脑、智能手机、智能电视、电动汽车、机器人等下游领域的巨大需求。中国政府在 2010 年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列为七大支柱产业之一。2014 年，中国为战略性集成电路产业融资 220 亿美元，2018 年又宣布设立另一只规模约 470 亿美元的投资基金[127]。中国目前的半导体消费占全球总额的比例高达 45%。

中国 2018 年的集成电路进口额超过

3130 亿美元

原油进口额为

2390 亿美元

尽管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但中国本土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仍旧不温不火。2018 年，中国的集成电路进口额高达 3130 亿美元，甚至高于 2390 亿美元的原油进口额[128]。不过，虽然中国在全球集成设备制造和装备市场中无甚地位；但在无晶圆制造和晶圆代工领域却取得了一定进展：2013-2017 年间，无晶圆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从 11% 增长到 15%，晶圆代工的市场份额则从 2013 年的 9% 略降至 8%。在余下的所有半导体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份额都落后于发达经济体（见图 28）。中国政府已宣布实施多项旨在扩大国内半导体供应的计划，其目标是提升国内芯片产值，到 2030 年突破 3050 亿美元（2016 年为 650 亿美元），并服务于80%的国内市场（2016 年为 33%）[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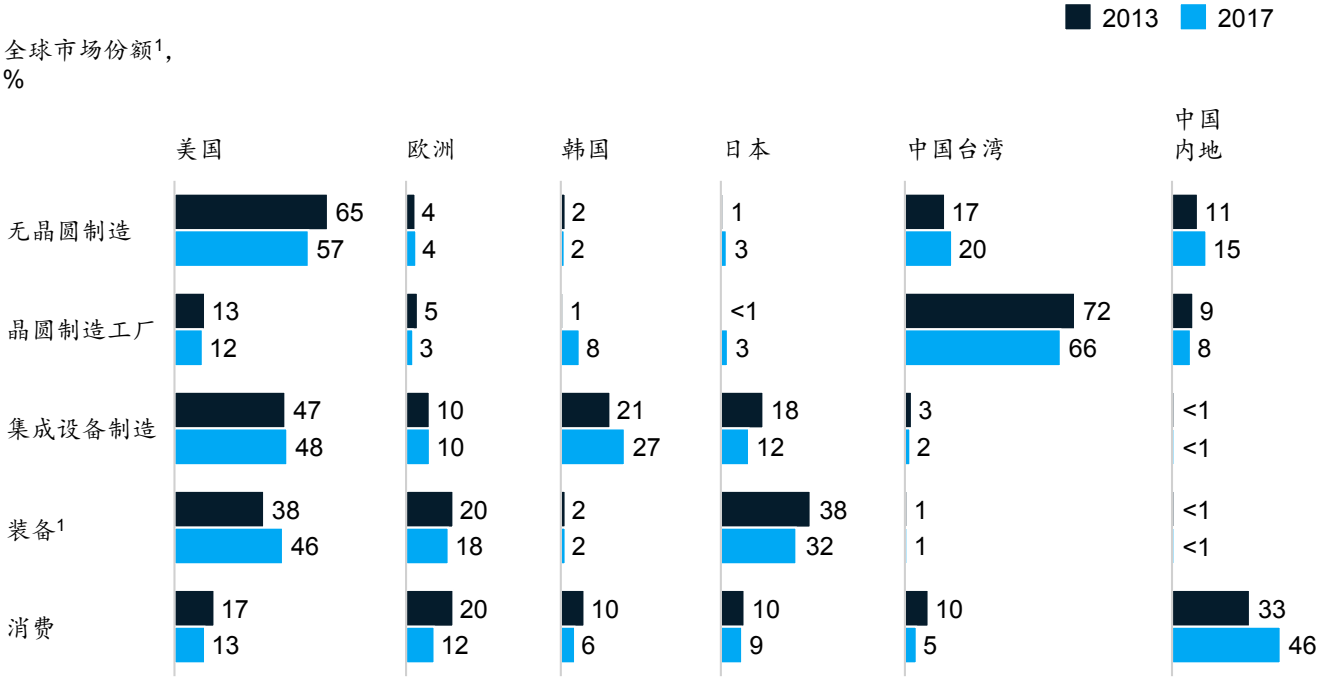
不过，这种相对缓慢的产业发展原本也在预料之中。因为该领域技术壁垒极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实现半导体价值链本土化，形成国内市场的自给自足。不妨与液晶面板产业做一个对比：液晶面板的制造工序约为 11 个，而半导体在 6~8 周的生产周期内却有多达 1200 个工序[130]。此外，随着制造技术不断进步，生产流程的复杂度以及由此而来的投资需求都呈指数级增长，进一步推升了落后国家追赶的难度和成本。以晶圆代工为例，生产一个 20 纳米芯片需要约 500 个步骤，但若是 7 纳米芯片，则需要 1500 个步骤。同样，以 32 纳米技术生产 1000 片晶圆，需要花费 5 亿美元，但若使用 7 纳米技术，则需要花费 20 亿美元[131]。

[126] Alexander Chipman Koty, *Chips all in: Investing in China's semiconductor*, China Briefing, 2016 年 3 月 2 日。
[127] Yoko Kubota, China plans $47 billion fund to boost it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华尔街日报》, 2018 年 5 月 6 日。
[128]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国际贸易中心。
[129] Marcelo Duhalde 和 Yujing Liu, «Made in China 2025»: How Beijing is boosting it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南华早报》, 2018 年 9 月 25 日。
[130] *LCD production process & our equipment*, Nakan, nakan-techno.co.jp/en/technology/product_equipment.html；Michaela D. Platzer 和 John F. Sargent Jr., *U.S.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Industry trends, global competition, federal policy,* 国会研究服务处, 2016 年 6 月 27 日。
[131] SemiWiki；IC Knowledge。

图28

中国内地在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中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少

2017年各地区半导体市场比较（总部所在地）



[1] 半导体晶圆制造设备。

注释：由于四舍五入，或者因为其他地区的消费并未包含在内，数字总和可能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IHS Markit；Gartner；IC Insights；麦肯锡半导体实践；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即便如此，中国仍然在一些落后技术领域奠定了一定市场地位。其本土芯片工厂在65纳米半导体领域占据全球市场19%的份额，在45纳米半导体领域占据了12%的份额。这些技术在终端消费电子产品市场中均有一定应用空间。

除了技术壁垒之外，也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此前为半导体产业的本土化付出的努力是相对低效的。虽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有时却错误地分配给了技术前景不佳的企业。据一份报告估计，中国新上马的晶圆项目约有50%将以失败告终[132]。由于半导体行业很大一部分投资来自省级基金，往往形成资本过剩的局面，引发对半导体人才的争夺，而这些人才在中国很稀缺。据估计，中国的半导体人才缺口超过40万人[133]。最后，中国采用的是低集中度投资模式，基金分散于不同的省份和企业当中，所以往往收效欠佳。麦肯锡研究显示，半导体研发一旦分散，效率将损失10%以上[134]。

[132] Mark Lapedus, *China: Fab boom or bust?*, Semiconductor Engineering, 2017年3月16日。

[133] Chris Richard、Karthik Ramachandran和Ivan Pandoy, *Looming talent gap challenge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Semi, 2019年。

[134] Christopher Thomas, *A new world under construction: China and semiconductors*, 麦肯锡公司, 2015年11月。

中国继续发展的机会在于：从低端起步，逐渐向高端挺进。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可加速这一进程，尤其有利于更好地获取知识和技术（第二个要素）。关键在于如何最新技术，但这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困难。中国企业希望通过并购交易获取国外半导体技术，但往往无法如愿；而国外领先的半导体企业为了防止知识产权泄露，往往不愿把最顶尖的研发中心和制造业务迁往中国。中国的芯片和设备出口也因为涉及国家安全而受到密切审查。

中国融入全球半导体价值链的另一个途径是开展技术创新。随着硅基半导体芯片逐渐逼近"摩尔定律"预测的理论极限，业界需要为下一代半导体开发新的解决方案。目前，全球半导体企业正在测试石墨烯和氮化镓等新材料，希望找到替代硅的可行材料[135]。业界也在开发 3D 集成电路，以解决 2D 芯片连接效率不高的问题[136]。光电子也被视作一种低能耗的数据传输方案，可以用于机器学习等领域[137]。这些都是全球合作的潜在机遇，而创造新一代技术解决方案需要深化全球整合和人才流动。

遵循全球化标准可以促进资本和知识流入中国。据高德纳咨询 (Gartner) 统计，2019-2022 年间，中国有望投入 630 亿美元建设晶圆产能（约占全球总投资额的 24%）。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政府宣布的晶圆产能新增投资中，可能有近一半来自中国内地之外的企业（见图 29）。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助于鼓励国外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更多顶尖生产设施和研发中心，而不只是在中国生产落后的产品（参见附文 6：中国的知识产权和数字主权现状）。而且向外国企业开放这一领域，将推动知识的流入以及相关技术人才的流动，这些都会让中国本土企业受益匪浅。

[135] Gauray Batra、Nick Santhanam 和 Kushan Surana，*Graphene: The next S-curve for semiconductors?*，麦肯锡公司，2018 年 4 月；以及 Angela Chen，*Gallium nitride is the silicon of the future,* The Verge，2018 年 11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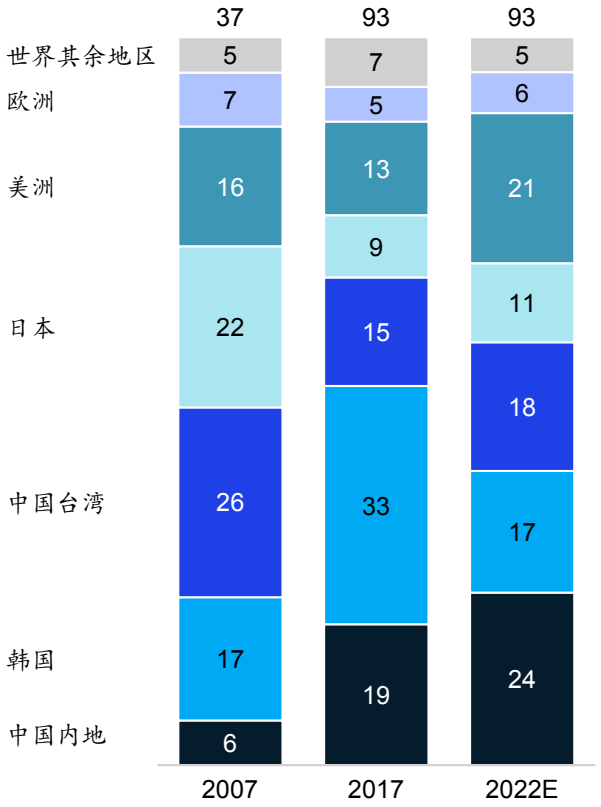
[136] Tia Ghose，*3D computer chips could be 1,000 times faster than existing ones*，Live Science，2015 年 9 月 20 日。

[137] Brian Bailey，*Get ready for integrated silicon photonics, Semiconductor Engineering*，2018 年 4 月 1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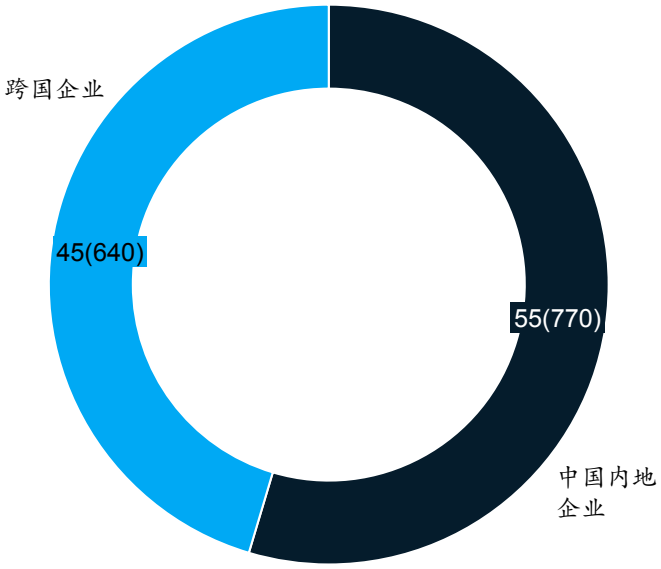
图29

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晶圆制造新增产能的主要来源国，但其中近一半产能将来自国外跨国企业

全球各地区的晶圆制造资本支出份额，%；十亿美元[1]



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中国新建的半导体工厂产能，2018-2020，%（千片晶圆/月）[1]



[1] 包括晶圆制造工厂和集成半导体制造工厂。

资料来源：Gartner；新闻检索；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附文 6.

中国的知识产权和数字主权现状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令一些外国企业心有顾虑，不仅是紧张情绪，甚至导致了实质性的障碍，使中国难以获取那些无法由本土企业开发和生产的技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经过为期 7 个月的调查后认为，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现状导致美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38]。据美国商业软件联盟（BSA）估计，2018 年，中国的个人电脑上安装的软件有 66% 未获授权，其对应的商业价值高达 68 亿美元。相比之下，全球平均比例为 37%[139]。

过去 10 年间，中国一直致力于提高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2017 年，中国法院受理知识产权保护案件多达 213480 件，较 2016 年增加 40.4%，是 2013 年的两倍[140]。2017 年，中国提升了专利侵权的赔偿金额，而为了落实这项官方举措，中国知识产权法院也在裁决中加大了赔偿金额。2015-2016 年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处的专利侵权赔偿额平均增长 3 倍有余。中国也一直在消除对外企的偏见，例如 2017 年末在全国 12 个政府部门中展开了为期 4 个月的宣传活动，旨在保护外企的知识产权[141]。2018 年 12 月，中国宣布针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施加 38 项不同的惩罚措施[142]。2018 年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以负责相关上诉案件，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用[143]。中国计划到 2020 年将知识产权法院系统覆盖全国[144]。这些举措并没有被国际社会所忽视。在美国商会的年度商业环境调查中，超过 96% 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监管水平在 2012-2017 年间保持稳定或有所改善[145]。

数字主权是争端的另一个焦点，根据 2017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在中国产生和收集的商业、经济、科技和个人数据必须保存在国内的服务器上，未经许可不得出口。在华开展业务的外国投资者可能会被要求提供源代码、加密算法等关键信息，以接受中国政府的审查，这意味着可能面临数据丢失、被竞争对手获取或被政府利用的风险[146]。

就知识产权和数字保护问题加强理解与协调，不仅对中国有益，也将惠及全球其他国家。鉴于中国企业已经在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知识产权，长远看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

[138]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总统行政办公室，2018 年 3 月 22 日。

[139] *Software management: Security imperative, business opportunity,* 《商业软件联盟全球软件调查》，商业软件联盟，2018 年 6 月。

[140] 《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将于近期挂牌》，新华社，2018 年 12 月 29 日。

[141] William Weightman, China's progres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yes, really), 《外交官》，2018 年 1 月 20 日；以及 Renjun Bian; *Many things you know about paten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in China are wrong,* 2017 年 11 月 11 日。

[142] *China announces punishments for intellectual-property theft*, 彭博社，2018 年 12 月 4 日。

[143] Peter Leung 和 John Butcher, *China to open national IP appeals court amid U.S. trade spat*, 彭博法律，2018 年 11 月 6 日。

[144] *Updates on China's specialized IP courts and tribunals,* AFD China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Office, 2019 年 1 月 27 日。

[145] 《2018 中国营商环境调查》，2018 年 1 月。

[146] Daniel Wagner, China's cybersecurity law is biased and open to abuse, but it may not stop others copying it, 《南华早报》，2018 年 6 月 25 日。

结构改革将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而鼓励私营企业积极参与也有助于创造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第四个要素）。我们注意到，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中国大型科技企业正在开发自己的人工智能芯片[147]。

大中华地区的整合也将让世界各国受益匪浅。中国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随着人口城镇化的推进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这一市场今后或将加速增长。其中，下游半导体应用领域的机会尤为显著，因为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为创新提供了理想的试验场。举例而言，中国目前占全球电子商务市场的 40% 以上；仅在这一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前景就非常可观。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中国生产的机器人满足了全球 36% 的机器人需求，这也为数字化创造了巨大机会。

• • •

中国不但是数字技术的全球参与者，也是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应用大国。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全球市场，中国企业在不同细分市场中占据的份额存在较大差异。向技术价值链上游挺进需要具备四大要素，中国在其中两个要素中占据优势，在另外两个要素中却存在劣势。究竟应该追求本土化，还是积极融入全球技术链？中国需要做出抉择，而相关企业也会为满足中国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关注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根基——消费市场。

[147] Coco Liu, Alibaba to produce its first self-developed AI chip next year,《日经亚洲评论》, 2018 年 9 月 19 日；以及 Yimian Wu, *Tencent leads $50m pre-A round in Chinese AI chipmaker Suiyuan Technology*, China Money Network, 2018 年 8 月 7 日。

百一店
東方商厦
南京路步行街

4 中国的消费市场为全球经济提供了进一步的发展机遇

中国的消费市场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经济纽带。自从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外企便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寻找新的增长机会。现在，中国的消费者期待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选择，但仅靠本土供应商或许无法满足，这就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彼此融合创造了更多机会。虽然中国的消费企业在本土市场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却很有限。正如第 1 章所述，2018 年入选“全球品牌 100 强榜单”的中国企业只有华为一家。虽然跨境电商在中国日渐流行，进口消费额越来越高，但进口商品在中国消费总额中的占比仍然低于其他国家。目前中国的服务业仍然限制外资参与；若能放松这些限制，便可以促进竞争，提升消费品的品质和选择范围。最后，由于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和出境游客人数不断增长，中国人的境外消费也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

在本章中，我们将首先审视中国消费市场强劲的发展势头，以及国外跨国企业在华竞争的基本态势。随后将着重剖析可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发展机会的两大趋势，这两大趋势将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消费价值链，同时为国内外企业带来巨大商机。

中国消费市场拥有可观的增长势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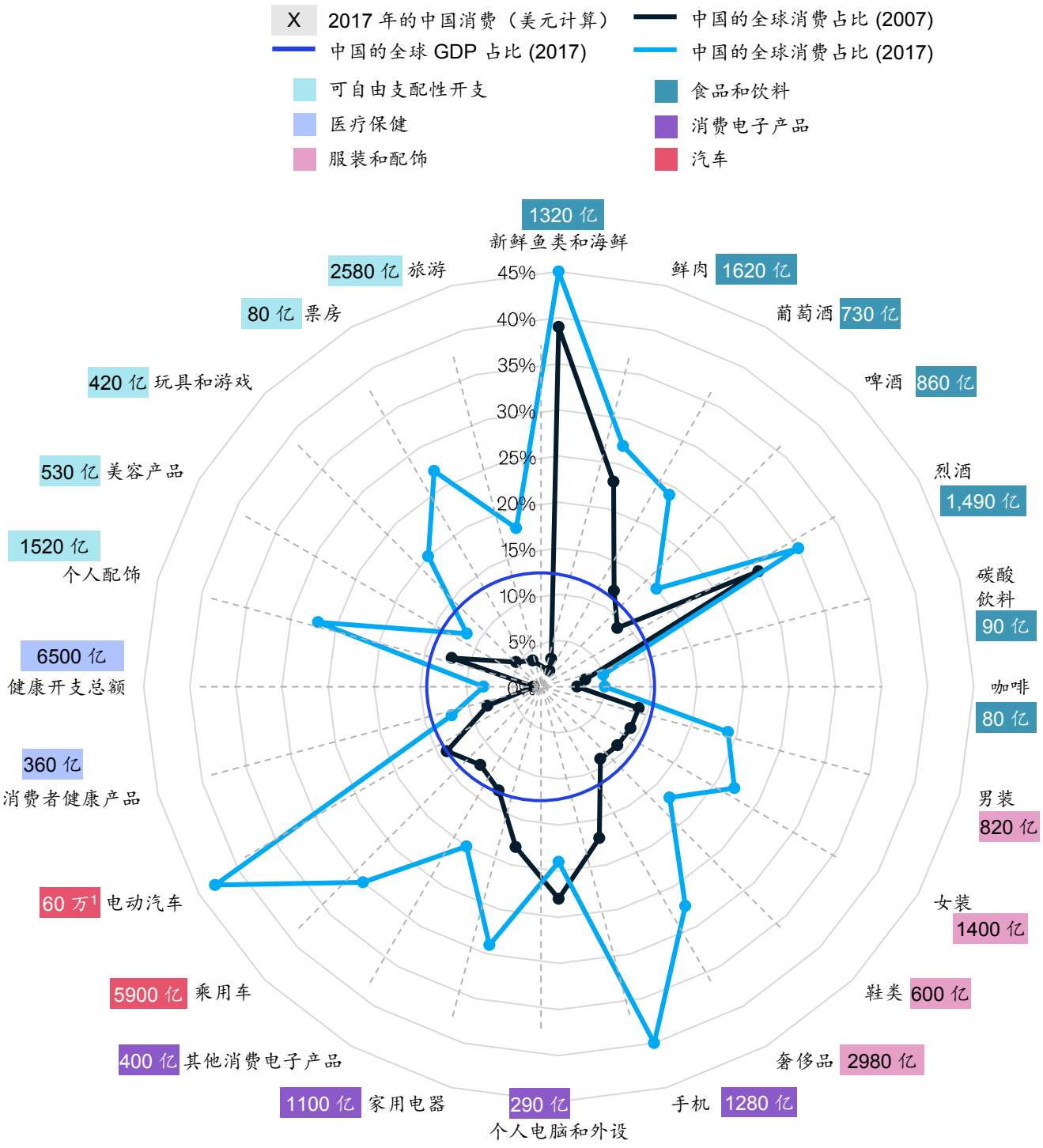
2017 年，中国消费者为全球贡献了逾 40% 的电动汽车销量、30% 的汽车销量、45% 的鱼类和海鲜销量、37% 的新鲜肉类销量、24% 的葡萄酒销量和 22% 的女装销量。我们研究了 24 个消费品类，其全球消费总额高达 10 万亿美元，在所有品类中，中国占据的全球市场份额平均为 18%（见图 30）。中国为各品类消费增长做出的贡献更为惊人。2010-2017 年间，全球汽车销量增长的 50% 来自中国。2017 年以来，中国消费者贡献了全球电影票房增长的 90% 以上；2017 年，中国消费者贡献了全球电影票房的 27%。对于消费承压的经济体而言，中国游客的涌入帮助其提升了整体消费；例如，中国游客在泰国的消费相当于该国个人消费总额的 9%。这些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的居民收入自 2010 年以来保持了 11% 的年增速[148]。

[148] 中国国家统计局。

图30

过去 10 年间，中国在全球消费总额中的占比大幅增长

中国消费占全球市场消费总额之比，
消费品行业，
%



[1] 此处表示辆数，而非金额。

资料来源：欧睿国际；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到2030年，中国有望跻身“大众富裕”或以上阶层的家庭比例为

58%

韩国目前的比例为

55%

很多国家的企业都依赖中国市场出售商品。以美国为例，MSCI 美国指数的 IT 板块中的企业对中国的营收依存度为 15%，材料板块为 7%，工业板块为 6%。据估计，2017 年，美国企业通过对华出口和在华子公司的业务，共计从中国获得了 4500~5000 亿美元营收[149]。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此前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有一半的消费增长来自于三个消费群体，它们具有重塑全球消费市场的潜力——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到 2030 年，全球每 1 美元城市消费中将有 12 美分来自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0]。

有观察人士指出，由于中国负债较高，老龄化迅速，而且年轻一代的购买力也因城市生活成本不断上涨而受到挫伤，因此很多人对中国的消费增长前景持保守态度。诚然，上述因素可能阻碍中国的消费增长，但我们也发现，由于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上一代人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积累了巨额财富，加之代际财富转移规模非常可观，因此中国消费市场未来将依然保持强劲增长。

中国消费者变得越来越富裕

中国消费受到家庭收入增长和财富积累的促进。2010-2018 年间，中国跻身“大众富裕”或以上阶层的家庭（指家庭可支配收入达到或超过每月 1.8 万元人民币）占比从3% 增长到了 12%，增幅达 3 倍[151]。到 2030 年，中国“大众富裕”或以上阶层的家庭比例或将达到 58%，将超过韩国目前的 55%（见图 31）。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镇消费者的支出概况正在与全球其他国家趋同。中国城镇居民用于可支配性支出的收入也在增加。食品支出在中国家庭总消费中的占比从 2000 年的 50% 下降到了 2017 年的 25%，已经与发达国家如今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相差无几——日本为 26%，韩国为 29%，美国为 17%（见图 32）。将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概况与亚洲各发达国家相比较后可发现，中国消费者在服装（7%）和家居用品（6%）上的支出比例较高，在个人用品的支出则较低（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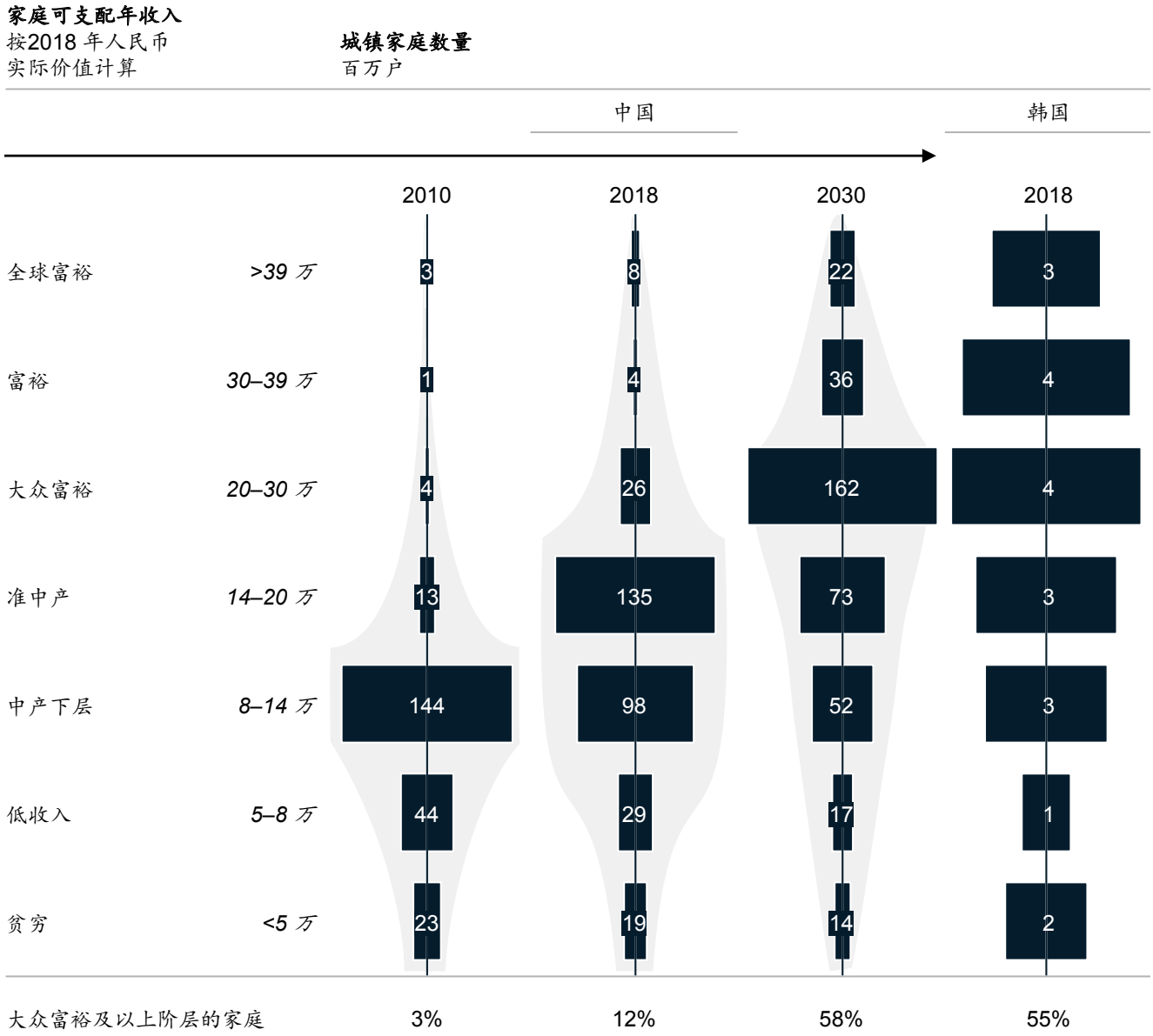
经济转移和财富积累有助于维持代际消费稳定

虽然中国的老年抚养比（每 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的老年人数量）在过去 50 年间相对稳定，但出生率的下降（部分原因在于“独生子女政策”，该政策现已取消）却导致这一比率上升。根据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数据，2015-2050 年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将可能从 14 增长至 48。到 2020 年该比率可能将与韩国目前的水平相当，到 2027 年与美国目前的水平相当，到 2030 年达到德国目前的水平，到 2047 年达到日本目前的水平。到 2050 年，约 1/4 的中国人将会达到或超过 65 岁。

[149] America Inc and the rage against Beijing，《经济学人》，2018 年 6 月 28 日。
[150] *Urban world: The global consumers to watch*（《城市世界：全球消费者观察》），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6 年 4 月。
[151] 可支配收入指扣除税费后的个人收入总额。

图31

居民收入的提升有助于家庭进入大众富裕或更高阶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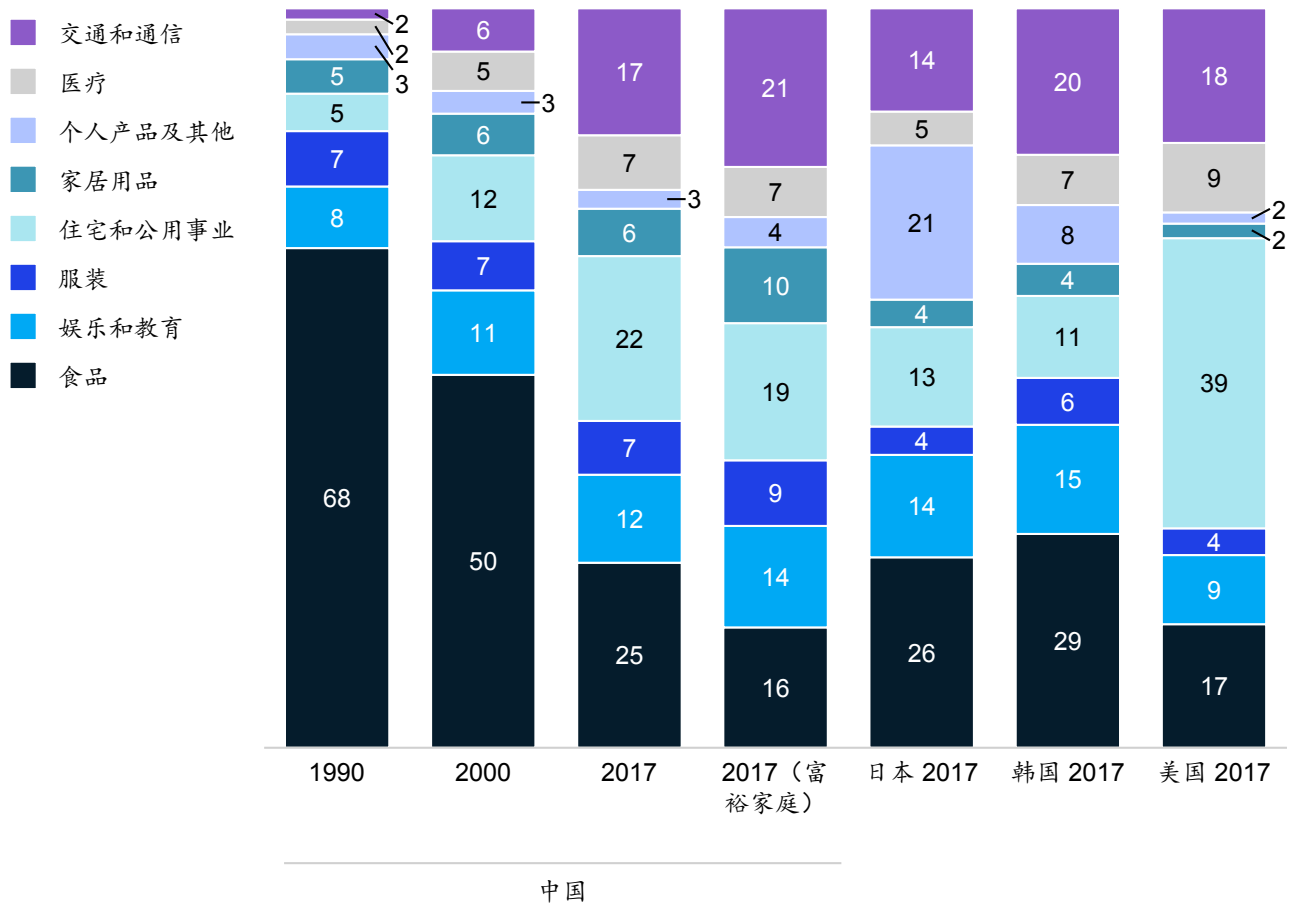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智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图32

中国城镇消费者可自由支配的开支比例有所增加，正在逐渐向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水平看齐

每个城镇家庭在各类商品上的年度消费，
开支占比，%



注释：由于四舍五入，数字总和可能不等于 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解读中国宏观模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可能会削弱消费增长的潜力[152]。但我们发现这种担忧未免有些不切实际。我们细致分析了中国家庭的经济状况之后发现，人口老龄化也许不会严重危及中国强劲的消费增长势头。针对多项调查开展的三角分析（包括麦肯锡中国消费者调查、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调查、汇丰银行的《砖瓦之上：住房的意义》调查和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以及专家采访都描绘出一幅不同的图景[153]。

[152] Paula Campbell Roberts 和 Ken Mehlman, *What does population aging mean for growth and investments?*, KKR, 2018 年 2 月 13 日。
[153] 麦肯锡的双年调查覆盖 9165 名受访者，该调查把城市划分为不同级别。中国养老金融论坛发布的年度调查覆盖了超过 4.5 万个城镇和农村家庭。汇丰银行的《砖瓦之上：住房的意义》调查覆盖 9 个国家，主要关注大城市。西南财经大学的报告覆盖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地区，每两年更新一次。

首先，中国的老年人（60 岁或以上人群）有可能积累了不少财富，这有助于支持其退休生活。2017 年中国养老金融论坛开展了一项调查研究，采访了 4.6 万名城镇和农村居民，发现超过 80% 的老年人拥有至少 10 万元人民币的退休储蓄，超过 50% 拥有至少 30 万元。在调查中还发现，有 83% 的老年人拥有一处房产（但我们发现，报告中并未明确说明这些房产的平均价值）。

其次，中国家庭内部的代际财富转移有助于维持消费增长的势头。北京大学进行过一项覆盖城镇和农村社区的纵向调查，其结果显示，中年人口（40~60 岁人群）在中国所有年龄段中收入最高[154]。但他们面临双重财务压力：既要养老尽孝，又要抚育子女。“麦肯锡2018 年中国消费者调查”采访了9000 余名城镇和农村居民，调查显示，在 40~60 岁受访者中，有 60%~80% 希望降低赡养父母及子女的开支。尽管“上有老，下有小”带来了额外的财务压力，但中年人口的财务实力仍然相对较强。根据中国养老金融论坛的调查报告，中国有 70%~80% 的中年人口拥有房产，25%~30% 的房产不止一处。同样，房产创造的财富多寡以及具体价值的高低取决于房产的品质和位置。这份报告并未量化这些人所拥有的房产价值。

20~30 岁的年轻人也许会获得家庭的财务支持，因此消费更加自由（并且经常入不敷出）。“麦肯锡中国消费者调查”显示，该年龄段 40%~50%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从不担心收入问题，因为父母可以轻松支付他们的开支；约有 40% 的受访者表示买房时曾经获得父母的帮助。

财富积累和收入转移的双重影响可能会消除代际购买力的差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开展过一项研究，模拟了收入和财富转移对一个生活在中国某大都市的家庭可能造成的影响（见图 33）。第一代家庭成员目前已超过 70 岁，生活在二、三线城市（各年龄段人口规模总计约为 5 亿人），居住于自有住房（系私人购买或由国家提供）。两人都拥有养老金，并在工作期间攒下了可观的积蓄。第二代成员已移居一线城市（例如北京或上海，人口规模均超过 1000 万人），购买了自用住房，并且已经大幅增值。这一代的两个成年人的工作收入也许会使之跻身富裕阶层，但他们近 1/3 的收入需要用于养老（父母）和育儿（通常是一个子女）。第三代成员是刚刚开始在一、二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其收入足够应付日常生活，但储蓄很少。但这些人会获得父母的资助，在他们结婚购买首套住房时，父母会帮助其支付首付。第三代成员有望从前两代处继承价值不菲的房产。我们的分析显示，由于第三代可能从父母那里继承高价值的房产，所以财富向下转移的趋势将持续下去，而且总额十分可观。在较为富裕的家庭中，为年老一代提供的财富（向上转移）往往较少，因为他们能够自行支付大部分生活成本。

调查显示，中国20~30岁的年轻人中，

4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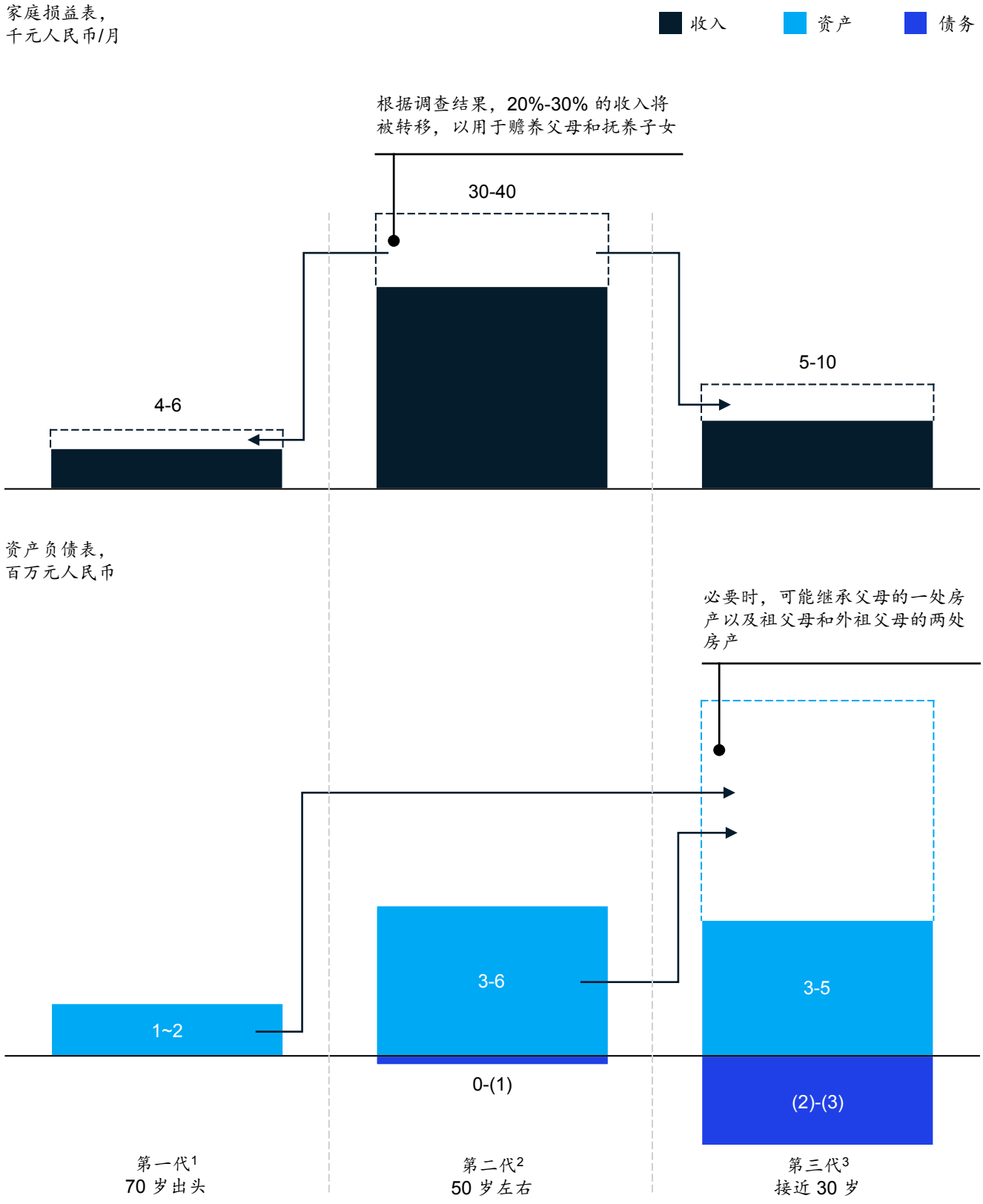
的受访者表示从不担心收入问题，因为可以从父母处得到帮助

[154] 《CHARLS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pku.edu.cn/en。

图33

财富的代际转移和房产继承消除了中国人购买力演变中的差异

模拟：一二线城市城镇家庭说明性示例



[1] 已退休，生活在二三线城市的自有住房内；房贷已还清；每月养老金收入为 4000-5000 元人民币。
[2] 拥有一线城市房产；90% 的房贷已还清；每月税后收入为 3-4 万元人民币。
[3] 希望在一线城市购买一套婚房。

资料来源：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15；CEIC；北京市统计局；麦肯锡中国消费者调查 2017；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结果是根据当今中国家庭的假想画像而得出的，而人口统计指标一旦变更，得到的数据可能大不相同，这些指标包括：年龄、收入层次、所处地域、是否拥有社保。有证据显示，由于出生率低于预期，中国社会老龄化的速度或将高于预期。中国的人口规模可能从2030 年起逐渐萎缩[155]。中国政府也承认养老金和社会福利成本的上涨可能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项研究阐述了老龄人口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例如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社会福利成本上涨、侵蚀国民储蓄和资本积累、减缓科技进步[156]。该研究估计，中国的老龄化人口可能导致中国 GDP 增速从 2011-2015 年的 8.8% 逐步降至 2046-2050 年的 2%。

跨国企业在中国消费市场面临竞争格局的变化

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快速增长，并已高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我们分析了十大消费领域的 30 种顶尖品牌，发现在华外企 2017 年的平均市场渗透率为 40%，在美国市场，外企的平均市场渗透率为 26%。其中某些品类的渗透率甚至更高；例如在美妆和个人护理领域中跨国企业的渗透率高达 73%（见图 34）。近年来，中国的消费品行业对外资企业相对更为开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签署的入世协议规定，中国需要逐步消除外资企业的市场壁垒，而中国也从 2004 年开始允许外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零售业务[157]。

外企的出现为中国消费市场带来了竞争，由此刺激了本土企业的发展，它们目前已经开始在某些行业中抢占跨国企业的份额。其中一个著名案例就是本土品牌在国际顶尖智能手机企业的夹击下迅速升级。另外，在华外企也带来了人才。领英的一项研究显示，2014-2018 年间，从外企“跳槽”进入中国企业的商业领袖比例达到 31%，而同期从中国企业加入外企的商业领袖占比只有 10%[158]。最后，在华外企也带来了卓越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有助于本土企业提升能力[159]。

[155] China’s demographic danger grows as births fall far below forecast,《华尔街日报》，2019 年 2 月 9 日，wsj.com/articles/chinas-demographic-danger-grows-as-births-fall-far-below-forecast-11549717201。

[156] Dong Keyong, *Population aging and its influences o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中欧社会保障改革合作项目，2016 年 8 月。

[157] Understanding China’s retail market,《中国商业评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0 年 5 月 1 日。

[158] Zara Ingilizian , *How local companies are winning over China’s consumers,* 世界经济论坛，2018 年 1 月 25 日。

[159] Karel Eloot、Alan Huang 和 Martin Lehnich, A new era for manufacturing in China, *McKinsey Quarterly*, 2013 年 6 月。

图34

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渗透率高于在美国市场的渗透率

按品类和市场划分，外资跨国企业在全球前30大商品品类中占据的市场份额（2017年）

%

注释：由于四舍五入，数字总和可能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欧睿国际；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随着国内企业的产品不断升级，它们与国外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态势也在逐渐改变。“2017 年麦肯锡中国消费者调查”显示，对多数品类而言，消费者对品牌来源的重视度有所下降。无论是本土品牌还是进口品牌，物有所值才是好选择。事实上，在调查所涉的 17 个品类中，有 8 个品类的受访者都表达了对本土品牌的明显偏好，这些品类在中国商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超过一半[160]。

跨国企业也正在积极应对来自中国本土企业的挑战。在我们研究的 30 个消费品类中，外国品牌在其中 14 个品类中的市场份额有所上升，在 5 个品类中保持份额稳定，在另外 11 个品类的份额中有所减少（见图 35）。

2017年国外跨国企业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约为

~10%

2008年为

90%

— **跨国企业份额上升的品类。**在拥有差异化优势的品类以及消费者认为“洋牌子”品质更佳的品类中，外国企业最有优势，例如运动服装和婴儿食品。外国品牌在这些品类中被视为优质产品；自 2008 年以来，在华外企在这些品类中的市场份额上升了 20 个百分点。在运动服装这一品类中，外国品牌 2017 年的市场份额为 52%，2008 年则降为 31%。据估算，耐克和阿迪达斯在中国运动服装市场占据的份额均超过 20%。在婴儿食品这一品类中，2008-2017 年间，在华外企占据的高端市场份额增长了 27%，中端市场份额增长 17%，低端市场份额也增长了 17%。中国前十大婴儿食品品牌中有 8 个是外国品牌。

— 跨国企业份额减少的品类。在大众商品或差异化逐渐消失的品类中，在华外企的市场份额则大幅降低。以智能手机行业为例，随着中国企业在技术上渐渐赶超，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 2008-2017 年间，国外跨国企业在中高低端市场的份额均有所减少；整体市场份额也从 90% 下滑到约 10%。中国目前最大的 4 家智能手机厂商均为本土品牌。同样，在那些消费者认为国内外商品质量差异不大的品类中，国外跨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同样被中国品牌所蚕食，以洗洁精为例，该品类市场排名前两位的厂商都是中国本土品牌，合计占据 50% 以上的市场份额。

— 跨国企业份额保持稳定的品类。在这些品类中，在华外企能够维持高端定位，但本土品牌也已开始升级。即便是在这些品类中，跨国企业也在逐渐丧失低端市场的份额。以美妆和个人护理行业为例，在华外企已经丧失了 5% 的低端市场，但得益于消费升级的趋势（以及外企产品始终保持的高端定位），它们在整个品类中的份额得以保持稳定。而中国本土企业多年来一直深耕大众美妆领域，市场份额合计也占到了 26%。同样，在乘用车市场，国外跨国企业损失了 8% 的中端市场和 17% 的低端市场，但在高端领域的份额得以保持。中国低端乘用车市场排名前 5 的品牌都是本土车企，市场份额合计超过 50%。

[160] Wouter Baan、Lan Luan、Felix Poh 和 Daniel Zipser, *Double-clicking on the Chinese consumer: The new health craze, the rise of the post-90s generation, and other trends worth watching*, 麦肯锡公司，2017 年 11 月。

图35

跨国企业在中国消费领域的业绩参差不齐

	品类	市场规模，2017年，十亿美元	国外跨国企业市场份额，2017年，%	国外跨国企业份额变化，2008-2017百分点
外国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有所上升	运动服装	31	52	21
	婴儿食品	25	84	18
	个人护理	2	40	12
	鞋类	57	23	12
	箱包	28	23	7
	衣物洗护	10	29	6
	传统玩具和游戏	11	11	5
	快餐	50	18	4
	家居用品	15	12	3
	服装	288	7	3
	眼镜	9	11	3
	家具	95	5	2
	啤酒	71	12	2
	珠宝	98	2	1
外国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保持不变	个人奢侈品	22	73	0
	烈酒	200	<1	0
	美妆和个人护理	13	55	0
	家用消费电子产品	30	21	0
	儿童健康用品	3	37	0
外国品牌在中国市场份额有所降低	洗碗机	2	17	-2
	计算机和外设	26	39	-2
	非处方药	13	13	-2
	大家电	51	8	-2
	小家电	62	10	-3
	手表	10	47	-4
	碳酸饮料	17	7	-5
	乘用车	528	62	-13
	视频游戏	30	15	-13
	宠物食品	2	40	-17
	智能手机	94	13	-81

资料来源：欧睿国际；IHS Markit；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中国的移动游戏市场规模为

379亿美元

美国为

304亿美元

这些趋势都表明中国本土消费企业正在发展壮大。在华外企推升了中国本土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迫使后者通过创新和升级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某些行业中，本土企业不但占据了国内市场的更多份额，而且开始对外出口。以智能手机行业为例，苹果和三星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市场的领先品牌，在高端市场占有一定份额。但过去 10 年里，本土竞争对手逐渐崭露头角。2008-2017 年间，华为、Oppo、Vivo、小米等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的份额增长了 81 个百分点，一些中国智能手机厂商现已走出国门。据 IDC 统计，传音是非洲部分地区最畅销的智能手机品牌，小米是印度最畅销的智能手机品牌。华为和 Oppo 在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地均跻身当地前三大品牌。中国迅速发展的数字技术也孕育了强大的本土智能手机软件品牌。2014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微信在马来西亚的渗透率达到 38%，在印度达到 22%，在阿联酋和南非达到 14%[161]。抖音在美国拥有 4000 万活跃用户[162]。海外市场的成功得益于中国数字巨头慷慨的战略投资。根据 CB Insights 的数据，2013-2017 年间，阿里巴巴的海外投资从 5.2 亿美元飞速增长到60 亿美元以上；而腾讯的海外投资也在同一时期从 2.6 亿美元飙升到了 60 亿美元以上。

此外，中国企业也已成为移动游戏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行业规模高达 379 亿美元，超过美国的 304 亿美元[163]。全球移动游戏市场曾经由外企占据强势地位，但近年来中国品牌正逐渐受到青睐。《终结者2：审判日》和《王者荣耀》等国产游戏不仅在本土市场中抢占了外国老牌巨头的大量市场份额（其市场份额在2008-2017 年间上涨 17 个百分点），并且开始向海外输出[164]。中国大型游戏工作室也在通过投资 Riot Games 等国外企业来提升其全球影响力[165]。

中国消费市场的两大趋势表明中国与世界经济有望进一步融合

鉴于中国消费市场增长强劲，而且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甚密，因此中国消费市场的变化趋势将对国内外企业产生重大影响。下文将着重分析能够促进中国与世界之间消费价值链融合的两大趋势。

1.中国消费者渴望更多选择，倾向于消费升级，并且更青睐外国品牌

首先，中国消费者期待更多选择，对商品及服务品质的期望也有所提升。麦肯锡在中国展开的常规调查始终表明中国消费者渴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中国游客的海外消费概况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但中国企业却未必总能满足这些要求。麦肯锡 2015 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收集了 1 万名消费者的调查问卷，超过 5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在化妆品、酒类、口腔护理等快消品类升级购买高端商品。约有 60% 的受访者表示购买食品和饮料时，品牌是否著名、是不是有机产品，都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166]。

[161] Jason Mander, WeChat rises to become the fastest growing messaging app in the last year, Global Web Index, 2014 年 5 月 16 日; 和 Thomas Graziani, *WeChat outside China: What are the growth opportunities?, Walk the Chat*, 2015 年 5 月 10 日。

[162] Mansoor Iqbal, *TikTok revenue and usage statistics (2019), Business of Apps,* 2019 年 2 月 27 日。

[163] Tom Wijman, *Mobile revenues account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global games market as it reaches $137.9 billion in 2018, News Zoo*, 2018 年 4 月 30 日。

[164] Allen Peng, *China's most popular mobile game charges into American market*, All Tech Considered, 2018 年 1 月 2 日。

[165] Allegra Frank, *Riot Games now owned entirely by Tencent,* Polygon, 2015 年 12 月 15 日。

[166] *China's choice: Capturing the $5 trillion productivity opportunity*（《中国的选择：抓住5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机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6 年 6 月。

2008-2017年间，国外跨国企业在广义的婴儿食品市场中占据的份额增长了

20%

一些媒体提到中国消费者正在经历“消费降级”，但其依据并不十分可靠，例如方便面和榨菜的销量增加、共享单车的热度超过出租车、折扣电商平台拼多多快速崛起等[167]。但这些降级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是渠道创新的结果，这些渠道瞄准的是那些尚未获得充分服务的消费者群体，他们对价格更敏感，品牌意识也较为薄弱。除此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权衡取舍”的结果。麦肯锡 2018 年全球消费者信心调查显示，在全球 GDP 排名前 10 的经济体中，中国与另外 9 个经济体相比，倾向于消费升级的消费者占比更高。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重要变化。2016 年的同一项调查显示，在几乎所有品类当中，消费降级的比例都可以忽略。2018 年，某些品类的消费降级比例上升到 9% 左右。虽然仍然低于其他大型经济体，但这反映出中国消费者的权衡取舍——在一些感觉价值不高的品类中消费降级，把钱花在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品类中（见图 36）。

国外跨国企业在很多消费品类中的市场份额都超过了 50%，例如乘用车和婴儿食品。居民收入的上涨意味着很多中国人有钱购买一般被认为比较“高端”的外国品牌。除了这种令人向往的消费模式外，对本土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缺乏信心，也成为促使中国消费者购买外国商品的原因。消费者对某些品类的商品质量心存忧虑，婴幼儿食品便是其中一类。2008 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受害者约有 30 万（其中有 6 名婴儿死亡），导致中国父母特别关注婴幼儿食品的质量[168]。这起恶性事件的影响极为深远。2008-2017 年间，国外跨国企业在广义的婴儿食品市场中所占份额增长了 20 个百分点。“麦肯锡 2017 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显示，青睐外国婴儿奶粉品牌的受访者比例在所有品类中占比最高，达到了 27%[169]。在食品以及其他消费品安全性的方面，中国的进步空间依然很大。一家专业质检企业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有 48% 的食品加工工厂未能达到国际安全标准。最近还曝出一家国内生物科技企业曾在 2018 年给儿童接种了 20 多万支问题疫苗。中国的中药营养补充剂厂商也曾曝出类似丑闻[170]。

由于中国消费者渴望购买某些国外商品，加之国内外商品存在巨大价差，所以催生了一些非正规购物渠道，导致国内消费流失、消费者得不到妥当的保护。而价差导致的高昂利润也促使一些灰色市场和商业模式飞速增长，也就是代购：消费者从国外购买商品（以化妆品为主，但也包括配饰、高端商品、奢侈品以及奶粉等大众商品），然后转卖到国内，通常会结成一个组织有序的代购体系。根据一项分析，代购贸易直接促使韩国 2017 年的免税销售额增长超过 20%，尽管那一年中国赴韩旅游的人数减少了近 50%[171]。有人估计，仅奢侈品代购的市场规模就高达 3000 亿元人民币[172]。

[167] Li Yuan, China's consumption downgrade; Skip avocados, cocktails, and kids, 《纽约时报》, 2018 年 8 月 22 日; Nathaniel Taplin, Are China's consumers in trouble?, 《华尔街日报》, 2018 年 9 月 24 日。

[168] Wang Qingyun 和 Shan Juan, Millions paid to milk scandal victims, 《中国日报》, 2012 年 5 月 17 日。

[169] Wouter Baan、Lan Luan、Felix Poh 和 Daniel Zipser, *Double-clicking on the Chinese consumer: The new health craze, the rise of the post-90s generation, and other trends worth watching*, 麦肯锡公司, 2017 年 11 月。

[170] Phoebe Zhang, Chinese health product firm Quanjian scandal widens as public anger grows, 《南华早报》, 2019 年 1 月 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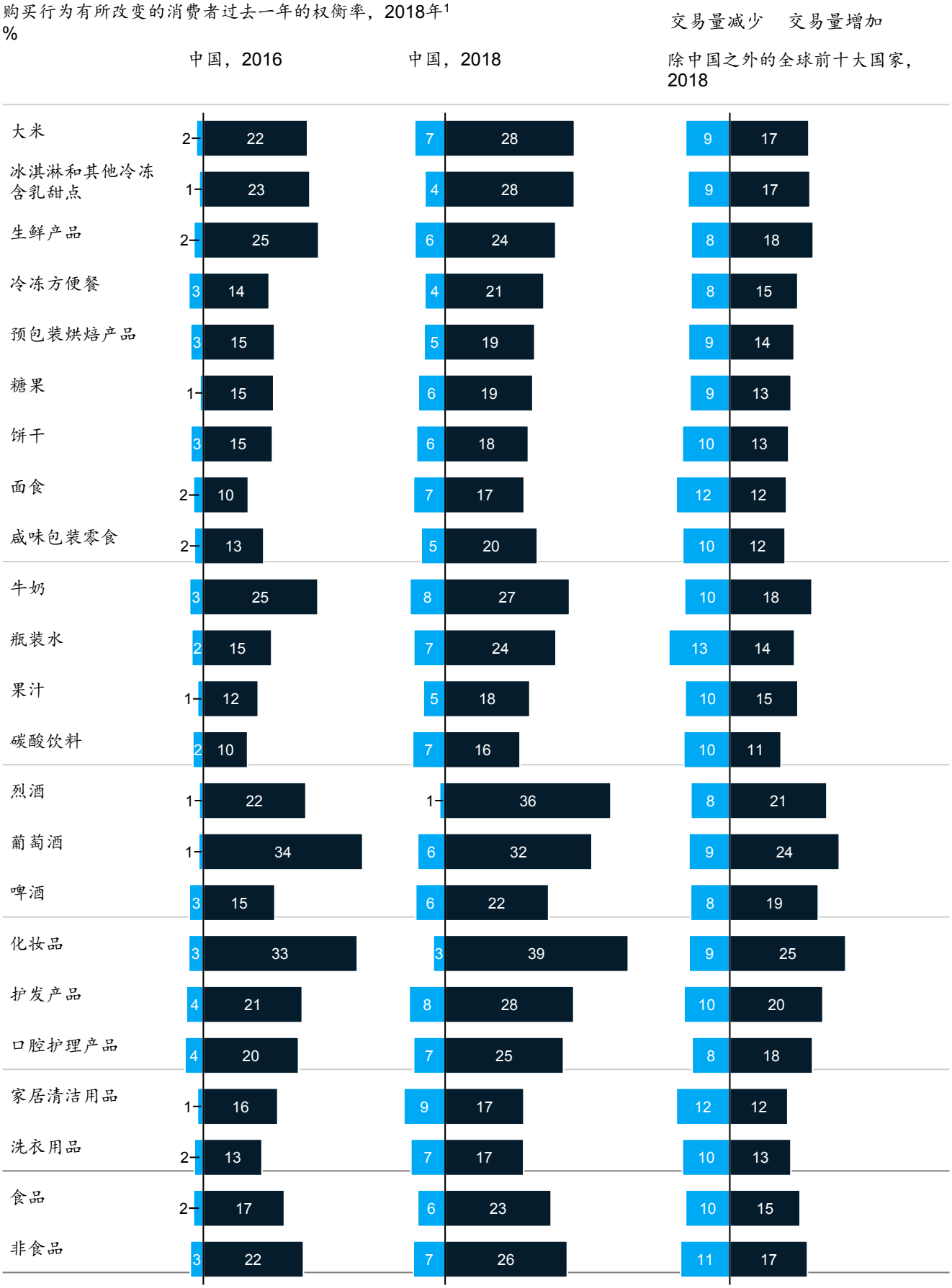
[171] Martin Moodie, *Daigou dampener: Chinese authorities crack down on travel retail's 'shuttle traders'*, Moodie Davitt Report, 2018 年 10 月 8 日。

[172] Jiaqi Luo, *China's 300-billion daigou business: What's next after the government crackdown*, *Luxury Society*, 2018 年 10 月 31 日。

图36

中国消费者在某些消费领域中变得更加成熟，逐渐开始权衡取舍

购买行为有所改变的消费者过去一年的权衡率，2018年[1]
%



资料来源：麦肯锡消费者信心调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另一个亟待加强竞争、升级质量的领域是服务业。就像对某些商品品质不满意一样，中国消费者有时也对国内的服务品质感到不满。在某些服务领域中，高收入人士往往会选择外国企业提供的服务。外企在中国参与服务业仍然受到限制，但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正在逐步通过一些项目来开放服务业。中国与全球服务业价值链仍有进一步融合的空间（详细讨论请参见第 5 章）。下文将着重分析两个在中国快速增长的服务行业：医疗和教育。

医疗

中国人比以往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麦肯锡 2017 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显示，65% 的受访者希望获得更健康的生活方式[173]。但中国的医疗系统存在资源短缺的问题。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中国每 1 万人中只有 19 名医生和 25 名护士（在美国则为 27 名医生和 129 名护士）。

2017年中国的药物审批人员达

800人

2015年只有

70人

此外，医疗服务的品质也有所欠缺，为此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改革国内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以医药领域为例，中国已经改革了药物审批流程，以缩短在世界其他地区通过审批的药物进入中国后的审批时间。2015-2017年，中国药物审批人员总人数从70 人提升到了 800 人，危重症药物可以获得优先审批，临床试验流程调整所需的审批时间也有所缩短[174]。改革后，贫血和肠癌的治疗方案在中国上市的时间比美国和欧洲还早[175]。目前中国也已批准了国内首个丙肝治疗方案[176]。

中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外国提供商在引入医院管理技能、创新治疗方案和临床治疗方式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因此正在积极向外资开放医疗服务。目前中国已经允许外资在 7 个省中设立独资医院和机构（进入其他省份的外资企业只能与国内企业签订合资协议，并且其持股比例最高不可超过 70%）。2017 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希望通过多种优惠待遇鼓励社会力量（外资及内资企业）参与中国医疗服务行业[177]。但对外资企业的限制依然存在，例如其资本承诺不得低于 2000 万元人民币。另外在运营方面也有一些掣肘因素，可能会妨碍国外跨国企业参与中国市场。举例而言，国内存在多种医疗支付标准，可能令外企感到困惑。外籍医师执业许可的有效期只有一年。针对外资医院制定的标准有些模棱两可，同样会拖慢其进入中国市场的进程。外资医院具体应当遵循何种标准和规定，目前尚不明确[178]。为了享受公共医保报销资格，外资医院提供特定服务之时也须遵守价格管控规定[179]。

[173] Wouter Baan、Lan Luan、Felix Poh 和 Daniel Zipser, *Double-clicking on the Chinese consumer: The new health craze, the rise of the post-90s generation, and other trends worth watching*, 麦肯锡公司, 2017 年 11 月。

[174] Alistair Davidson、Kirsten Messmer 和 Bill Wang, China regulatory reform: An update on review timelines and drug lag, *Regulatory Focus*, 2018 年 5 月。

[175] *China first to approve AstraZeneca, FibroGen anaemia drug*, 路透社, 2018 年 12 月 18 日。

[176] Checking up on China's healthcare system, 中国投资大会, 瑞士信贷, 2018 年 10 月 23 日。

[177] Quian Zhou 编纂, *China's healthcare reforms underscore market growth*, China Briefing, 2018 年 2 月 19 日。

[178] Elizabeth Leclaire, *China allows wholly foreign-owned hospitals: A year on*, China Briefing, 2015 年 7 月 10 日。

[179] Sabirina Luk, The politics of drug price control policy in China: Regulation, deregulation, and re-regul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2015 年。

教育

中国的教育服务主要由公立学校提供，而公立教育以应试教育为主，更重视机械记忆而非批判性思维。随着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格局，这种教育方法逐渐难以适应当前现状。因此体制外的教育模式逐渐涌现，并且获得了长足发展。中国私立小学的招生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从 2013 年的 6.0% 增长到了 2016 年的 7.3%，到 2020 年有望增至 8.9%。私立中学的招生人数占比从 2013 年的 9.8% 增长到了 2016 年的 11.2%，到 2020 年有望增至 13.8%[180]。

尽管体制外教育模式在中国有明显的需求，但供给却相对有限，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学校类型和招生要求做出了严格规定。国际学校很难获得运营资质，就连中国学校的国际部也是如此；申请过程需要数年之久。更重要的是，国际学校或中国学校的国际部仅招收外籍学生，导致外籍与中国籍学生彼此隔离的现状。

中国有机会让外资进一步进入本土教育市场，并改变公立、私立和国际学校的招生要求。全球范围内，不仅只有中国在积极追求教育全球化；新加坡、越南等许多亚洲国家也都宣布了改革措施，希望加大外资在教育行业的参与力度，包括鼓励外商在高等教育领域展开投资和协作。

如果可以制订一套允许外籍和中国籍学生共同就学的制度，将有助于中国打造有全球竞争力的教育体系。2017 年中国有 60.84 万学生赴海外留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服务贸易的逆差，若能吸引更多外国学生来华留学，便可自然缩小这种差距。中国有机会像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一样成为全球重要的教育出口国。举例而言，2017 年澳大利亚对华教育出口额高达 100 亿澳元，自 2013 年以来每年平均增长 21%[181]。过去 10 年间，前往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不断增长；来华留学的外国留学生也在增加，只是规模整体较小。目前中国每年接收的海外留学生已达到 48.9 万人。如果中国能够改善教育基础设施，鼓励设施共享，并设置更多满足中外学生需求的课程，中国便可成为那些在西方教育体系之外寻求替代方案的学生所渴望的留学目的地。

短短10年间，中国游客境外消费在全球旅游开支总额中的占比便从

6%

增长到了

22%

2.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增加境外消费

中国的人员流动规模逐年上升（尤其是游客），让目的地国家的零售商获得了巨大商机。中国如今是全球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地（见图 37）。2017 年，中国人出境游人数为 1.4 亿人次，境外消费额高达 2650 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人出境游的消费总额为 1680 亿美元。短短 10 年间，中国游客境外消费在全球旅游开支中的占比就从 6% 增长到了 22%，预计到 2028 年将达到 30% 左右，等于欧洲游客的境外总消费，略低于北美游客的总消费，以及亚洲其他地区游客的境外总消费。

[180] Russell Flannery, Why the private education market in China will outperform in the next decade,《福布斯》，2018 年 3 月 2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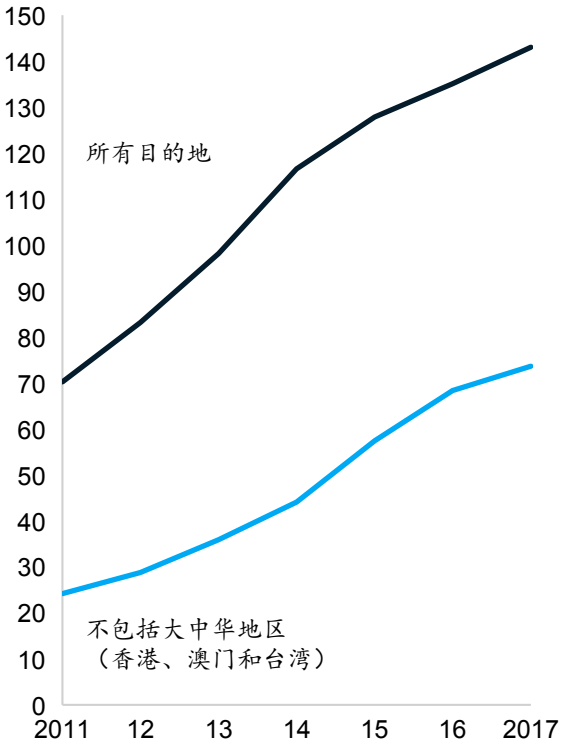
[181] 澳大利亚统计局。

以往，中国人的出行目的地主要集中于大中华地区（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但在2011-2017 年间，前往大中华地区之外的出行人数占中国游客出境游总数的比例已从34% 增长到51%。随着中国游客越来越富裕，其旅行目的地越来越远，选择日益高端，消费水平也日益上涨。

图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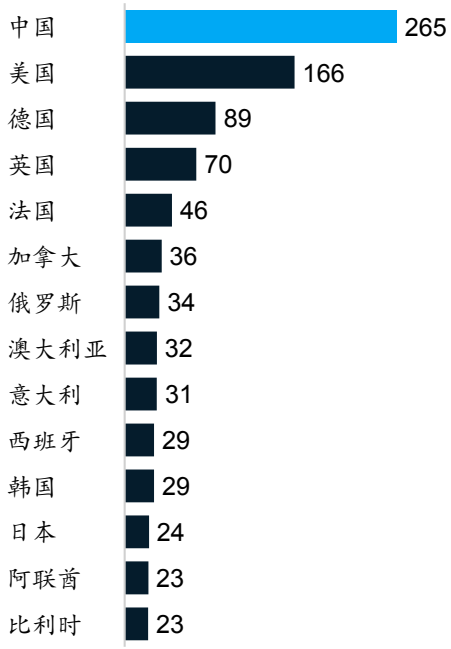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游客来源地 – 旅游目的地大多为大中华区域 – 但越来越多的游客正前往其他目的地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
百万人次



大中华地区之外的占比，%	34	37	45	51

按游客来源统计的出境游总消费，2017年，
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旅游业理事会；香港统计处；台湾交通部观光局；澳门旅游数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这其中自然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中国游客的出行目的地在地理位置上高度集中，目前有 84% 的出境游消费发生在亚太地区（包括上文所述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中国游客的消费估计相当于泰国个人消费总额的 9%、新加坡的 7%、韩国的 2%、日本的 1%（见图 38）。相比之下，中国游客在亚太地区之外的消费较少，仅为 2017 年中国游客出境游总消费的 15% 左右（但这一比例仍高于 2012 年的 12%）。为了满足中国游客前往更多目的地旅游的需求，相关行业的服务能力也在提升。举例而言，截至 2019 年初，中国有 4 家航空公司提交了增设意大利航线的申请。一旦获批，便可将中国每周飞往意大利的航班数量增加 24 个班次[182]。这一类旅游目的地获得的中国人旅游消费有望迎来大幅增长。

这些目的地国家也在积极适应中国游客的偏好。亚太各国的企业已经在满足他们的需求，例如采用中国的数字支付体系。截至 2018 年，共有 5 万家韩国店铺接受了支付宝付款，人均花费约为 8330 元人民币[183]。新加坡约有 75% 的出租车接受支付宝付款[184]。日本的银座六号、东京中城等高端商场为中国游客提供外币免税兑换服务，并设立了中文招牌、手册和通告[185]。2018 年 8 月，泰国为中国游客开启了特别入境通道，泰国旅游局也在考虑为中国游客提供两次免费入境签证[186]。一项调查发现，在塞尔维亚放松对中国游客的签证限制后（这是东欧首个采取该措施的国家），申请前往该国的中国游客人数在 2018 年上半年增长了 350%[187]。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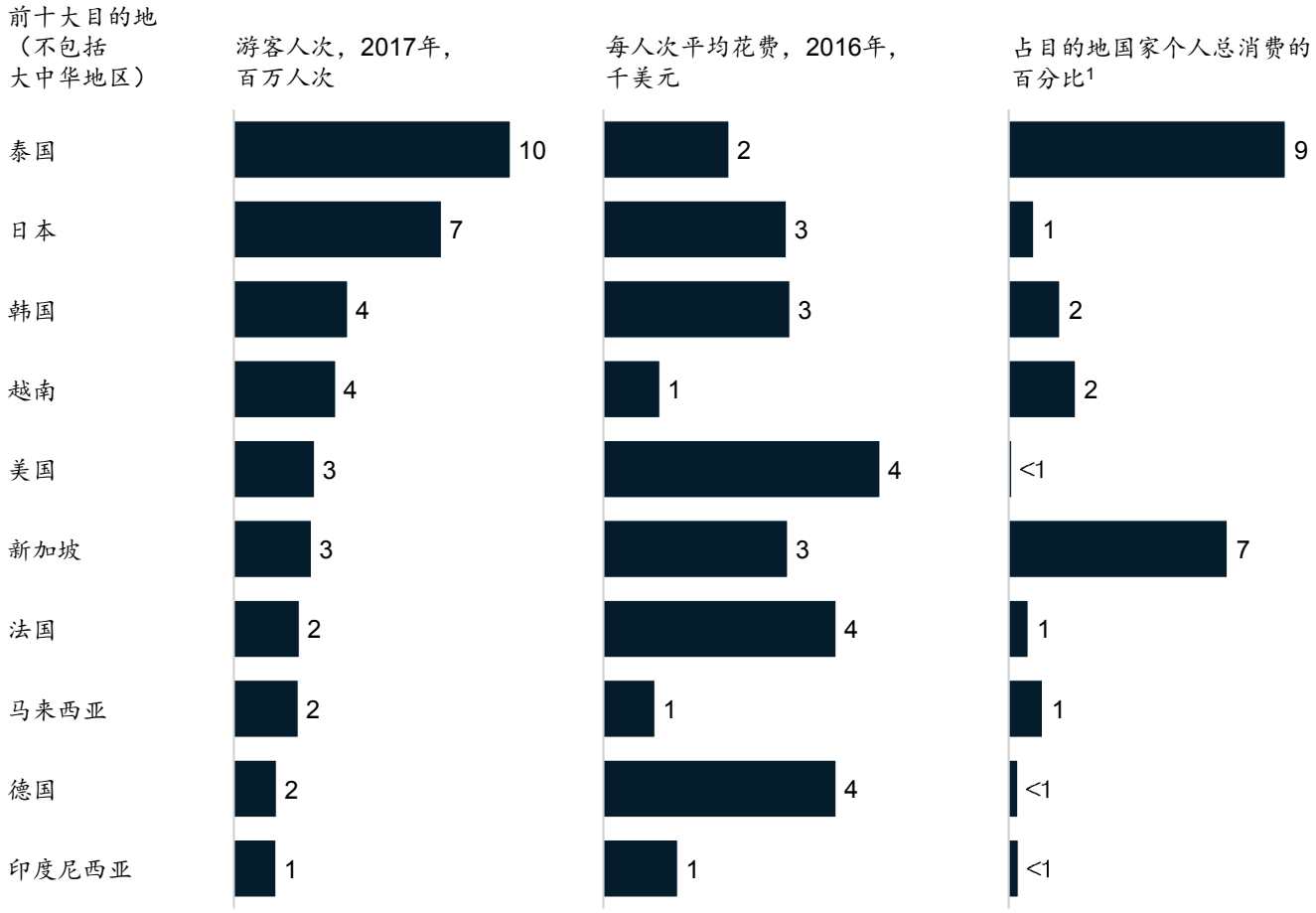
的中国游客出境游消费发生在亚太地区

中国的出境游服务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改善。中国人的出境游几乎全部由国内企业安排，并且游客更青睐跟团游。麦肯锡研究发现，前往东南亚和欧洲的所有行程中有接近 50% 是包价旅游，前往北美的行程中有 20% 要依靠目的地当地的旅游服务机构[188]。但这些行程往往只注于购物，而不注重更广泛的旅游体验，例如游览文化和历史景点，这让中国消费者越来越觉得不满足。麦肯锡在 2018 年又进行了这项研究，重点关注中国游客受到的误解，包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出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购物，但他们实际上更偏爱体验式旅游；另一个误解是中国游客只喜欢中式美食，但他们其实对各类美食都很感兴趣。随着定制化旅游的需求不断增长，提供定制化出游套餐的中国初创企业也获得了飞速发展[189]。

[182] 欧高敦，*Chinese airlines are vastly expanding their flights to Europe this year*，领英，2019 年 2 月 7 日。
[183] Korea among top spending destinations for Alipay，《韩国新闻导报》，2018 年 9 月 3 日。
[184] *Alipay to be made available in Seoul taxis via kakaopay,* Finextra，2018 年 10 月 23 日。
[185] Andreas Neuenkirchen，*Lower Chinese retail spending necessitates creativity for Tokyo's Hibiya Midtown*，Jing Travel，2018 年 4 月 5 日。
[186] *Thailand tries to lure Chinese tourists with dedicated immigration lanes*，Travel Wire News，2018 年 8 月 10 日。
[187] Zigor Aldama，Ctrip is not only bringing the world to Chinese tourists，the online travel agent is changing the industry too，《南华早报》，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及 *How China's largest online travel agency connects the world: An interview with Ctrip CEO Jane Sun*，麦肯锡公司视频，2019 年 2 月。
[188] *Chinese tourists: Dispelling the myths,* 麦肯锡公司，2018 年 9 月。
[189] Coco Liu，Customised travel: The next big thing for Chinese tourists?，《南华早报》，2017 年 1 月 21 日。

图38

中国游客的海外消费额逐年渐增，将对前几大出游目的地的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1] 衡量中国游客消费（不可直接计入 GDP）相对规模的指示性数字。

资料来源：欧睿国际；尼尔森；越南国家旅游局；印度尼西亚统计局；马来西亚旅游局；IHS Markit;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许多中国旅行社都是互联网企业。2018 年 7 月，一艘满载中国游客的游船在普吉岛海域翻船，此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便开始对旅游市场展开调查，希望起草新的立法大纲，以明确提高安全标准，并广泛改善旅游业的服务质量[190]。那次事故发生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还发出通知，要求地方政府彻查在线旅游平台，并下架未达标准的旅游产品[191]。有证据表明，中国消费者对国内旅行社的服务质量感到不满[192]。放松外国旅行社的在华运营限制也许有助于改善中国旅游业的服务质量。2016 年，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宣布了一项试点计划，允许中外合资企业提供出境游服务（不包括赴台旅游）[193]。同一年，日本国际旅行社与上海当地企业组建了一家合资公司，作为其促进中国游客赴日旅游整体计划的一部分[194]。2018 年，英国旅行社 Thomas Cook 在海南与复星旅游文化集团组建了一家合资公司。中国或许即将批准外商全资旅行社在华运营[195]。

积极提升服务品质，将有助于吸引更多海外游客来华旅游，并拓宽其旅游目的地的范围。目前，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目的地主要集中于特定区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仅广东省和上海市吸纳的外国游客就占了中国入境游总人数的 23%（不包括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游客），而排名前 7 的省级旅游目的地的占比更超过了一半。中国可以通过包价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和补贴等方式鼓励外国游客前往他们不太常去的地方，从而刺激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

• • •

中国消费市场发展势头迅猛，虽然目前与全球价值链相对融合，但仍有更多潜力有待释放。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审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而引发的经济联系减弱的情况，以及中国如何通过关键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来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并估算这两种情况可能影响的经济价值。

[190] Xu Wei, *China will eliminate substandard tour products*, Yicai Global, 2018 年 7 月 9 日。
[191] *China prepares unprecedented online tourism regulation*, 彭博新闻, 2018 年 9 月 28 日。
[192] Sarah Zheng, Chinese tourists ripped off by country's oldest travel agency, undercover report claims, 《南华早报》, 2018 年 6 月 18 日; 和 Julie Makinen, Strong-arm tour guides force Chinese tourists to shop, 《悉尼先驱晨报》, 2015 年 10 月 24 日。
[193] *Joint-venture agencies with foreign capital to conduct outbound tours*, China Travel News, 2016 年 5 月 26 日。
[194] *Japan travel agencies targeting Chinese tourists on their turf,* 《日经亚洲评论》,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95] Melissa Cyrill, *China's outbound tourism market: New opening proposed for foreign investors*, China Briefing, 2018 年 11 月 15 日。

5 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将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变动

中国与世界之间经济流动的扩大带来了诸多裨益。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跨境流动的经济效益每年高达4500亿美元，该研究也指出：与全球高度融合的经济体收获的经济效益比融合度较弱的经济体高出多达40%[196]。

1978 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其核心举措就是积极拥抱市场机制，并对外国投资开放市场。外国企业的在华业务版图随即显著扩张。2000-2017 年间，在华外资企业的数量从20.3 万家增加至 54 万家；到2017年底，这些企业雇用的员工总数已达 1400万，远高于早年间的区区 300 万。这些企业为中国贡献了43% 的出口额。若没有欧美地区的半导体和飞机、日本和韩国的电池和光学设备、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智利的铜矿、澳大利亚的铁矿和煤矿，中国便无法维持其“世界工厂”的地位。

如今，世界各国的消费者都在使用中国制造的商品。若没有中国供应的稀土和光伏面板，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便无法正常运营，无论是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还是智能手机制造。对华出口压低了全球消费品的价格。据一项研究估算，对华出口已经让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下降了约 27%[197]。中国不但为国外跨国企业提供了一个成本效益出色的制造业市场，也提供了一个快速扩张的消费市场。

中国与世界似乎正在重新审视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

虽然全球流动规模的扩张带来了经济效益，但世界各国围绕全球化成本及收益展开的争论也日益激烈，保护主义渐有抬头之势。就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而言，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有人开始担忧“中国冲击”（China Shock）将导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损失制造业岗位[198]。一项研究估计，1999-2011 年间，美国至少有 200 万个制造业岗位遭到取代，这正是自华进口剧增的一段时期[199]。有学者指出，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因素[200]。有迹象显示，某些国家正在重新审视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角色。美国国防部 2018 年的一份报告着重强调，来自中国工业政策的挑战与日俱增，已对美国知识产权和经济安全造成了具体威胁[201]。同样，欧盟委员会也强调中国是“经济领域内的竞争对手”。[202]

[196] *Global flows in a digital age: How trade, finance, people, and data connect the world economy*（《数字时代的全球流动：贸易、金融、人员和数据如何连接全球经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4 年 4 月。
[197] Lawrence J. Lau、Junjie Tang, *The impact of U.S. imports from China on U.S. consumer prices and expenditures*, IGEF 工作论文第 66 号，2018 年 4 月 30 日。
[198] David H. Autor、David Dorn和Gordon H. Hanson,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经济学年报》，2016 年，第 8 期。
[199] Daron Acemoglu 等, 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劳动经济学期刊》，2016 年，第 34 期，第 1 册。
[200] Daron Acemoglu 和 Pascual Restrepo,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2018 年 7 月 16 日。
[201] *Assess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nufacturing an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履行第 13806 号行政令-联合事务特遣队对特朗普总统报告，2018 年 9 月。
[202] *EU-China – A strategic outlook,* 欧盟委员会和 HR/VAP 对欧洲理事会报告，2019 年 3 月 12 日。

导致中国与国际合作伙伴出现紧张关系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中国的工业政策提倡发展本土产能，支持国内企业增长。政府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工业发展蓝图便是典型的例子。从全球来看，这种产业政策绝非个例。很多国家一直在积极推动本土的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增长，包括但并不限于半导体行业。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在发展之初的一大营收来源就是政府的国防和航空合同[203]。日本则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将半导体列为战略重点行业加以扶持，政府鼓励电子产品企业在本土采购，政府与企业联合投资开展大规模研发，并为企业提供投资[204]。同样，作为当今全球内存和芯片制造的领头羊，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是靠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跻身于全球领先行列。很多国家的政府（包括巴西、中国、墨西哥和南非）都为本土汽车行业的发展提供过支持，例如允许国外跨国企业在境内设立生产基地，或者利用贸易壁垒扶持和保护本地企业[205]。

然而，有一些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和欧盟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却对《中国制造2025》表示出了担忧[206]。一份报告表示，美国应该视《中国制造 2025》为美国工业新政的模板："《中国制造 2025》实质上是一份未来5年工业竞争的路线图，美国制定应对举措之时，不妨将其作为参照。"[207]

鉴于中国经济体量庞大，在多个领域内领先全球，有关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如何、是否应继续以发展中经济体自居并享受相关利益的争论越来越多（参见附文 7：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地位）。

[203] Daniel Holbrook, Government support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Diverse approaches and information flows,《商业与经济史杂志》, 1995 年冬季刊，第 24 期，第 2 册。

[204] Katsuro Sakoh, Japanese economic success: Industrial policy or free market?, *Cato Journal*, 1984 年秋季刊，第 4期，第 2 册。

[205] 有关工业政策实例的综合讨论参见：*How to compete and grow: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0 年 3 月。

[206]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2017 年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政府正在实施一项综合性的长期工业战略，以确保中国在全球拥有优势地位……其终极目标是以本土企业替代外国企业，成为关键技术与产品的设计方和生产方，首先占据境内市场，继而向境外市场扩张。"参见《2017 年度报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7 年 11 月 15 日。中国欧盟商会于 2017 年发布了一份批判《中国制造 2025》计划的报告，称欧洲企业正面临严重压力，必须交出先进技术，才能换取近期的市场准入资格。参见：*China manufacturing 2025: Putting industrial policy ahead of market forces*，中国欧盟商会，2017 年 3 月。

[207] *Made in China 2025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industry*，促进劳动力市场强大和国家发展项目部（Project for Strong Labor Market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美国参议院小企业和创业委员会（U.S. Senate 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2019 年 2 月。

附文 7

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地位

中国加入 WTO 后一直以发展中经济体自居（该组织允许成员国自选定位）。这意味着中国拥有某些优势，例如有更多时间去通过 WTO 的协议和履行承诺[208]。凭借这一定位，中国加入多边监管协议的压力也要比发达经济体小一些。举例而言，中国不受诸如《政府采购协议》或《服务贸易协议》等合约的约束，而很多发达经济体（以及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却别无选择[209]。有观察人士表示，中国一直以来享受了更多优待，却并未遵守 WTO 的承诺，例如公布《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列明的所有补贴内容[210]。

有些西方国家质疑中国是否有权继续享受 WTO 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关福利，以及这种地位是否会对全球贸易构成风险[211]。从某些方面来看，中国的确更像一个发达经济体，而非发展中经济体。举例而言，中国的 GDP 规模全球第二。中国的百万富翁多达 350 万人，同样位居全球第二[212]。中国其中 7 个省的人口合计达到3.5亿，人均 GDP 超过 1.2 万 美元——已经达到世界银行规定的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中国已成为全球技术的领导者；2018 年的研发开支总额达 2930 亿美元，消费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系统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此外也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领导者。

而且，中国在社会层面上也实现了巨大发展。居民预期寿命达到 76.25 岁（美国目前是 78.69 岁）。成年人识字率高达 96%[213]。但从其他指标来看，中国似乎也有理由维持其发展中经济体的定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人均 GDP 仅为 9000 美元左右，远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44000 美元。若按人均 GDP 计算，中国在全球 192 个经济体中只能排在第 72 位[214]。

208 《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贸易与发展委员会，世界贸易组织，wto.org/english/tratop_e/devel_e/dev_special_differential_provisions_e.htm#legal_provisions。

209 《政府采购协议》，世界贸易组织，wto.org/english/tratop_e/gproc_e/gp_gpa_e.htm；《服务贸易协定》参与方名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gov/tisa/participant-list。

210 *10 commitments China made when it joined the WTO and has not respected*，欧洲企业联盟，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537b2fbe4b0e49a1e30c01c/t/568f7bc51c1210296715af19/1452243910341/The+10+WTO+Committments+of+China.pdf。

211 Simon Lester 和 Huan Zhu，*The WTO still considers China a 'developing nation.' Here's the big problem with that,* CNBC，2018年4月25日；*An undifferentiated WTO: Self-declared development status risks institutional irrelevance*，美国常驻 WTO 代表团，世界贸易组织，2019 年 1 月 15 日。

212 Benjamin Stupples，*China is set to keep minting new millionaires faster than U.S.*，彭博社，2018 年 10 月 18 日。

213 《1982-2015 年中国成年人识字率统计》，Statista，statista.com/statistics/271336/literacy-in-china/。

214 IMF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外国投资在中国正受到密切审查，尤其是涉及技术转让项目的投资，其中一个常用的理由就是国家安全。2018年，美国出台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将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管辖权延伸至涉及关键技术、关键行业和美国人敏感个人数据的非控股性外国投资。中美企业间拟开展的某些并购项目便因为关键技术转让的敏感性而被叫停。举例而言，2018年2月，美国监管机构阻止了一家中国基金出价5.8亿美元收购一家美国半导体测试设备制造商[215]。除了技术行业外，金融等行业内的此类交易也被叫停[216]。鉴于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这种局面或将持续下去。

中美之间的紧张态势牵动着民众的注意力，但是压力（以及日益抬头的保护主义）不只存在于这两个国家之间。以欧洲为例，欧盟已批准一项提案，将关键领域的清单扩大至选举基础设施、生物医学和汽车。这也促使欧盟开始更加严格地审查有政府背景的投资以及向第三国转让技术的投资。2017 年 10 月，日本修订了《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在国家安全相关领域中，如果外资取得日本企业的股份但并未事先申报，日本政府便可强制要求变更或终止投资。

到2040年，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变化或将影响高达 37 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中国和世界正在重新审视彼此之间的联系，而日益加剧的紧张态势可能引发某些国家采取行动，以保护和封锁部分国内经济、脱离全球化。我们发现，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变化将显著影响全球经济价值（研究方法详见《技术附录》）。

我们确定了 5 个关键领域的机会，可能会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创造更多价值。第一，中国发展成为开放的贸易伙伴和重要的进口目的地。第二，中国进一步开放服务业，从而扩大服务提供商在中国市场准入的行业并提高生产率。第三，中国实行金融市场全球化，以提升外资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参与度。第四，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助力，为气候变化、全球基建缺口、数字化与数据安全等全球挑战寻找对策。第五，改善知识产权和技术投资环境，从而扩大技术与创新的流动。上述每个领域都是中国改革议程中的重点，旨在带动高质量增长，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如果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这些领域内有所减弱，则可能导致贸易量缩减，服务领域封闭，金融体系效率降低，应对全球挑战的领导力减弱，全球技术流动规模下降。

[215] Alice Woodhouse, US blocks Chinese takeover of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company,《金融时报》，2018 年 2月 23 日。

[216] Charles Wallace, Trump angers China with blocked takeover,《福布斯》，2018 年 1 月 3 日。

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可能影响到的经济价值或将高达

22~37

万亿美元

两种情境——联系加强以及联系减弱——对各利益相关方而言各有利弊。举例而言，假如联系减弱，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贸易流动有所萎缩，尤其是世界减少从中国的进口，那么其他有替补潜力的供应国便会受益。有报告预测，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越南）都可能是中美贸易冲突的"赢家"[217]。同样，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技术流动减弱，势必将削弱技术领域的竞争，有助于全球其他企业巩固其全球市场份额。相反，如果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有所加强，那么中国某些行业的劳动者和企业必将经历阵痛，因为政府将加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力度。我们发现，决策者针对联系的深化或减弱做出抉择时，需要兼顾经济性和非经济性因素。各国优先发展的事务彼此冲突，可能会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前景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本章将主要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关注上述选择和情境（以及后果）如何逐渐显现，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些选择和情境并不只取决于中国的决策和方法；世界其他国家的行动和应对也至关重要。全球各国可以共同思考并改革全球贸易系统，以提升争端解决效率和扩大包容性，并让全球进一步分享中国经济开放创造的利益，惠泽更广大的群体[218]。如果中国实现了金融行业全球化，届时全球各国都应当对中国的投资抱有更开放的态度，同时也应提升项目管理能力，充分利用更强劲的资本流动所带来的优势。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各国需要明确拟定目标和里程碑，以避免某些国家过分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全球福祉，乃至彼此对立[219]。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流动规模主要取决于各个国家对技术投资和国家安全问题所秉持的政策立场。

我们估计，若在以上五大领域内积极采取行动，到 2040 年时全球经济（也包括中国）有望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220]。而减弱联系则可能令全球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分析显示，到 2040 年，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变化而影响到的经济价值可能高达 22~37 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 GDP 的 15%~26%（见图 39）。这些价值绝大部分都表现为对GDP的影响，其余则表现为其他价值形式，例如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时选择不同，将导致社会成本出现或升或降的分化。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估算相关价值，我们在模拟时设定了一组具体的条件和假设，所以这些估算结果不应被视作对未来的预测。举例而言，在模拟情境下，我们分别预定了各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以及技术交流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程度。我们也在模拟研究中排除了几个因素，包括与政治议程和军事干预相关的风险。本模拟研究侧重于长期影响。我们并不是在试图预测当前关于贸易和关税辩论的结果。

[217] Alice Woodhouse, Malaysia may be best placed to benefit from China-US trade war,《金融时报》, 2018 年 11 月20 日。

[218] Wendy Cutler, *Global trade is broken: Here are five ways to rebuild it*, 世界经济论坛, 2018年9月12日; Current trade and opportunities, 经合组织, https://www.oecd.org/trade/understanding-the-global-trading-system/trade-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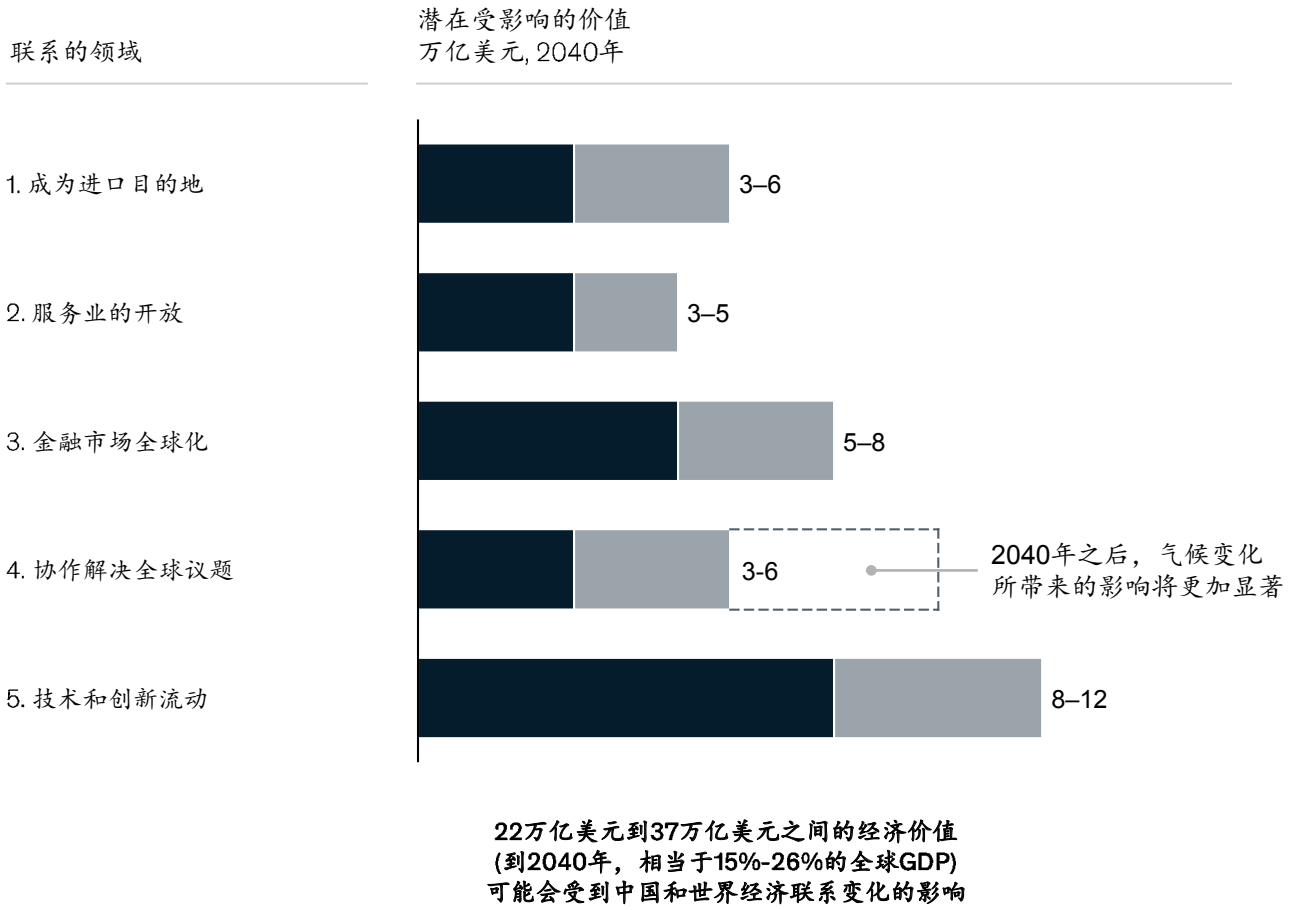
[219] Leda Zimmerman, *What the Prisoner's Dilemma tells us about climate change,* 世界经济论坛, 2018年6月6日。

[220] 我们通过以下三步模拟了其中的风险值：(1) 我们首先定义了联系改变将对经济驱动力造成怎样的影响以及相应的传导机制；(2) 我们收集和查阅了外部研究资料，将其作为评测联系所致经济影响的参考信息；(3) 我们将麦肯锡全球增长模型 (GGM) 与外部建模相结合，综合外部研究成果，模拟了加强和减弱联系这两种情境对全球 GDP 产生的影响。然后，我们将这两种情境与 GGM 模型计算得出的 2040 年基准情境进行对比，2040年基准情境利用时间序列加权平均趋势，并结合当前的实际发展趋势建立对全球经济的长期预测。这两种情境与基准情境的区别可彰显加强联系带来的上行机会以及和减弱联系带来的下行风险。详情请参见《技术附录》。

图 39

中国和世界之间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将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变动

模拟研究



22万亿美元到37万亿美元之间的经济价值
(到2040年，相当于15%-26%的全球GDP)
可能会受到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变化的影响

注释: 我们对于可能引起的经济价值变动的估算是基于在特定条件及假设下的模拟研究; 并非是对未来的预测值。我们使用麦肯锡全球增长模型作为基础进行模拟计算, 研究了对经济价值的正面及负面的影响, 具体取决于经济联系减弱或增强的情境下对主要经济驱动要素的影响程度。我们的研究关注的是对经济的长期影响, 而不是试图预测当前关于贸易和关税的辩论的结果。

资料来源: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机会一：中国可能成为发达与新兴经济体的重要出口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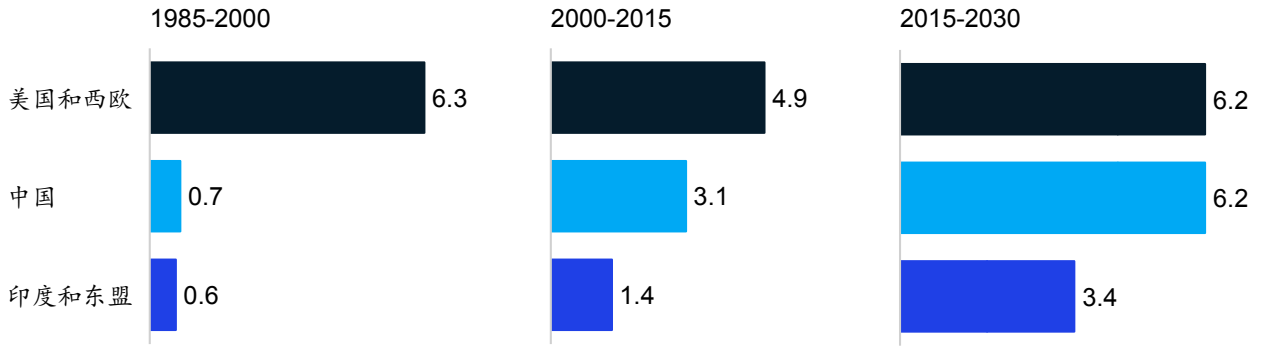
中国不断增长的庞大消费市场蕴藏着大量潜能，不仅足以带动国内发展，还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根据各方的一致预测，中国从当下到2030年这段时间的消费增长可能高达 6 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美国与西欧的总和，是印度与整个东盟的约两倍（见图 40）[221]。

[221] 结合了麦肯锡全球增长模型、牛津经济、IHS Markit 三方的预测结果。

图 40

未来15年，中国的消费增长或将相当于美国和西欧增长的总和

消费递增规模
万亿美元，按2016年物价计算



资料来源：牛津经济研究所；IHS；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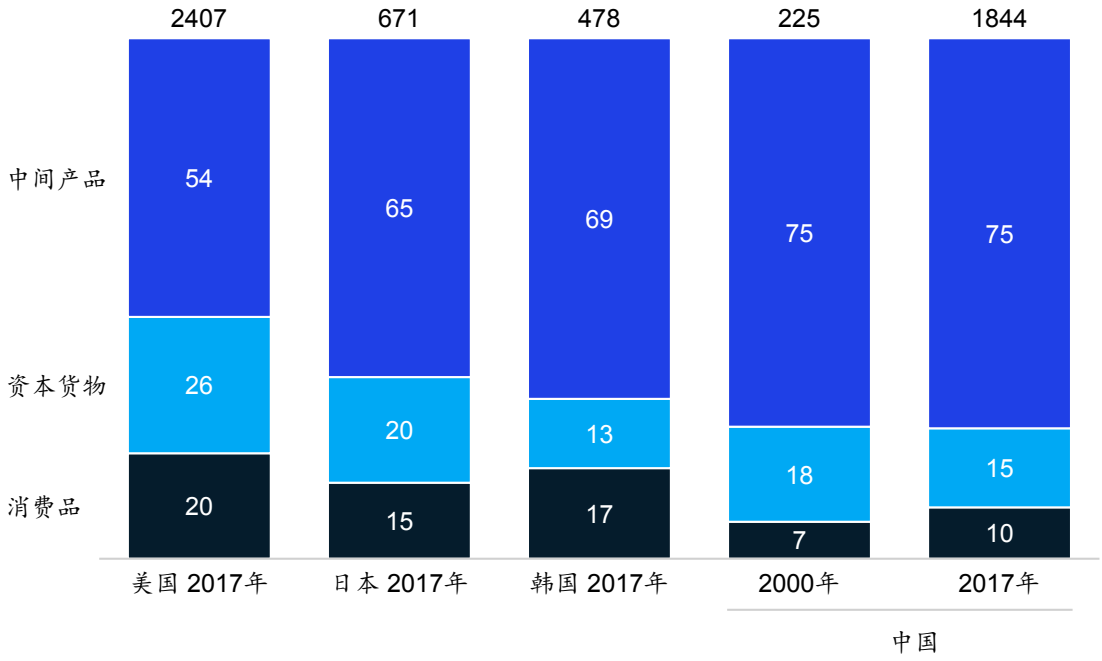
以中国为贸易目的国的经济联系一旦加深，也将创造更庞大的贸易流量。中国若想扩大贸易流量，不妨加大消费品的进口力度，这不仅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商品选择，也能为跨国企业提供更多机会。2000 年以来，中国的进口总额增长了 7 倍，但消费品进口额却增长了 10 倍以上。仅在2016-2017年间，中国的消费品进口增幅就达到了日韩两国用了 10 年才达到的增幅水平。若按绝对值计算，如今中国的消费品进口总额是日本的1.3倍，韩国的近 3 倍。然而，若按制成品进口占总进口额和总消费额的比例来计算，中国进口制成品的相对规模则低于发达国家（见图 41）。

随着中国的消费者日益富裕，中产阶级逐渐扩张，上述占比显然还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中国的绝大部分进口来自亚洲和欧洲，分别占总进口额的 37% 和 34%，从美国的进口则占 21%。总进口额中 28% 为食品，还有 41% 为交通运输和通信产品。其余消费品类的占比都很小——这也再次凸显了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参见附文 8：数字渠道可促进跨境电商的增长）。

图 41

虽然个人消费品规模飞速增长，但中国的消费品进口总额仍然低于发达经济体

%；十亿美元，名义数据



注：由于四舍五入，数字总和可能不等于 100%。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全球增长模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随着中国逐渐向价值链上游挺进，开始涉足附加值更高的行业，中国不妨从新兴经济体进口更多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且随着收入的增长，中国人对发达经济体商品的进口消费也越来越多。目前全球发达经济体 8% 的出口额来自对华出口，比2007年的5%有所增长。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也在不断增长，例如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等国。

有证据显示，中国正日渐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经济体。同时，中国与非亚洲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加深。在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出口当中，中国占据的份额有所下降（2014-2016 年间共降低 3 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占据的份额则有所上升：越南的份额上升 1.5 个百分点，印度上升 0.7 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上升 0.4 个百分点[222]。1996-2016 年间，中国与全球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中南贸易）增加了 11 倍；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北北贸易）却只增加了两倍。

进口的增长或许将对中国的制造业岗位产生冲击——事实上，已有证据显示这种趋势初现端倪。2012-2017年间，中国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30% 下降至28%（若按绝对人数计算，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口则从 2.58 亿下降至 2.09 亿）。不过，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流失被服务业就业人口的增长所弥补。同一时期内，中国的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 36% 上升到了 45%。

[222] *Outperformers: High-growth 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 companies that propel them*（《领跑全球——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及推动其发展的企业》），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8年9月。

附文 8

数字渠道可促进跨境电商的增长

数字技术是中国扩大进口的另一个机会[223]。随着中国消费者对电商购物渠道日渐熟悉，来自新兴和发达经济体的小微跨国企业（也即进入全球市场的小公司乃至个人）均可参与到中国的消费增长之中。

随着跨境电商的规模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消费者无需出国，便可经由官方渠道购买海外商品。据艾瑞咨询的统计数据，2015-2017 年间，中国跨境电商的零售进口额增长了近一倍，目前已高达 1110 亿元人民币。

跨境购物平台可为外国企业提供机会，尤其是那些正在崛起的小微跨国企业。入驻中国领先跨境购物平台（例如天猫商城、京东商城）的品牌数量已超过 1.8 万个，境外卖家可借此进入中国消费市场（有些卖家是初次进入中国市场）。这些购物平台也让中国消费者得以接触来自 80 余个国家的境外品牌。此外，跨境 B2C 电商还有一项优势，就是让小型零售商得以直接接触消费者，无需经过中间商的批发环节。2018年，根据市场调研机构eMarketer 预测，当年中国将有 24% 的线上买家完成至少一次跨境购物，这也证明了电商渠道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十分可观[224]。

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激励电商进口的措施。2017年，中国将 B2C 零售商的电商关税税率从17%下调至12%。2016年4月，中国政府颁布新政，将电商纳入税收体制，而不再只是对通关时查出的货品追征一笔印花税。中国政府目前允许 B2C 零售商对华销售时享受零关税待遇，并在现行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基础上提供 30% 的减免额度。不过该项税收优惠目前存在上限：每人每年不超过 20000 元人民币；单件商品价格不超过 2000 元人民币。施加上述限制的用意在于，既能让消费者直接选购境外零售商的商品，也能提升受监管官方渠道（而非“灰色”渠道）的交易数量，以免政府蒙受巨大的税收损失，或者严重影响当前的进口。不过，单件商品的税收优惠限额也限制了跨境购物平台上的商品多样性和价格幅度。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后，便将限额上调为每件商品 5000 元人民币和每人每年 26000 元人民币，这意味着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商如今可以对中国消费者出口“高级货”和奢侈品。

[223]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的新时代》），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6年3月。

[224] Deborah Weinswig, What Chinese consumers want from western retailers (hint:It's not just fashion and technology)，《福布斯》，2018年5月18日。

2017年在华外资企业总数高达

54万家

2000年为

20.3万家

反之，如果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贸易流量有所缩减，那么可能会有多项经济动因对GDP造成冲击。首先，消费者将被迫支付更高的价格。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出口的商品让全球消费者享受到了更低的价格（例如美国非石油类消费品的价格降幅高达27%），但如今的关税上涨趋势可能会让这些益处消失殆尽[225]。而商品价格受影响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中国出口量的减少。鉴于中国对美出口中有77%都是用于生产制成品的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关税上涨很可能会推高美国的生产成本，进而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或者挤压美国制成品厂家的利润。

其次，中国参与其中的许多全球供应链可能会被扰乱。在华业务规模较大的国外跨国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都可能蒙受损失。2000-2017年间，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总数量从20.3万家增长到了54万家[226]。2017年，这些企业雇用的劳动力人数约为1300万，相比2000年的区区300万已有大幅增长。中国的出口总额约有40%由外资控股企业和合资企业所贡献（见图42）。

在华经营的国外跨国企业已在开始考虑调整战略。中国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发现，31%的美国受访企业已经推迟或取消了投资决议，18%的美国受访企业正在考虑将制造部门迁离中国，还有3%的美国受访企业正在考虑完全退出中国市场。然而，考虑迁出在华业务的企业未必会把这些业务迁回美国境内。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的受访企业表明其计划在美国设立制造业务[227]。另一方面，关税可能将推高企业的成本，而这种成本又会转嫁给消费者。有研究估算，关税每提高10个百分点，一户美国家庭的年均生活成本将增加至少1400美元[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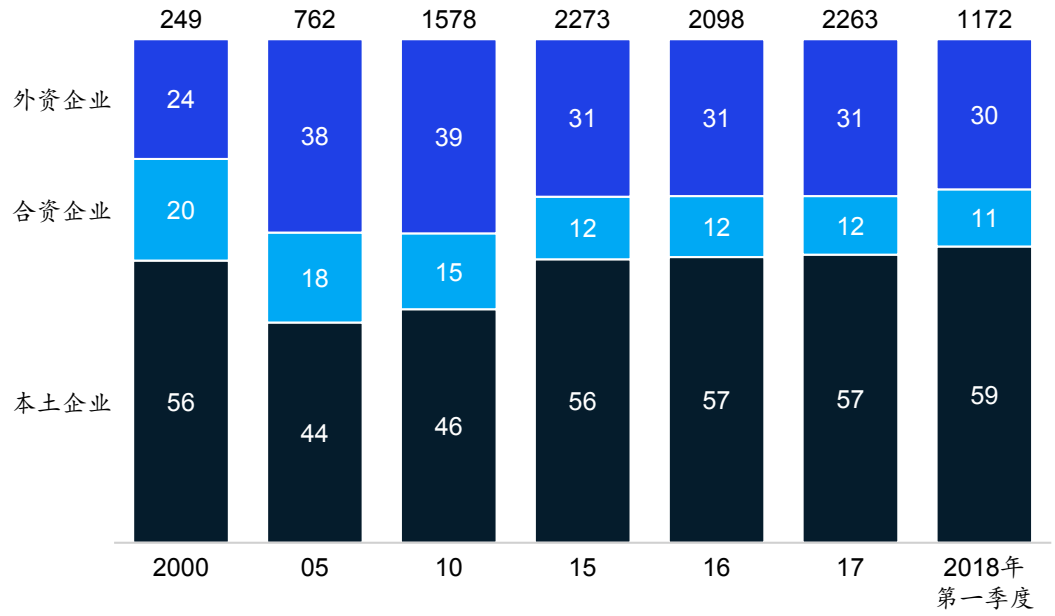
如果中美贸易冲突持续下去，其他贸易国也会受到冲击（参见附文9：贸易冲突历史纵览）。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均面临极高风险，预计中美贸易冲突将对这三国GDP带来0.5%~1.5%的负面影响。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不同经济体正在构建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新伙伴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并从供应链转移中寻找新的商机。举例而言，其中两项新贸易协定分别是11国联合签署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将影响全球1/3 GDP的《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229]。鉴于资源行业对中国的需求高度敏感，与中国的融合程度一旦降低，必然会导致短期波动和价格下跌。反之，由于中国依赖铁矿石进口，假如无法维持关键性的贸易联系，则可能导致中国的制造业增长放缓。目前中国的铁矿石库存为1.3~1.6亿吨，仅占年度表观消费量的10%[230]。

[225] Lawrence J. Lau 和 Junjie Tang, *The impact of U.S. imports from China on U.S. consumer prices and expenditures*, IGEF工作论文第66号，2018年4月30日。
[226] 中国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
[227] John Brinkley, Trump's China trade war not bringing jobs back to U.S.，《福布斯》，2018年10月30日。
[228] Jason Furman、Katheryn Russ 和 Jay Shambaugh, *US tariffs are an arbitrary and regressive tax,* Vox, 2017年1月12日。
[229] Sarah Porter, *A whole new world for free trade?* BBC新闻网，2018年12月28日。
[230] Custeel, http://www.custeel.com/reform/more.mv?group=1002003&cat=1002017。

图 42

中国的价值链已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全球化——40%以上的出口由在华外资或合资企业所贡献

按企业类型统计的中国出口货物，
%；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CEIC；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下行风险，并在联系加强的情况下充分把握上行机遇，世界各国需要对全球贸易体系中面临压力的方面进行改革。有观察人士指出，世界贸易组织的三个关键职能全部需要改革：管理多边贸易规则，作为贸易谈判的论坛，提供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此外，世界各国需要讨论并取得共识的内容还有贸易政策的监管方式，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中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定义[231]。世界贸易组织由 164 个成员国的共识所推进，但这种共识很难达成。其中一种解决之道就是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就某一套新规则达成多边协议，以此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补充[232]。

模拟研究显示，假如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贸易联系发生变化，影响到的经济价值总计或将高达 3~6万亿美元。贸易流动的扩大或许将集中表现为对华出口量的增加，这将有利于中国国内的消费，并增加世界其他地区的就业。如果当前的贸易冲突长期持续，抑制了贸易流动，则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会受到冲击。

[231] Marianne Schneider-Petsinger, *The path forward on WTO reform*,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2019 年 5 月 7 日。

[232] *WTO reform: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r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18 年 10 月 23 日。

附文9

贸易冲突历史纵览

自从国家间的商品和服务往来出现之后，贸易冲突便层出不穷。经验显示，贸易冲突有时会对各个经济体以及全球经济造成极为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此仅举两例：第一个例子是美国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秉持保护主义立场，在1930 年签署生效。当时美国正在经历快速工业化和电气化带来的阵痛，农村地区产能过剩严重、农产品大量盈余。这项法案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些群体。该法案提高了逾 2 万种产品的进口关税，绝大多数为农产品，政府希望以此促进对国内生产商品的消费。然而这一举措却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了冲击。法案刚刚获得通过，美国股市便应声下跌。美国本土生产商依赖的多种进口原材料忽然被课以重税，使其损失惨重。世界贸易格局也遭到扰乱，导致美国的进口总额下降了66%，出口总额下降了61%。最终该法案成为上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成因之一[233]。

第二个例子则出自欧洲。15-18世纪，重商主义学说盛行一时，欧洲各国断定国际贸易获得的利益将完全归出口国所有，据此认为贸易属于零和博弈。于是这段时期的贸易限制显著增加，引发了长远的负面影响：其一是奴隶贸易扩大，欧洲各国需要奴隶来支持国内新出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34]；其二是通货膨胀加剧，因为货币的跨境流动遭到抑制，但政府却需要增加开支，以支持国内的产业发展[235]；其三是相关政策间接引发了军事冲突，包括英荷战争和法荷战争。由于重商主义政策忽视了比较优势，过度追求贸易顺差，最终阻碍了全球的经济发展。

[233] Cato at Liberty，引自 Alan Reynolds 的博客文章：*The Smoot-Hawley Tariff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2016 年 5 月 7 日，cato.org/blog/smoot-hawley-tariff-great-depression。
[234] C. Robert Haywood, Mercantilism and Colonial Slave Labor, 1700 –1763,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1957 年11 月，第 23 期，第 4 册。
[235] Murray N. Rothbard, Mercantilism and Inflation，收录于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第一卷，Edward Elgar Publishing 出版社，1995 年。

机会二：中国若能开放服务市场，则中外企业均可从中受益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19 年上半年的一项研究指出，2017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为 5.1 万亿美元，远低于商品贸易总额的 17.3 万亿美元。但全球服务贸易过去 10 年间的增速比商品贸易高出 60% 以上，传统的交易统计数据无法完全反映服务业的作用。鉴于制成品贸易中约有 1/3 的价值由服务组成，无形资产的流动规模除了知识产权费用都无从衡量，而且免费数字服务的跨境流动规模也十分可观，因此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认为，全球服务贸易的总价值或许已经超过了商品贸易[236]。

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逐年增大，2018 年占国内 GDP 的比例达到 52%，而 2010 年只有有 44%。在此期间，中国医疗行业的年增速为12%，总价值达 4790 亿美元；教育行业的总价值（年增速为 8%）则达到 5000 亿美元。

[236]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 年 1 月。

中国的服务业限制水平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

4.8倍

然而，正如第4章所述，中国的服务业依然存在诸多限制，包括对外资参与的限制以及各种经营壁垒。经合组织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限制指数”为中国评定的指数比经合组织平均水平高出4.8倍。美国商会“2018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46%的服务企业表示外国企业相比中国当地企业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有29%的受访企业表示，若能允许外资企业“进入当前限制进入的业务或产品细分领域”，将具备重大意义。

加强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有助于推动服务业发展并提升生产率。中国政府已经实施了一些向外资开放服务业的举措，例如尽力缩短外国药品的审批时间，在某些地区撤销了设立外资医院的合资要求，并允许外资在金融机构中持有更多股份。此外，放宽对国内服务业的监管和谨慎消除外资门槛，也有助于创造富有竞争力的市场动态——正如放宽监管和开放市场在中国其他经济领域催生的结果——进而提高生产率，扩大市场准入，并且提升品质。

如果中国选择维持目前对服务业的诸多限制，则可能妨碍生产率增长，进而对整个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目前，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20%~50%左右，这说明提升生产率的改革有望带来巨大回报（见图43）。对于难以衡量生产率的行业，中外企业的服务差别可通过其他绩效指标来了解。以医疗行业为例，中国仅有36%的糖尿病患者和42%的高血压患者得到了有效诊断（在美国的比例分别是76%和85%），得到治疗的比例甚至更低。中国仅有33%的糖尿病患者和34%的高血压患者得到了治疗，在美国的比例分别是59%和81%[237]。在一项统计医疗服务普及度及医疗质量指数的研究中，中国医疗体系的有效性位列全球第48位，得分为78（满分为100）[238]。

中国消费者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与外国提供商在服务品质与便捷度上的差别。一些较为富裕的中国人选择前往海外留学，使中国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地。2017年，在美国高等教育院校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总消费为139亿美元，注册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7%。据联合国统计，2010-2017年间，中国赴海外留学的大学生人数从58万人增至87万人，年增速6%。在金融服务方面，也有一些中国家庭将资金投入其他经济体。2018年上半年，赴港旅行的内地游客在保险单和储蓄计划上的支出总计高达223亿港币[239]。

模拟研究表明，中国与全球的经济联系加强后，服务业受影响的经济价值将在3~5万亿美元之间。这一情境可通过扩大外资参与来实现，该举措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让世界各国的企业有更多机会参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反之，如果中国的服务业保持封闭，则本土企业的生产率和整体表现将继续落后于发达经济体的同类企业，并且可能无法满足中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期望。

[237] *Digital China: Powering the economy 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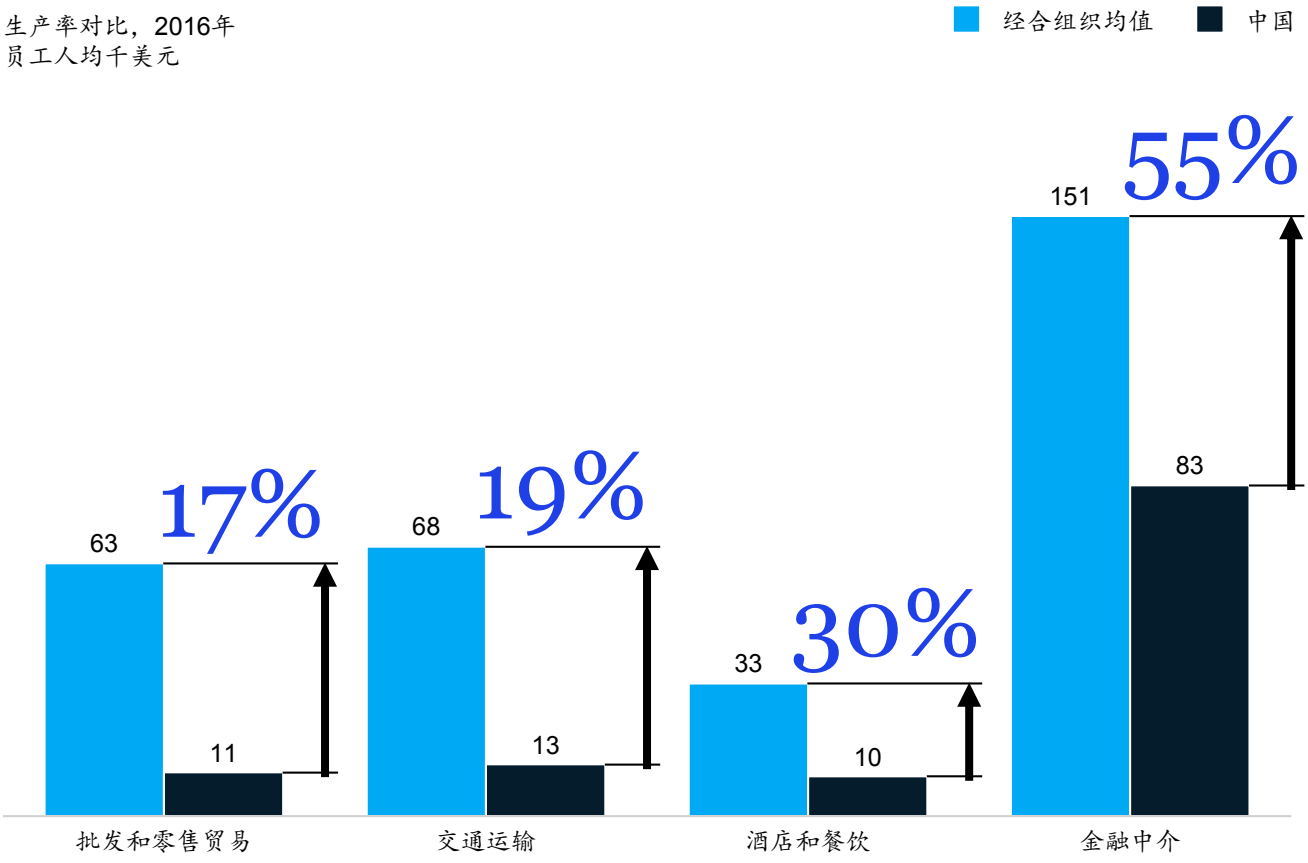
[238] 有研究预计，中国医疗改革后，药物获批的平均耗时将从21.4个月缩短到6.8个月。参见Nancy Fullman等，Measuring performance on the Healthcare Access and Quality Index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and selected subnational locations: A systematic analysi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6，《柳叶刀》，第391期，第10136册，第2236–71页，2018年6月2日。

[239] Enoch Yiu, Fearing further yuan weakness, mainland Chinese are buying insurance policies in Hong Kong once again，《南华早报》，2018年9月29日。

图43

中国服务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约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20%~50%不等

生产率对比，2016年
员工人均千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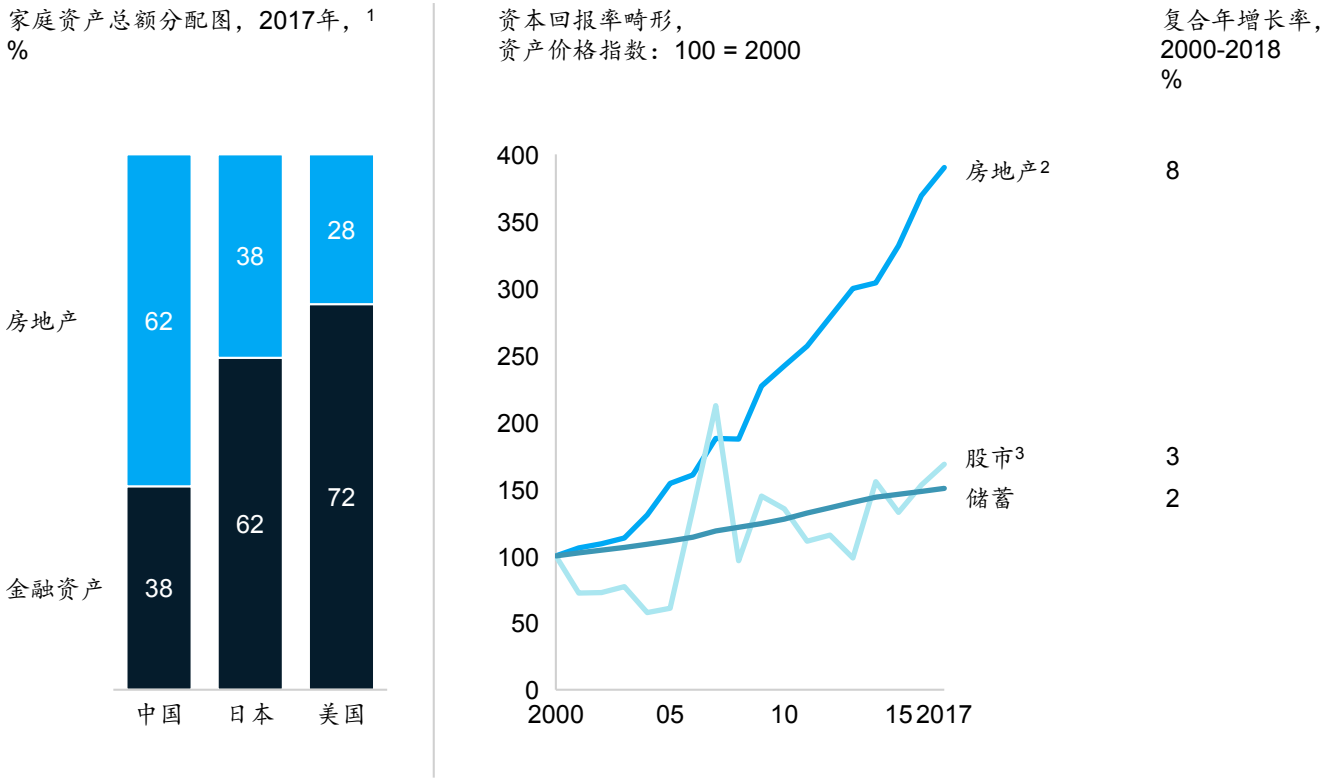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HS；中国国家统计局；经合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机会三：如果中国能够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的全球化和现代化，便可为中国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更多选择，并且提升资本配置效率

正如第1章所述，中国的金融体系全球化仍然任重而道远。这种与全球缺少联系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消费者和企业缺乏投资选择。中国普通家庭的资产配置高度集中，房地产类别的占比远高于其他资产。举例而言，中国家庭的资产中平均有62%为房地产，而这一比例在日本为38%，在美国为28%（见图44）。这种高度围绕房地产的资本配置模式也推动了房价快速上涨。中国的房价长期保持8%的年涨幅，而中国股市的年涨幅却只有3%。这也削弱了其他资产的收益。2012-2017年间，中国金融资产的平均回报率仅为0.4%，在美国则为3.1%。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积累，流动资金持续注入国内金融系统，而资本账户却保持封闭，这些因素也许都是汇率失衡的原因，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房价上涨和股市动荡的推手。

图 44

中国家庭大力投资房地产市场的原因在于金融资产的回报率偏低



[1] 未计入债务。
[2] 该价格基于 CEIC 统计的全国住宅用房均价计算得出。
[3] 股价为每年年末上证指数的调整后收盘价格；最后引用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资料来源：CEIC；彭博社；2018年瑞信全球财富报告；中国人民银行；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穆迪；标普；雅虎金融；美联储；麦肯锡分析

过去 3 年里，中国政府变更了多项监管规定，释放出提高金融服务市场自由度的信号。举例而言，如今由外资完全控股的银行已经可以在中国境内经营业务。2018 年政府发布了新的负面清单，允许外资在证券交易机构和保险企业中的持股比例达到51%（此前仅允许外资持有少量股份），并且计划到 2021 年时允许外资完全控股[240]。2012-2018 年间，中国境内的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 或 RQFII）的数量已从 138 家增至 486 家。外国投资者参与中国股市的要求也有所放宽，战略投资的锁定期从 3 年缩短至 1 年，最低资本要求从 1 亿美元降至 5000 万美元[241]。2019 年初，标准普尔获批进入中国开展业务，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信用评级机构[242]。然而，运营壁垒和冗杂的监管问题依然存在，例如外资银行至今仍然要为每一家分行取得单独的牌照。上海美国商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政策频频发生非正式和突发性的变动，削弱了美资银行的规划能力（例如外汇管控）[243]。商会还特别提到了跨境资本流动面对的特殊限制，尤其是专门从事跨境服务的银行。中国的监管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有时也令人迷惑，这可能会挫伤外资参与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积极性。

[240] Dorcas Wong, *How to read China's 2018 negative list,* China Briefing, 2018 年 7 月 7 日。
[241] Xie Yu, China relaxes foreign stock investment rules to boost A-share market, 《南华早报》, 2018 年 7 月 30日。
[242] Lianting Tu, *S&P Global gets approval for China local rating business,* 彭博社, 2019 年 1 月 28 日。
[243] *Market access challenges in China*, 上海美国商会, 2017 年 10 月, amcham-shanghai.org/sites/default/files/2017-10/Market%20Access%20Challenges%20in%20China%20Final.pdf。

加强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有助于推动外资进一步参与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全球化有助于中国降低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风险，并减轻所谓“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的限制——即一个国家无法同时控制货币政策、外汇和资本流动。外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知识与实践有助于中国企业改善资源配置，保障更佳收益。开放金融市场将使得外国储户有机会接触更丰富的投资选择，让他们得以直接持有外资银行的股权、投资公开市场。据 IHS Markit 统计，外国金融机构将可参与中国金融服务业高达1.1万亿美元的营收分配，2007-2017年间该行业高速发展，营收年增速达 9%。外国储户和外国资本也将享受到中国生产率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可观收益。另一方面，中国的储户也会拥有更丰富的投资选择，例如向存在储蓄缺口的经合组织成员国投资。

中国的企业债务占全国总债务的

57%

其中国企债务约占

~70%

然而，如果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有所减弱，则金融体系目前的种种弊端及面对的风险将继续存在，乃至加剧。中国金融体系目前亟待改进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资本配置效率较低[24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国企债务在中国的企业债务中占比高达 70%，但却只贡献了略高于 20% 的工业总产值。该研究还预测，如果中国能够清除“僵尸企业”，减少过剩产能，改革低效的国企，则总产值有望增加 0.7~1.2 个百分点[245]。此外，中国金融体系还面临另一重风险：中国的国内债务在过去10年里增长超过 4 倍，故此国内经济很容易受到投机、流动性过剩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衰退的影响。中国的债务规模一直在不断增长，2007-2018年间，中国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从 120% 升至 250% 左右；全国总债务的 57% 为企业债务，其中又有 70% 来自国有企业，但其资产回报却只有私企的 30%~50%（见图45）。

如果中国的金融行业实现了全球化，届时世界各国都应当对中国的投资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以充分把握经济联系加强所带来的优势。毫无疑问，各国都要以最符合本国利益的方式来使用中国的投资，例如填补储蓄缺口、促进国内就业、推进健康的市场竞争，以及获取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国外金融服务机构也需要强化自身能力，准确评估更开放的中国金融行业将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和风险，如果它们决定拓展在华业务，还要找到应对监管和经营壁垒的正确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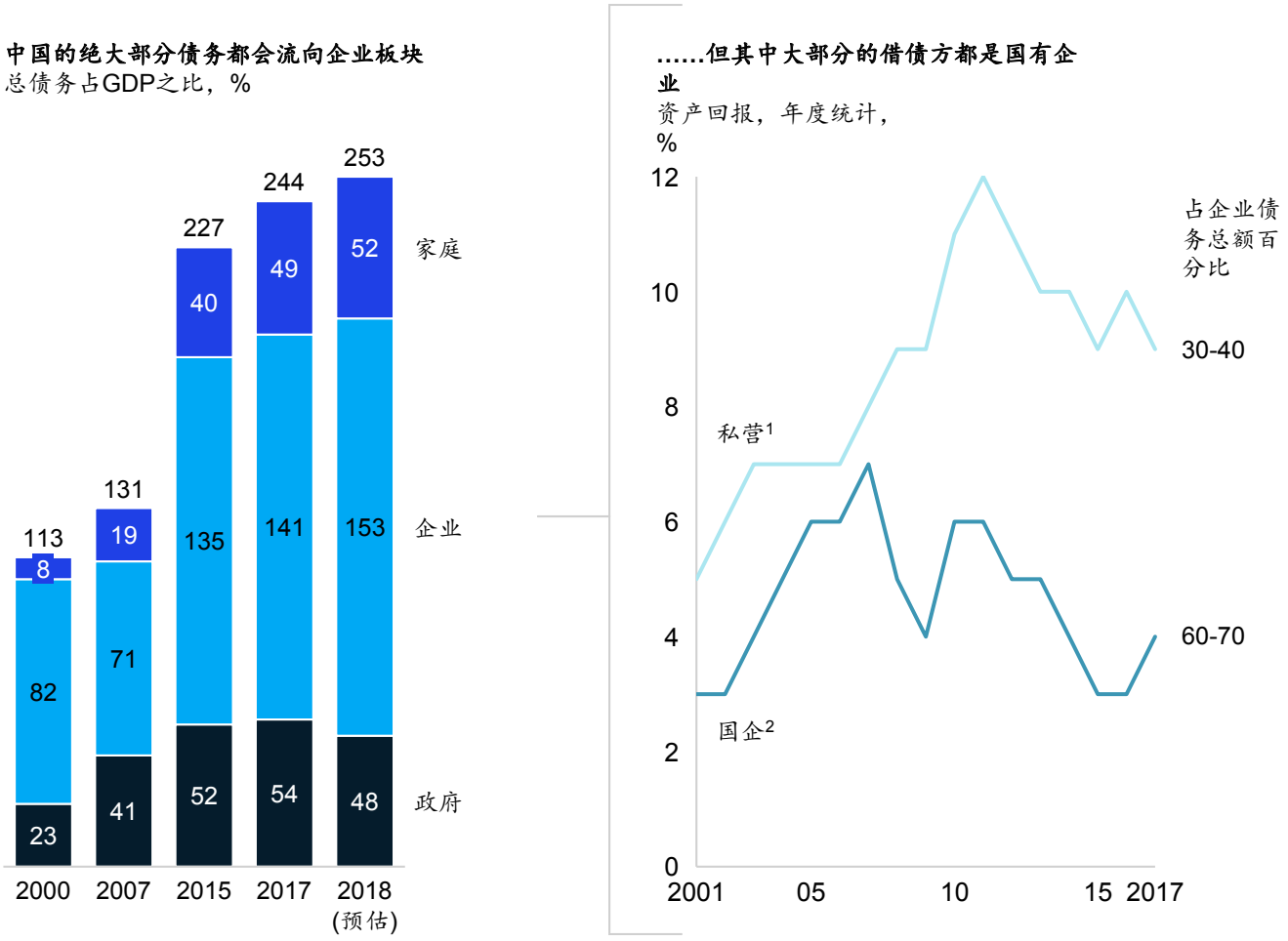
模拟研究显示，从现在到 2040 年，中国金融行业受影响的经济价值或将高达 5~8 万亿美元。完成现代化改造的中国金融体系能够提高资本生产率。反之，如果中国不开展金融体系现代化改造，那么资本错配可能将持续存在，市场波动也将不断增加，从而推高资本成本，抑制资本生产率的增长。

[244] Nicholas R. Lardy, *The State Strikes Back: 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9 年 1 月。

[245] W. Raphael Lam等, *Resolving China's zombies: Tackling debt and raising productivity,*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 年11 月 27 日。

图 45

中国的企业债务正在快速增长，并且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其投资回报率通常低于私营企业



1 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2 国企包括国家控股的企业。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债务数据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各国债务数据库；国际清算银行；CEIC；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机会四：中国可以进一步促进国际合作，为解决全球议题做出更多贡献

国际合作正面临重重压力。全球经济体系与治理体系的基础规则不断变化。但依然存在的全球性挑战只能通过国际合作加以应对，例如探讨更有效的多边贸易体系，解决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就数字化治理达成共识（例如数据流动和数字主权等问题），填补每年估计高达 3500 亿美元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246]。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当参与到国际社会的对话当中，协助其制定解决方案。中国正在设立机构，筹措资本，加入全球气候协定，这表明其有兴趣进一步参与国际社会新规则的制定当中。

[246] *Bridging global infrastructure gaps*（《填补全球基础设施缺口》），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以及麦肯锡资本项目和基础设施实践，2016 年 6 月。

自2010年以来，中国向联合国提供的资助每年增加

40%

中国已开始在国际机构中承担更多职责。自2010年以来，中国向联合国提供的资助每年增加40%，而今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捐助国。但中国为世界贸易组织和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资助仅占总经费的9%，为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和教科文组织提供的资助仅占8%，为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助仅占5%。中国也在日益成为海外开发融资的重要来源。以往，中国需要通过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现成的多边发展融资机构参与融资。但近年来中国正通过自己主导设立的两家多边开发银行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融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在其中分别持有30%和20%的股份。

中国也正在拓展自己的自由贸易协议体系。中国已经与全球12个经济体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同时也是“中国-东盟多边贸易协定”的活跃成员。截至2018年末，中国正在谈判另外11项双边协议（包括对现有协议的4项“升级”）和3项多边协议（一项关于日本和韩国；一项涉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项关于海湾合作委员会）。如果这些协定全部敲定，则中国拥有的自由贸易伙伴关系将占到全球GDP的21%和全球贸易总值的12%（见图46）。

中国也在开始为全球议程贡献力量，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中国能够为这项复杂而艰巨的挑战做出重大贡献。2017年，全球近一半的可再生能源的新增产能来自中国[247]。中国光伏面板企业的业务版图如今已覆盖全球，在境外市场获得的份额据估计也在48%左右。除了关注可再生能源以外，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发展清洁煤炭和节能减排，国内的老式燃煤发电厂纷纷关停改造，以实现高效燃煤；如今中国燃煤发电厂的效率已经比美国的平均水平高出24%[248]。中国在降低碳排放强度上取得的显著成果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249]。中国为此制定了多种解决方案，包括采用更清洁的能源生产方式，逐渐过渡至可再生能源，以及扩大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有所加强，这些解决方案便可出口到其他国家，从而帮助降低全球的碳排放，并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提供更多创新方案。

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为缩小全球基础设施缺口做出了贡献。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的基础设施（见图47）。中国与世界可以携手合作，让中国为填补全球基础设施缺口充分做出贡献。举例而言，中国可努力提升关于“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来源、环境影响、经营模式及预期回报的透明度。世界其他国家则需要加强项目管理能力，以更好地评估“一带一路”相关投资的风险和回报。

[247] *Made in China 2025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industry,* 促进劳动力市场强大和国家发展项目部（Project for Strong Labor Market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美国参议院小企业和创业委员会（U.S. Senate 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2019年2月；Eri Sugiura、Akane Okutsu，China's renewable energy surges after state backing，《日经亚洲评论》，2018年11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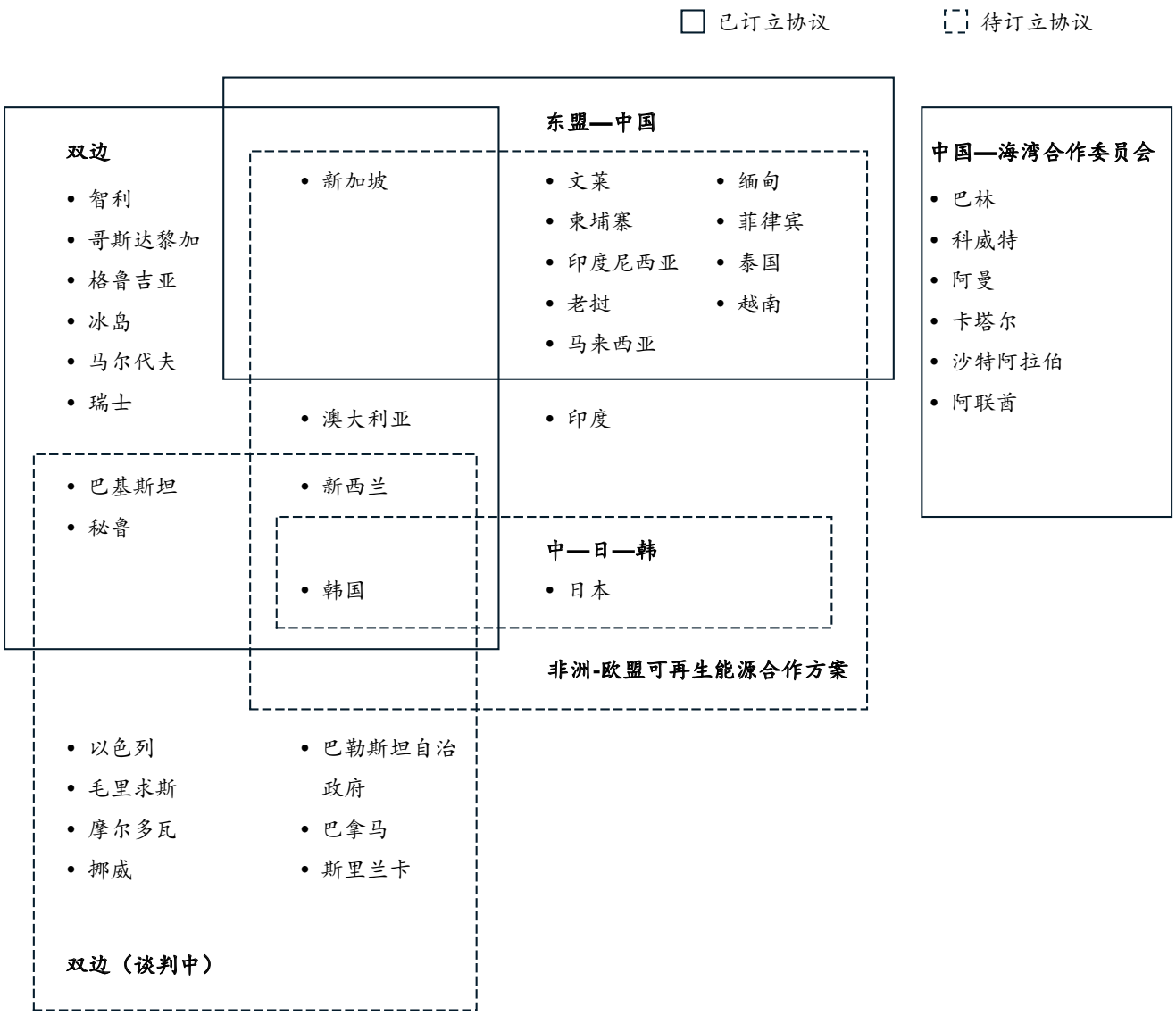
[248] Melanie Hart、Luke Bassett和Blaine Johnson，*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coal in China is wrong,* 美国进步中心，2017年5月15日。

[249] Anita Engels，Understanding how China is championing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帕尔格雷夫-通讯》，文章编号101，2018年。

图46

中国计划与世界其他国家订立的自由贸易协定相当于全球贸易总值的12%，全球GDP的21%

中国已与 21 个经济体订立了自由贸易协定，与另外 15 国的谈判正在进行中[1]。



[1] 该数据包含了与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的贸易合作；未显示经济协议和合作协议。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在数字化治理方面，中国与世界可以携手促进网络安全、数字鸿沟、数据流动、隐私保护、数字主权等话题的相关讨论，并努力就这些全球性课题取得共识。中国也可以分享自己在建设数字经济、拓展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经验与实践。

反之，如果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有所减弱，重大全球性挑战的全球领导和协作便会遭到削弱。举例而言，气候变化问题因此产生的不良后果便相当显著。有研究估计，如果国际社会能够遵守《巴黎协定》设定的 2 摄氏度的目标，则其长期经济收益（到 2100 年）或可高达年均 17 万亿美元[250]。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估算，全球基础设施缺口高达每年 3500 亿美元，如果置之不顾，则可能导致全球生产率增速显著减缓[251]。若全球数字化治理的协调性不足，则可能加剧数据本地化的趋势，据估算将对全球 GDP 造成 2% 的负面影响。

强化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全球碳排放强度得到抑制，从而减轻污染等负面影响。污染会危害居民健康并导致全球气温上升。而且鉴于这些挑战都是全球性的，国际社会携手行动就显得更为必要。尽管如此，某些一意孤行的国家（以本国私利为出发点）仍然选择继续排放，因为替代方案令人不快——他们也许会认为投资清洁能源的代价就是牺牲本国的经济发展[252]。但如果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立足长远，互相监督，为了追求共同福祉而设定并追求明确的目标与里程碑，那么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将产生更大的积极影响。

模拟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基础设施赤字和数字化治理领域可能将有 3 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受到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到 2040 年以后，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下行风险或将大幅增加。

[250] Tom Kompas、Van Ha Pham 和 Tyong Nhu Che,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GDP by country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gains from complying with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Earth's Future, 2018 年 7 月 13 日，第 6 期，第 8 册。

[251] *Bridging global infrastructure gaps*（《填补全球基础设施缺口》），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以及麦肯锡资本项目和基础设施实践，2016 年 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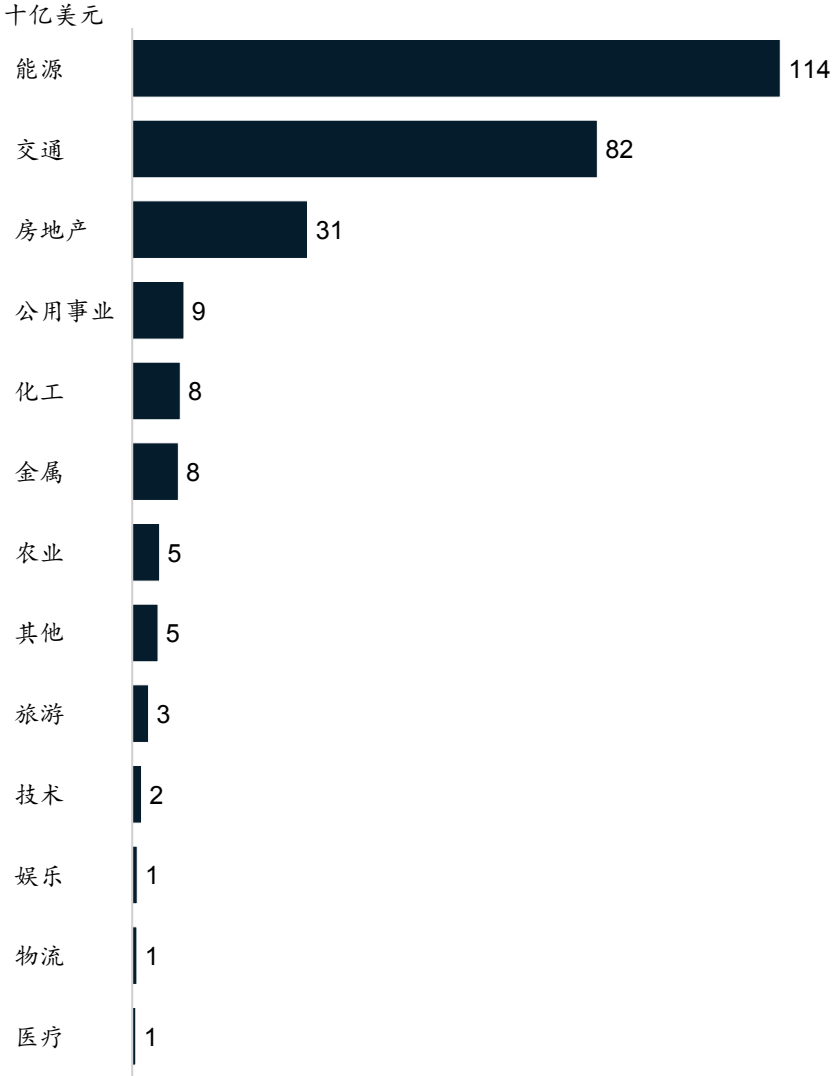
[252] S. M. Gardiner 和 L. Hartzell-Nichols, Ethics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Nature Education Knowledge* 3(10), 2012 年。

图 47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有助于填补全球基础设施缺口

“一带一路”相关投资规模，
每年十亿美元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个领域的投资，2013-2018年，
十亿美元



[1] 根据中国商务部估计，2016-2018 年间的投资达140~160亿美元。来自于其他信息渠道的自下而上的估算显示，该数字可能高达每年400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美国企业研究所；彭博；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机会五：开展技术与创新协作，共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并提高全球生产率

若想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源源不断的创新，而且要向价值链上游逐步攀升；但如果缺乏坚实的技术基础，这两点便无从谈起。认识到了技术获取的意义之后，中国便开始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制定有利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为外企提供优惠待遇等手段承接国外先进企业的技术外溢，并获得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253]。中国正在崛起成为全球数字与创新大国，而一旦技术流动萎缩，其发展将难以为继。

2016年中国的专利申请约占全球总申请数量的

40%

正如第 3 章所述，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的水平和国际领先国家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举例而言，虽然中国授权的专利总量全球领先，但平均质量却十分落后。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2016 年全球 40% 的专利申请发生在中国。在我们研究的三个关键行业中（汽车、航空、先进电子产品），中国分别拥有全球 85%、49%、18% 的专利；但这些行业中拥有的中高强度专利比例却只有 4%~11% 不等，而非中国专利中的这一比例为 14%~27%[254]。为了填补质量缺口，开放市场以接收外企的技术输入和专业知识将成为个中关键。

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为本土技术创新以及创业生态做出了重要贡献。麦肯锡自下而上的分析显示，中国约 60% 的独角兽企业拥有具备国际经验的高管人员，这些企业的估值比那些单纯依靠本地人才的企业高 3 倍。中国的“千人计划”早已超越了最初的愿景，迄今共吸引了 7000 余名专家的参与，其中 30%~40% 的人才走向了非一线城市[255]。

中国与世界各国加强各类技术领域的联系将带来诸多益处，其中之一便是获得一套全球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有研究估计，全球范围内的假冒产品、盗版软件、盗窃国家机密等行为每年会为美国造成 2250~600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56]。不过，加强联系更显著的益处表现为各国得以开展更大规模的全球协作，以携手开发创新解决方案。中国企业已经为全球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2010-2015 年，中国为全球贡献了 38% 的研发费用增长以及 80% 的专利申请增长。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培养了700万名研究生；2016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科研论文产出国（总计发表 42.6 万项研究，美国则为 40.9 万项）[257]。根据经合组织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 STEM 学科（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毕业生人数将占整个经合组织和 G20 国家的 37%。中国还拥有全球近 1/3 的独角兽企业，孕育出了多种富有活力的商业模式，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在新兴技术方面，中国也已实现了多项全球性突破。2019年初，中国的“嫦娥四号”探测器成为全球第一架登陆月球背面的航天器，为全球太空探索之旅树立了一块崭新的里程碑。随着中国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地位与日俱增，中国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技术将同时惠及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举例而言，中国最近与埃及签署了一项协议，两国将联合研发一颗地球观测卫星，用于支持埃及航天局的设立。在这一领域加强联系有助于推动全球创新，进而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253] John Van Reenan 和 Linda Yueh, *Why has China grown so fast?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s*, 牛津大学经济系，工作论文，2012年1月；*Outperformers: High-growth 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 companies that propel them*（《领跑全球——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及推动其发展的企业》），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8年9月。

[254] 专利强度根据 Innography 专利分析平台发布的评分而得出。该平台的满分为100，我们采用如下定义方式：评分超过 70 为高强度，40-70 为中等强度，低于 40 为低强度。

[255] 中国的“千人计划”于 2008 年出台，通过高薪、签证优待、声望荣誉等一系列特别待遇招聘国际上的科学研发、创新以及创业专家进入中国。参见Hepeng Jia, China's plan to recruit talented researchers,《自然》，2018 年 1 月 17 日。

[256]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assessments of the challenge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美国知识产权盗窃问题委员会报告，全美亚洲研究所，201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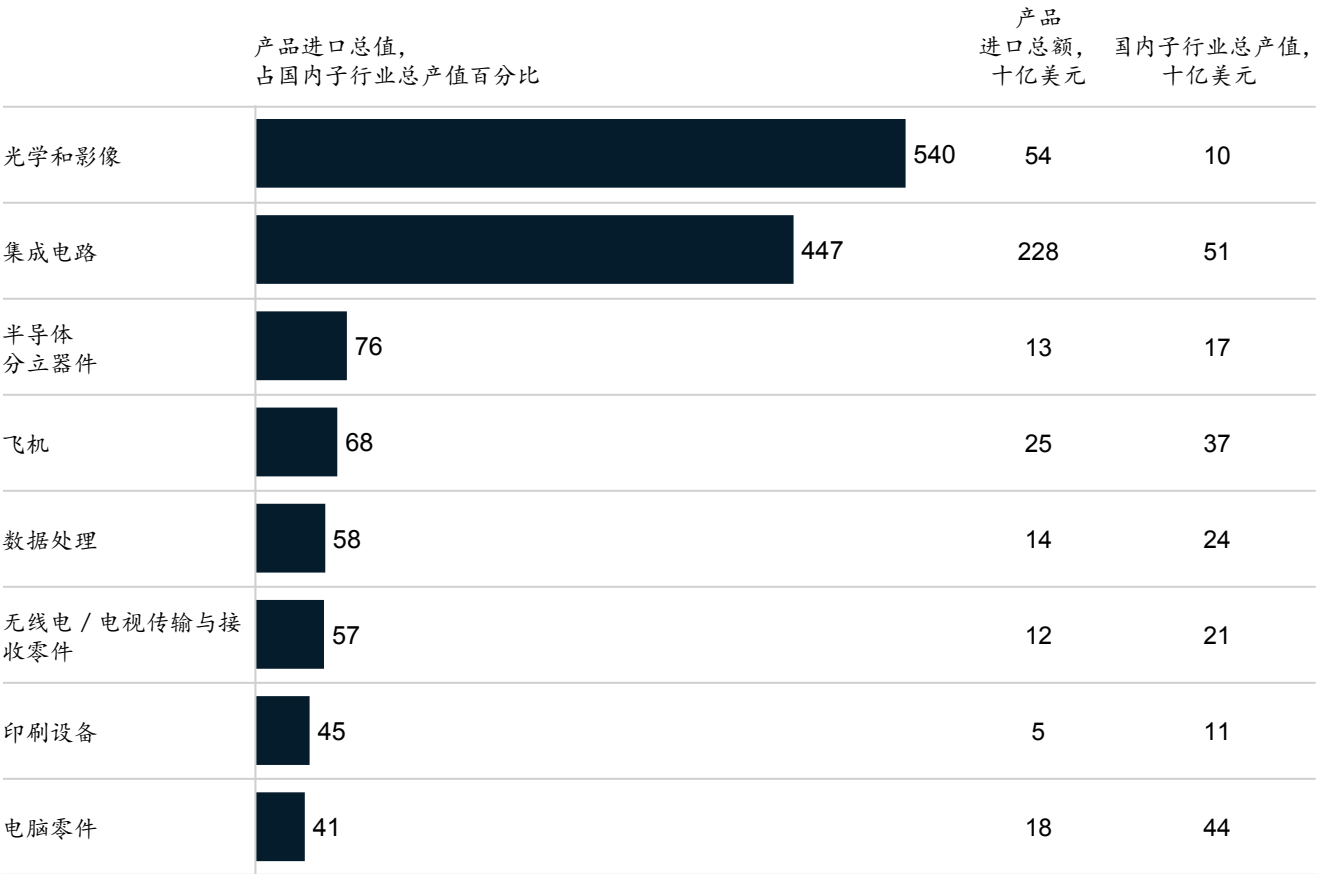
[257] 中国教育部和世界银行数据。

中国的制药企业也在积极创新，以寻求严重疾病的治疗方案。2011-2016 年间，中国本土药企提交的临床试验申请从 21 件增加到了 88 件，年增速高达 33%[258]。这些临床试验实现了多项重大突破，包括第一项完全由国内药企自主开发的主流癌症治疗方案，该方案于 2018 年获批上市[259]。同年，有几家外国药企的产品首先在中国获批，随后才在西方国家获批，这同样是前所未有的情况[260]。

相反，假如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下去，并导致长期关税上涨，政府收紧对外国投资的审查，乃至引发技术禁运，则中国便无法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从而严重影响生产率的提升。对于某些关键技术产品而言，中国对进口的需求度仍然远高于其他的大型经济体。以集成电路和光学设备领域为例，中国的进口额高达国内产值的 4~5 倍（见图48）。这种负面影响的范围当然不只限于中国。在某些高科技行业中，中国贡献了全球 20% 以上的贸易额，假如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有所减弱，世界各国将会失去自华进口技术的机会，从而推高技术成本，抑制全球创新。

[258] Fangning Zhang 和 Josie Zhou, *What's next for pharma innovation in China*, 麦肯锡公司访谈, 2017 年 9 月。
[259] *Chi-Med and Lilly's cancer drug Elunate a milestone for China*, PMLive, pmlive.com/pharma_news/chi-med_and_lillys_cancer_drug_elunate_a_milestone_for_china_1263760。
[260] Denise Roland 和 Preetika Rana, Big Pharma wins drug approval in China ahead of West for first time, 《华尔街日报》, 2018 年 12 月 20 日。

图 48
在部分高科技行业中，中国的进口总额相当于本地总产值的 5 倍之多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国科技统计年鉴》；IHS Markit；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这种联系究竟如何变化，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世界各国对技术流动的态度。每个国家都可以斟酌其国家安全审查的力度，出口控制的范围，对“关键技术”的定义，以及国家的总体开放程度。这些决定反过来又会对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流动产生巨大影响。严格管控将意味着世界与中国的技术流动下降，从而削弱中国作为全球创新平台的机会——这就是所谓“创新-安全”不可兼顾的难题[261]。如果世界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它们便有机会为中国规模庞大且不断扩张的用户群体和数字生态系统提供服务，从而迅速实现技术商业化，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层面解除担忧，对于各国把握这些机遇至关重要。

模拟研究显示，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变化可能导致中国的技术流动规模发生显著变化，最高可影响 12 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加强联系或可催生富有竞争力的创新解决方案，并提高生产率。但减弱联系却会阻碍技术流动，压低投资效率，割裂技术链，使国际社会无力开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 • •

假如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减弱，双方皆可能蒙受严重的价值损失。反之，如果中国继续推行经济改革，加强与全球的纽带，则双方都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目前，我们仍无法确定上述哪一种情境最可能发生。在本报告的最后一章里，我们将探讨企业高管应当如何调整策略，以妥善应对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

[261] Robert D. Williams, *Protecting sensitive technologies without constricting their development,* 布鲁金斯研究学会，2018 年 11 月 30 日。

6 不确定环境下的企业战略制定

如今国际关系剧烈变化，紧张态势随时可能加剧，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企业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不过，正如前文所述，在华企业依然拥有大量机遇——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全球投资和供应大国，坐拥庞大的消费市场，构成了企业制定战略时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在本报告的最后一章中，我们将重点指出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需要关注的 4 个领域，以助其妥善应对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潜在转变。

评估自身在短期和长期受中国与世界之间经济联系变化的影响程度

企业斟酌发展战略之前，应当首先评估自身在短期和长期内对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依存度，从多个角度思考联系变化后将在哪些方面引发风险或机遇。跨国企业应采取高屋建瓴的视角，通过在华营收份额、在华利润等指标来评估自身的依存度。仔细审视经济联系的变化对自身的影响，有助于企业识别额外的风险和机遇。此外，有一些趋势也许会影响那些对中国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和行业，企业也需要密切关注这类趋势。设定明确而具体的指标，有助于企业揭示第 1 章中述及的 8 个维度所对应的依存度，进而确定每个维度中的关键问题（见图 49）。

— **企业。**企业所属行业在中国市场中的竞争态势如何？快速增长的中国企业面临哪些竞争对手？有没有可以帮助自身扩展在华业务的合作伙伴？新近打入中国市场的企业将对本行业造成何种影响？中国企业的增长将对国际同类企业造成何种影响？

— **贸易。**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何种角色？中国的出口总额是多少？用于服务中国市场的进口额是多少？与这些贸易流动相关的关税变动对成本有何影响？如果贸易冲突持续升温，企业可将供应链上的重点业务迁往何地？

— **资本。**目前投入中国的资本总量是多少？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与其他高增长经济体相比有无竞争力？企业可以从中国的对外投资行为中获得何种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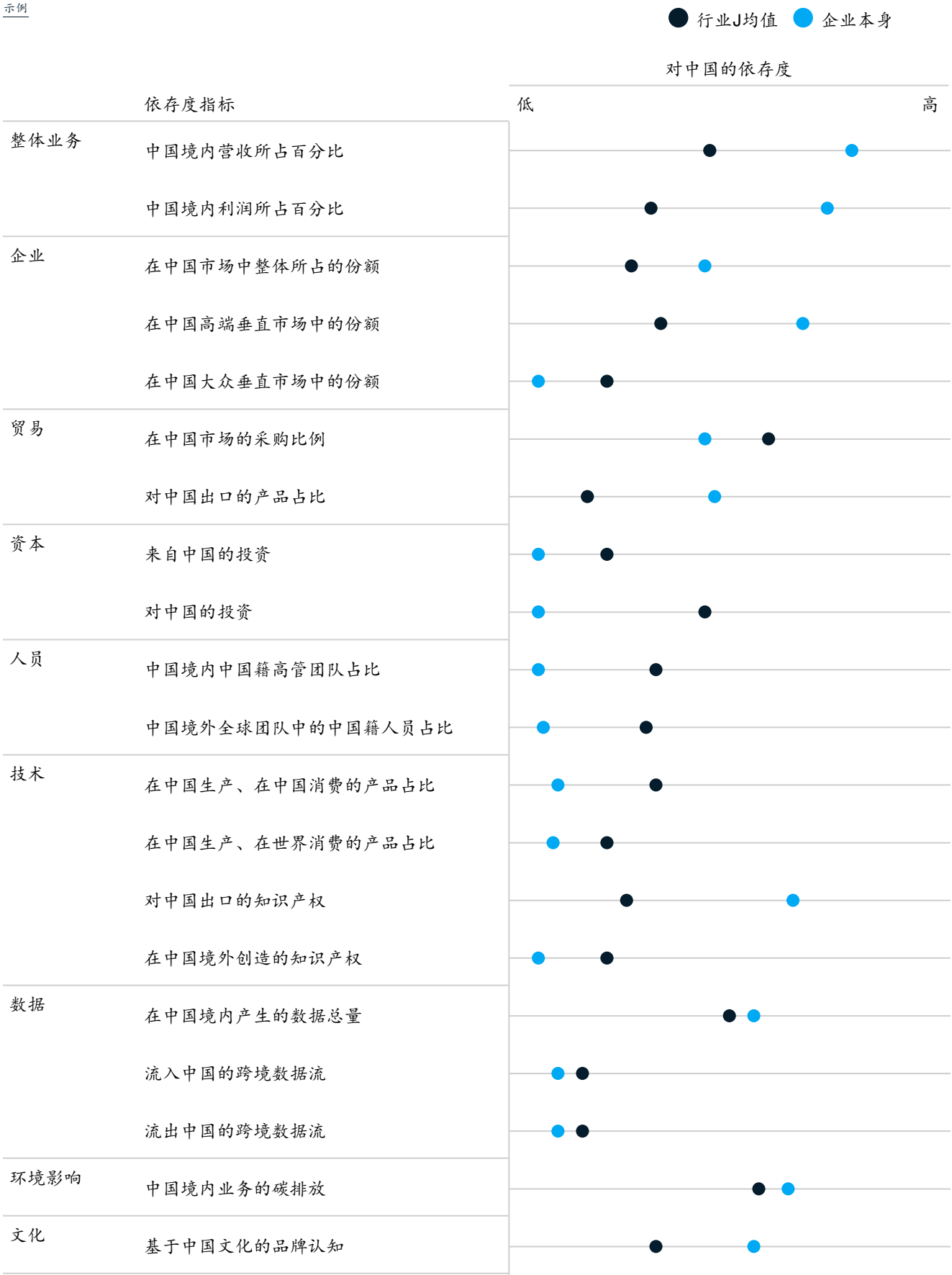
— **人员。**企业是否充分利用了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人才？企业在中国是否有效实现了团队的本地化和充分赋权？为中国境外的中国人提供服务的机会有哪些？中国消费者的旅行目的地有哪些？企业如何从中国游客的境外消费中捕获机遇？

— **技术。**中国是全球创新中心（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市场），还是着重服务于本土市场（立足中国、面向本土市场）？企业是否需要为中国单独开发一条价值链？或者在世界其他地区有现成的价值链可以使用？本地化运营时，企业如何确保在技术转让的同时做好知识产权保护？

图 49

企业不妨从以下 8 个维度来评估自身受中国与世界之间经济联系变化的影响程度

示例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 **数据。**与其他市场采集的数据相比，企业能否使用在中国本土市场采集的数据实现赢利？如果中国收紧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流动方面的限制，企业应如何应对？

— **环境影响。**如果中国继续大力控制碳排放强度，将对企业成本产生何种影响？企业若要降低长期排放成本，需要展开哪些投资？

— **文化。**企业开展品牌建设与营销时，应如何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有哪些潜在的敏感问题？为了应对意外事件（例如社交媒体的不良反响或声誉受损），企业应如何部署风控流程和应急预案？

这 8 个维度中的依存度可分别反映出企业在相应领域的风险和机遇。举例而言，一家企业从中国市场获得的营收和利润的占比很可观，但在多个维度上基本未能融入中国市场：在华研发活动仅维持最低程度，用于拓展业务版图的投资偏少，中国团队中的当地员工占比有限；那么，该企业一旦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在中国拥有专门的研发资源，并积极针对中国政策制定者强化价值主张的企业——它们很可能会败下阵来。一家采用数据驱动型业务模式的外国企业不妨进入中国市场拓展业务，融入当地活跃的数字经济，收集生成的海量数据并将其变现，最终实现在中国境外开发新的知识产权。此外，关注企业在 8 个维度中的整体依存度如何变化，也同样重要。举例而言，如果一家企业日渐依赖对华采购，则可能会因当地竞争态势的变化而损失关键价格区间中的市场份额；作为应对，该企业不妨实施业务多元化，以开辟新的增长点——同时应对潜在的紧张局势升级。

由于很多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指标和问题也许同样契合它们的需要。它们有必要仔细思索自身业务对全球经济的依存度。中国企业如何通过贸易往来服务于全球市场？跨国企业会为中国本土市场带来何种竞争压力？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有哪些竞争优势？如何获取全球资本和国外人才？中国企业在哪些知识产权和技术实践领域中对外国依存度最高？遵守全球环保监管规定需要付出多少成本？全球市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是否会对品牌造成影响，敏感度如何？中国企业应关注其核心业务领域的依存度，以此衡量自身对全球经济的依存度，国外跨国企业也不妨据此衡量自身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

明确投资方向和价值链布局

鉴于上述情境和涉及到的经济价值与每一家企业息息相关，企业高管可通过把中国的投资承诺等指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以确定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战略，并确定中国在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上扮演何种角色。企业应当从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演变方向出发，评估自身在各情境下的依存度，借此厘清联系变化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一种极端情况在于，假如企业面临潜在的不确定性，依然对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和长期发展轨迹怀有信心，那么不妨向中国市场加倍投入资金。当然，企业也可以缩小投资，选择更保守的发展路径，尤其是面临联系减弱的情境时。

企业最终制定的战略应当综合考虑过各种情境与技能，完全能够抵御短期波动。即便世界经济大环境处于最为良性稳定的时期，关注长线思考而非短期规划也是必要的做法。麦肯锡的一项研究发现，采用长线思维模式的企业与较为短视的同类企业相比，营收高出 47%，市值高出 58%[262]。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变化，可能导致企业制定的优先事务彼此冲突。因此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营环境下，关注长期价值创造显得格外重要。就中国市场而言，企业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摒弃短期噪音的干扰。**本报告成文之时，关于中国经济下行的论调沸沸扬扬，理由包括贸易战的对峙，以及日益攀升的债务。不过，如果能够意识到中国经济基本面在许多方面依然动力十足，企业就不会丧失信心。正如第 4 章所述，消费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依然强劲，包括收入上升、代际转移以及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升级倾向。拉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城市化进程仍将持续。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也很可能继续存在。对中国消费增长的动力抱有信心的企业早已摒弃短期噪音的干扰，大力投资中国市场。举例而言，特斯拉在上海斥资 50 亿美元规划的工厂已经破土动工，初期目标为一年生产 25 万辆电动汽车。这是特斯拉在美国境外设立的第一座工厂，旨在帮助企业规避进口关税[263]。宝马也已宣布增持其与华晨汽车设立的合资企业的股份，斥资 36 亿欧元将持股比例从 50% 提高到 75%[264]。星巴克计划到 2023 年时，将在华门店总数提高一倍，达到 230 座城市、6000 家门店的规模，这意味着每15小时就有一家新店在中国开张[265]。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生物技术公司安进 (Amgen) 与中国的先声药业设立了合资企业，以联合开展生物仿制药的开发和商业化。法国保险公司安盛 (AXA) 正出资逾 6 亿美元买断其在华合资子公司的全部股权[266]。

— **明确在中国和走出中国的长期"愿景"。**企业应当明确自己在中国发展的长期愿景——希望把中国市场作为业务增长的关键引擎，还是只想将其作为业务发展的一小部分？选择既然有所不同，所需要的业务模式和资金投入也大不相同[267]。其中一种方法是把中国市场作为全球业务增长的核心。这需要企业做出一些大胆的举措，例如把总部迁至中国，或者制定战略、入乡随俗，把自己变成一家"中国企业"。与之相反，澳大利亚的澳新银行 (ANZ) 则在中国采用利基战略，聚焦于认为自己占优势的业务板块 (例如农业、资源、医疗等)，并且重点对接那些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有联系、并将其作为业务重点的中国企业[268]。招商局集团也明确制定了长期在华发展愿景，并据此布局投资，一跃成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之一 (营收达 400 亿美元，跻身全球财富 500 强企业之列)。1979 年，该集团向蛇口经济特区投资 6000 万元港币，成为最早乘上改革开放东风的中国企业之一，近年来又向"中国新纪元科技基金"投资60亿美元，大胆涉足风投业务[269]。2013年，麦肯锡公司联手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 (CPPIB) 开展了一项"立足长远、聚焦资本"调查，邀请 474 名受访者投票选出长线决策中最重要的因素。结果显示，聚焦于关键指标，有助于高管人员转变思维方式、注重长线决策。调查也揭示了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客户满意度：45% 的受访者将其选为在发展中经济体开展业务的首要任务，41% 的受访者则视之为发展全球业务的首要任务。对比之下，只有 12% 和 13% 的受访者将股市的表现视为在发展中经济体和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重点。

[262] Dominic Barton、James Manyika 和 Sarah Keohane, Finally, evidence that managing for the long term pays off,《哈佛商业评论》, 2017 年 2 月 9 日; Dominic Barton, Capitalism for the long term,《哈佛商业评论》, 2011 年 3 月。

[263] *Elon Musk in China to break ground for first Tesla factory outside U.S.*, 彭博新闻, 2019 年 1 月 7 日。

[264] *BMW to take control of China venture Brilliance Automotive,* BBC 新闻, 2018 年 10 月 11 日。

[265] Wang Zhuqiong, Starbucks aims to increase stores, revenue in China over 5 years,《中国日报》, 2018 年 5 月 16 日。

[266] Enoch Yiu, AXA to pay US$662 million for full control of China joint venture, as Beijing speeds up opening before Xi-Trump meeting,《南华早报》, 2018 年 11 月 27 日。

[267] Jeff Galvin、Jimmy Hexter 和 Martin Hirt, Building a second home in China, *McKinsey Quarterly*, 2010 年 6 月。

[268] Xiaoguang Huang, China strategy: Focus on the niches, bluenotes, 2017 年 12 月 18 日。

[269] *China Merchants Group,*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拉脱维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2016年2月2日; Zhang Hongpei, Shekhou, a symbol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环球时报》, 2018 年 2 月 25 日。

关注长期战略和愿景同样也会让中国企业受益。虽然对部分行业而言，中国是全球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但随着 GDP 增速放缓（这一趋势符合预期）、竞争日益加剧，抢占国际市场份额的竞争必将愈发激烈。对中国经济长期基本面的评估，有助于企业将投资和资源集中于可能产生最大价值的领域。服务中国以外的市场需要培养新的业务能力，中国企业必须思考如何投资价值创造，以便在与外国企业的角逐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国外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已达

1,500个

2000年仅有

200个

— **根据战略确定投资重点。**如果大环境充满变数，增长又面临压力，许多企业都会转而限制现金流出，准备实施撤出战略。但在这种时期，也许企业反而需要扩大投资，以确保长远的价值创造。麦肯锡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扩大研发支出的企业虽然在市值上经历了更大的波动，但最终的业绩却更为出色[270]。

另一种有效的做法，则是在全球技术流动波动加剧之际大力投资技术创新。如今，国外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已超过 1500 家，而 2000 年时仅有 200 家[271]。以瑞士药企罗氏集团（Roche Group）为例，它向其上海创新中心投资 1.26 亿美元用于研发新型抗生素和乙型肝炎治疗方案。美国食品巨头亿滋国际（Mondelēz International）也在苏州设立了研究中心。中国企业也正在努力扩大创新与全球协作，尽管技术研发的不确定性很高。举例而言，大力投资研发之后，万华化学得以开发出一种专用的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制备流程，从已在市场中完全普及的核心产品，转向附加值更高的生产活动。万华借此抓住了业内特种垂直市场需求增长的良机，而且全球只有 4 家企业与它争夺领导地位。如今的万华已在北美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绿地投资，并且收购了匈牙利规模最大的化工集团，近年来又成为第一家获得“ICIS 年度最佳企业”称号的中国企业[272]。

[270] Dominic Barton、James Manyika 和 Sarah Keohane, Finally, evidence that managing for the long term pays off,《哈佛商业评论》, 2017 年 2 月 9 日。

[271] Nick Marro, Foreign company R&D: In China, for China,《中国商业评论》, 2015 年 6 月 1 日; Dominique Jolly、Bruce McKern 和 George Yip, *The next innovation opportunity in China,* Strategy + Business, 2015 年 7 月 27 日。

[272] 万华化学, *Cracker Project part of 'eco-chain' integration*, 博客网站 The Urethane Blog, 2018 年 12 月 17 日。

培养自身的卓越运营能力，以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动荡的环境中经营业务，需要某些特定的组织能力。麦肯锡的一项调查显示，早在 2015 年，各类企业就已窥见了业务波动的端倪。调查中有 84% 的受访者表示“地缘政治不稳定”会对其全球业务造成“重大”或“非常重大”的影响。但只有 13% 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企业已采取了积极措施来应对这些风险[273]。准确把握地缘战略风险是企业应有的一项能力，这说明企业能够预测风险，并判断风险将对自身造成何种影响。制定风险缓解战略，有助于企业降低高敏感型风险。对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依存度较高的企业不妨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 **加强与相关监管机构的沟通。**鉴于监管机构已经对跨境交易（例如并购交易，尤其是涉及技术转让的并购交易）表现出了更多关注，企业需要时刻留意政策形势的变化以及管控升级的可能。政府虽然有创造经济价值的强烈愿望，但也要兼顾国家安全等其他因素。了解这些因素，并与相关监管机构积极对话，对于理解和打消后者在经济和非经济层面上的顾虑十分重要。

  中国企业尤其需要加强对全球利益相关方的了解和管理，在境外开展业务的企业还要了解当地环境，将引发争议和紧张情绪的风险降至最低。举例而言，有些能源和资源类企业曾因成本严重超支而不得不撤销某些项目，因为与地方政府官员缺乏协调而不得不收购海外资源，或者对于当地监管及文化管制要求简直一无所知[274]。一家中国房企曾在欧洲收购了一块地产，但因为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反对而无法按期开工[275]。

  对管控及经营门槛的出色管理，未来仍将是在华外企的一项重要能力。开展一项业务，需要经过中央政府、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层层批准，企业必须清楚了解各个层级的监管要求、准入门槛和机会，方能取得成功。在这一方面，外国企业有过不少成功先例。早在 2008年，通用汽车便与中国国企上汽集团共同设立了合资企业，从而开辟了中国市场的业务通道。后来，金融危机导致通用汽车陷入破产危机，连美国政府的救助也无法帮它维持海外业务之际，通用凭借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拿到了 4.91 亿美元的流动资金援助[276]。双方关系经过此次救助变得更为紧密，通用汽车的在华合资企业的产量逐年增加，还出口到了美国等发达市场。政府与债权机构的支持以及实际获得的资本，都是企业渡过危机的重要因素。美国化工巨头陶氏 (Dow) 也与中国环境保护部（现为中国生态环境部）合作，以提升其在华管理可持续发展挑战的能力，并设计新的发展计划和政策。

[273] *Geostrategic risks on the rise*，麦肯锡公司，2016 年 5 月。
[274] Wayne Arnold, China's global mining play is failing to pan out，《华尔街日报》，2014 年 9 月 15 日。
[275] Chinese firms should be wary of overseas obstacles，《环球时报》，2017 年 12 月 7 日。
[276] Edward Niedermeyer, *The secret history of GM's Chinese bailout*, Quartz, 2016 年 1 月 24 日。

— **关注当地环境：**业务环境一旦变化，企业便可能面临严峻的经营风险，因此密切关注和了解当地环境将变得愈发重要。跨国企业常常也是母国的“企业外交家”，但假如母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该企业便会面临风险。在 2017 年中韩两国关系降至冰点的那段时期，赴韩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下降了 50% 以上[277]。2012 年中日关系紧张，导致当年日本某汽车制造商的销售额下滑了 50%[278]。类似情形也将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中国曾将一座海洋石油钻井平台架设到越南专属经济区内，于是中国的采购企业出于对政治形势的担忧，纷纷关闭了在越南的业务[279]。

跨国企业还应了解市场当地的公众情绪及行为，以妥善应对客户群体接受度的问题[280]。某欧洲奢侈品牌在中国策划了一场营销活动，却被批为“文化麻木”，引发了中国消费者的强烈抵制。某全球连锁酒店品牌由于误将某些特定地区列为了独立国家，不得不临时关闭其官方网站在中国境内的访问入口。某欧洲服装品牌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几家航空公司也遭遇过类似困境。企业需要加强风险管理实践以规避意外，此外还需要在中国及世界其他市场设置应急流程，从而在意外发生后尽量止损，并重新获取消费者的信任。

麦肯锡 2018年的调查显示，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视为首要顾虑的受访者占比为

33%

— **打造敏捷灵活的业务版图。**跨国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尤其严重——英国计划脱欧与中美贸易冲突便是两个典型例子。2018年9月发布的“麦肯锡全球高管调查报告”显示，33%的受访者表示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是他们的首要顾虑，而25%的受访者表示近来的关税上调是他们最担忧的问题[281]。企业应该未雨绸缪，在形势朝着不利或复杂的方向演变之际，灵活调整其业务经营版图。很多企业确实也是这样做的。目前全球的汽车企业都在调整麾下产品线以及出口计划，以尽量减少关税调整的冲击。三菱为了规避美国进口关税，已经把电火花加工机和激光加工机的生产业务从大连迁移到了名古屋。

一些企业也在考虑前往相对更为“政治中立”的国家开展业务。考虑到中国目前的贸易局势，东南亚地区或将受益匪浅[282]。2018 年 11 月，瑞银集团 (UBS) 对全球 200 家制造企业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有 37% 的受访企业表示在过去12 个月里曾将部分生产业务迁出中国，另有 33% 的企业表示计划在未来6~12个月里将业务迁出中国[283]。美国商会开展的“2018年商业环境调查”显示，计划将生产业务迁出中国的美国企业中，有 49% 正在积极开辟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机会[284]。中国企业也不妨与相对中立的国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降低与全球经济彼此脱离的风险。中国制造企业已经开始在东南亚等成本更低廉的地区寻找机会，对于产品易受关税变化影响 (家具、纺织品等) 以及贸易冲突影响 (电子产品等) 的企业而言，该地区或将为其提供良好的生产环境[285]。

[277] *Chinese tour agencies resume operations in S. Korea,* 韩国联合通讯社，2017 年 12 月 19 日。
[278] Lisa Tam 和 Soojin Kim,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 China,《亚太通讯期刊》，2017 年 1 月，第 27卷，第 2 期。
[279] Condoleezza Rice 和 Amy Zegart, Managing 21st-century political risk,《哈佛商业评论》，2018 年 5-6 月。
[280] Lisa Tam 和 Soojin Kim,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 China,《亚太通讯期刊》，2017 年 1 月，第 27 卷，第 2 期。
[281]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 年 1 月。
[282] George Yeo, China's trade war pain can be ASEAN's gain: How Southeast Asia is reaping a windfall of shifting trade and investment,《南华早报》，2018 年 10 月 16 日。
[283] *Companies have started shifting their supply chains,* CNBC 对瑞银集团全球财富管理部 Kelvin Tay 的采访，2018年 11 月 7 日，https://www.cnbc.com/video/2018/11/07/companies-have-started-shifting-their-supply-chains-ubs.html。
[284] 《2018 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商会，2018 年 1 月。
[285] Lien Hoang, *Southeast Asia eyes windfalls from U.S.-China trade war*, 彭博法律，2018 年 10 月 15 日。

培养并保持“幸存者”心态

中国企业对于危机并不陌生——事实上，中文的“危机”一词，正是由“危险”和“机会”两个词组合而成。近几十年间，国外跨国企业经历了多次冲击，包括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破裂，还有 2008 年的经济大萧条。然而，当前环境的复杂性却自有其独特之处：世界各国对中国空前关注，而中国经济也在努力寻求转型发展。面对这些风险，企业不妨借鉴此前数次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的“幸存者”的经验。以下是这些企业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 **改善资产负债表，保持通畅的融资渠道。**若想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持续创造经济价值，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确保企业拥有强健的资产负债表，并且维持以优惠条件获得资金的渠道。企业应当思考自己能否设法减少负债，例如抛售非经营性资产。举例而言，上世纪 90 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制造企业的债务股本比飙升到了 400% 左右。大宇集团、韩宝、起亚等大型企业原本都是人们眼中“大到不能倒”的企业，却陆续以破产告终[286]。成功渡过危机的都是那些采取措施降低债务、改善资产负债表的企业[287]。现代与起亚合并，在韩国国内市场占据了领先地位，坐拥 70% 以上的市场份额；如今现代已成为全球第七大汽车集团[288]。而对于美国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而言，保持健康的资产负债表意味着即使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该公司依旧有能力投资高盛集团和美国银行的股票。

— **留意收购和重组的机会。**危机四伏的大环境也提供了低价收购企业的机会。擅长择机出手收购的企业无不充分利用了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2009 年是全球经济大萧条结束后的第一年，美国银行斥资 500 亿美元收购了美林证券，由此组建了美国目前规模最大的银行[289]。2001 年，通用汽车收购大宇汽车，获得了大宇在小型车垂直市场的优势资源[290]。2008 年，塔塔汽车 (Tata) 从福特集团手中收购了捷豹路虎，捷豹路虎的营收随即从 2008 年的 50 亿美元飙升至 2016 年的 240 亿美元。

具有挑战性的经济环境也会加剧企业的动力和紧迫感，这正是企业着眼长期发展而大胆进行战略抉择、重组企业所不可或缺的魄力。“幸存者”企业将亚洲金融危机作为催化自身业务模式改造、提高运营效率的有利条件。举例而言，三星当年出台了一系列重组计划，到 2005 年时已然成为韩国利润最高的企业之一，可与日本和美国的同行一较高下[291]。2008 年经济萧条期间，美国办公用品巨头史泰博 (Staples) 关停了部分业绩欠佳的工厂，但却将员工人数扩大了 10%，这主要是为了支持麾下新推出的高端产品和服务。同时，史泰博也开始严格控制其运营成本[292]。美国快餐连锁品牌百胜餐饮将中国市场的业务从全球业务中剥离，打造了一套更为精简的全球业务模式[293]。最近更有数家中国开发商抓住了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机会，设立基金收购小型开发商和不良房地产债务，从而加速了整个行业的整合[294]。

[286] Kim Kihwan, *The 1997–98 Korean financial crisis: Causes, policy response, and lessons*, 新兴市场经济危机预防系列讲座, 新加坡, 2006 年 7 月 10-11 日。
[287] Martin Fackler, Lessons learned, South Korea makes quick economic recovery, 《纽约时报》, 2011 年 1 月 6 日。
[288] Russell D. Lansbury、Byoung-Hoon Lee 和 Seoghun Woo, *Technology, human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Korean auto industry,* 国际科学、技术与创新大会：新兴国际政策议题, 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2002 年 9 月 23 日-24 日。
[289] Bank of America completes Merrill Lynch purchase, 路透社, 2009 年 1 月 1 日。
[290] Choe Sang-hun、Daewoo, GM finds gold in overall gloom, 《纽约时报》, 2006 年 5 月 23 日。
[291] As good as it gets? Can a leading consumer-electronics giant keep getting stronger? 《经济学人》, 2005 年 1 月13 日。
[292] Ranjay Gulati、Nitin Nohria 和 Franz Wohlgezogen, *Roaring out of recession,* 《哈佛商业评论》, 2010 年 3 月。
[293] Julie Jargon, Yum looks to be leaner after China spinoff, 《华尔街日报》, 2016 年 10 月 11 日。
[294] Don Weinland, China developers snap up distressed real estate debt, 《金融时报》, 2019 年 2 月 18 日。

• • •

从很多维度来看，中国目前都已跻身全球大国之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领先的贸易国家。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从依赖出口转向以内需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变化。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降低，但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在不断增加。保护主义在许多国家有抬头之势。当然，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也有减弱的可能。我们的分析显示，如果联系真的减弱，双方都将可能损失巨大的经济价值；相反，加深彼此之间的融合却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全球企业多少都已习惯了应对经济压力，但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发展态势从未像今日这样利害攸关。企业领导者必须妥善制定发展战略，才能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存活下去，实现繁荣发展。

和谐号

技术附录

该附录旨在提供关于本报告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详细信息，将述及以下方面：

1. 资料来源
2. MGI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
3. 各国依存度
4. 各行业依存度
5. 中国供应商在技术价值链中所占份额
6. 受影响的经济价值

1. 资料来源

我们使用来自于广泛来源的数据对我们研究中的要点进行了量化，包括：

- **GDP**。包括名义GDP和购买力平价GDP，我们采用了世界银行的数据。
- **贸易**。对于第一产业和制造业的进出口情况，我们采用了IHS Markit的数据。对于服务业的进出口情况，我们采用了全球输入输出数据库的数据。对于中国的双边进出口情况，我们采用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于美国的双边进出口情况，我们采用了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对于通过知识产权和技术服务收费评定的技术进出口情况估算，我们采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收支数据。对于中国进口技术的价值估算，我们采用了《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
-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给定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估算，我们采用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对于中国的双边外商直接投资和双边对外直接投资估算，我们采用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 **研发开支**。对于各国研发开支总额估算，我们采用了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
- **其他指标**。对于各国产值总额、消费总额和资本支出总额，我们采用了IHS Markit的数据。

2. MGI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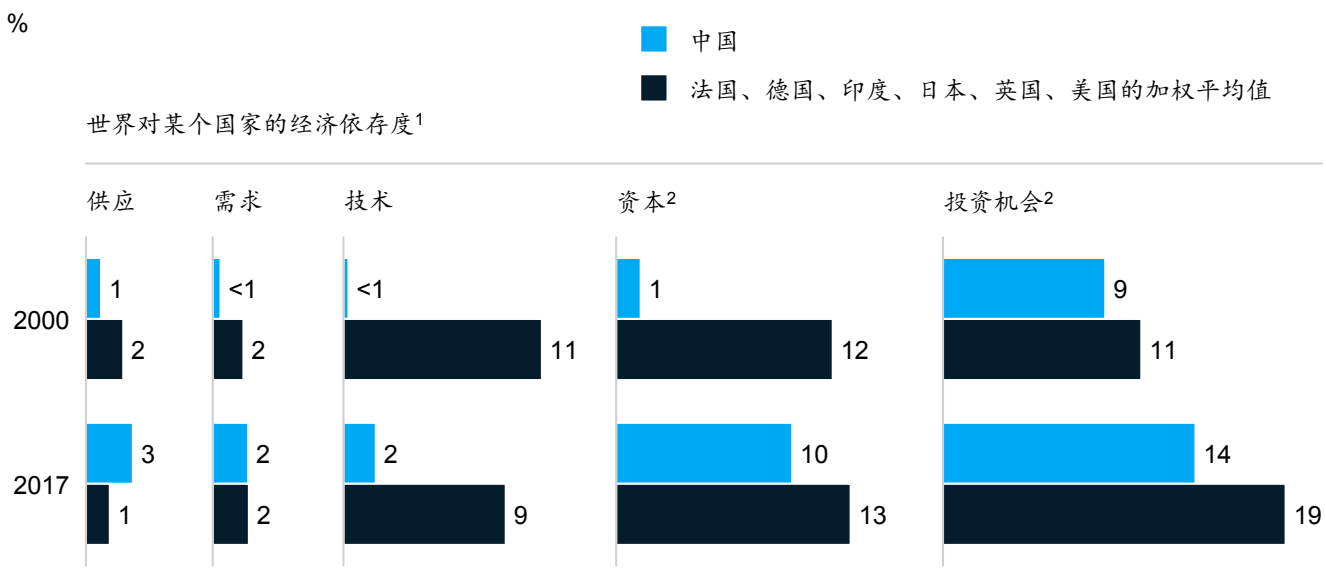
为计算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对依存度和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的相对依存度，我们审视了经济流动的三个维度——贸易、资本和技术，然后编制出了“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贸易方面，我们考虑了对一国供应（该国出口额除以世界其他地区消费额）和需求（该国进口额除以世界其他地区产值）的依存度。资本方面，我们考虑了对一国资本（该国对外直接投资除以世界其他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和投资机会（该国外商直接投资除以世界其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依存度。技术方面，我们考虑了对一国技术出口（该国知识产权和技术服务及设备出口额除以世界其他地区研发开支）的依存度。

我们首先衡量了过去20年里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依存度。接着，我们计算出其他大型经济体（分别是法国、德国、印度、日本、英国和美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以进行对比。我们将世界与七个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平均依存度指数设为1.0。如果数值高于1.0，说明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平均而言高于对七个大型经济体的依存度，而如果数值低于1.0，则说明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低于对七个大型经济体的依存度。该指数衡量的是跨境经济流动中进口相比出口对一个经济体而言的相对重要性。我们知悉，这一时期内流入和流出中国的经济流动绝对规模（出口和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流动）均有所增长（见图A1）。

最后，在将所有指标累加为一个最终指数时，我们采用了如下的权重分配方式：各项贸易相关指标为35%（对供需的依存度），其余各项指标为10%（对资本、投资机会、技术的依存度）。

图 A1

相对于其他大型经济体，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上升



1 整体指数的计算方式为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除以世界对基准经济体的依存度，我们将对供应和需求依存度的权重设置为35%，将对其他指标的依存度权重设置为10%。世界对某个国家供应依存度的计算方式为该国出口额除以世界其他地区的消费总额。世界对某个国家需求依存度的计算方式为该国进口额除以世界其他地区的总产值。世界对某个国家技术依存度的计算方式为该国技术的出口额除以世界其他地区的总研发支出。世界对某个国家资本依存度的计算方式为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除以世界其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世界对某个国家的投资机会依存度的计算方式为该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除以世界其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2 三年滚动平均值；2000 年的数据不可用，因此我们使用了 2007 年的依存度数据

资料来源：IHS Markit；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3. 各国依存度

为评估世界对中国及其他各国的依存度，我们汇集了73个国家的双边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动数据。我们专门研究了三项指标：对中国出口占国内产值百分比，从中国进口占国内消费百分比，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百分比。为了说明依存度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我们查看了相隔10年的两个时期（2003—2007年和2013—2017年）。我们从这两个时期里分别截取了一段为期5年的时间，以便将分析的季节性因素控制至最低。最后，我们根据各经济体的依存度模式对国家基模进行了定义。我们对“地理位置靠近”依存的经济体的定义是位于亚洲地区的经济体；它们对中国供需的依存度相对较高，各自在中国消费或产值中占比均不低于6%。我们对“资源相关”经济体的定义是对中国需求的依存度格外高（对中国出口不低于总产值的8%）。我们对“资本”依存经济体的定义是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依存度相对偏高，占到国内投资的3%以上。

4. 各行业依存度

为评估世界对中国不同行业的依存度，我们首先观察了贸易密集度，该指标的定义为各行业总出口占行业总产值百分比。接着，我们评估了中国在全球进出口中所占份额，以此确认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相对重要性。与各国依存度分析相同，我们选取了两个分别为期5年的时段，用于说明依存度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从2003年到2007年，以及从2013年到2017年。最后，我们根据各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规律对行业基模进行了定义。我们对"高整合度"行业的定义是贸易密集度高，起码占到全球总产值的30%，且中国在全球出口（起码17%）和全球进口（起码9%）中均占到很大份额的行业。我们对"对中国出口高依存度"行业的定义是贸易密集度相对较高（起码占到全球总产值的10%），且中国在全球出口中占到很大份额（起码13%）的行业。我们对"对中国进口高依存度"行业的定义是贸易密集度相对较高（起码占到全球总产值的10%），且中国在全球进口中占到很大份额（起码12%）的行业。我们对"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低依存度"行业的定义是贸易密集度高（起码占到全球总产值的28%），且中国在全球出口或进口中所占份额不到10%的行业。最后，我们对"本地生产本地消费"行业的定义是贸易密集度相对较低（不足全球总产值的15%）的行业。

5. 中国供应商在技术价值链中所占份额

我们研究了12条技术价值链（光伏面板、高速铁路、电子支付、风力涡轮机、电动汽车、货船、农业器械、智能手机、云服务、机器人、半导体、飞机），分析了中国供应商在本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最终使用"技术市场中所占到的份额。分析本地供应商在本国价值链内所占份额时，我们首先找到所涉各个市场中的代表性产品。接着，我们将这些产品按照基本组件进行拆解，通常体现为物料清单的形式。针对清单上的每一个组件，我们分析了中国供应商在本国价值链内所占到的份额。最后，我们针对每种基本组件求得加权平均值，累加出各条完整价值链上的中国供应商所占份额。我们承认，一种只以基本组件为研究对象的分析方法存在局限，其结果可能不同于基于组件的更深度分析。

6. 受影响的经济价值

我们模拟出了可能因中国与世界联系加强或减弱受损或获利的总价值。我们知晓，我们的模拟基于特定的条件和假设，故其结果不得被视作为预测。但是，我们所做的模拟确实指向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会关系到十分庞大的价值。我们的建模过程分为三步：

第一步：定义联系在不同程度上的加强或减弱会对经济驱动力造成的影响以及相应的传导机制

贸易流动可能影响到世界各地的消费、物价和就业。放开服务业市场，可能会因为竞争加剧和最佳实践转让，对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作用，又因为经济效率的提高，促使制造业也参与到间接利益的分配中来。金融业的现代化，可能会改善资源配置，进而加强整个经济的资本生产率。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增加，可能会因碳减排和气候变化解决方案实现成本规避，并且通过满足当前需要的数据流量增加和基建投资充足实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技术协作可能促进知识流动和采纳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进而改善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步：收集和查阅一些作为参考信息评测联系所致经济影响的外部研究

我们针对中国可能加强（以及反之减弱）联系的五个领域，找出了超过20篇提供全球经济影响相关证据的论文。这些领域包括：

贸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美贸易战将分别对中国GDP和全球GDP造成0.6%和0.4%的长期性负面影响。[295]同样，经合组织于2018年11月预测，中美两国在此阶段已经开始征收的关税，到2020—2021年时可能促使两个经济体的产值放缓0.2%到0.3%，全球贸易量下降0.4%左右，两个经济体的进口量之和下降0.75%左右。[29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共同编制的一份报告发现，关税每降低1%，行业生产率便会相应提高2%。[297]有研究预测指出，从1994年至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扩大，促使非石油类消费品的价格下滑了27%。[298]对于某些以中国为大型供应国的商品，例如稀土金属等，观察人士指出，其价格完全可以因为中国出口管控，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便上涨7到8倍。[299]其他研究则预测，稀土价格将在近期上涨10%到50%。[300]反之，丧失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则可能引发商品遭受负向的价格冲击。有研究发现，在2003年到2012年间，中国的GDP增速成为了铁矿石价格的最大决定因素。[301]

295 《*World Economic Outlook:Challenges to steady growth*》，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10月。

296 《经合组织经济展望》，第2018卷，第2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8年。

297 《*Making trade an engine of growth for all:The case for trade and for policies to facilitate adjustmen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2017年4月10日。

298 Lawrence J. Lau、Junjie Tang合著的《*The impact of U.S. imports from China on U.S. consumer prices and expenditures*》，香港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工作论文第66号，2018年5月，igef.cuhk.edu.hk。

299 Robert Castellano著《*A new China rare earth embargo would damage several U.S. companies'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Seeking Alpha，2018年6月28日。

300 Barbara Lewis、Ernest Sheyder合著的《*China cutting rare earth output, unnerving global manufacturers*》，路透社，2018年10月24日。

301 Linda Wårell著《*An analysis of iron ore prices during the latest commodity boom*》，《矿产经济学》，2018年，第31卷，第1-2期。

服务。世界银行、美国农业部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联合开展的研究发现，服务贸易管制若是放松50%，中国特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高将可达到3.55%。[302]同样，有预测表示，放开服务业市场可以促使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9.2个百分点。[303]另一项研究发现，服务贸易市场的自由化，可促使福利和家庭收入增加5.3%。[304]还有分析发现，（通过引入竞争、开放外商直接投资、设立独立监管机构）全面实现电信业和金融业市场自由化的国家，其GNP增速要比没有实现市场全面自由化的国家高出1.5个百分点。[305]

金融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如能有效解决中国的"僵尸企业"问题，将可促进生产率每年提高0.7%~1.2%[306]。有研究预测，如果中国在资本配置上采用一种更为现代化的做法，资本生产率将可提升30%~50%[307]。另一分析则估计，资本错配导致中国企业在营收方面总计遭受了20%的损失308。其他研究罗列了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在信贷繁荣时期的种种相似之处，并预测中国最终也会迎来同样的崩盘[309]。

治理与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方面，伦敦经济学院开展的一项研究预测，对碳排放和其他有害气体排放的控制，将可在每年成功规避1万亿美元的成本[310]。同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现有文献的趋势分析发现，针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可促使全球GDP增长高达5%。[311]经合组织预测，旨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决定性转变，到2050年将可为GDP带来2.8%的正向影响（若将规避的损失一并计算在内则为4.7%）[312]。反之，部分研究人员预测，管理全球气候变化未果所产生的成本约达 17 万亿美元[313]。数字化治理方面，世界经济论坛有报告预测，数据本地化可能对 GDP 造成 1.3% 的负向影响，而数据全球化则可带来0.4%的正向影响。[314]同样，有分析预测，数据本地化可能因对跨境流动的钳制，导致GDP减少1%到2%。[315]对公司而言，从事安全行业的企业Leviathan Security Group表示，数据本地化的相关法规可能导致IT成本增加30%到60%。[316]牛津经济发现，如果填补上全球的基础设施缺口，全球GDP将可增长2.7万亿美元[317]。

---

302 Sherman Robinson、Zhi Wang、Will Martin合著的《Captu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services trade liberalization》，《经济制度研究》，2002年，第14卷，第1期。

303 Oleksandr Shepotylo、Volodymyr Vakhitov合著的《*Impact of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on productivity of manufacturing firms:Evidence from Ukrainian firm-level data*》，讨论文件第45号，基辅经济学院，2011年。

304 Denise Eby Konan、Keith E. Maskus合著的《*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in a developing country*》，政策研究工作论文第3193号，世界银行，2004年。

305 Aaditya Mattoo、Randeep Rathindran、Arvind Subramanian合著的《*Measuring service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An illustration*》（英文版），政策研究工作论文第WPS2655号，世界银行，2001年。

306 W. Raphael Lam等人合著的《Resolving China's zombies:Tackling debt and raising productivity》，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11月27日。

307 Chang-Tai Hsieh、Peter J. Klenow合著的《Misallocation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经济学季刊》，2009年11月1日，第124卷，第4期。

308 Zheng (Michael) Song、Guiying Laura Wu合著的《*Identifying capital misallocation*》，2015年1月。

309 Sally Chen、Joong Shik Kang合著的《*Credit booms—is China differen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1月5日。

310 Simon Dietz、Sam Fankhauser合著的《*An economic solution to climate change that could save trillions*》，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14年。

311 Terry Barker、Katie Jenkins合著的《*The costs of avoiding dangerous climate change:Estimates derived from a meta-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年。

312 《*Investing in climate, investing in growth*》，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年6月。

313 Tom Kompas、Van Ha Pham、Tyong Nhu Che合著的《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GDP by country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gains from complying with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地球未来》，第6卷，第8期，2018年7月13日。

314 Robert Pepper、John Garrity、Connie LaSalle合著的《Cross-border data flows, digit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刊载于《2016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

315 Erik van der Marel、Hosuk Lee-Makiyama、Matthias Bauer合著的《*The costs of data localization:A friendly fire on economic recovery*》，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2014年5月。

316 《*Quantifying the cost of forced localization*》，Leviathan Security Group，2015年。

317 《*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牛津经济，2017年7月。

技术。有研究发现，“落后国家”与“技术领先国家”的TFP融合，与技术扩散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关联。[318]对于相关的量化结果，有研究预测，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联合设立的合资企业，在生产率上要比同行业的本地企业高出29%，外国企业的存在也在对本地企业造成竞争压力，可促成本地企业的绩效改善。[319]另一研究则将“东亚四虎”（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的TFP增长1.5%至3.7%不等归功于扩大了对外国技术的大量采用。[320]

第三步：结合麦肯锡全球增长模型（GGM）与外部建模，综合外部研究结果，对加强联系和减弱联系这两种情境进行模拟

接着用GGM的2040年基准情境与两种情境——减弱联系和加强联系——进行对比，GGM的2040年基准情境利用时间序列趋势，基于长期性趋势建立全球经济的前瞻性情境，包括人口结构变化、生产率增长和贸易情况。历史数据集方面，我们采用1980年至2016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我们基于逾100个经济体的生产函数建立了相应的等式。两种情境与基准情境的不同分别代表着加强联系带来的上行机会和减弱联系带来的下行风险。

调整GGM的宏观经济变量。麦肯锡GGM采用一种一般均衡计算生成各类情境预测，其中用到的宏观经济指标超过100种。我们为不同情境——即减弱联系或加强联系——下的主要输入变量建立不同的“冲击”模型，包括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商业利率、消费品价格和投资。

为其他特定领域单独建模。对于无法使用GGM变量校准联系指标的领域（例如，扩大或缩减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的影响），则将我们的建模结果与外部模拟相结合。

[318] 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Jaypee Sevilla合著的《*Technological diffusion,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and economic growth*》，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第8713号，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02年1月。
[319] Kun Jiang等人合著的《*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nd internal vs. external technology transfer:Evidence from China*》，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第24455号，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18年。
[320] Diego A. Comin、Bart Hobijn合著的《*An exploration of technology diffusion*》，2008年。

参考文献

Daron Acemoglu、Pascual Restrepo合著的《Robots and jobs: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2018年7月16日。

Daron Acemoglu等人合著的《*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 《劳动经济学期刊》, 2016年, 第34卷, 第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商会, 《*2018 China Business Climate Survey Report*》, 2018年1月。

上海美国商会, 《*Market access challenges in China*》, 2017年10月, amcham-shanghai.org/sites/default/files/2017-10/Market%20Access%20Challenges%20in%20China%20Final.pdf。

David H. Autor、David Dorn和Gordon H. Hanson合著的《The China shock:Learning from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经济学年报》, 2016年, 第8卷。

Wouter Baan、Lan Luan、Felix Poh、Daniel Zipser合著的《*Double-clicking on the Chinese consumer:The new health craze, the rise of the post-90s generation, and other trends worth watching*》, 麦肯锡公司, 2017年11月。

Terry Barker、Katie Jenkins合著的《*The costs of avoiding dangerous climate change:Estimates derived from a meta-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7年。

Dominic Barton著《Capitalism for the long term》, 《哈佛商业评论》, 2011年3月。

Dominic Barton、James Manyika、Sarah Keohane合著的《Finally, evidence that managing for the long term pays off》, 《哈佛商业评论》, 2017年2月9日。

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Jaypee Sevilla合著的《*Technological diffusion,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第8713号,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2002年1月。

Sally Chen、Joong Shik Kang合著的《*Credit booms—is China different?*》,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8年1月5日。

中国互联网观察,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tail market forecast 2018–2021*》, 2018年5月12日。

Diego A. Comin、Bart Hobijn合著的《*An exploration of technology diffusion*》, 2008年。

Alistair Davidson、Kirsten Messmer、Bill Wang合著的《China regulatory reform:An update on review timelines and drug lag》, 《监管焦点》, 2018年5月。

Simon Dietz、Sam Fankhauser合著的《*An economic solution to climate change that could save trillions*》,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2014年。

欧亚集团, 《*The geopolitics of 5G*》, 2018年11月5日。

欧盟委员会和HR/VAP对欧洲理事会报告, 《*EU-China – A strategic outlook*》, 2019年3月12日。

中国欧盟商会, 《China manufacturing 2025:Putting industrial policy ahead of market forces》, 2017年3月。

Nancy Fullman等人合著的《Measuring performance on the Healthcare Access and Quality Index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and selected subnational locations:A systematic analysi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6》, 《柳叶刀》, 第391卷, 第10136期, 第2236–71页, 2018年6月2日。

Jeff Galvin、Jimmy Hexter、Martin Hirt著《Building a second home in China, McKinsey Quarterly, 2010年6月。

Ranjay Gulati、Nitin Nohria、Franz Wohlgezogen合著的《Roaring out of recession》, 《哈佛商业评论》 , 2010年3月。

Melanie Hart、Luke Bassett、Blaine Johnson合著的《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coal in China is wrong》, 美国进步中心, 2017年5月15日。

C. Robert Haywood著《Mercantilism and Colonial Slave Labor, 1700–1763》, 《南方历史期刊》, 1957年11月, 第23卷, 第4册。

Daniel Holbrook著《Government support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Diverse approaches and information flows》, 《商业与经济史》, 1995年冬, 第24卷, 第2册。

Chang-Tai Hsieh、Peter J. Klenow合著的《Misallocation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经济学季刊》, 2009年11月1日, 第124卷, 第4期。

《Assess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nufacturing an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第13806号行政命令联合事务特遣队对特朗普总统报告, 2018年9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World Economic Outlook:Challenges to steady growth*》, 2018年10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 2018 年10月版 2018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组织, 《*Making trade an engine of growth for all:The case for trade and for policies to facilitate adjustment*》, 2017年4月10日。

Kun Jiang等人合著的《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nd internal vs. external technology transfer:Evidence from China》,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第24455号,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2018年。

Kim Kihwan著《The 1997–98 Korean financial crisis:Causes, policy response, and lessons》, 新兴市场经济危机预防系列讲座, 新加坡, 2006年7月10日—11日。

Tom Kompas、Van Ha Pham、Tyong Nhu Che合著的《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GDP by country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gains from complying with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地球未来》, 2018年7月13日, 第6卷, 第8期。

Denise Eby Konan、Keith E. Maskus合著的《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in a developing country》(英语), 政策研究工作论文第WPS3193号, 世界银行, 2004年。

W. Raphael Lam等人合著的《Resolving China's zombies:Tackling debt and raising productivity》,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7年11月27日。

Russell D. Lansbury、Byoung-Hoon Lee、Seoghun Woo合著的《Technology, human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Korean auto industry》, 国际科学、技术与创新大会: 新兴国际政策议题, 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2002年9月23日—24日。

Nicholas R. Lardy著《The State Strikes Back: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美国华盛顿特区: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2019年1月。

Lawrence J. Lau、Junjie Tang合著的The impact of U.S. imports from China on U.S. consumer prices and expenditures, IGEF工作论文第66号, 2018年4月30日。

Leviathan Security Group, 《*Quantifying the cost of forced localization*》 2015年。

Sabirina Luk 撰写的《The politics of drug price control policy in China:Regulation, deregulation, and re-regul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2015 年, 第4卷, 第1期。。

Angus Maddison撰写的《*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 经合组织发展中心, 2004 年。

Aaditya Mattoo、Randeep Rathindran、Arvind Subramanian合著的《Measuring service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An illustration》(英文版), 政策研究工作论文第WPS2655号, 世界银行, 2001年。

麦肯锡公司, 《*Chinese tourists:Dispelling the myths*》, 2018 年 9 月。

麦肯锡公司,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 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 2017年6月。

麦肯锡公司, 《*Geostrategic risks on the rise*》, 2016年5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mplications for China*》, 2017年4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The China effect on global innovation*》, 2015 年 10 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China's choice:Capturing the $5 trillion productivity opportunity*》, 2016 年 6 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Digital China:Powering the economy 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 2017 年 12 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Digital globalization: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 2016年3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Global flows in a digital age:How trade, finance, people, and data connect the world economy*》, 2014年4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2019年1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How to compete and grow:A sector guide to policy*》, 2010年3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Notes from the AI frontier:Modeling the impact of AI on the world economy*》, 2018年9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Outperformers: High-growth 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 companies that propel them* (《领跑全球——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及推动其发展的企业》), 2018年9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Superstars:The dynamics of firms, sectors, and cities leading the global economy*》， 2018年10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以及麦肯锡资本项目和基础设施实践， 《Bridging global infrastructure gaps》（《填补全球基础设施缺口》），2016年6月。

全美亚洲研究所，《*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Reassessments of the challenge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Update to the IP Commission Report*》，2017年。

Christina Nelson 撰写的《Developing China sales and distribution capabilities》，中国商业评论，2010 年 7 月 1 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Investing in climate, investing in growth》，2017年6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经济展望》，第2018卷，第2期，2018年。

牛津经济，《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2017年7月。

Robert Pepper、John Garrity、Connie LaSalle合著的《Cross-border data flows, digit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刊载于《2016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

强劲劳动力市场和国家发展项目，美国参议院小企业和创业委员会，《*Made in China 2025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industry*》， 2019年2月。Alan Reynolds发表博客文章《The Smoot-Hawley Tariff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Cato at Liberty》，2016年5月7日，cato.org/blog/smoot-hawley-tariff-great-depression。

Condoleezza Rice、Amy Zegart合著的《Managing 21st-century political risk》，《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5—6月。

Sherman Robinson、Zhi Wang、Will Martin合著的《Captu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services trade liberalization》，《经济制度研究》，2002年，第14卷，第1期。

Murray N. Rothbard著《重商主义与通货膨胀》，收录于《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第一卷，英国切尔滕纳姆：Edward Elgar Publishing出版社，1995年。

Katsuro Sakoh著《Japanese economic success:Industrial policy or free market?》，《*Cato Journal*》，1984年秋，第4卷，第2册。

Oleksandr Shepotylo、Volodymyr Vakhitov合著的《Impact of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on productivity of manufacturing firms:Evidence from Ukrainian firm-level data》，讨论文件第45号，基辅经济学院，2011年。

Zheng (Michael) Song、Guiying Laura Wu合著的《Identifying capital misallocation》，2015年1月。

Lisa Tam、Soojin Kim合著的《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 China》，《亚太通讯期刊》，2017年1月，第27卷，第2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彭博新能源财经， 《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report 2018》，2018 年。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7 年年报， 2017年11月15日。

美国常驻WTO代表团，《An undifferentiated WTO:Self-declared development status risks institutional irrelevance》，世界贸易组织，2019年1月15日。

Erik van der Marel、Hosuk Lee-Makiyama、Matthias Bauer合著的《The costs of data localization:A friendly fire on economic recovery》，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2014年5月。

John Van Reenan、Linda Yueh合著的《Why has China grown so fast?: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s》，牛津大学经济系，工作论文，2012年1月。

Dorcas Wong 撰写的《China's new negative list targets unified market access》，China Briefing，2019 年 1 月。

Fangning Zhang、Josie Zhou著《What's next for pharma innovation in China》，麦肯锡公司访谈，2017年9月

相关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

《全球化转型报告：贸易和价值链的未来》（**2019**年**1**月）

随着发展中经济体的需求增长和新行业力量的崛起以及新技术浪潮的涌现，全球价值链正在被重塑。

《数字时代的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2017**年**12**月）

作为数字科技的全球力量，中国一定会随着企业的数字化在营收和利润方面出现巨大的转变，推动中国的全球竞争力。

《中国在下一代全球化中的角色》（**2017**年**4**月）

在寻求保护全球化利益而又应对下行风险方面，中国能够发挥领导作用。该讨论文件涵盖这些领域的机会，例如利用强大的搜索能力指引共享科技挑战，努力构建全球网络。

《中国的选择：抓住**5**万亿美元生产力的机会》（**2016**年**6**月）

绝非易事，但从集中投资的经济体转为生产力导向型经济体，到2030年可为中国的增长带来万亿美元的新增财富。

《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的新时代》（**2016**年**2**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这份报告发现数据和信息的高速流动现在产生的经济价值

高于全球商品贸易所产生的经济价值。

《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2015**年**10**月）

中国在客户服务和制造业方面的创新成果显著，但在更为复杂的领域表现一般。但中国需要复杂领域的创新来保持增长。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19年7月
Copyright © McKinsey & Company
Designed by 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www.mckinsey.com/mgi

@McKinsey
@McKinsey